

#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

第一时期

1917 — 1923

[法] 夏尔·贝特兰著



#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

第一时期 1917—1923

〔法〕夏尔·贝特兰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Charles Bettelheim*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URSS**

Première période 1917-1923

SEUIL/MASPERO

1974

根据法国瑟伊-马斯佩罗出版社

1974年版译出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

第一时期 1917—1923

〔法〕夏尔·贝特兰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5 字数 343,000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171·239 定价：1.90元

**内 部 发 行**

## 出版说明

1974年5月，法国瑟伊-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国内阶级斗争》一书的第一卷，作者是法中友协主席、经济学教授夏尔·贝特兰。

据作者说，他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苏联问题，至今将近四十年，并曾多次访问苏联进行实地考察。1968年苏修侵捷事件后，他感到必须对今天苏联社会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如果不研究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情况，就不能很好了解苏联变修的原因和过程。并认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国革命经验提供了正面的教益。因此，他决心写几卷书，试图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阐述苏联是怎样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对内“存在着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剥削关系”、对外“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的。

我们现在译出的第一卷，是写1917至1923

年间列宁领导时期苏联的阶级斗争情况的。以后几卷将分别写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苏修上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现尚在撰写中,据称即将陆续出版。

在第一卷中,作者收集了大量材料,对列宁领导时期苏联的阶级斗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最困难的事情不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是摧毁旧的社会关系,并防止它的复辟;法律上确定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足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消除阶级存在的条件;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新生产关系的幼芽;苏联在1936年宣布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阻碍了苏联无产阶级去继续改变生产关系,摧毁阶级存在的基础,等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作者自称要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决裂”,跳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在本书的论述中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缺点和错误。如作者对列宁领导时期苏联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有很大的片面性,没有反映当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主线和全貌,没有充分

肯定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没有阐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因而也就没有突出列宁路线的伟大胜利。作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时，有不少曲解之处，如认为“从生产力提问题”就是一种“经济主义”，错误地认为列宁有“经济主义”思想，马克思也没有完全排除“经济主义的概念”；曲解列宁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论述，对于“战时共产主义”作出了与列宁截然不同的错误评价；曲解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的思想，并不顾历史事实错误地指责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忽视了农业合作制。作者在看待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制度、民主集中制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观点，既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是最大的民主，也不充分肯定对阶级敌人镇压的必要性，而是一再抱怨专政机关“专横”、“镇压过分”，甚至在本卷结尾部分把它列为布尔什维克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任务中的“政治障碍”。此外，作者在叙述这一时期的苏联国内阶级关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变革时，过低估计无产阶级在国家机器中的决定性作用，过高估计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在国家

机关和经济部门中的力量，又过分强调当时保留下来的部分资产阶级的分配关系，忽视列宁对于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许多论述和一系列规定，因而作出了在列宁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所谓“国家资产阶级”的错误结论。

总的来说，本卷虽有上述一些重大的缺点和错误，但对研究探讨当时苏联的阶级斗争，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它对促使当前各国进步人士研究苏联怎样变修，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卷是在短期内翻译出版的，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如须引用译文，请核对原书，并注明原书版本、页码。

1975年10月

# 目 录

序言	1
(一)成为问题的生产力问题占了优势	39
(二)明确今天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 必要性及建立这些社会关系的条件	60
“第一时期”的简介	67

## 第一部分

### 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第一章 在1917年2至10月期间互相 交错的革命过程	81
第一节 苏维埃运动的高涨	88
(一)工人阶级和苏维埃的发展	90
(二)士兵、农民和苏维埃的发展	93
第二节 十月革命条件的成熟	98
(一)1917年2至10月间革命新形势的发 展	99



(二) 1917年10月的起义和革命·····	101
第三节 俄国革命从1917年4至10月所 经历的阶段·····	105
(一) 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斗争和1917年夏 季革命所经历的民主新阶段·····	107
(二) 工人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斗争和1917 年十月革命越过的无产阶级新阶段·····	110
第二章 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 级关系·····	112
第一节 1917年和十月革命后布尔什 维克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和局 限性·····	115
第二节 1917年10月无产阶级政权的 形式和特点·····	122
(一)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	123
(二) “国家政权”和工农联盟·····	127
第三节 苏维埃政府和苏维埃机关的建 立·····	135
(一) 人民委员会·····	139
(二)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39

(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关系·····	141
(四)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	144
(五)国家行政机关·····	146
(六)红军·····	147
第四节 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领导作用···	149
(一)为争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占首要地位而进行的理论斗争·····	152
(二)建立和发展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斗争·····	159

## 第二部分

### 在 1917 至 1921 年期间苏维埃政权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

第一章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173
第二章 城市中阶级关系的变化·····	184
第一节 关于工业和商业的当前措施·····	185
(一)没收·····	186
(二)工人监督·····	188
(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对生产过程的协调·····	198
(四)生产单位领导人的任命和一长制问题·····	204

第二节	“战时共产主义”末期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地位·····	212
	(一)私人资产阶级活动的取缔·····	212
	(二)作为小私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削弱和在工厂企业、机关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处境···	216
	(三)国家资产阶级的发展·····	218
	(四)学校和资产阶级地位以后的巩固·····	228
第三节	“战时共产主义”末期的无产阶级地位·····	232
	(一)苏维埃无产阶级的“体质”的衰弱和部分的“解体”·····	233
	(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资问题·····	235
	(三)阶级的思想斗争和劳动纪律·····	240
	(四)劳动纪律和工会的作用·····	249
	(五)对劳动者采取强制措施·····	255
	(六)无产阶级地位的主要的一面——把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	260
	(七)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路线·····	264
	(八)无产阶级专政和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融合”·····	268
第四节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生产关系的出现·····	272

第三章	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284
第一节	俄国农村旧社会关系的特点·····	287
第二节	民主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土地 革命的希望·····	298
	(一) 1917 至 1918 年间的冬天的民主土地 革命·····	298
	(二) 1918 年夏开展贫农自治运动的尝试 ·····	301
第三节	1919 至 1920 年时期以及引导 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307
	(一) 农村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关系·····	314
	(二) 对中农的帮助·····	317
	(三) 征收问题·····	318
第四节	“战时共产主义”末期与新经济 政策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 政策的修改和农村中的阶级关 系·····	323
	(一) 农民的要求以及“交换自由”的恢复·····	324
	(二) 1922 年的土地法 ·····	326
	(三) 国内战争后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新经济政 策初期农村中的阶级分化·····	330

### 第三部分

## 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机关的变革

第一章 国家政权的中央机关和行政机 关的变革·····	349
第一节 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关系的变 化·····	350
第二节 取消各党派及资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报刊的过程·····	352
(一)立宪民主党及其报纸·····	353
(二)同“民主”党派的初步谈判·····	356
(三)社会革命党的政策·····	361
(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363
(五)无政府主义者·····	365
(六)孟什维克党人·····	368
(七)开展对“民主”党派及其报刊的镇压活动··	371
第三节 苏维埃各机关作用的变化·····	376
第四节 国家行政机关对于党和政府的 自治·····	379
第五节 红军的发展·····	382
(一)建立红军·····	383

(二)地方民兵问题·····	389
(三)红军的胜利和它具有的人民军队的特征···	390
第六节 契卡的成立与发展·····	396
第二章 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机关布尔什 维克党的演变·····	405
第一节 布尔什维克党与国家机关之间 的关系·····	407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关系的演变···	418
(一)党的基层组织同各上级机关之间的关系 的变化·····	420
(二)党被它的行政机构“包围”的概念·····	429
第三节 布尔什维克党的演变对其固有 职能的影响·····	436
(一)领导作风·····	436
(二)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人数及其社会成分·····	441
(三)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软弱性·····	452
第三章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的自治化 过程的客观性质·····	459
第一节 自治化过程的阶级影响和重新 摧毁国家机关的要求·····	460
第二节 阶级斗争过程的客观基础·····	463

第三节	国家机关自治化过程发展的 条件和与这个过程作斗争的条 件·····	466
	(一)当务之急·····	471
	(二)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村的历史关系·····	472
	(三)在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进行必要的社 会主义变革中缺乏足够的经验·····	475
	(四)党的理论观念和 1917 至 1922 年的总结··	476

## 第四部分

### 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 的变化·····	487
第一节	农村中“无产阶级进攻”的尝试 与转向中农的过程·····	490
第二节	征收粮食和苏维埃政权与农民 之间矛盾的发展·····	495
第三节	农民的不满情绪和布尔什维克 党对农民政策重新评价·····	500
第四节	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群众的关 系·····	503

(一)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	504
(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布尔什维克党的 领导实践·····	506
第五节 1920 至 1921 年间冬季的政 治危机·····	508
第二章 国内战争前在布尔什维主义 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519
第一节 1917 年 2 月至 10 月间的党内 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521
第二节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斗争·····	524
第三节 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和布 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526
第四节 “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国家资本 主义·····	529
第三章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思想斗争 和政治斗争·····	537
第一节 1918 和 1919 年的反对派·····	538
(一)“军事反对派”·····	540
(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新党纲·····	541
第二节 1920 年与党内危机·····	543
(一)1920 至 1921 年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立 场·····	544



(二)“工人反对派”提纲·····	551
(三)列宁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观点的斗争·····	552
<b>第四章 “战时共产主义”末期和新经济政 策初期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b>	<b>559</b>
<b>第一节 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和 1920 年同两个反对派论战         的结束·····</b>	<b>560</b>
(一)对“工人反对派”提纲的否决·····	561
(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565
<b>第二节 党的多数派同“工人反对派”之         间的分歧的局限性·····</b>	<b>570</b>
(一)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委派方式”问题·····	574
(二)国家行政机关的自治化与有效率和无效 率的概念·····	580
<b>第三节 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和政         治斗争的焦点·····</b>	<b>583</b>
<b>第四节 1921 至 1923 年间的不公开的         反对派·····</b>	<b>591</b>
(一)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	593
(二)民族问题·····	597
(三)群众路线或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	613

## 第五部分

### 列宁逝世前五年革命的总结和展望

第一章 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后不久所作的总结.....	623
第一节 俄国革命的民主的工作.....	624
第二节 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的工作.....	628
(一)“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629
(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633
第三节 俄国革命的阶段.....	637
第二章 对“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的分析.....	640
第一节 “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及其后果.....	640
(一)列宁对错误的分析.....	641
(二)“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后果.....	647
第二节 “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根源.....	649
(一)列宁对所犯错误的解释.....	650
(二)“战时共产主义”幻想的来源.....	653
第三章 “国家资本主义”.....	659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	

概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中 所占的地位·····	659
(一) 1917年10月至1918年3月实施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	663
(二) 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形式·····	665
(三) 1921年“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	666
第二节 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以及 在列宁主义中的地位·····	668
第四章 列宁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概念的演 变·····	678
第一节 1921年春新经济政策的列宁主 义概念·····	679
第二节 从1921年秋季开始的新经济 政策的列宁主义概念·····	690
(一)《论合作制》·····	695
(二) 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同国家机关 的斗争·····	700
(三) 群众路线、文化革命和经济关系的变革···	705
(四) 农民的革命作用·····	708
第三节 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主义”观点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占主要地位···	710

第五章	列宁逝世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	721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和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721
第二节	实现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的 思想障碍……	732
第三节	实现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的 政治障碍……	746
参考书目	……	756

## 序 言

我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写和怎样写这本书，并从本书和我以前著作的关系上来说明它所占的地位。

最简便的方法无疑是先说明开始写这本书的经过，并说明原来仅是一个很小的打算，后来怎样变成了一个宏伟的计划。

写这本书的直接出发点是由于苏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引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满足于对这种政治行为的“谴责”或“遗憾”，还应该对这些行为作出解释。其实，表达“遗憾”和“愿望”，只能使人们更加忍气吞声，而不能帮助他们去认识其根源，也不能为消除这种根源或不让它们再出现而进行斗争。相反，只有对那些从劳动者的利益来看确实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加以分析，才能使各种政治力量朝着不再产生使人“遗憾”的事

情的方向发展。

对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认为不应该使自己局限于“遗憾”之中，既然苏联和它的“同盟者”的军队使用了武力，那末，除了要弄清一个已遭到多次占领的民族的命运这个问题之外，更应弄清的问题是对苏联演变至今的情况作出判断。

我所以觉得我有权利研究苏联问题，那是因为我研究这个国家已近四十年了，我认为有关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具有重要性和世界意义。自1934年我开始学习俄语时起，其后，1936年我在苏联研究它的计划工作，1939年出版有关这个问题的书，1946年出版专论计划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另一本书，1950年发表论苏联经济的一本书；此后，我又多次访问过这个国家，并发表其他论述计划工作<sup>①</sup>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书籍<sup>②</sup>，这些年

① 见《制定计划和加速增产》，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64年。

② 主要指《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68年，和《经济核算和所有制形式》，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0年。这两本书也记载了两个重大的社会和政治经验，即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从1958和1960年起我就不断地分别予以注意。这两本书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兴起。这一兴起特别和毛泽东思想越来越广泛的传播有关，同时也标志了L.阿尔蒂塞尔和他的合作者在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经济学者”式的研究中出现的分裂。

来我始终是这样想的。

从根本上说，三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对苏联发生兴趣，是由于这个国家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所得的经验引起的。我对这一建设特有的困难和矛盾并没有视而不见（1936年“大审讯”<sup>①</sup>时我正在莫斯科，我每天能够感觉到莫斯科人的慌乱。那些最平常的人与布尔什维克党和第三国际的老战士们一样，对发表自己的意见怀有恐惧心理，我怎么会视而不见呢？），我不仅认为十月革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我始终是这样想的——而且还认为苏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样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矛盾，无论多么严重，我总认为这首先是俄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我认为它们不可能在别的地方重新出现，也决不能阻止俄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继续前进。

虽然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出现的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的趋势，反而更加发展了；但是，苏联自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所获得的无可争议

---

<sup>①</sup> 这一审讯的主要被告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每天早晨，莫斯科人在书报亭前排队，为了买到报道审讯情况的报纸。

的经济成就，特别是在工业方面的成就，以及红军对希特勒主义的胜利，战后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政府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援助，似乎都证明我上述的评价与预见。

虽然苏共二十大本身对以往岁月不加区别，对引起大规模的镇压行动的困难和矛盾没有进行任何分析，而仅仅代之以对斯大林个人的指责（把斯大林作为过去“消极”方面的唯一应“负责任的人”），但似乎还是肯定苏联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走上了更广阔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并为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开创了更广泛的可能性。这次大会似乎也表明苏联共产党保持了、或者进而说是重新获得了对纠正错误所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的能力。<sup>①</sup>

事实远非如此。对苏联社会的和历史的矛盾的现实，没有进行任何分析。应该受到谴责或改造的现实的各个方面，也没有与苏联的内在矛盾联系起来加以阐明，反而解释为“个人”行动（斯大

---

<sup>①</sup> 这也是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个意见发表在两篇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这两篇文章于1956年4月5日和同年12月2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般认为是毛泽东的文章。



林的)所引起的“倒行逆施”。苏联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虚假的解释，证明它已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武器，使马克思主义不再能真正地帮助改变产生那些口头“谴责”的社会关系。这个虚假解释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使命：巩固那种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阶级关系，因而使这种阶级关系所产生的矛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为深化了。

社会矛盾的深化所造成的许多后果之一，是苏联经济的日益退化。那些与苏联有联系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推行的是同一条政治路线。他们没有去解决社会矛盾，而是采取了试图使经济制度“更好地运转”的“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扩大厂长的权力和使经济管理的资本主义形式和准则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

与苏联领导人及其“兄弟国家”领导人的愿望相反，各种各样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任何困难。当然，也曾获得一些有限的暂时的“成就”，但失败是主要的：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日益增加；外债上升；工业增长率的显著降低和供应上的困难。人们可以看到，劳动者对自己

处境以及对那些“经济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后果所表示的不满正在迅速增长。

众所周知，1970年12月在波兰所发生的事件：波罗的海的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什切青、索波特等大城市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造成物价高涨和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政府政策。对进行斗争的波兰工人的镇压，促使他们开展反击，占领了党的地方机构和政治警察机关，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虽然警察部队进行了严厉镇压，打死和打伤许多工人，可是后者坚持反抗，继续罢工，迫使政府改组领导班子，同他们进行谈判并对某些要求作出让步。<sup>①</sup>

波兰“事件”成为苏联集团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他们本国政府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大家知道，这一事件在苏联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在苏联领导阶层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这一恐慌具体表现在1971年经济计划的修改以及镇压的加剧。

---

<sup>①</sup> 在波兰港口所发生的事件以及1970年12月武装冲突之后谈判的细节，可参阅《盖莱克是怎样对付什切青的罢工者的》，巴黎，塞里奥出版社，1971年。

近几年来,在苏联国内,加强镇压越来越明显,新的警察措施和人们所知道的集中营内人数增加到二百万人(估计数字)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国内矛盾加深的基础上,苏联对外政策的特点是,越来越明显地否定过去苏联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过去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援助,自1960年以来——以意识形态“分歧”为借口——则改为蓄意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的行动,特别是片面撕毁缔结的协定,停止供应建设中的工厂所必需的器材,撤退工程技术人员,等等。这样,苏联企图——但毫无效果——利用过去同这些国家建立的经济关系,对它们施加粗暴的压力,迫使这些国家屈从它的霸权。

总的说来,苏联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大国的政策,即从与它有紧密关系的其他国家身上,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政策导致苏联同美国既有勾结又有矛盾。这两个大国正在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相互进行斗争。它们不惜损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以达成妥协。他们嘴里说“缓和”,而实际上却在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军备竞赛,美帝国主义事实上继续在

对越南人民进行战争。

苏联为使自己和美国处于同等地位，也就是说，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正在建立一支前所未有的进攻性军事力量，拥有能在全全球范围内进行干预的巨大手段。为了具备与美国相等或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的力量，苏联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作为军事开支（美国是百分之七到八）。它年复一年地在中国边境增加处于战备状态的部队，但它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是面向西欧，并且同样也增长得很快。

为了拥有推行帝国主义式的对外政策手段，苏联领导人把沉重的负担压在苏联人民身上，损害国内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最终，他们不得不向美帝国主义寻求财政和技术援助，尽管经常碰壁。

对这种演变（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其中一个事件）的思考，促使我对苏联的过去重新进行分析，因为不可能设想这个国家今后所走的道路只是与几个领导人的“个人责任”有关。这些人的上台和他们推行上述政策的可能性，只能用今日统治着苏联的社会关系性质来说明，而这些关系是在过去的长时期内形成的，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

分析。

我要进行的这个分析，还可以用我从中国和古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中所获得的经验作为依据。

对古巴，我有十分具体的实践经验，因为在1960至1966年期间，我曾多次参加过关于古巴经济计划问题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从那时起就重新研究一整套的理论，即有关制定经济计划的条件、计划化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意义以及在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商品和货币关系存在的作用。

为了阐明本书中所有论点的性质，并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些论点同我在以前两本书中（这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研究古巴问题的成果）所阐述的论点的关系，回顾一下上述两书中各种论点的范围不是无益的。

《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一书引用了1962至1967年期间一系列的论述和文章，在这本书中，我曾把在古巴和苏联都存在的商品和货币关系同实际上彼此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尽管执行了经济计划）的关系联系起来，因此是作为“经济专

题”<sup>①</sup>来对待的。

因而我提出的分析是要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真正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因此人们不能只限于宣布“废除”这些社会关系，并坐待它们“消灭”）来解释商品和货币关系以及工资关系的存在。在这一分析的范畴内，商品和货币关系是作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而出现的：它们是这些社会关系的结果，同时也是这些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客观需要。

今天，我认为在 1962 和 1967 年我提出的特定的分析方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根据新的考虑，参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特别是从文化革命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极为严肃地修改过去的提法。

从 1962 至 1967 年间我写的文章的主要弱点在于，被认为是客观需要所强加的东西，主要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sup>②</sup> 虽然我在文章中也

---

<sup>①</sup> 见前引夏尔·贝特兰著作《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 30 页。此处所述问题在该书第 70 页起和第 175 页起均有论述。

<sup>②</sup> 同上书，第 45—77 页，特别是第 48 页。

讲到了“生产力的性质”的概念，但没有充分阐明这个概念的确切意义。结果，就没有阐明全社会统一的政策（其中经济计划只能是它的手段）所遇到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在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重新出现以及与之并存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后者虽然是这种分工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了这种分工重新出现的社会条件（使个人和企业作为“主体”“行使其职权”，把他们的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如果集体利益不和一项旨在为有效地消除对立阶级利益而创造条件的政策相结合，集体利益就只能具有暂时的或虚幻的性质）。

所以，在以《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为名重新发表的著作中没有表达清楚的是绝不能单靠生产力的发展来消除劳动分工的资本主义形式，也不可能消除资产阶级的其他社会关系。没有提到的一点，即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和在正确领导下开展的阶级斗争——依靠群众的科学实践和理论分析——才能着手解决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解决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关系问题，从而消除资

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因为使剥削和压迫关系得以再产生的，就是这些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关系。

如果我在 1962 至 1967 年未曾提出后来才阐述的那些思想，这是因为我当时仍深受“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概念的影响。这种概念曾在很大程度上在欧洲占据优势，其实不过是列宁称之为“经济主义”<sup>①</sup>的另一种特殊形式而已。正是那些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可以吸取的经验，使我进一步同“经济主义”决裂，并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这个内容长期来被欧洲工人运动所特有的“经济主义的”实践所伪装和“掩盖”——重新结合起来。<sup>②</sup>

在《经济核算和所有制形式》中——我曾在该书中预告准备分析苏联的社会结构——我开始放弃以前的提法，即认为商品和货币关系的消失和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还是多少有些“直线式”的发展），而不是把社会关系的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正如我已说过

---

① “经济主义”的问题以后再讲（见本卷第 39 页起）。

② 见夏尔·贝特兰：《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组织》，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3 年。



的，只是在最近几年——部分地是由于对文化革命及其意义进行了思考——我才更系统地注意到放弃“成为问题的生产力问题”，即放弃那种把改变社会关系片面地从属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意味着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1968年到现在写了一些文章论述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sup>①</sup>，特别是我对苏联进行了新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抓住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以及今天在这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与实践的特点。

1969年初，我写完了第一篇文章（未发表）阐述这个分析的结果，指出今天苏联在国家所有制的掩盖下存在着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剥削关系，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关系的存在形式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一特殊性质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人们从恩格斯那时起已经知道，国家资本主义无非是“发展到顶的资本主义”。

可是，再读一下我当时所写的文章并加以剖析，我就觉得它缺少历史背景。如果不与苏联的

<sup>①</sup> 见保罗·斯维济和夏尔·贝特兰：《有关社会主义当前几个问题的书简》，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2年。

过去联系起来，就不能理解苏联的今天。仅仅使人看到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和实践是不够的，还得说明为什么它们能达到今天的统治地位。应该思考一下，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以什么方式、通过哪些斗争和矛盾演变成为一个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不惜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以保护它自身的大国利益。

归根到底，对苏联发生变化的分析，至少是同对它的现状的分析同样重要。这种分析能够成为无法取代的教益的源泉，并帮助别的无产阶级革命避免走上同样的道路，即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某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与各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形式具有同样的压迫性和侵略性。

尽管存在困难，但目前的时代要求完成这样的分析。即使有缺陷，这一分析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过去（这个过去也就是我们的现在），了解为什么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会走向它的反面：资产阶级反革命。

苏联的经验证明，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首先要摧毁旧的社会关系

——在这些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再建立起一种类似人们认为已被彻底推翻的那种剥削制度——，其次是阻止在新的社会关系中以还会长期存在的旧因素为起点重新组成旧的社会关系。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懂得是什么原因使胜利了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变为今日苏联的现实。不懂得这一点——尽管可以从中国革命的成就中取得积极的和无法取代的教益——就会产生巨大的危险，即不管在哪里发生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会变成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

所以，我感到在1969年写成的文章已经不够了。我认为，在发表之前加以修改的同时，有必要对苏联的过去进行分析，作为补充。在着手这一工作时，我看到它至少同以前的分析一样复杂。首先，因为它涉及的这段历史时期要长得多，这段时期中的事件和斗争要多得多；其次，除了苏联的特定的历史以外，还需要努力去探求矛盾的普遍性，而苏联历史的特殊性本身则是这些矛盾的一种存在形式；事实上，如仅就这特殊性本身而言，它就

会显得“偶然”、“出乎意料”，使人不能从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预期的目的是要达到对苏联历史有充分正确的认识，除了写苏联历史外，还能写其他的书：对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的阶级斗争进行具有充分普遍意义的分析，虽然这分析是按苏联现代史特点的角度加以说明的。因此，我分析了苏维埃社会形成所经历的各个决定性时刻，并试图确定在各该时刻存在过和曾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我也试图弄清改变这些社会关系组合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可是为进行改革而从事的斗争所实际产生的效果往往与预定的目标完全不同。本卷叙述了这一工作的初步成果，这项工作应导致分析今日苏联的现实，而如果对形成目前这个现实的那些条件缺少足够的认识，这个分析将有一部分是不可理解的。

上述分析延长了对 1962 至 1967 年间已开始的修改工作。

这个修改以及对苏联现状和过去的具体分析，使我逐步同“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僵化的、简单化的概念决裂，并同我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革命内容重新结合起来。<sup>①</sup>

本卷只阐述了这项分析的一部分成果，但是我有必要在这篇序言中概括一下，因为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一个是“个人阅历”而对读者兴趣不大的事情。

如同我在上面提到的，我所试图摆脱的“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我“个人的”东西。第三国际的欧洲各支部在其同列宁主义日益分裂时，就使这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在欧洲占据了优势（这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即当我开始思考有关社会主义的诸问题时）。这种“简单化的马克

---

<sup>①</sup> 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重新结合”，当然不是“重新发现”大约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已经明确提出的论点，而是在今天能从那时以来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重新结合”就是消除一些内容错误（尽管在一段时期内看来好象是正确的）并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思想，以及消除一些阻碍从阶级斗争及其影响的具体分析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正如列宁在谈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时曾写过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见《我们的纲领》，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492页（中文版，1972年，第1卷第203页）。

思主义”自身就具有——即使不是萌芽，至少给萌芽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现代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前提，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为了促使苏联国内外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得到巩固。

为了弄清楚苏联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而要求对本书应与之决裂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方面进行分析，那是徒劳的（读了这篇研究材料就能发现其主要之点）。另一方面，必须阐明和讨论它的几个明显的或含蓄的论点，以便更好地了解后面文章中正在进行的修改的意义以及将归纳在本书最后一卷中的那些结论的意义。

为了重新给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真正的革命性质，必须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三个论点决裂。这就是关于阶级关系的基础、生产力的作用以及国家存在和消亡的条件等三个问题。我将简单地说一下这三个论点和它们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客观上所起的作用。

### (1) 阶级关系和所有制的法律形式

必须与之决裂的第一个论点是，把所有制的

法律形式和阶级关系“机械地”等同起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斯大林于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sup>①</sup>上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sup>②</sup>，就这个论点作过清楚的阐述。

在这个报告中，斯大林总结了苏联在1924至1936年间所有制形式的变更。他指出在这段时期中，法律上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私人所有制已事实上被消灭并代之以另外两种形式的所有制：在工业、运输、商业和银行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于是他得出结论说：

“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sup>③</sup>

根据这个报告的提法，今后只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

---

① 应为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译者

②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巴黎，诺尔曼·白求恩出版社，1969年，第2卷第748页起（中文版，1972年，第599页起）。

③ 同上书，第752页（中文版，1972年，第603页）。

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sup>①</sup>。

在报告的结论部分，肯定了（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之间）阶级的政治经济的矛盾必然会“缩小”和“消失”<sup>②</sup>。

接受这样的论点，就妨碍了对苏联事实上不断在产生的矛盾的分析，并使人对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政权丧失给任何资产阶级这种观点感到不能理解，因为资产阶级似乎不能再存在，除非将“重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样的论点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认为阶级斗争到此已经结束。

生活本身证明（或者提醒）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的变革不足以消除阶级存在的条件，当然也不能消除阶级斗争的条件。这些条件事实上并不存在于所有制的法律形式中——马克思和列宁对此曾多次强调过——而是存在于生产关系中，那就是说，在社会占有过程的形式中，存在于这个形式所确定的生产者的地位中，确切些说，就是存在

---

<sup>①</sup>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巴黎，诺尔曼·白求恩出版社，1969年，第2卷第755页（中文版，1972年，第605页）。

<sup>②</sup> 同上。



于这些人在社会生产中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之中。<sup>①</sup>

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国家所有制形式或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存在，还不足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使对抗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消失”。资产阶级可以找到几种改头换面的存在形式，特别是以国家资产阶级的面貌出现的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改变所有制形式，而且还要改变社会占有的过程，并从而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更加复杂和更加长期的任务，以此来保证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向

---

<sup>①</sup>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见列宁：《伟大的创举》，载《列宁全集》，第29卷第425页；译文根据俄文第4版，第24卷第337页校正，《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4卷第10页）。可见，列宁认为社会不同阶级的地位可“由法律来……规定”，但是，那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至于阶级的定义则并不包括生产资料的“法律关系”。

社会主义过渡也是与这个过程相同的，只有这个过程才能使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连同资产阶级本身都被消灭。

以上所讲的并不是“新东西”。事实上，只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马克思和列宁的话罢了。

按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必要的过渡。<sup>①</sup>

按列宁的说法，他屡次提醒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他又指出，“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sup>②</sup>。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不局限于所有制法律关系的变革，而根本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变革，其中包括生产关系在内。列宁经常

---

<sup>①</sup> 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于 1852 年 3 月 5 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首次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书简》，巴黎，社会出版社，1972 年，第 3 卷第 79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332—333 页）。

<sup>②</sup> 见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 年 11 月 7 日，载《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111 页（《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 年，第 4 卷第 91—92 页）。

强调这个主要思想，即相对地讲，“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特别困难的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sup>①</sup>。

这样，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在几年内“完成”。<sup>②</sup>

当然，要理解苏联社会的变革和在苏联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不改变所有制的法律关系），就必须放弃这样一种论点：只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以及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形式占了优势，就认为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如果那样，还向哪个阶级专政呢？）；应该回到列宁主义的下列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59页（中文版，第31卷第45页）。

② 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内部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施加的影响，曾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把生产关系变成简单的法律关系的倾向。在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当时曾经幻想只要扩大国有化和禁止私营商业（代之以不经过市场的征购和分配措施）就等于“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关系，从而错误地用“战时共产主义”这一名词来表明这个时期的特点。正如列宁所承认的那样，当时形成的幻想导致了“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列宁全集》，第33卷第57页（中文版，第33卷第44页）。

## (2) 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在三十年代，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第二个论点是，使发展生产力居于首位，它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历史的动力”。当时这种论点有强加给第三国际欧洲各支部的趋向。

在一段时期内，人们接受了这个论点，于是就以为这就是一种对苏联社会结构内特有矛盾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再也找不到阶级斗争，人们假定它正在“趋向熄灭”或已经同对抗阶级一起消失了。

在斯大林于 1938 年 9 月写的题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sup>①</sup> 一文中可以找到以一种非常一般的形式阐述这个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动力的论点。

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这样说：

“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sup>②</sup>

---

<sup>①</sup> 见前引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问题》，第 785 页起（中文版，1972 年，第 629 页起）。

<sup>②</sup> 同上书，第 808—809 页（中文版，1972 年，第 648 页）。

这种论点不否认阶级斗争的作用——既然存在着敌对阶级彼此冲突的社会——但把这种作用置于次要地位上：阶级斗争的作用主要在于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产生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事实上，在上面援引的文章中，斯大林承认新的生产关系能够不依赖于革命进程而自行产生。他说：“……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sup>①</sup>。

可以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找到类似的提法，但是，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表明，对他来说，历史的动

---

<sup>①</sup>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17页（中文版，1972年，第654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生”的这个论点，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相矛盾的，那末它只是暗示着……“无阶级社会的生产的新的物质条件和交往关系（已经）在原来的社会的母腹中孕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巴黎，人类出版社，1967年，第1卷第97页，译文根据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德文版第77页订正）。马克思在这里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摧毁了地方主义，发展了可以互相比较的条件和“世界性”关系。（同上书，第98—99页及第78页，德文本。）

力是阶级斗争，只要阶级存在，那就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社会关系。马克思的著作也表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只能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同样，假如列宁——象孟什维克那样——坚持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因为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内发生），那末，他就再也没有可能提出“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的理论了（这个理论使人们可以理解俄国应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唯生产力论的论点阻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充分发展，并引出错误的政治观点，例如（斯大林在前引著作中提出的）：“……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候，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sup>①</sup>

把这个生产力概念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中来看，必然会发生许多困难。但是，就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个论点来说，它却是必然得出的结论。

---

<sup>①</sup> 见前引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问题》，第808页（中文版，1972年，第647页）。

这两个论点的联系以下列方式体现出来：例如，斯大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sup>①</sup>。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的这一公式所引出的困难之一是，它抹杀了经济基础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矛盾。在1951年，斯大林对他以前的提法作了部分修改，他谴责了亚·伊·诺特京按字面来解释他的“完全适合”的提法，并申明这一公式所指的事实只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sup>②</sup>。

以上两个论点（苏联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及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论点），从思想上和政治上阻碍了苏联无产阶级为改变生

---

<sup>①</sup>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15页（中文版，1972年，第652页）。

<sup>②</sup> 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1971年，第40页），引自《苏联研究》1952年11月号第32—33页。

产关系而采取的一切有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就是：摧毁占有过程的现存形式——阶级关系再生产的基础（见本卷第 21 页），以便建立一种新的占有过程；排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社会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从而得以摧毁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事实上，一方面，认为阶级已被消灭了。另一方面，认为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因此就认为所有一切可能产生的矛盾都会有赖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而被及时消除。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无产阶级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似乎就是尽快地增加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保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样地得到发展。所以，当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技术决定一切”和“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关于这两个论点，人们能理解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所指出的，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sup>①</sup>。



说实在的，对阶级斗争规律的这种认识并不是斯大林独有的。在这里，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例如关于党内团结和斗争的关系的观点），斯大林只是系统地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党内领导阶层的观点。不管外表如何，他的作用主要是象齿轮一样，转达和集中了反映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社会内正在发生变革的方向。这种作用使党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反潮流，就是说不能使实践和理论革命化。尽管斯大林有时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惧怕和保留表示满不在乎，但他并没有真的去“反潮流”<sup>②</sup>，他只是把党的领导阶层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能产生的后果提出来。斯大林坚持到底的态度使他明显地超越于党“之上”，并使一

---

①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年，第14—15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中文版，第462页）。

② “反潮流”对于一个革命政党的战士来说，不管职位高低——即使处在少数的地位——要努力去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以妥协、掩盖观点的分歧并改变党内力量对比，或者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对某些人施加压力，改变领导机构的组成，使自己的观点“得以实现”，那末，这并不是真正的反潮流，而是通过组织上的斗争，把自己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强加于人。

些观点——除了极少数例外<sup>①</sup>——看起来似乎是“他自己”的。其实，这些观点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由于他的支持这些观点才显得特别具有权威，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事实上，这种“认识”统治了第三国际欧洲各支部的思想和政治观点，并使苏联的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被掩盖起来；由于这个原因，也促使人们要到阶级矛盾“之外”去寻找苏联所发生的严重困难的原因。

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论点解释了这个“之外”：因为生产力“不够发达”，苏联才面临巨大困难，因此它必须采取更远离布尔什维克旧党纲认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一系列措施。它必须扩大工资差距，发展奖金制度，不断增加技术人员的特权，加强企业领导人的个人权力，等等。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人来说，上述两个论点已经相当“明显”，可以对矛盾和现实的问题

---

<sup>①</sup> 在罕有情况下，斯大林才毫不顾忌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这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下一卷中，我们再来分析原因，在这些场合他做的说服工作是很少的。

进行分析。但是即使人们看到了这些问题，也被放到将来去“解决”，即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去解决。

为了理解我们所讨论的这两个论点是“明显的”（在现代修正主义和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心目中也都是“明显的”），应该注意这些论点所表达的不是斯大林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欧洲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革命的一翼的观点。<sup>①</sup>

在这里，再讲几句关于托洛茨基对这两个论点的立场并不是无益的；事实上，这些立场虽然同斯大林的立场近似，还是使托洛茨基作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

同斯大林一样，托洛茨基也认为在生产资料集体化或国有化之后，“再也不存在有产阶级了”<sup>②</sup>，因为已经没有“私人财产”了。为了使他的观点更加明确，托洛茨基又说，苏联不存在“有产阶级”，因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建立”不许可

---

<sup>①</sup> 曾经有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和一些小的组织，特别是在德国，有时表示不同意这些论点的政治结论和某些思想前提。但是，这些理论家或组织（属于当时的“左翼”）一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那些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上，他们从来没有离开他们所批评的人的立场，这一共同立场就是“经济主义”。

<sup>②</sup> 见《被出卖的革命》，载《论革命》，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第456页。

“官僚阶层”支配可以作为遗产来馈赠的“有价证券”或“股票”<sup>①</sup>。可是,他又说,“在文明社会里”,是“法律规定生产关系”<sup>②</sup>,这使生产关系显得好象是在上层建筑的范围内,而不是同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进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相适应的东西。

从托洛茨基那里也能找到斯大林的公式,但是,无疑是以歪曲的方式出现的。根据这个公式,无产阶级的纲领应该“首先来自生产规律”<sup>③</sup>,他这样写道,“马克思主义来自技术的发展,作为进步的主要动力;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纲领”<sup>④</sup>。

这些相似之处只能使人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分别得出的不同的结论感到更加惊异。

对斯大林来说,事实上,社会主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托洛茨基来说,由于下述两个主要原因而不能接受这个结论:

---

① 见《被出卖的革命》,载《论革命》,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第603页。

② 同上书,第602页。

③ 参阅本卷第26页。

④ 见前引著作《被出卖的革命》,载《论革命》,第473页。

其一，他认为不存在“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二——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苏联“劳动效率”（即劳动生产率）太低了，所以谈不上社会主义<sup>①</sup>；尽管托洛茨基承认同一种法律形式的“社会内容”可以变化，但在他看来，这种“变化”并不在各种生产关系中得到反映（在托洛茨基的论述中，“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没有的），但却反映在“劳动效率所达到的水平”<sup>②</sup>上，这就使他认为“一切社会组织的根基在于生产力”<sup>③</sup>。

最后，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看，托洛茨基的概念的特点是，他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论点引伸出下列两个极端的结论：

首先，以生产力水平为依据，使托洛茨基引出“资产阶级分配标准”<sup>④</sup>的概念——由于苏联生产

---

① 见《被出卖的革命》，载《论革命》，第474页。

② 同上书，第483页和第48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599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讲到的“资产阶级的框框”，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影响到产品的分配，但是，这种“框框”不是指生产力水平，而是指在劳动分工中人们的从属关系以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有关社会关系（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巴黎，社会出版社，1950年，第24-25页）。

力水平低而必须采用的标准，而这些标准的存在可能导致私有制的复辟。关于在国家所有制内部复辟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也被托洛茨基含蓄地加以否定，他未能提出真正的论据来说明他的否定是正确的。

其次，托洛茨基把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说得太过分，以致完全取代了阶级斗争。这就使他写道：

“各种制度的力量和稳定性归根结底是由劳动效率的高低来决定的。社会化的经济正在从技术上超越资本主义，它将真正由一种可说是自动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来加以保证……”<sup>①</sup>。

如果我冗长地引用托洛茨基的论述来和斯大林的论述对照，那是为了指出在什么程度上——尽管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不同——这两个论点（即关于苏联已消灭敌对阶级和生产力发展占首要地位的论点）在三十年代（一直到相当近的时期还是这样）已成为“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的东西。接受了这些论点，就会阻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对社会变革进行分析。

在后面，我将根据自己的想法，试图说明这

<sup>①</sup> 见《被出卖的革命》，载《论革命》，第475页。

两个论点为什么能这样长期地在政治思想上起作用。但是在讨论这一点之前，还得对与前两个有联系的第三个论点再讲几句。

### (3) 国家的存在和剥削阶级的消灭

接受关于剥削阶级已消灭这个论点所带来的难题之一是，苏联国家的存在不是作为一种过渡到非国家，即过渡到“公社”——按照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中所使用的、又为列宁所重复使用的名词——的形式，而是成为这样一种国家，它越来越脱离群众、拥有越来越严守“秘密”的机构，按等级制方式进行工作，每一“级”都要从属于“上”一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苏联国家存在的形式以及它拥有的机构的性质是成问题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这种国家只能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存在。这类国家机器的加强也意味着对抗的加深，随着对抗的消失，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作为镇压的机关）也将消亡，国家将让位于群众的自治管理机构。

这个问题是斯大林提出来的，特别是在苏共

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sup>①</sup>。在这个报告里，斯大林引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个提法：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sup>②</sup>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有不充实和不够的地方”<sup>③</sup>。为了补充这个不足之处，斯大林提出，国家与巨大国家机器之所以需要存在，不是基于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而是由于外部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包围。这样，就提出了如下的论述：

“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武装保护国家

---

① 1939年3月10日所作的报告，见前引著作《列宁主义问题》，第823页起（中文版，第658页起）。

②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巴黎，社会出版社，1956年，修订法译本，第319页（中文版，1970年，第277页）。

③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75页（中文版，1972年，第701页）。



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因此红军、海军以及为逮捕和惩罚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sup>①</sup>

认为有必要拥有一个庞大的内部镇压的专门机构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论点，引起了理论上的困难，因为在一个原则上已没有任何阶级准备给敌人以某种协助的国家里，群众组织本身能够担负起侦察“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敌对分子的任务。因此有必要保持国家机器的论点，便遇到一个更为具体的困难（但是，只有在人们认识到镇压的规模时——当指的是数百万人被逮捕、被监禁、被流放时，用这样的词还是不过分的——这个困难才充分暴露出来）：假如仅仅是对付“混进来”的分子以及盗贼和公有财产的盗窃者，或者是那些由于自己的“弱点”、“虚荣心”或“无气节”而被网罗到“间谍网中”去的人，那末，如何来解释必须采取那么多的强制措施呢<sup>②</sup>？这

---

<sup>①</sup>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81页（中文版，1972年，第70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875页（中文版，第700页）。

这个问题是很难用上述论点来回答的。相反，当人们不是主要地把这些事实同外国谍报机关的活动和苏联公民的“无气节”相联系，而是同既是尖锐、又是看不见的阶级斗争相联系时，你就能更好地理解镇压的规模、它的形式以及所出现的矛盾。

托洛茨基也接受了阶级压迫消失的理论，和斯大林一样，他也遇到了如何解释国家机器存在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纯经济的。他在引用恩格斯的上述提法时，突出“争取个人生存的斗争”这一点，由于这种斗争在苏联并没有消失，所以国家就依然存在，而且，“在美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sup>①</sup>，国家也还继续存在。还可以补充这个古怪的细节：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确切些说，是群众自治管理机构，即非国家——夏尔·贝特兰）应当随着社会组织的社会主义化而消失……”<sup>②</sup>。

然而，借口外来威胁和苏联公民“无气节”来解释苏联国家现有的形式，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同

---

① 见前引著作《论革命》，第478页。

② 同上书，第485页。

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承认了以上两个观点，那末，对这个观点的性质，也不可避免要承认。

我们所作的这一回顾，一定会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那些接受了前述论点的人们（而且直到最近时期，至少在欧洲，承认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人们中绝大多数也是如此）几乎完全不可能对苏联社会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的实质是不忽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影响，相反，却认为这种关系和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而这种关系在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之前必将继续存在。

但是，这一回顾还不足以回答如下的问题：为什么“经济主义”观点（上面所提到的论点是它的组成部分）能如此长久地并且还继续在思想上发挥它固有的作用？

### （一）成为问题的生产力问题占了优势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忘记成为问题的生产力问题——这是“经济主义”的一个方面——不仅在历史上与1880至1914年的欧洲工人运动，而且

还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下同俄国革命的历史，主要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历史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当时正是前所未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首次尝试。对于那些正确地把资本主义看作人剥削人的“完备”制度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制度已经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小规模战争——这个尝试在他们眼中所享有的威望，在某种意义上必然要归结为与这个尝试有关的在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里只不过解答了问题的一半，因此还应该问一下，为什么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同我们正在讨论的难以解决的中心问题之间具有这种历史联系？

对于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我只试图在这篇序言中说一下答案的要点。这些要点将在本卷及以后各卷中加以发挥（尤其因为分析苏联社会的变化需要这样发挥）。

### 1. 布尔什维克党内停止了反对 “经济主义”的斗争

答案的第一个要点甚至要回顾到布尔什维克

党本身的思想。事实上，虽然党的思想由于党的革命行动和列宁所领导的对“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而起了深刻的变化，但还远未消除所有的“经济主义”观点。随着列宁的逝世，党内的思想斗争不再带有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特点了。

值得回忆的是，列宁使用“经济主义”一词是批判地指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可以解释整个社会变革的简单的“经济理论”。

这种观点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当它未系统化之前，只能起一种比较次要的作用，而且人们也只能把它说成是一种“经济主义的倾向”。

“经济主义”的主要影响之一是把阶级的政治斗争说成是经济矛盾的直接产物，因为它把生产力的发展解释为历史的动力。这些经济矛盾被认为其本身将“引起”社会变革，而当“时机成熟”也会引起革命斗争。因此工人阶级看来必将自发地走向革命（而不需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经济主义”观点趋向于否定除了无产阶级之外的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也能够为争取社

会主义而斗争。<sup>①</sup>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经济主义”有一种趋向于把生产力和生产的物质手段等同起来的特点，它否认主要的生产力就是生产者自己。因此，“经济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特殊作用的是新的生产手段和技术知识的积累，而不是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

“经济主义”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阶级斗争不同的形势，它可以表现为“右”的或“左”的（实际上它永远是“时左时右”的）。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经济主义”曾经助长了1918年和1920至1925年期间的一些反对派的立场，其中包括一些右派特点特别明显的工会反对派。<sup>②</sup>

关于“经济主义”的“时左时右”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影响，应该提一下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普列

---

① 这里所用的“经济主义”一词不是指这个概念的某一特殊形式（例如列宁在本世纪初所反对的那种形式），而是指这个概念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

② 工会反对派要求布尔什维克党给予工会组织（被看作是保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以自治权。这种自治可以使工人阶级从提出经济要求中得到好处，造成和其他阶级的对立，而这些阶级对

奥布拉任斯基三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立场，他们企图普遍采用国家强制的方法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方法包括劳动军事化、自上而下的强加于人的纪律、国家征用和分配农产品）。这种强制被称为“无产阶级自觉遵守的纪律”，因为他们把苏维埃国家抽象地看成“工人国家”。

这种形式的“经济主义”把经济的集中领导作为“共产主义”的“实质”。它可以被看作是“右”的，因为它迫使劳动人民服从强制机构。所以它似乎是在反对一种“左的经济主义”，后者至少断言——至少是含蓄地断言——由于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工人阶级的统一以及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阶级的团结能够“自发地”实现。实际上这两种概念都坚决不承认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承认（为了很好地进

---

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是使革命前进所必不可少的。这样就可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这种作用需要无产阶级能够为革命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某些眼前利益。使目前的要求，甚至行会利益或本位利益得到满足的倾向，是工团主义的或“自治”的观点所固有的。从1921至1928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大多数“左派”反对派的纲领正好具有这种倾向。

行这种斗争) 必须有一个在正确政治路线指引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第一种观点倾向于以国家的强制方法来代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sup>①</sup>；第二种观点则倾向于以工会组织的活动来代替这一领导。后来人们可以看到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末期,这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曾导致某些布尔什维克主张“工会国家化”,而另一些布尔什维克则表示赞成“国家工会化”。

如果说,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地讨论一下“经济主义”,那不仅是因为它在第三国际的某些欧洲支部中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而且也因为“经济主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不断给工人运动提出新的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完全彻底地”清除掉“经济主义”,那是幻想。事实上,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想的土壤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只能随着阶级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

<sup>①</sup> 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一旦“建立”以后,党就不再起什么作用,可由国家机关取而代之。(见皮·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第129页)。



因此，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马克思和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都进行了这种斗争。

由于列宁采取了行动，布尔什维克党才把“经济主义”的一些最简单化的形式从党内清除掉；可是，事实上党内“经济主义”的各种倾向仍然很强。基于这个原因，列宁常常难以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也说明为什么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方式上，在苏联盛行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概念上，都深刻地打上了“经济主义”的烙印。这种观念赋予积累以特殊的作用，并且似乎把技术置于阶级之上。

上述的情况只能使人们了解一部分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和“经济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为了对这种联系有更全面的理解，必须阐明其他两种观点。首先是关于“经济主义”的社会基础，其次是关于在执行各个五年计划时期，曾明显地重新采取一整套的“经济主义”论点。

## 2. “经济主义”的社会基础

虽然不宜在这里进行一场辩论，但必须指出，

“经济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内部阶级斗争的产物。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这就是认为“思想”与社会矛盾毫不相干，是按照其自身的运动发展，并发挥其历史作用的。

我们首先应当指出，“经济主义”的最早形式是在第二国际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出来的，以“右”的面貌出现的经济主义，它与党内强大的政治和工会机构——这些机构已纳入德国的国家机器——有密切关系，这个强大机构的领导人有过这种幻想：通过他们的有组织的和要求满足切身利益的行动的不断加强，终将为推翻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尤其因为这样做，他们巩固了自己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而不必去冒革命行动所固有的风险，因此他们更是抱住这种幻想不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藻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不过这种思想意识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即工人运动的政治和工会机构的活动和德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工人阶级中某些阶层感到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相反，在沙皇的俄国没有发展合法的工人运动的条件，除了某些条

件比较“优越”的阶层如铁路工人之外，孟什维克的“经济主义”在俄国工人阶级中没有引起共鸣。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多次暴露出他们是“右的经济主义”的主要代表，十月革命以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行政官员阶层，经济、计划和财政干部阶层等等的增加，促进了新形式的“经济主义”的发展。如同人们将看到的那样，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和一些工人阶层容易成为“经济主义”社会基础的特点，“经济主义”就以右的或“左”的面貌出现。

在苏联共产党内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主义”反过来也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国际支部中引起了反响，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式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人运动相似的。

### 3. “经济主义”的论点在执行各个五年计划期间明显地抬头了

上面提到的（见本卷第24页起）几篇著作里已经很系统地阐述的“经济主义”观点的明显的重新抬头，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一方面从俄国社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深刻演变的结果来

看，另一方面从这些观点的抬头是和新领导人分不开的这一点来看，因为这些观点都是斯大林提出来的。

第一个方面显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从苏维埃俄国和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0月至1929年初这段时期发生的许多变化中产生了一个先是在实践中还很模糊、后来才得到肯定的思想，即不惜损害工农联盟，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尽快地发展生产力首先发展工业等同起来的思想。<sup>①</sup>

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当“经济主义”的观点正以胜利的姿态出现时，基本上未受到各种“反对派”思潮的反对。这些“反对派”的思潮只不过对有关政治上或行政上的某一项或全部的具体措施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对这些措施所根据的总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不反对的。甚至连布哈林也说，他对他认为是操之过急的工业化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只是为了防止产生长期的消极的经济影响，因为他认为创建工业所花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他争辩说如果在努力发展工业的初期，推行一

<sup>①</sup> 这种等同往往和列宁在一定情况下(例如在“战时共产主义”末期)所肯定的论点混淆起来。按照列宁的观点，在某些时候，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交流的工作必须看作是首要的。

种规模较小的计划，可以更快地发展成为类似那些五年计划所要实现的那种工业化。但他对这种工业化是否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并不表示怀疑（但他认为从 1929 年起所实施的那种集体化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关系）。

如果认为在执行头几个五年计划时赢得胜利的“经济主义”观点符合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的那种强烈的倾向性是确实的话，那末，人们注意到上述的这些“经济主义”观点，都是斯大林明确肯定过的。因为是他肯定的，所以，这些观点的分量就特别重了，这也是事实。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人们称之为“斯大林问题”的问题。

要谈这个问题（这只能在本书的第二卷中与 1924 至 1953 年时期的分析结合起来加以真正探讨），必须首先指出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待党内思想斗争所持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

一般说来，列宁总是把思想斗争放在首位。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进行“反潮流”的斗争，因此甚至在讨论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不止一次地被列为少数派。这也说明有人把布尔什维克党说成是“列宁主义的”党，这是错误的，这个

问题以后再详细加以讨论。

斯大林对自己的领导作用则有另一种看法。作为党的代言人，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总是首先尽力阐明党的强烈的倾向性（到 1934 年这段时期尤其如此），所以，在这方面，对斯大林进行的论战性的攻击——认为他以“个人意志”把与党无关的观念“强加”于党——是毫无根据的。相反，这些攻击恰恰说明，斯大林对无论是根据他自己或者根据几乎是全党（包括那些反对某一项具体措施的大多数党员）的观点所采取的措施，都坚定不移地严格执行的。

此外，这个党经常不断地在起变化。1929 年在党内大规模活动的社会力量与 1917 年的不同，与 1934 年或 1952 年的更加不同，这种变化的本身是与苏联社会的变革分不开的。

可是，这也是我们必须回过来要讨论的第二点。斯大林作为富有强烈的倾向性的党的代言人，使这种倾向显得更加重要，并果断地加强了这种倾向性。特别是自 1929 年开始盛行起来的“经济主义”观点尤其如此。

为斯大林所肯定下来的一些观点之所以更有

分量是由于他个人的威信所造成的。这种威信主要不是——象某些人所想象那样——与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总书记有关（在这里我们必须加以解释，而不是象有些人那样往往把原因归之于斯大林“个人意志方面”的奇闻轶事，即使这些轶事是真实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种威信是由于几乎全党从三十年代初以来都认为斯大林作出了以下双重特殊贡献而树立起来的：第一，他没有放弃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二，从党的角度来看，是他制定了导致这一结果的政策。

在列宁逝世之后，当其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准备继续执行那种只能演变成私人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或者建议实施一些不顾社会主义前途的工业化措施时，斯大林却一再重申列宁的主张<sup>①</sup>，重申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而

---

<sup>①</sup> 重新肯定列宁关于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无可争议地使斯大林在党内外享有党的任何其他领导人所未曾有过的威望（而其原因并不是都与捍卫无产阶级利益联系着的，以路标转换派为代表的俄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对斯大林提出的政策给以支持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个立场极明显地表现在斯大林在1924年12月20日《真理报》上发表的《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文章中。这样，斯大林便同几个月前，特别是在1924年4月30日《真理报》上还维护的那种非常犹豫的立场决裂了。

不使这个建设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或在世界其他各地赢得胜利。

斯大林采取了上述的立场，并制定了一项旨在取得合乎逻辑的结果的政策，以恢复苏联工人阶级的信心。他给布尔什维克党确定了与那种企图等待过好日子来维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做法不同的目标。因此，他在国内开始进行的巨大发展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这种发展后来为保卫苏联的独立和加剧帝国主义阵营的分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并使苏联在击败希特勒主义的战斗中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个工业化的政策保护了十月革命灯塔的光辉，使它永不熄灭，并加强了世界各国人民取得斗争胜利的信心，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在亚洲的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由于斯大林宣称有可能使苏联向社会主义迈进，我们可以看出他同托洛茨基的论断相反。他是列宁的继承人，因为列宁在许多著作中，尤其是最后的著作中，重申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斯大林威望的源泉之一，而且这种威望是与他具体提出的观点分不开的。事实上，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斯大林之所以能有这样高的威



望，不但是由于他本人所捍卫的那些观点，而且也应归功于苏联人民的努力、勇敢和忘我精神。由于苏联人民的劳动和英雄主义精神，才使苏联的工业建立起来了，希特勒的军队也被击败了。但是，以确定正确的目标来领导这种努力和这些斗争的正是斯大林。

当然，生活表明，在为了达到规定的目标所应遵循的途径或某些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方面，斯大林曾犯过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的确切性质，并不是当时马上可以看得出来的。<sup>①</sup> 况且，在二十年代末期苏联当时的情况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的处境，从历史观点上来看，他所犯的这些错误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他犯了一些错误，而且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后

---

<sup>①</sup> 这里是指斯大林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所犯的一些错误。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错误是和若干总的政治和理论的观点分不开的，而这些观点使斯大林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与列宁相对立（如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与各非俄罗斯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受到列宁的批评而仍坚持他的立场，这与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所处地位有关。由于这种地位，即总书记的职务，斯大林受到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双重压力，因此，他采取了那些他认为最能立即“见效”的措施，即使理论分析说明这些立即“见效”的措施会给革命的前途带来严重的危害（在关于维护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制方面，如果列宁没有取胜，情况就会如此，参阅本卷第593页起）。

果，特别是那种盲目的镇压，不仅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也打击了人民群众和真正的革命战士，而那些真正的敌人反而安然无恙地漏网了。这一事实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典型教训，因此它最终表明，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某些方式是不切实际的，反而巩固了在政治和经济机构中资产阶级的地位。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类似的但有局限性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也得到了证实。

然而，当时苏联在几年内实现了规模巨大的改造——导致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事实，使斯大林提出的并为布尔什维克党所支持的所有观点具有空前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仅是苏联而且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运动的大多数人更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 4. 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 运动中的“经济主义”

这里涉及另一个因素，它能够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主义”的观念在苏联以外同样起作用。这个因素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曾经与之斗争过的那个“经济主义”，在第三国际欧洲各支部

比在俄国支部内更具体和活跃。在欧洲，更确切地说在西欧，特别在德国和法国，“经济主义”曾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这段历史，主要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起，在很大程度上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经济主义”在欧洲的其余地区没有象在苏联那样遭到反对，由于这种情况，这就容易理解，欧洲的工人革命运动已经完全准备好要“理所当然”地接受苏联共产党的“经济主义”观点。

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问题的“经济主义”问题已站不住脚了（至少是对它二十年代末期起所具有的那种形式），这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苏联以外的中国革命。在中国所发生的事证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低”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变革不是一个障碍，也并不因此而“必然”要经过原始积累的方式和加剧社会不平等，等等。

中国的例子说明了没有必要（而事实上也是危险的）强调“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推迟与较高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这个例子说明，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变革，应

该与生产力的发展一起进行，并且这样的变革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它还说明，当变革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时，同苏联的情况相反，工业化不需要提高对农业的税收，而这种提高税收构成对工农联盟的威胁是严重的。

使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为问题的“经济主义”问题站不住脚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些正在争论中的“经济主义”观点企图从中得出“理所当然”的结论的那些事实已经不存在了。

事实上，当苏联只具有中等水平的工业，在经济方面还很落后时，在这个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看来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相矛盾，而“经济主义”就可以把它归咎于苏联的经济力量的薄弱。“经济主义”的观点使人抱有这种希望，即当苏联结束落后状态时，对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限制将被取消，收入上的不平等将缩小，少数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多种特权将被取消，对各阶层人民的压制将不再扩大。因此，苏联社会的“消极”面似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似乎是“过渡的”现象，而当上述目标将要达到或接近

时，这些“消极”面就会自行消失。因此，“事实”似乎“证实”了“经济主义”观点是有道理的，并使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苏联现实显得“没有必要”了。然而这种分析却能够揭示一种国家资产阶级的兴起<sup>①</sup>，这种资产阶级占据了领导地位，并建立了它的统治所必须的机构。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虽然仍经常遭受巨大经济困难<sup>②</sup>——今后还要明确地说明——苏联

---

① 关于“国家资产阶级”（或国家官僚资产阶级）的概念在这里不予详述。简单地说，是指与直接生产者有区别的社会再生产的管理人员。从现有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和主要的社会实践来看他们对应该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有实际的支配权。这个资产阶级的存在的经济基础是由再生产过程的统一或分工的形式造成的（见前引夏尔·贝特兰著作《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第12页）；它在这个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取决于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允许（或禁止）国家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国家机关中占有地位，也许会改变国家的阶级性质。国家资产阶级的代表不一定是它的“自觉的代理人”。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这个阶级在“生活中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这个阶级成员“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32页）。

② 这些困难明显表现在苏联领导致力于追求从美国、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获得资本、技术援助和食品。与西方帝国主

很久以来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和欧洲第一的工业大国；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领域里，它处于领先的地位。此外，它和周围的欧洲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的经济潜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经济主义”企图以苏联的“落后状态”来解释的那些现象——这些现象本应具有“暂时的”性质——不但远未消失，而且继续存在和发展。过去产生的并被认为是当时条件和出于积累的需要“不得不”产生的特权，今天以“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为借口，已成为其国内社会关系的制度的正式部分。苏共根本不去触动这个制度，反而去加强这个制度。根本不允许苏联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日常产品的使用或者对苏共及其成员的活动进行集体监督。管理工厂的厂长同“他们的”工人只有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并且只对他们的上级直接负责。农业企业实际上也是在相似的条件经营的。在一般情况下，直接生产者没有发言权，只有当居于他们之上的党和国家的“上层”所拟定的决议或“动议”需要他们在形式上予以赞同时，才给他们发言权。

---

义搞政治“合作”，是苏联领导鼓吹的这种追求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我们将在本书第三卷中要讨论的苏联修正主义的问题。

苏联企业的管理规章<sup>①</sup> 越来越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似，许多苏联的“经理”到美国和日本的管理学校（“工商管理学院”）去学习。那些被认为应该产生越来越社会主义化的社会关系，却产生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因此，在“经济计划”的幌子下，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即利润规律决定着生产资料的使用。

生产者仍旧是为使生产资料产生价值而劳动的雇佣劳动者。这些生产资料起着由国家资产阶级管理的集体资本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用来表达资产阶级特点的说法，这个资产阶级（如同所有资产阶级一样），构成一帮“资本的经营者的”实体。执政党向劳动者提供的只是无限期地延续这些社会关系。实际上它就是“资本的经营者的”党。它在对内对外方面上都起着这样的作用。

---

<sup>①</sup> 苏联企业的管理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由唯一的负责人领导，他直接对上级负责；以及“经济核算”，引导企业追求利润。当1918年和1921年推行这两个原则时，列宁曾强调指出这是当时环境所迫的一种暂时的“退却”，实施这两个原则就在国营部门引进了资本主义关系。当谈到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时，列宁指出，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这些企业放在“资本主义商业的基础”上。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396页。1965年以来，企业的经济核算和利润的追逐有显著的发展。

对正视现实的人们来说，生活本身已否定了在巩固(更应该说是发展)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成果方面所抱的希望。今天，应该尽力弄懂为什么希望破灭，以便了解经过哪些演变才使苏联变成现在的情况。这就是本书要解决的两个目标，由于好几个原因，我认为确定目标是必要的。

## (二)明确今天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及建立这些社会关系的条件

首先，还有许多人不愿意正视现实，他们继续认为苏联就是社会主义。这严重地影响工人阶级的斗争，尤其是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事实上，在这些国家里，即使是斗争性最强的、最坚信必须结束资本主义的劳动者也认为，苏联劳动人民的命运不能令人羡慕，而且还担心——通过苏联的例子——这里所提出的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的办法，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因此，那些一直声称把苏联看成“社会主义祖国”的西方共产党领导人，同时又努力向他们国家的劳动者保证，他们所推荐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将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同。对于“如何”和“为什么原因”有这个差



别的解释是很简单的（这些解释最多也不过是虚假的“人民心理”，诸如“法国人不是俄国人”这样一类说法），并且和政治分析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解释只能说服那些本来很乐意被说服的人；对于其他人，“苏联=社会主义”这个方程式则起了相反的作用<sup>①</sup>。

第二个理由，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为什么苏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并且还要从苏联历史的纯粹“俄罗斯”面貌之外去找到解释。<sup>②</sup>因为这个“为什么”同那些“共产”党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把苏联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种“马克思主义”仍然受到第二国际“经济主义”遗留下来的严重影响。

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斗争中，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总是它的一个基本方面（无论是右的

---

① 苏联领导人显然竭力阻止对他们的政策和他们国家的现实的一切批评，他们改变了上述方程式，宣称：反苏（应读作：对苏联现实或对苏联国际政策后果的分析）=反共。

② 这些意见并不表明苏联社会不带有它所由产生的沙皇社会的痕迹。在革命事业尚未深入的时候，旧俄罗斯的很多特有的社会关系没有被粉碎，由此，今天的苏联和“神圣的俄罗斯”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或者是“左”的)。但是，正是在分析为什么苏联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一个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到“经济主义”给予致力于这个演变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的帮助，因为“经济主义”使革命战士迷失方向，解除了苏联劳动人民的思想武装。

对苏联所经历的变化和这些变化所借以发生的斗争的分析，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分析。在这些斗争中起作用的，正是那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工业化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观点（在它们的“颠倒的”形式下，即在各种不同的“左”的形式下，它们也常常在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通过苏联的典型经验，尽可能具体地分析这些观点所导致的错误，从而得出“反面的教训”，这将有助于那些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抛弃这些观点。

分析苏联的过去和现在，对修正主义党的党员和同情者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去了解苏联的过去，他们的思想实际上已经“瘫痪”。因而他们也没有能力去了解苏联的现在。这种“瘫痪”的一种表现就是求助于对“个人

崇拜”的空洞的公式，或者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即一面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一面不断声称忠于“社会主义祖国”。

这样的公式和态度是一个空前深刻的思想危机的标志，而这个危机可能是最终否定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做法的一次重新思考的前奏。这种思考必须通过努力了解苏联的过去和现在来吸取营养。可惜，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被关闭在使他们看不清真实历史的框框内。修正主义领导人显然害怕这种思考，凡那些一开始就接受对苏联的具体历史进行批判性重新思考的人，都被他们诅咒为“反苏主义”者。这种诅咒没有其他作用，只不过是企图禁止修正主义党的党员和同情者提出本质的问题。从这些问题出发，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斗争将可能象摆脱其他事情一样摆脱下列三个方面：选举主义的改良主义、所谓独立于一切政治组织的工会斗争、自发主义。

当然，分析苏联过去和现在的现实，这样做只不过是一种能够帮助澄清思想的因素，因而能够间接地有助于工人运动，特别是有助于今天统治着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已经僵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跳出它自己似乎被关在里面的那个圈子。但是，很幸运的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这些因素之一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的加剧，这个危机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以大规模的国际货币危机开始），也表现在思想方面（突出的是标志着工业化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民，特别是青年工人、大学生和妇女拒绝接受资本主义过去强加于他们的奴役形式）和政治方面（许多工业不发达国家里民族革命斗争的发展）。

面对苏联的失败，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正面教材是促使人民斗争重整旗鼓和重新制定斗争方向的另一个因素。那里，实际生活——即由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领导的群众斗争——已经指出为什么有可能解决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提出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又重新朝气蓬勃了，而且还澄清了一系列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从这方面来看，如前所述，只有今天才有可能进一步了解苏联演变的性质。

更确切地说，只有摒弃成为问题的“经济主义”问题的观点，才能懂得苏联的演变是阶级斗争

发展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掌握好，甚至越来越没有掌握好这个过程，因为它不懂得团结人民的力量，不懂得在不同的时期，对能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以及能使之中立的社会力量这三者之间划清正确界限。因而在俄国和苏联继续进行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会遭到重大的失败。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斗争在继续着，而且在一定时期内经过一些波折后——在这方面进行猜测是徒劳的——必将导致苏维埃各共和国的劳动者重新取得政权和重新建设社会主义。

1974年1月



## “第一时期”的简介

本书的目的在于分析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到列宁逝世这段时期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和它的主要后果。可以看到，本书的写作计划不是按照年月的顺序写的，因为问题在于说明当时在阶级关系，以及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等关系方面的变革。这些不同方面的变革，按照它们历史发展的过程来分析，那就有必要经常提到苏联革命在那些年代所经历过的各个重要阶段。但是，只有在进行全面分析时（见本卷第五部分），才能对这几个阶段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讨论。所以，在这里简略地提一下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的各个主要阶段是有益的。

苏联革命胜利后的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及和它有关的政治和经济的初步改革。这个阶段包括从1917年10月起义到白军开始叛

乱止(1918年5月底)。在这几个月里,苏维埃政府竭尽全力摧毁让资产阶级私人占有主要的生产和流通手段的那种经济权力,把大工业企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并把整个经济置于工人阶级的监督下,同时防止把国有化的措施过分扩大。列宁曾把这个政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sup>①</sup>的政策,便于今后进入社会主义的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sup>②</sup>。在1918年头几个月中,看来并不应该很快地跨过第二步,原因很多,有些是由于苏维埃工作有缺点<sup>③</sup>,另一些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内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只有在欧洲其余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涨时,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才能加速。<sup>④</sup>

---

① 在本卷第五部分里,能看到关于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概念的分析。

② 见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间的著作,载《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4页(《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3卷第507页)。

③ 在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1918年3月),列宁谈到建立一个“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的新的国家的任务,并说:“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同上书,第133页,《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3卷第482页。)

④ 在阶级矛盾迅速上升的推动下,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初期



事实上，白军叛乱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政治和经济方面采取的措施与原来的设想有极大的差别。这些措施使国家机器和国家强制办法起主导作用，特别是以农产品征购的形式出现，从而构成了（从1918年6月至1921年3月这一时期）“战时共产主义”的特点。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时期，俄国遭到了破坏，并濒临饥荒的边缘。“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看来对扭转局势并没有多大帮助。新经济政策实施了。开始时这一政策好象又回到了1917至1918年之间的冬天的“国家资本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的涵义以后经过许多变化，直到1929年被放弃时为止。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恢复农产品的自由买卖和放弃征购。

本卷主要是分析列宁逝世前所进行的变革，因为他的去世正好是俄国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这样一个有实效的过渡时期：随着军

---

的弱点，使列宁在一段时期内认为，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最重要的是“坚持”到革命火焰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后，俄国的革命运动就可以得到巩固。这样，当苏维埃政权显示出比巴黎公社更能持久地存在时，这个事实就被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看做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成就。

事行动的结束,人们从事恢复生产,同时可以看到一支积极的产业工人队伍的重建,以及在农民中间日益发展着的社会分化。这个新阶段和苏维埃政权的头几年有着明显的区别,它的特点需要另作分析。因此,新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在本书内也不分析了,而只是探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所持的那些分歧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具备哪些社会和政治条件的看法存在着严重分歧。

后面有关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分析的章节,是从当时的一些文件(调查、统计、会议记录等)以及俄国或外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而更多的是列宁的许多原著为依据的。列宁原著事实上在本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不仅表达列宁试图给苏维埃政策制定的方针,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对过去的情况进行毫不隐瞒的、一目了然的分析,以及对以后执行的那些政策作出批评性的评价。<sup>①</sup>

---

<sup>①</sup> 列宁不断强调,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说,必须进行这种分析和批评,因为这是党帮助群众看清问题的主要方法。因此,譬如当列宁建议付给旧工程师和旧经理高薪时,他声明说:“用非常高的薪金来吸收资产阶级专家,这是离开了公社原则的,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我们就是墮落到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

我们主要参照这些原著，因为它们有突出的教育意义。那些决定政治方针的著作当然也是如此，但是意义又不同：这些著作便于我们了解列宁经过一定的分析所得出的政治结论，然而要防止把这些结论与列宁所主张的措施，同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实际政策或实际变革混淆起来。事实上，在执行列宁所制定的方针时，经常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或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客观过程和面对着各阶级的实际力量，使变革与本来愿望相违背，或是由于党和国家的机关不能完全按照方针办事（这种情况一般也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本卷第一部分，分析了自 1917 年冬天开始发展起来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特点及其成果之一——于同年 10 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运动具有两个不同的性质：在城市是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农村则是民主的性质，所以要把这次运动同 10 月以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特点联

---

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258 页，《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 年，第 3 卷第 502--503 页）。

系起来分析。应当特别注意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运动中和在 10 月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第二部分分析 1917 至 1922 年间的阶级关系的改变；而第三部分则阐明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机关的变革。第四部分叙述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各派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情况，这一部分也把这些斗争同阶级矛盾的普遍运动以及经济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最后，第五部分是致力于对这一时期作出“总结”，评价直到那时为止一系列变革的真正意义和实际影响，以便搞清在列宁逝世时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般地说，后面的分析还要打破关于苏联革命历史的某些观点，这种观点似乎把这一部历史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党作出的一系列“决议”和“选择”的“产物”，这样就把党想象成为对俄国革命的一切成败都要负责的造物主。虽然这种历史观完全和能够深入实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脱节，但这种观点却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开始出现，成为苏联大部分历史学家的著作的一个特点。这种

观点必然要使他们带着辩护士的眼光把俄国革命的成就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特别是列宁的，以后又是斯大林的功绩，从而抹杀了历史运动的实质：矛盾，首先是阶级矛盾的发展和转移。

在后面的篇幅里，我们力图了解这个运动，然而往往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因为这个运动非常复杂，很少有人恰如其分地把它当作一个客观过程进行分析。

要同或力求同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后来的变革的“主观主义”观点决裂，必须承认我们所分析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或俄国无产阶级的“意志”或“愿望”的结果。应当认识到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后来的变革，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的客观过程的结果（这些社会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也起了变化），也是它们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进行干预的结果。

因此，应该集中精力分析社会各个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在政治、思想、经济上所产生的影响，应当承认从实际情况来看，伴随这些斗争而来的社会变革，只有极小一部分是在斗争之前就进行的或者是出

于“自愿”的。

用这样的方法分析历史过程，不会抹杀布尔什维克党的作用的现实意义，但是它要求不应把党设想成“历史主体”并从这种地位上去分析它的作用。它迫使人们承认布尔什维克党同一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样，参加历史运动而不是决定这个运动。

革命政党参加历史运动，使党在特定的条件下对运动的过程起作用，以便有效地完成这一运动本身原来难以完成的变革。这样的行动就是革命政党在它所参加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干预。这种干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只有革命政党在许多矛盾中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进，并帮助群众根据一条相当正确的政治路线行事，一条从实际运动出发并考虑到运动的可能性的政治路线行事，干预才能是“有效的”（即能够得到所要求的效果）。

在历史过程中，革命政党的有效干预的条件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只有抓住这些条件，这个政党才真正地起到领导作用。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0月以及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所

起的作用，因为党的行动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但是，即使这样，也是客观过程决定变革的，尽管党的干预在这个过程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取决于它如何参加历史运动、它和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力量相处的关系以及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矛盾的方法去领导这些力量的能力的结果。在1917年10月的那些日子里，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革命时刻，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得非常出色；在日常工作中党同样也发挥作用，不过不是那么明显。一个革命政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在实践中，通过他们的战斗来提高觉悟，同时要去探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斗形式。从根本上说，这就是党的领导作用的主要方面。毛泽东非常出色地阐述了党的领导作用的意义，他写道：

“所谓(党的。——贝特兰)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sup>①</sup>

---

<sup>①</sup>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载《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第2卷第450页(中文版，横排本，1966年，第700页)。

每当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实际有效的干预的条件没有具备时——由于党没有正确分析矛盾，没有制定一条相当正确的路线，没有坚持不用压服的领导作风，那样就必然搞坏与群众的关系（这种情况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经常发生）——客观历史进程在未受到党的积极的影响下仍然向前发展，从而所采取的决定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正因为这样，对阶级斗争客观进程的分析就应当放在首位。因此，要分析党的政治路线、党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党内开展的斗争，就必须与这个进程的发展联系起来分析，这就是我正在试图采用的分析方法。



# 第一部分

## 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在1917年10月25日<sup>①</sup>失去了政权。这一天，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武装工人和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的士兵和水兵组成的革命起义力量投入了战斗。在几小时内，首都的主要公共建筑物都已落到了革命力量手中。26日凌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冬宫也被占领了。在那里的部长们都成了俘虏。

10月25日白天，彼得格勒苏维埃证实了当天早晨根据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的命令，临时政府已被推翻。10月25日晚上，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占大多数。从25日晚到26日，代表大会（在大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会议后）<sup>②</sup> 批准了推翻临时政府

---

① 到1918年2月（根据西欧通用的日历）为止，俄国一直使用它自己的日历，即俄历。自1917年11月7日（即俄历1917年10月25日）至1918年2月13日（俄历1918年1月31日）这段时期内，本卷所用的所有日期都是旧历，自2月14日起，全部使用西欧通用的公历。

②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

的决定。大会宣布停止前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的权力，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几个小时以后，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工农临时政府，取名人民委员会，其成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大会责成政府“立即就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sup>①</sup>并执行“土地法令”，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sup>②</sup>。

武装起义差不多同时在莫斯科(第二首都)和

---

他们拒不承认在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赞成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社会革命党人是支持这种政治倾向的最重要的势力，他们口头上说在“农民”的绝对领导下统一所有“劳动者”，而实质上就是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这些劳动派分子甚至准备接受“君主立宪政体”。正如列宁在1905年所写的：“典型的劳动派分子就是有觉悟的农民。……但是现在他们的主要力量是用来同地主争土地，同农奴制国家争民主。他们的理想是消灭剥削；他们只是按照小资产阶级方式来理解消灭剥削的，因此从他们的这种倾向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反对一切剥削，而只是反对地主和大财政资本的剥削。”见《俄国政党分类的尝试》，载《列宁全集》1930年版，第10卷第146页(中文版，第11卷第211页)。在1917年的革命过程中，社会革命党人分裂为右派和左派。后者曾在1917至1918年之间的冬天一度同布尔什维克合作过。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55页(中文版，第26卷第227页)。

② 同上书，第266页(中文版，第237页)。

其他大城市取得了胜利。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这个胜利标志着旧临时政府已丧失了权力。克伦斯基在逃出彼得格勒后，大部分部队已不再听命于他，只有少量部队还跟着他，人数既少，士气也十分低落。因此他们在十月起义以后几天试图向彼得格勒发动的进攻，以可悲的失败而告终。武装的较量证实资产阶级已完全丧失了政权，也证实从此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来行使权力了。

1917年10月25至26日，在两个首都所发生的“事件”的经过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领导权，还不足以完全决定俄国革命那时所进入的新阶段的特点，也不足以决定新政权的阶级性质。这些特点也取决于自1917年2月至10月间所经历的所有的阶级斗争。这些斗争本身带有具体的特点，因它正处于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交错的进程中，这个过程构成了俄国革命的本质。而这种交错又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统治机构之间的关系，还对以后的革命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 第 一 章

### 在 1917 年 2 至 10 月期间互相 交错的革命过程

自 1916 年底以来，迫于日益困难的生活条件，工农群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士兵们在战争中饱受无法形容的痛苦，逐步认清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们的愤懑情绪也在迅速上升。1917 年 2 月间，彼得格勒工人和首都士兵的不满公开爆发了。罢工和示威不断发生，其中一部分是自发的；另一部分则越来越多的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所组织的。罢工和示威在莫斯科和其他工业中心发展着。2 月 25 日，彼得格勒的士兵开始同首都及郊区的工人结合在一起。26 日，卫戍部队哗变。27 日，工人和士兵会师，夺下了冬宫，沙皇倒台了。

这样，俄国革命的第一次行动完成了。革命能在这样的国家里爆发，按照列宁的说法，是由于这个国家的特点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

1917年10月以前，俄国既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又严重地依附于世界帝国主义（主要是法、英帝国主义），它们通过向沙皇政府提供贷款，或在石油、煤炭的开采和在冶金、机械工业方面的投资就有几十亿法郎。

俄国帝国主义对英、法资本的依赖是它的虚弱性的一个根源，这种依赖本身是俄国帝国主义发展的特殊形式的后果，它的工业资本主义基础是极其有限的。

因此，俄国帝国主义具有两重性，它是帝国主义两种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和“前资本”帝国主义——紧密结合的结果。一方面是工业中资本主义的高度集中和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密切结合而构成了走向帝国主义扩张的金融资本，同法、英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主要是俄国的“军事”扩张主义。这个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竭力奠定的扩张主义的经济基础，需要另作分析。这里，必须简略地指出，沙俄的扩张主义根子在于俄国

社会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促使沙皇俄国进行一系列的干涉行动，为俄国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资本主义一旦出现，俄国旧社会的矛盾和新生资本主义的矛盾就促使沙皇俄国推行军事扩张，并以各种方法支持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依靠（1861年颁布的）所谓“解放”农奴的法令<sup>①</sup>，借此以牺牲农民群众为代价来进行国家积累。

俄国的扩张主义是从彼得大帝开始大力推行的。在此以后，实际上也从未间断过。

在欧洲，俄国的扩张主义是指向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

向南，针对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向这个方向扩张的目标一方面是想从地中海，另一方面是想从阿曼湾和印度洋进入“自由海”。这种扩张主义不止一次地使英国和俄国发生对抗。

向东，俄国扩张主义针对西伯利亚、中国，甚至美洲大陆。自十七世纪以来，征服西伯利亚实际上已完成，俄国人继续向东推进到白令海峡，占领了阿拉斯加（俄国被迫于1867年“售给”美国）。

---

<sup>①</sup> 1861年2月19日（即公元1861年3月3日），俄国政府颁布废除农奴制法令。——译者

对中国，俄国扩张主义的特点是进行一系列的冲突，然后签订条约，再就是俄国有计划地破坏条约。俄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强加给中国的条约更是记忆犹新的。<sup>①</sup>

在英、法侵华的同时，沙皇统治者从中国夺走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这样，沙皇俄国在 1917 年 2 月垮台之前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sup>②</sup>的历史，一开始是商业和贸易性质的，后来则越来越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了。

俄国帝国主义的两重性是和俄国的大资本积

---

① 这一时期的第一个条约是《璦琿条约》(1858 年)。它使俄国占据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有一部分在黑龙江以南)，直到太平洋之滨。俄国从此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即海参崴。——译者)，并巩固了萨哈林岛的地位。根据《北京条约》，俄国于 1860 年又攫取了黑龙江以南一片新的领土以及乌苏里江地区。这样，它就有了“自由海”(不冻之海)的出海口。俄国在侵吞了中亚细亚的一部分后，又强迫中国割让大片领土，进驻新疆和帕米尔，从此更迫近印度了。

② 这里讲的殖民主义，从字源的意义来说，就是建立移民点。这样做，使沙皇政府能减轻俄国人口增长对于变化十分缓慢的农业结构的压力，专制制度企图控制这种变化(因为这种农业结构组成了沙皇政体赖以生存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殖民化也为沙皇制度以后的扩张提供了新的手段。这个政策的典型例子是哥萨克的“殖民化”。



累能力的薄弱相符合的，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相对的虚弱性，所以资产阶级自己没有能力为了本阶级的目的去同沙皇制度对抗。

俄国资产阶级的无能说明他们担忧现有秩序会受到威胁的恐惧心理。自 1905 年革命以来，俄国资产阶级知道它正面对着一个有能力进行坚决战斗的工人阶级。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不断增长。<sup>①</sup> 依靠自己的组织，无产阶级越来越能在整个革命变革中得到好处。资产阶级则处于瘫痪状态，只得把革命的主动权让给无产阶级和农民<sup>②</sup>，这正是 1917 年 2 月所发生的情况。

俄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反对沙皇制度的真正的政治积极性<sup>③</sup>，后者拒绝给它以任何政治权利，

<sup>①</sup> 俄国无产阶级在 1913 年估计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它高度集中在几个大工业中心，它的悲惨生活推动它起来造反。

<sup>②</sup> 在 1913 年，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强（这个百分比和上述的百分比引自《1970 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71 年，第 22 页）。贫农和下中农占农民中的极大多数。

<sup>③</sup> 资产阶级缺乏真正的政治积极性，当然并不妨碍某些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各种阴谋企图，包括夺取政权。事实上，在 1917 年 2 月以前的一些日子里，特别是从 1916 年 12 月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内，借助于“自由派”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不满，几个将军似乎在策划一次拥护沙皇的儿子的政变，以便使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摄政，因为他们认为他更倾向于议会形式的政府。二月革命制止了这次宫廷政变的阴谋。

这也由于它在经济上对沙皇制度处于从属地位。在十九世纪后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年代里，较快的工业化进程，事实上仅仅把工业利润积累和国内市场的扩大作为部分的基础。工业化的过程还部分地依赖外国投资，同样也依赖国家的财政支持、国家银行的贷款、公用事业的订货，等等。在很大程度上<sup>①</sup>，俄国的工业扩张还依靠一种“原始积累”（逐步剥夺农民），沙皇制度是这种剥夺的政治和思想工具。俄国资产阶级缺乏真正的政治积极性说明了1917年二月革命的特点，当时一开始就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只是在后来才建立的。

事实上，1917年2月27日成立了主要是由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组成的“工人代表

<sup>①</sup> 在这里不可能进行更详尽的分析。但应该指出，在本世纪初，俄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显然可分成两大派。其中一派密切地依附于国家，并且同法、英帝国主义联系极为密切，他们给予沙皇扩张主义以最直接的支持。这一派资产阶级活动的主要基地在彼得堡。另一派比较不依附于专制政体，因为他们的财政基础比较巩固。他们活动的主要基地在莫斯科。苏联经济学家H. M. 瓦纳格在1925年莫斯科出版的《世界大战前夕俄国金融资本》（俄文版，莫斯科，1926年）一书中称彼得堡为“非民族的金融资本的化身”，而称莫斯科为民族的资本制度的化身（见该书，第43页）。参阅詹姆斯·D. 怀特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莫斯科、彼得堡和俄国的实业家》，载《苏联研究》，1973年1月，第414页。

会议临时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号召首都工人和士兵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推派代表（第一次会议在28日召开）。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要所有军队服从苏维埃。在紧接着的几天和几周内，工农兵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成立。但是，这些组织的组成方式不同，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在城乡发展很不平衡。

1917年2月底，唯一能够以刚刚胜利的革命的名义讲话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它得到几乎所有俄国各地新建立的苏维埃的支持。这个得到起义部队支持的苏维埃政权，看起来在它面前已不再有其他政权了。唯一自命能够反对它的机构是从国家杜马（沙皇“议会”）产生的委员会，它在革命群众中毫无威信，因为它是由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所组成的。可是，主要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却同杜马委员会于3月1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成立了一个由资产阶级政客组成的临时政府，而苏维埃则表示有条件地支持这个政府。<sup>①</sup> 这

---

<sup>①</sup> 见 O. 安魏勒：《俄国的苏维埃》，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72年，第125—126页和第159页。

样，就产生了列宁所说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苏维埃政权和临时政府的政权）<sup>①</sup>。随着苏维埃组织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内部影响的增强，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1917年10月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 第一节 苏维埃运动的高涨

自1917年3月开始，在旧俄罗斯帝国的所有城市中，到处都在组织工兵苏维埃。运动从大城市开始，然后发展到中等城市。不久以后，农民苏维埃也组织起来了。到5月，估计已有四百个苏维埃；到8月，六百个；到10月，九百个。<sup>②</sup>与此同时，工厂委员会的运动也在发展，在一些较重要的城市中，区苏维埃也组织起来了。

在这个运动的发展中，不可能分清哪些是出

---

<sup>①</sup> 在列宁所写有关1917年春季当时形势的过渡性质和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著作中，应该提到《四月提纲》（载《列宁全集》，第24卷第11页起，中文版，第24卷第1页起）及《论两个政权》（同上书，第28页，中文版，第18页）。

<sup>②</sup> 见O. 安魏勒：《俄国的苏维埃》，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72年，第125—126页和第159页。

于“自发性”的，哪些是出于孟什维克的，尤其是出于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分子的活动。在绝大多数的苏维埃中，这些积极分子的存在和他们所起的作用表明，只要这个运动能符合革命群众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的要求，再加上政治积极分子的活动，那末，这个运动就能达到它应有的规模。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愿苏维埃成为政权机构。在他们看来，苏维埃只是战斗的和革命宣传的机构，而工厂委员会则首先应该完成象工会那样的任务。

实际情况是，随着临时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的丧失，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坚持不懈的活动，苏维埃正在变成地方政权机关，它自己处理许多行政问题，并向地区苏维埃和(省)“政府”苏维埃以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派出代表。

1917年3月底，召开了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会议，6月3日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了。这次大会产生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的俄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曾徒然地试图同彼得格勒苏维埃相对抗，后者在全俄国享有很高威信并越来越“布尔什维克化”。

在大城市的苏维埃和工业化较差地区的苏维埃两者间的活动水平及其成员的政治水平差距很大,这是各阶级不平衡地参加苏维埃运动的反映。鉴于这种情况,苏维埃选派(工农兵)代表参加这个运动来排除资产阶级的势力<sup>①</sup>。但是不能防止这些代表中的某些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代言人,特别是成为对一部分群众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代言人。二月革命以后的情况就是那样,社会革命党人在大部分的苏维埃内处于大多数的地位,在苏维埃选出的执行委员会中,他们的人数还更多些。

### (一)工人阶级和苏维埃的发展

在1917年2至10月的几个月内,苏维埃运动主要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首先,这是由于它的社会基础,其次,由于工人苏维埃越来越站在无

---

<sup>①</sup> O. 安魏勒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时,提出的理由之一是,“苏维埃是阶级的组织,它只包括人民的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还说,如果苏维埃上台,“社会的其他部分——为首的是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农民——将与革命决裂,而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有生力量,将会……陷于孤立”(见前引著作《俄国的苏维埃》,第174页)。

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同时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合作并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而失去人心，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却在工人苏维埃组织中增长起来了。

全部由工人组成的苏维埃的过程开始是缓慢的，后来则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可见，在二月革命后不久，1917年3月6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在二、三千名代表中仅占四十人（代表人数实际上经常在迅速变动）。6月，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在一千零九十名代表中还只有一百零五人，但是，在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已经起着主导作用，并以一百七十三票对一百四十四票通过了表达他们立场的决议。到10月，依靠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完全象在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一样成为多数派了。

在城市里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所赖以发展的社会的和组织的基础是工厂（或“工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二月革命后得到迅速发展。自从春季召开了彼得格勒市的第一次工厂委员会会议后（这些工厂委员会在一些城市和地区苏维埃中

虽然占少数，但在几乎所有的大工业中心和驻防城市中却占优势)<sup>①</sup>，在这次会议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在8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莫斯科和莫斯科省，苏维埃的“彻底改革”（即完全由工人参加。——译者）进展较慢，但是，在夏季期间进展加速了。在十月革命前夕，全俄工厂委员会会议的一百六十七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九十六名，社会革命党人仅占二十四名，无政府主义者占十三名，孟什维克占七名。<sup>②</sup>

从8至10月，主要情况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在工人群众中迅速深入人心。在2月还是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逐步在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变成了多数派。列宁在4月间还讲到的“狂热”行将消失。<sup>③</sup> 无产者意识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的一部分人改变原来的立场，组成社会革命党左派）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取消临时政府，建立由布尔什维克党

---

① 参阅前引O. 安魏勒著作《俄国的苏维埃》，第23页。

②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同上书，特别是第156—157页。

③ 见本卷第99页。



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能结束俄国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支持群众为满足他们的革命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和反革命武装力量进行斗争。

## (二)士兵、农民和苏维埃的发展

农民和士兵(主要是农民，他们又是被迫背井离乡的，所以他们最关心迅速实现和平)是苏维埃运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

后方的士兵和卫戍部队的士兵直接受到工人阶级的影响，他们在苏维埃的代表与工人代表的步调也差不多一致，都主张彻底改革。在前线的士兵中，运动开展较慢，直到6月为止，他们还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影响之下。在夏季，克伦斯基所决定的一次进攻遭到了惨败，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却组织得越来越好，形势起了迅速变化。到10月时，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士兵一样，都坚定地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与此相反，真正的农民在参加苏维埃运动时却有很大的保留，并且他们远未做到把坚决赞成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主动性结合起来。

当然，从 1917 年春季开始，“农民”就已组织起来了。但是，“农民”组织的重心并不是建立在苏维埃制度上，而是建立在土地委员会的制度上，它们主要设在省、区、县一级，也就是说仍然远离农村。这些委员会与临时政府勾结在一起。它们被“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农业技术员、小学教员、革命前农村行政机关的代表、合作社社长等人）所把持。在政治上，这些委员会大量地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而且在 2 至 10 月间情况毫无改变。

与土地委员会对立的农民代表苏维埃逐渐产生了。组织的发起人不是来自农村，而是来自穿着军服的农民，即士兵。事实上，建立农民苏维埃的运动基本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这个运动也受到社会革命党和在它影响下的以富裕农民为主的合作社联合会的支持。那些人之所以对农民苏维埃的发展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把它看成是一个能与全部由工人组成的城市苏维埃相抗衡的手段。从形式上看来，社会革命党人的干预还相当成功；在 5 月 4 至 28 日召开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在一千一百十五名代表中）有五百七十一名代表自称是社会革命党人，而只有十四名

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夕，地区和省一级的农民苏维埃一般还掌握在社会革命党人手中。那时，大部分的农民苏维埃宣布反对参加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sup>①</sup> 在10月以前，农民苏维埃主要还只是省级和地区一级的机构，在县一级几乎不存在，在农村则更少。

实际上，从1917年2至10月间，农民的群众运动很少具有苏维埃的形式。农民群众在思想上还是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也并未提出政权的问题。他们的行动主要指向土地革命，用的是这样的字眼：剥夺和分配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大片土地。因此，1917年农民的群众运动仍旧停留在过去农民运动的水平上：地方性起义和直接夺取土地。

从1917年5至10月，这个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了。<sup>②</sup> 它摆脱了社会革命党

---

<sup>①</sup> 参阅前引 O. 安魏勒著作《俄国的苏维埃》，第150—151页和第230页。

<sup>②</sup> 官方统计表明：在1917年3月，有四十九次“农民暴动”；4月，三百七十八次；5月，六百七十八次；6月，九百八十八次；7月，九百五十七次；8月，七百六十次；9月，八百零三次；10月，一千一百六十九次。引自S.杜布罗夫斯基：《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农民运动》，柏林，1929年，第90页。前引 O. 安魏勒的著作第148页曾引用过。

人的控制,客观上是在为十月革命作准备。

从1917年2至10月间,农民运动的特点之一是对政权问题漠不关心,因此,也不关心地方政权机构的建立。听其自然的农民运动,就是说没有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支持,必然会遭到和过去所有一切农民起义同样的失败,因为它不能组织起来一致对抗那保护有产阶级利益的国家的镇压行动。听其自然,也就是说没有得到无产阶级运动和组织的支持,它也不能摧毁这样的国家,并建立一个保护劳动群众利益的国家。

农民群众自身的运动,当时局限于对土地采取直接行动,而不是以同城市无产阶级建立有组织的联盟作为方向,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政治思想上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强大和布尔什维克党影响的微弱;然而,在这样一个政治形势下,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情况,必须加以说明。如果回顾一下过去,还是比较容易解释的:布尔什维克在农民群众中没有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而社会革命党人通过农村的知识分子在一部分农民中有一定的影响。在1917年2至10月间,布尔什维克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局势:他们现有

的力量还办不到。

更有甚者，农村本身的组织机构，即传统的村议会（村会）<sup>①</sup>，它一般是在富农和中农控制下的，企图阻碍村苏维埃的建立，并阻止农民运动的彻底开展。事实上，农村的旧的组织机构（它把法律上“公有”制的土地与私人耕种的土地结合起来）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破坏，但还能使每一农村成为一个多少是闭关自守的小“天地”，在这个天地内似乎任何问题都可以就地解决。这个组织结构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专制制度成长的土壤，同时也是对这一秩序所维护的剥削制度不断地进行无效的反抗的发源地；它不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还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渗入俄国农村，都一律进行有力的抵制。

当然，在1917年2至10月间，许多农民的动议也提出了一些“过激”的政治要求：如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普选，召开立宪会议<sup>②</sup>，等等。但是，从起草这些动议的情况来看——在农民组

---

① 真正经营村社土地的是村会。村社一般叫做米尔。

② 见马克·费罗：《1917年革命》，巴黎，1967年，第184—196页。

织起来之前，是由农村知识分子起草的——和从提出土地要求的内容来看(几乎没有提到村社，也几乎没有提出废除土地私有制的要求)，不免使人想到这些动议还与村社所有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大能表达农民群众的愿望，而更多的是表达了从米尔中退出来的富裕农民、富农分子和地主的愿望。农民中的这些阶层的人首先站出来讲话，但另外的人则很快采取了行动；一部分富裕农民和富农分子也跟着行动起来了，他们想从被没收的土地的分配中得到好处。

## 第二节 十月革命条件的成熟

从2至10月的几个月中，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一直试图把人民群众运动纳入“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框框，并企图用迟迟不兑现的诺言来欺骗工农。这样，在群众的要求和临时政府的阶级性质之间的矛盾就不断加深了。

## (一) 1917年2至10月间 革命新形势的发展

在1917年2至4月间，根据列宁的说法，工人、士兵群众现在正好卷入“‘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里了”<sup>①</sup>，而同这一“狂热”作斗争的列宁则要求仍居少数地位的党，不要在“希望同群众在一起”的错误借口下，即不要“共同卷入狂热”。从4月开始，特别是从6至7月开始，形势迅速变化。群众从自身体验中得到新的教益。工人和士兵越来越看清继续战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只符合俄国资产阶级和法、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懂得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唯独布尔什维克才是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从此，就迫切需要结束临时政府，把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并采取行动，使苏维埃政权由布尔什维克来领导。所以，必须发动一次群众革命运动，以驱逐不肯自行下台的临时政府。随着这种思想为工兵群众所掌握——在各首府、许多工业中

---

<sup>①</sup> 见列宁：《论策略书》的第一封信，载《列宁全集》，第24卷第45页（中文版，第24卷第35页）。

心和驻防城市的情况就是如此——一次新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夕，农民仍继续相信社会革命党人，这说明农民并没有象工人和士兵，特别是象在驻防城市中的工人和士兵那样，从切身经验中去吸取所有的教训。但是，农民群众逐步地行动起来了。不顾临时政府的禁令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的劝告，农民自己已在夺取土地。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根据列宁在4月所作的分析，可以认为这一新形势是资产阶级同农民的阶级合作在实际上的破裂，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sup>①</sup>的开始。

城市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成熟以及农村民主革命跨入新的阶段，证实了列宁的分析。他曾指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指出俄国地主、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对群众的剥削，以及为俄国帝国主义扩张倾向和为原始积累的要求效劳的国家压迫，这种压迫和剥削的爆炸性的结合，乃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获得胜利的原因。

---

<sup>①</sup> 见列宁：《论策略书》的第一封信，载《列宁全集》，第24卷第45页（中文版，第24卷第28页）。



剥削和压迫的这种特定的结合是广大阶层人民受苦受难和一部分知识界深感不满的根源。帝国主义战争把同俄国形势相联系的矛盾推向顶端，而临时政府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无法使俄国摆脱它所陷入的毫无出路的困境。工兵农群众越来越公开的反抗高潮，使布尔什维克党，首先是列宁——因为党内许多领导人是犹豫不决的——决定发动十月起义。

## (二) 1917年10月的起义和革命

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是以暴动形式进行的一次武装冲突的结果。这一次武装冲突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巩固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对比，并实际上证明今后真正的力量已掌握在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

1917年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具体地表明，它有能力在军事行动上采取主动，实际上推翻临时政府（迫使克伦斯基逃亡，并逮捕了好几名部长）。它还表明，特别是通过军事和政治行动相结合，在苏维埃内组织起来的力量能有效地不再

“承认”临时政府的存在，并迫使总参谋部（沙皇的将军们所组成）向既成事实低头，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动进行的政治变革，使总参谋部已不能再调动昨天还能依靠的大部分军事力量。

所以，在10月25日所发生的，并不是一次人民战争或一次暴动的结果，而是一次得到群众支持和根据预定计划由武装力量参加的起义的结果。这些武装力量<sup>①</sup>来自工人阶级和驻军，他们行动起来以达到布尔什维克党给他们指定的明确目标。按照列宁时常提到的公式：“起义是一种艺术”。

起义的形式是由1917年2至10月阶级斗争的过程决定的。一方面，农民起义的规模表明国家从此已陷入的革命危机的程度。另一方面，

---

<sup>①</sup> 这些“武装力量”是指赤卫队的力量。对这支武装力量在俄国全境的总数估计很不一致。一般认为最低和最高数字是七万五千和二十万人。就彼得格勒而言，估计在四千到四万人之间，一般认为是二万人。总而言之，人数不多，并且赤卫队的组织也不健全。他们的行动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是由于政治形势以及临时政府武装力量的瓦解。至于他们的社会成分，现有的材料证明赤卫队大多数是大工业的工人（有关以上各点，见D. M. 柯林斯：《关于1917年10月俄国赤卫队力量的札记》，载《苏联研究》，1972年10月号，第270页；这篇文章有相当丰富的参考书目）。

这个起义的特点使国家面临垮台的严重威胁：农民运动本身没有提出政权问题，运动开展的方式是不统一的、地方性的，这样就会被“各个击破”地镇压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继续存在有可能导致农民的失败，从而使革命失败。

正如列宁所写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如果不向镇压农民的临时政府发动进攻，那就成了出卖农民阶级和革命的“叛徒”，因为“容许政府……镇压农民起义，就等于断送整个革命……”<sup>①</sup>。

农民为夺取土地而斗争使俄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标志着农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事实上的破裂，这个联盟曾经使临时革命政府得以组成，并使资产阶级重新获得力量。<sup>②</sup>此后，资产阶级同革命群众之间的冲突就变成不可避免的了，这就迫切需要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迅速行

---

<sup>①</sup> 见列宁：《危机成熟了》（写于1917年9月9日），载《列宁全集》，第26卷第76页（中文版，第26卷第64页）。

<sup>②</sup> 在7月人民示威之后，政府对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镇压以及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半地下状态的必要性证明，在群众趋于激进的同时，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利用2月以后的几个月时间，组织力量以便发动一次反革命进攻。科尔尼洛夫将军在8月发动政变的阴谋——这个阴谋被布尔什维克扑灭了——也证明了资产阶级重新组织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

动。不能再等待，既不能等待下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平地”仔细商讨，也不能等待在城市中开展一次群众运动。等待，就是把主动权让给临时政府，就是让它不仅可以镇压农民，并且能够把忠于它的部队集中到彼得格勒，在它自己选定的时机和条件下发动进攻。所以，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采取主动并“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他们不应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在全国各地都得到群众支持，而在彼得格勒当地，他们有“数千名武装工人和士兵，他们能够马上占领冬宫、总参谋部……”等等。列宁又说，在起义时组织起来的苏维埃政府决不能让资产阶级撵走：“只要我们在军队中进行这样的鼓动，使他们不致反对给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等等的政府”<sup>①</sup>。

事实证明列宁的分析是正确的，就是依靠武装起义能够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这个政权——它的建立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将是异常巩固的。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费了不少周折才接受了起义的思想，并认识到起义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77—78页（中文版，第26卷第66—67页）。

的迫切性。<sup>①</sup> 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再加上其他类似的事件——可以看到列宁同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之间经常存在着分歧，尤其是在一些决定性的问题上和在决定性的时刻。这个问题在以后还会感觉到的。

### 第三节 俄国革命从 1917 年 4 至 10 月所经历的阶段

要刻划十月起义后俄国革命所进入的新阶段并掌握其特点，就需要从 1917 年 4 月的实际情况入手。当时的情况是，既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又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统治，“两种统治互相交错”，以及构成当时俄国局面特点的两个政权“同时并存”<sup>②</sup>。

---

<sup>①</sup> 经过几周的犹豫不决之后，到 10 月 10 日，中央委员会才表示同意起义。在这以前，它对列宁所指出的各点不作任何答复，而且“删去”了列宁提出的一些要点。这曾使列宁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以便“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为维护他的立场。——贝特兰）进行鼓动”（见《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79 页，中文版，第 26 卷第 67 页）。

<sup>②</sup> 参阅《论策略书》，载《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36 页（中文版，第 24 卷第 26 页）。

两个政权“同时并存”意味着在1917年4月“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因为“彼得堡的政权实际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但又没有实现，因为，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支持阶级合作，因而“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sup>①</sup>。

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是很不稳定的。这意味着俄国处在列宁称为“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sup>②</sup>的局面。

俄国革命的这个特点本身就是两个革命过程“互相交错”的产物。这两个革命过程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十月革命后不久，这种交错并没有消失，但是，它将带有崭新的特点。

早在1917年4月，列宁就预见到“只有农民脱离了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

---

① 见《论策略书》，载《列宁全集》，第24卷第35—36页（中文版，第24卷第25—26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中文版，第23页）。

段”<sup>①</sup>。

事情过去了，事实同列宁的预见不一样。再引用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实际生活把预见变为现实时，“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sup>②</sup>。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正是两个既互有区别又相辅相成的俄国革命阶段的过渡。

### (一) 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斗争和1917年 夏季革命所经历的民主新阶段

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同列宁所预见的很相似，但同时也呈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从1917年夏天开始，农民事实上脱离了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已开始夺取土地；可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他们没有坚决同资产阶级决裂。实际上，农民阶级并没有完全不信任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提出政权问题。只有在接受了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后，他们才能提出和去解决关于政权的

---

<sup>①</sup> 见《论策略书》，载《列宁全集》，第24卷第38页（中文版，第24卷第2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5页（中文版，第25页）。

问题，而当时他们并没有那样做。10月25日当晚，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列宁在提出要赢得农民的信任的问题时指出：

“我们只要颁布一项废除地主所有制的法令，就可以赢得农民的信任。农民会懂得，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他们才有出路。”<sup>①</sup>

自1917年夏天开始和整个秋天，农民的革命斗争构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因为它的目标是分地和发展土地的私人经营，这完全是停留在资产阶级制度许可的范围内。

分地通常是在米尔的范围内进行的。原则上，它规定在社员之间定期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定期的重新分配土地能够推迟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的发展，但不能制止这种发展，因为进行这种重新分配的条件，受到农业以外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米尔内部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影

响。

在1917年夏天和初秋，临时政府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对农民进行镇压，那并不是因为农民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46页（中文版，第26卷第220页）。



的行动破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是和土地所有制的直接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临时政府正是为了维护这些直接利益而采取了威胁整个革命过程的镇压措施，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干预，使革命得以继续深入下去。

经过这次干预，即十月起义，俄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可是，俄国革命进入新阶段——即无产阶级的阶段——丝毫不意味着革命的全部民主任务都已经完成了。相反，在当时的阶级对比情况下，这些民主任务只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联系在一起才能全部完成。这一点适用于实现农民的民主目标，也同样适用于实现旧沙俄帝国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各族人民的目标。在1917年，这些民族开始了争取他们民族独立的斗争。通过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从外来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帮助俄国无产阶级粉碎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很早就掌握了这些革命运动的辩证统一性，并说服布尔什维克党，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名义，宣布支持这些民族有“分离”和组织他们自己政府的权利。列宁的历史功绩之

一是认识到长期以来受俄罗斯统治的各族人民运动的革命意义，以及布尔什维克党支持这个运动的必要性。<sup>①</sup> 大家知道，这个必要性并没有为某些布尔什维克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所理解；比如罗莎·卢森堡基本上只看到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方面，而没有懂得民族运动的民主方面需要无产阶级来支持，正如农民为土地而斗争的革命运动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那样。

## (二)工人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斗争和1917年十月革命越过的无产阶级新阶段

农民革命运动（具有上面提到的它自己的特点）和非俄罗斯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同无产阶级力量的有力增长相结合，决定了十月起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了把革命进行下去）。十月起义

---

<sup>①</sup> 根据这个国际主义的立场，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吸收了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党员。他们给党提供了很大一部分领导人，这有助于使旧俄的大部分民族运动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因为这些运动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在 G. 豪普特和 J.-J. 玛丽合著的《布尔什维克自述》一书——巴黎，弗·马斯佩罗出版社，1969年——的引言中可以看到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民族出身的详细材料：从该书所介绍的二百四十六名领导人的小传中可以看到，只有一百二十七名是俄罗斯族的。——同上书，第 20 页）。

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革命的特点，改变了农民夺地斗争的条件和政权的阶级性。

从10月开始，俄国革命的主要方面就是它的无产阶级性质。此后，农民革命斗争是作为民主革命进行的。这个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发生的，但它并不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际领导的，这里就产生了俄国革命在以后过程中所具有的特点，从这里也产生了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特性。

## 第二章

### 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关系

十月起义结束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这是为了继续革命，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和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十月起义之所以能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是因为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这个时机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

占领几幢公共建筑物或者逮捕几名部长（如果资产阶级有能力的话，它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换别人来当），显然不能使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以代替资产阶级的政权。形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是由于十月起义的胜利所显示的并促成其建立的各阶级力量的新的对比关系，因为政权

只不过是各阶级的对比关系的体现（而不是什么可“捉摸”的“东西”）。

十月起义之前之所以能够显示新的阶级的对比关系，同时又促进建立这种关系，就是因为它公开表明，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指挥枪”，它还表明新的统治阶级掌握了决定性的军事力量<sup>①</sup>，而旧的统治阶级则已丧失了它。

1917年10月，无产阶级掌握了决定性的军事力量，因为能够决定革命命运的军队不再为资产阶级打仗。<sup>②</sup> 由于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军队站到了革命的一边：因为军队不能摆脱人民群众的

<sup>①</sup> 在这一点上，尽管它不掌握任何真正的“军队”。

<sup>②</sup> 1917年初，列宁在苏黎世瑞士青年工人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里，谈到1905年革命时着重指出：在这个时期，“人民中间的革命风潮不能不影响到军队，”但是，相反，运动中所缺少的东西，“一方面是群众缺乏刚毅果断的精神，极容易犯轻信毛病，另一方面是身穿军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还缺乏组织：他们不善于夺取领导权，不善于领导革命的军队并转而向政府当局进攻。”列宁接着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军国主义作了这样的指示：“光靠指摘，咒骂，‘否认’军国主义，……和平地拒绝服兵役是愚蠢的，我们的任务在于紧紧保持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且不是一般地而是具体地来培养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就成为革命军队的领导人物。”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8—269页（中文版，第23卷第251—252页）。1917年10月所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而在1905年和1917年2月，尽管军队倒向革命一边，但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军队不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行动和压力。在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人民群众实际上是在毫无出路的形势推动下前进的。工人群众运动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帮助他们认清了形势的特点，进行及时统一行动后才成为势不可当的。<sup>①</sup> 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行动与整个革命条件相配合，才取得了十月革命起义的胜利，才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使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毫无出路的形势，群众的愤怒，群众的压力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倒向革命阵营，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等等，——其中党对城市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首先是对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大工业中心工人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了这个胜利所产生的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

从十月革命的阶级内容和由此而产生的政权来看，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

一切革命的产生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特别是

---

<sup>①</sup> 7月，布尔什维克党竟然避免了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的起义。如这个起义发生的话——那时农民革命运动刚开始——将会遭到扼杀，并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机会将会大大减少。

工人阶级的(自从这个阶级存在后)果断行动和他们的英雄主义。1917年二月革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这次革命中,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并未因此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除了巴黎公社外,十月革命同以往的所有革命不同,因为它是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布尔什维克党是这种思想的有组织的传播者,正是这个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因为党和无产阶级中最有战斗性的阶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信任的联系,所以这个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只要党保持着这种联系,并继续保持起决定性作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实践,它就一直是这样的工具(尽管一个政党事实上有广泛的工人基础,如果它没有无产阶级思想和实践为支柱,那它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工人党”)。

## **第一节 1917年和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和局限性**

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过程中从事两方面的领

导，即思想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领导。在这两方面中，思想占主要地位，尤其是因为思想是党的政治活动的产物，也是党的群众斗争的组织工作和统一工作的产物，因为这个工作能使党丰富它的理论，制定政治路线，并使这条政治路线深入人心。

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领导作用，是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思想领导一致的，党把无产阶级最富有战斗性和革命创造性的力量集中起来。在革命中，这种思想领导作用是无产阶级领导<sup>①</sup>的条件之一。

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作用显然不应该同无产阶级的思想统治混为一谈。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经过长期的阶级斗争，

---

<sup>①</sup> 列宁在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里用过的这个词，有助于理解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这是一篇在1920年12月30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页起；中文版，第32卷第1页起）。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没有唯一由资本主义培养起来从事大生产的……阶级的领导，要实现这种过渡[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贝特兰]是根本不可能的”（同上书，第13页，中文版，第3页）。法文版译文用“hégémonie”一词完全表达了列宁所用俄文“glavienstvo”（法文译音）一词的意思。俄文这个词的意思也是“优势”、“首位”、“最高权力”。



并进行社会关系的革命性的变革，才能取得无产阶级的思想统治。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思想领导作用是赢得政权的必要条件，由于党员积极分子贯彻政治思想工作，在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已具备了这个条件。

正是某些有关目前形势、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革命思想为群众充分掌握，从而变成了“物质力量”，并且动摇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这表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了它们的思想领导作用。在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活动的成果之一是：人民群众不再屈从现存的秩序，士兵拒绝那种秩序的受益者指使他们把枪口对准群众。具备了这个条件后，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作用就能够变成无产阶级领导权，从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正如十月革命所完成的那样。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有某些局限性，在这里应该注意这些局限性，因为它们在今后的革命过程中和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上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局限性，上面已经提到过了（它构成当

时革命形势的特点)。问题在于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主要确立了对工人群众的领导作用,而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则是比较薄弱的。这种局限性将产生如此重要的后果,以致布尔什维克党以后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也很困难。可是在国内战争时期,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农民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领导(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战斗,并使苏维埃政权战胜了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但是这并不表明大批农民群众都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所捍卫的思想,或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当时的一部分措施。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的第二个局限性在于: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部,党的思想领导作用也是局限于当前任务的政治领导。广泛传播到一部分有决定性作用的工人群众中去的,不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根本原理——阐明社会主义远景,从而理解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而首先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当前任务”<sup>①</sup>的思想。**

---

<sup>①</sup> 在此不可能详细探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所以有局限性的理由,然而,应该指出:

1) 无论如何,在掌握政权之前,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起的领

由于党的领导作用有着各方面的局限性和革命的直接任务，布尔什维克党不能确定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目标（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1917和1918年初，党正确地认为，除了明确规定的几点以外，要想很快地达到社会主义目标是空想，并且也是极端危险的。

当时，这种由于任务引起的必然的和暂时的局限性，已成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多次注意的内容。例如，列宁在《四月提纲》里，就已指出这种局限性，他肯定地说：

---

导作用必定有它的局限性。根据具体条件而起变化的是：局限性的性质、最能觉察到这些局限性的阶级以及局限性的形式，等等。

2)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比较年轻（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仅在十三年前举行，并且布尔什维主义受到第二国际的小资产阶级观念的巨大的思想压力，它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同这种观念进行斗争），因而它的领导作用的局限性也就更大。当时党只有为数甚少的有经验的党员，又必须面临急剧变化的形势：帝国主义战争对群众来说，一个星期相当于几年。

3) 最后，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民中的活动，由于俄国农村存在着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农村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党本身低估农民革命运动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党的活动受到了局限。

不难看出，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多么不同。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活动了二十八年，前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在红色根据地和解放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开展了政治、军事、思想和经济的群众性活动。

“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sup>①</sup>

十月革命前不久已经确定了这个任务<sup>②</sup>。起义当天再次宣布了这个任务<sup>③</sup>，六个月以后，又坚决地重申了这个任务<sup>④</sup>。

人们看到，当时列宁不断指出俄国只不过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指出，在1917年10月和10月至1918年4月期间所做的工作尽管很重要，只是完成了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的确，在读了列宁的大部分著作后，可以说，列宁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能走得太快太远，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破坏、组织解体、饥荒等等造成的当时的形势。但是，这个主要原因是由一个根

---

① 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载《列宁全集》，第24卷第14页（中文版，第24卷第4页）。

② 参阅《一个人的札记》（应为《政论家札记》。——译者），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4页（中文版，第25卷第266页）。

③ 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指出，俄国革命的新时代“最终必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全集》，第26卷第245页；中文版，第26卷第219页）。

④ 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载《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3—255页（中文版，第27卷第223—225页）。

本原因所造成的，这个根本原因与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所采用的领导方式相联系，也就是说与作为当时党的领导作用特征的局限性相联系。同时人们认为，从1918年下半年起，党是多么轻易相信“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经济状况还很严重，然而政治和思想状况似乎已有了深刻变化，农民群众为了战胜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军队而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

在国内战争时期，党的领导作用实际上已大大增强，但还没有达到使它能不冒严重风险就可以从根本上离开1917年所制定的路线。<sup>①</sup> 1921年，布尔什维克党承认了上述现实，这使党提出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问题，尽管其内容有某些重要改变，但基本上同四年前党不得不提出的提法相似。

上面谈到的是1917年10月或十月革命不久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它的特点和它的局限性。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同一时期无产阶级政

---

<sup>①</sup> 大家知道，1949年的中国的政治思想条件要比1917年的俄国更有利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然而中国只是在1956年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社会主义。

权的形式和特点问题。

## 第二节 1917年10月无产阶级 政权的形式和特点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城市工人的革命斗争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起先是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权，其后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这个政权首先是阶级的对比关系，不能与一个特定的政治机构等同起来。在具体时间和具体条件下，同样的阶级政权可以由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机构”来“实现”<sup>①</sup>。

1917年10月以后，无产阶级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来行使的；正是这个党“实现”了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政权包括国家政权，但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政权，它还统治着国家政权。因此，应当区别政权与（“实现”这个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政权（由它来镇压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政权的形式以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参阅《论策略书》列宁的论点，载《列宁全集》，第24卷第35页（中文版，第24卷第25页）。

及为行使政权能够具体开展一定活动的机关和组织（如果它们受到了其他阶级的压力或者因为党犯了错误，而擅自摆脱党的控制，并实行“自治”，它们也能给无产阶级政权造成障碍）。

### （一）无产阶级专政体系

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体系，列宁把它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无产阶级和与它结成联盟的阶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的机关，都有不同的地位。但是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对整个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意识形态关系又反过来影响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与工人阶级联盟的阶级），所以它们的地位是会发生变化的。

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几年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列宁已经在上文提到的《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文中加以说明了。

在当时的这个体系里，党处于领导地位，因

为，正象列宁说的那样，“可以说党是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的，而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sup>①</sup>，所以它的地位高于“国家政权”。

列宁把作为一个能够组织全体产业工人并建立“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sup>②</sup>的工会，放在国家政权和党之间。这个联系应该有两个方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事实上，苏维埃工会从未真正占据过给它指定的这种位置，因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工会（考虑到工会结构的本身能够产生工人阶级的一定程度的分裂现象）是否能够占据这个位置，如果能够的话，那末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占据呢？

关于“国家政权”，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并不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因此列宁认为必须“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sup>③</sup>。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页（中文版，第32卷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12—13页（中文版，第3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中文版，第8页）。



关于为什么应当保护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不受国家政权的侵犯的理由，不论是在上面引用的文章中，还是列宁或者布尔什维克党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加以说明。

在上面引用的文章中，列宁提出了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要实现它的专政，必须同农民结成阶级联盟；由此，列宁提出：“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sup>①</sup>。

列宁作的第二个解释是他所说的苏维埃国家“带有官僚主义毛病”<sup>②</sup>，这种“毛病”当时已经感染了国家机关。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同列宁自 1918 年初已经注意到的情况联系起来看（自那时起至 1920 年 12 月，这种情况并未好转），也就是说要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内部联系起来看，在“苏维埃里面还有很多粗犷的、不完善的东西……”，因而从苏维埃制度作用的情况来看，任务“才刚刚开始，而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16 页（中文版，第 32 卷第 6 页）。

② 同上书，第 17 页（中文版，第 7 页）。

且开始得并不好”<sup>①</sup>。

从1918至1920年，列宁提出的关于苏维埃“国家政权”特征的坦率而清晰的见解（直到他后期的著作中，他还继续重提）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以后那些甚嚣尘上的辩护高调截然不同，这些见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苏维埃制度的“粗犷的”和“不完善的”性质。同时，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由于没有足够的长期的实践经验，所以无法深刻地理解产生这些特征的关系——，列宁的这些话并不是真正的解释，只不过是他的总的看法罢了。

本卷的目的之一正是试图——由于我们对以后发生的事件有了认识，所以现在能够做这项工作——更完善地刻划出1917至1923年及以后几年中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特征，这样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性质，后者决定了这个体系的特征以及它后来的演变。关于这个方面，有必要再回到上述的列宁的

---

<sup>①</sup> 见1918年3月8日，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27卷第132-133页（中文版，第27卷第120-121页）。

公式,他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

## (二)“国家政权”和工农联盟

由于提法缺乏明确性,这个公式引起的问题比它说明的问题还要多。列宁也曾以他称为“修正”的方式重新提到这个公式,并附有简短的解释。

这个“修正”写在1921年1月21日的《真理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党内危机》的文章里。

列宁在这篇文章里用几句话回答了布哈林的插话。事实是,在1920年12月30日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在会上曾经使用“工农国家”这个公式),布哈林打断了列宁的话,喊道:“什么国家?工农国家?”

在1921年1月21日的那篇文章中,列宁说:“我看到,我说的是不对的,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他又说:

“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我们实际上存在的工人国家是具有这样的特点的:第一、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第二、这个工

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

在这段叙述中，列宁使用了——如同他写的那样——同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时用过的差不多同样的词句，但是，他实际上保持了他原来所讲的话，并在作结论时强调说：“……不论我的各种论据或我的结论，都不会因这一修正而有所改变。”<sup>①</sup>

事实上，“修正”这个名词确切说明了列宁的思想，因为它使列宁能够着重指出（有些布尔什维克可能会遗忘的），苏维埃国家的具体现实必然受到农业人口（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内社会的决定力量）同无产阶级（通过自己政党进行的社会领导力量）之间所保持的关系的本质的影响。

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力量（主要是农民群众）与这一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性质之间的矛盾<sup>②</sup>，其次，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2卷第41页（中文版，第32卷第32页）。

<sup>②</sup> 毫无疑问，在这里指出在所有的国家里真正的无产阶级总是少数这一点不是没有用的，因为当时俄国的特点是——但是在所有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非无产阶级群众中，占压倒多数的总是农民群众。

正确处理这个矛盾的问题。

在当时的条件下,矛盾是必然的: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应当有效地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的话,那末,这个体系也应当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甚至非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这个基础上,而在苏维埃当时的情况下,应当把他们大量地安插在无产阶级政权机关里,首先是安插在自治的和政府的机关里。

这个矛盾的尖锐程度,是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人民群众本身实行思想和政治领导的特点而决定的。在对一部分人民群众的领导(指领导作用)薄弱或比较薄弱时,矛盾就特别尖锐(除了几个短暂的时期以外),这是俄国农民群众的一般情况。

大家知道,党对农民的领导作用的薄弱,是与农民革命行动所采取的表面的独立形式和所取得的成就连在一起的。事实上,所以能够取得和巩固这些成就,只是因为工人群众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城市中赢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而保护了农民的革命运动<sup>①</sup>。但是,城市无产阶级革命

---

<sup>①</sup> 自发的农民运动不能建立足以对抗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和农村民主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农民的心目中，并没有充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布尔什维克党既没有在农村里出现，也没有在农民中间扎根。因此，必须向农民群众反复说明，使他们确信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和广大农民阶层之间才经常出现紧张局面<sup>②</sup>。

因此，列宁的“工农国家”公式首先指的是，

---

的军队并取得决定性革命胜利的统一的军事力量，这是历史事实。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工人积极分子在农民中的存在，才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武装。在初建红色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强调了这样一点：“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9页，中文版，横排本，1966年，第1卷第50页。）在俄国，自1917年10月至1918年5月，农民革命运动没有建立一支防御反革命的正规军队的需要，但是，当反革命联合帝国主义势力发动进攻时，情况就不同了。那时，农民群众就感觉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必要性（即使他们不同意党所采取的这项或那项具体政策）；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未曾在农村扎根，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作用还是比较表面的，它只是稍微带着思想领导的作用，而且，当农民不再迫切感到这种必要性时，党的领导作用也就趋于消失。

② 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民政策上，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犯了错误，这种紧张局面曾经长期存在。

能够脱离无产阶级专政单独采取政治行动的广大农民对苏维埃机构(村、县、区及其他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产生的影响。当时已知道苏维埃机构的活动有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倾向。

仅仅把农民群众从苏维埃机构里排除出去是不能消除这样的危险的。把农民排除出去，只能缩小无产阶级必须依靠的群众基础；只能削弱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不可缺少的联盟关系，只能妨碍革命的民主任务的执行，并且使党无法发挥它的领导作用。事实上，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并且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越来越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结合，才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如果离开了这条道路，如果不正确处理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同广大非无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权机构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另外一种危险：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样的集中强化了政权机关的国家色彩，促使国家机关更加脱离了群众，并加强了集中而不是民主的形式。这种集中使资产阶级政治关系趋向扩大

而不是缩小,因而也损害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人们知道,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国家政权,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权并不等于“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sup>①</sup>的政权。

人们可以看到,列宁的“工农国家”这个公式同时也指出正确对待这个公式引起的矛盾的必要性。历史告诉我们,俄国正是在对待这些矛盾上犯了错误。

由于人数众多的、只受到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微弱影响的农民群众的存在,使十月革命以后的政权机关在政治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和决定。

其中一项最有意义的决定是,正式规定每十二万五千名居民产生一名农民代表,而城市代表则规定每二万五千名选民产生一名<sup>②</sup>。在列宁看

---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5卷,特别是第453页;参阅中文版,第25卷第406页)和其他许多著作例如《列宁全集》第24卷第78页(中文版,第24卷第63页)里都提到过。列宁在这里只是重复了马克思和恩克斯的结论。他们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建议劳动者的政权不用“国家”二字,而采用“公社”这个名称。见《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第111—112页)。

② 应该说是“城市”代表,而不是“工人”代表,因为,除了那些“为自己利益剥削别人的人”、“商人”、“不是依靠自己劳动收入



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规定这样的差别,是以组织无产阶级比组织农民快得多的事实为依据的。列宁又说,这样就使工人实际上获得了优越地位<sup>①</sup>。

对农民采取歧视性措施同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至6日会议刚召开就解散的)选举的结果不是没有关系的。在苏维埃政权下选举的结果是:在七百零七名当选者中,布尔什维克只占一百七十五个席位,而社会革命党却占四百十个席位,立宪民主党<sup>②</sup>占十七个席位,孟什维克占十六个

的人”、罪犯、修道士、神甫和精神病患者以外,城市居民都是选民。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专家和政府雇员都是选民(关于这一点,见E. H. 卡尔:《苏联的形成》,巴黎,子夜出版社,1969年,第146—147页)。

① 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29卷,特别是第183—184页(中文版,第29卷第157—158页)。在这个报告中,列宁在总结了宪法关于选举权的规定时说:“我们的宪法承认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应为农民。——译者)占有优越地位,并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此外列宁也说明这项宪法规定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出的,因为他指出:“镇压资产阶级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并不是必要的。”(同上书,第183页,中文版,第158页。)

② 立宪民主党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用列宁的话说,“……立宪民主党人……是十足的掮客。他们的理想是用有秩序的、文明的、议会的形式永远保留资产阶级的剥削。”(见《俄国政党分类的尝试》,载《列宁全集》,1930年,第10卷第146页;中文版,第11卷第212页)。1905年提出的这个分类法到1917年仍然有效。

席位,各种民族组织占八十六个席位<sup>①</sup>。

出于同样的理由,先是严格限制,后来就实际上禁止(除布尔什维克党以外的)一切政党<sup>②</sup>特别是与农村富农阶层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革命党的活动。

上述各种措施在农民对待苏维埃机构的态度问题上,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很难确定的。总之,从各区苏维埃可以看出(在这里,最能感觉到农民的影响,这方面我们是很清楚的),共产党代表所占的比例从 1918 年的百分之六十一左右,逐步下降到 1920 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和 1921 年的百分之四十四。其他党派代表的名额没有了,但是布尔什维克代表人数并没有跟着增加,而是无党派代表的人数有所增加。在 1920 年至 1921 年,他们的代表人数甚至比共产党的代表人数更多。<sup>③</sup>

由于无产阶级政权与占绝对优势的农民(无产阶级对它的领导是相当薄弱的)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最重大的政治影响,显然不在于选举的特

<sup>①</sup> 参阅前引 E.H. 卡尔的著作《苏联的形成》,第 114 页。

<sup>②</sup> 参阅本卷第 352 页。

<sup>③</sup> 参阅前引 O. 安魏勒的著作《俄国的苏维埃》,第 328 页统计表。

点。最严重的事情是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不善<sup>①</sup>。

这种情况并不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它在苏维埃政权宣布成立时就存在了。这种情况正是（列宁所说的）“过渡形式”，从当时来说，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

在分析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两个重要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特征时，上述情况的影响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组织这个因素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领导这个因素，即布尔什维克党、它的思想、政治路线、领导作风、发展工农联盟以及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能力，构成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根本保证。

### 第三节 苏维埃政府和苏维埃机关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机关，尤其是由第二次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的苏维埃中央机关的地位的取得是革命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起义的结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2页（中文版，第29卷第156页）。

果。

推翻临时政府的不是苏维埃机关（其中有许多人是受到社会革命党人和拒绝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社会党右翼的控制的），而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正如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数年以后讲的，代表大会“只是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把政权接受过来”<sup>①</sup>，也就是从作出起义决定的布尔什维克党手中接受过来的<sup>②</sup>。

有人说，政权是阶级对比关系的体现，而不是一个可以“私自转移的”“东西”。由于生气勃勃的革命性以及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所以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实权，而不是苏维埃掌握实权。如果说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根据我们所研究的情况——是由第二次和以后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机关行使的，那末这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执行政策的结果。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347页（中文版，第6卷第300页），引自前引E.H.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105页。

<sup>②</sup> 10月26日，托洛茨基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为了使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接管政权，他接着说：“作为党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是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供真正掌握政权的可能性，……必须要有一个政党……它要从反革命手中夺取政权，并对你们说：看！政权在这里。现在该由你们来掌权了。”见《托洛茨基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2部分第65页起，前引O.安魏勒著作《俄国的苏维埃》第242页曾引用过。

党和苏维埃机关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是符合真正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也符合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列宁<sup>①</sup>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内党和苏维埃都各有自己的地位的观点。

列宁从来没有“迷信”过苏维埃的作用。1917年，当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沙文主义政党对苏维埃的控制有所加强，并准备执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危险出现时，列宁便收回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指出苏维埃也可能变成“反革命的遮羞布”<sup>②</sup>。

所以在1917年夏天，他指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4月、5月、6月，甚至7月5—9日以前……还是可能的。现在这个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它没有估计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经完

---

<sup>①</sup> 在这一点上，同对待其他的问题一样，党的意见远不一致。某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不赞成发动十月起义，也不主张起义后党在苏维埃中占优势地位。

<sup>②</sup> 见列宁在1917年7月11日《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载《列宁全集》，第25卷第190页（中文版，第25卷第167页）。（此注疑有误，“1917年7月11日《新生活报》”应为“1917年8月2日《无产阶级事业报》第6号”。——译者）

全背叛革命。”<sup>①</sup>

这时，列宁提出（不过他并没有放弃把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结合起来，但不要操之过急）武装起义的口号，目的是“使政权转到受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手中，来实现我党的纲领”<sup>②</sup>。

9月，科尔尼洛夫政变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的代表人数增加了，力量也加强了，因此列宁再次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机关的政策是，认为这些机关在无产阶级体系内应该有它们的地位，但是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它们不能占统治地位，尤其是因为农民代表苏维埃对它们抱无所谓的态度，农业工人和贫农在里面也不起主导作用。

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机关之间发展起来的关系——特别是和人民委员会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系（两个都是中央政府的机关）——在上面已经讲明了。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25卷第191页（中文版，第25卷第167页）。

<sup>②</sup> 同上（中文版，第168页）。

## (一)人民委员会

1917年10月26日那天晚上，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它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成立人民委员会，即“第一个工农政府”。

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完全是由布尔什维克所组成，其成员都是由党指定的。

从1917年11月底至1918年夏天，曾经一度有几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提名参加人民委员会，即参加政府，不过时间不长。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日益敌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特别表现在对同德国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上），最后只好把他们从人民委员会中开除出去。<sup>①</sup>从此以后，人民委员会完全由布尔什维克所组成。

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直到逝世。

## (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法律上说是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的。

第二次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全俄中央

---

<sup>①</sup> 参阅本卷第363页。

执行委员会有六十二名布尔什维克，二十九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十名其他社会主义者。这说明了在右派社会党人和其他政党代表反对十月起义，拒绝继续参加代表大会而退出以后的执行委员会的组织情况。

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人数，由于农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农民代表（代表人数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人代表人数相同）、一百名陆军和海军代表以及五十名工会代表的参加而增加了。1917年11月15日，新的执行委员会拥有三百五十多名委员，并正式命名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个苏维埃组织，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18年7月，由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城乡代表的比例相同<sup>①</sup>，不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定为二百名。宪法规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大会的职权，并由它任命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原则上应该是一个常设机构，但实际上，往往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主席团来行使职权。1919年

<sup>①</sup> 参阅本卷第94-95页。



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执行。

### (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关系

从法律上说，人民委员会隶属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前者的委员是由后者“任命”的。宪法又明确规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颁布法令、命令和发出指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职权”（第12条），而人民委员会则负责管理“一般的行政事务”工作。

但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则不然。从1917年10月30日起，人民委员会自己就颁布过一项法令，规定它有立法权。原则上规定这项法令只是在立宪会议召开前有效，可是直到立宪会议解散后，它仍然有效。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通过时，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人民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上级机关，后者只不过是一个批准决议，或批准一般来说它没有提案权的提案。

政府权力集中在人民委员会手中。既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被开除出人民委员会，政府的权力当然是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了，权力逐渐地转到党中央委员会，后来又转到党的政治局的手中。大部分重要决议都由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同时进行审查，更多的时候是由政治局先审查。

剥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府中掌握的实权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样做既对人民委员会也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有利。事实上，这个来自苏维埃机关的办法在解决最高政治权力“集中”的问题时，只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利益，从而损害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利益。

十月革命前，要组织一个诸如人民委员会那样同苏维埃组织分开的政府机关，从来也没有人想象过。过去一切权力似乎都要集中在所谓苏维埃机关手中。上述的那个办法就不然：是人民委员会行使政府权力，它的成员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选派，而不是直接从苏维埃机关中产生（如全俄执行委员会那样）。现在建立的这种权力结构很明显的与十月革命前，包括布尔什维克党自己所设想的完全不同。

人们可以这样想：建立和巩固这样一个政府结构的过程主要是因为作为十月革命的一个特点的政治力量星罗棋布，尤其是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包括在苏维埃组织中的影响。根据这个看法，上面的做法完全是出于“非常时期”的缘故，为的是“保护”政府的权力不直接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代表一切可能的干预，才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下，由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组成的）并使之处于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更高的统治地位。

这个看法，可以帮助我们较好地了解具体的历史进程，但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因为它只停留在单纯的“历史事件”上，只考虑到阶级关系的表面现象，而问题恰恰在于阶级关系本身。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意味着工人阶级事实上已成了领导阶级，依靠其他的组织，不论是苏维埃式的机关，即群众组织，抑或依靠完全是从群众组织中产生出来的国家机关，是无法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要使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必然要通过一个无产阶级特有的机关，这个机关要在

思想上、目标上和领导与团结上对人民群众起作用。也就是说,要通过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它对包括来自群众组织的国家机关在内,都起着政治和思想方面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无产阶级政党联系的具体方式可以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方式又反映了各个阶级和阶级斗争(包括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斗争)的作用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关系。

在苏俄时代,毫无疑问,国家机关同布尔什维克党的联系所采取的特定方式大部分决定于布尔什维克党在各个阶层的群众中,首先是在农民中的直接影响太小;此外,还决定于党依靠组织原则而不是思想斗争来解决领导问题的某些倾向。党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得不完成一些紧急任务,因而使这些倾向得到了加强。

#### (四)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

苏维埃式的政府组织也提出了苏维埃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它们各自的

权力问题,在1918年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宪法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的一切权力属于在城乡苏维埃内组织起来的全体劳动人民”(第10条)和“最高权力属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条),前一条意味着每个地方苏维埃是地方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后一条则把地方苏维埃隶属于中央一级机关。

实际上,上面所列举的中央权力,尤其在日常工作方面,很快就促使地方苏维埃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服从中央机关了。同时,党在地方的领导作用也得到了确认,这从地方各级党委的地位处于地方行政机关之上就可以看出。然而,这种优势的地位在列宁在世时还未真正得到保证。事实上,即使在内战结束以后,党的基层组织是很弱的,它们并不是到处都掌握实权的,即使实权在手,它们也没有实际能力去领导国家的行政机关:这些机关保持着、有时甚至还加强了对党中央机关的自治地位。

## (五)国家行政机关

人民委员会一成立就打算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行政机关,事实上,这项尝试并未进行下去,各个人民委员部实际上还是从属于(或试图从属于)大部分旧的行政机关之下,后者只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内部改革。

这个事实非常重要,以后还将谈到。然而现在必须指出,由于国家行政机关的阶级成分,更深刻地讲,由于国家行政机关和群众的关系的性质,由于它们内部的等级关系,以及它们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机关(布尔什维克党)的相互关系,它们顽强地抵制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命令,因此,在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也就是人民委员会致力于贯彻的政策和国家行政机关实际行动之间,经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此外,这些机关倾向于使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之间产生隔阂。从而使党的基层组织不能直接向布尔什维克领导汇报,后者就很难及时了解情况,特别是对全国的农村情况,当然对国家机关本身的内部情况也同样不了解。

布尔什维克党多次想纠正这种状况，第一次尝试是在1918年3月建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但无实际效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尝试的目的是要通过另一个行政机构而把国家行政机关置于政权的监督之下。

关于国家机关遇到的这个麻烦只有三个单位情况例外：外交人民委员部、红军和新的政治警察机构，即契卡<sup>①</sup>。关于契卡的问题留待以后论述。现在先谈谈关于红军的问题。

## (六)红 军

在军事方面，开始时，苏维埃政权并未掌握由它自己在革命前发展了的、并由布尔什维克党在其中有机地发挥领导作用的军事机构。十月革命爆发后，当时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做。

自1905年起，布尔什维克党确实掌握了一个“军事组织”，但是这个组织绝不是一支军队，甚至

---

<sup>①</sup> 契卡或“肃反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个政治警察机构，它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产生的。在该委员会解散时，1917年12月7日人民委员会的一项法令保持了“肃反委员会”的存在。

也不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军队。它的作用是配合布尔什维克党在沙俄军队中展开宣传工作，在1917年2至10月间，这个“军事组织”在临时政府的军队中建立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它那时还出版了一种机关刊物《士兵真理报》。十月革命前不久，它还帮助建立准备起义的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

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前不久，彼得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开始组织武装；赤卫队就是这样成立的。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3月，赤卫队在对付一些军官的反革命阴谋中起了很大作用。赤卫队再加上农民游击队和工人民兵，构成了无产阶级政权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支军队。十月革命后，旧的军队形式上还存在，按理，其中大部分士兵应该由苏维埃政权来指挥，不过这支军队已经溃不成军，于是1918年3月，苏维埃政权决定把它解散了。同月，组织红军的决定下达后，由托洛茨基负责这项工作。开始时本来打算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但是从1918年4月起，就改为义务兵役制了。

关于这支军队的特点，特别是关于官兵关系



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谈<sup>①</sup>。

正如事实证明,如果这样组成的红军在反对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的斗争中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工具的话,这主要是因为保卫革命的工农战士的英雄主义、牺牲和忘我的精神的缘故;但是这支军队不是——也不能变成——一个有助于思想革命化和发展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组织。相反,资产阶级的、甚至还有封建的思想作风,实际上还保持了下来。从1918年起,在军队内部重新推行“形式上的礼节”(军礼,对“上级”讲话时的特定仪式),军官可以享受各种特权,特别是在住房方面。以后,军官学校的学员,尽管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招募的(也从旧知识分子以及与旧军官有联系的子女中招募),但也重新产生了资产阶级军队所特有的一套思想和等级制。

#### 第四节 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领导作用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不只是“历史上的偶然”

<sup>①</sup> 见本卷382页。

所造成的,它符合于一个深刻的必然性,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的领导。这是经验所一直证明的事实,列宁把它归结为这样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①</sup>

事实上,列宁把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运动必须具备理论的重要性和直接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政党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因此,他接着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sup>②</sup>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并没有因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停止,事情正好相反。所以十月革命以后和以前一样,布尔什维克党为保持它在政

---

<sup>①</sup> 参阅《怎么办?》,载《列宁全集》,第5卷第376页(《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1卷第24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77页(《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1卷第242页)。关于这点,列宁提醒说,弗·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理论的重要时说,社会民主运动(当时无产阶级组织的政治运动)应该开展的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有三种形式,他认为理论斗争与其他两种斗争同样重要,恩格斯甚至还看出了当时(1874年)“英国工人运动……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他对法国、比利时等都提出同样的意见(同上,《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1卷第243页)。

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作用而进行斗争；为此，它必须依靠革命理论，从人民群众的活动中吸取经验教训来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

在 1917 和 1918 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和它的领导作用主要不是用强制方法来实现的，而是依靠自己作出正确理论分析的能力，并把它用在政治路线、措施和口号中，以保证党同人民群众中最富有战斗性的分子之间的密切关系。归根到底，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是和使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斗争相结合的革命发展联系在一起。

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7 年所起的作用，不应该使我们忘记这个党五年以前就存在了，因为它是 1912 年 1 月 5 日至 17 日在布拉格召开的会议上诞生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在这次会议中的诞生，不是几个积极分子或几个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简单结合的结果，因为它是经过十几年的理论上和组织上的活动后建立起来的，列宁在这些活动中，特别在理论战线上，是主要的倡导人之一。

因此，要了解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7 年 10 月

以及以后所起的作用,要了解这个党在 10 月以后如何对付所遇到的问题,都有必要回顾一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各个主要阶段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使党赢得在 1917 年的地位。

### (一)为争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占首要地位而进行的理论斗争

布尔什维克党未来的缔造者和领袖——列宁在 1894 年第一次以自己的著作参加了理论方面的斗争。他当时二十四岁,已有六年的战斗经历。他常常公开参加,特别是参加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sup>①</sup>。

这时候,主要由普列汉诺夫发动的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已经有好几年了。普列汉诺夫在 1883 年——和其他战士主要如维拉·查苏利奇——创立了“劳动解放社”;他自己出版书刊,并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几种著作,以此在

---

<sup>①</sup> 民粹主义或民粹主义者的运动是十九世纪形成的俄国革命运动。它主要把重点放在忠于民族特性和传统的农民革命的可能性上。民粹主义者曾试图在农民中进行宣传;失败后,他们转向恐怖活动。到了二十世纪,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接替了他们,但他们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村知识分子中找到了一个有实力的社会基础。

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1894年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sup>①</sup>一书中，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超过了普列汉诺夫；同时他强调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农民在俄国未来的革命中能够起到的作用。

列宁在1895年12月起的流放期间（因为在他创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进行过组织活动），后来，从1900年起流亡国外期间，继续进行了先是反对民粹主义，后是反对“经济主义”和“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后者认为俄国必须“向资本主义领教”，并认为由于国家的工业落后，俄国无产阶级只应开展经济斗争并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

在反对这些观念的思想斗争中，列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论述（使布尔什维克运动得以形成）包含在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sup>②</sup>一书中。在这本著作里，列宁确定了指导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和

---

① 参阅《列宁全集》，第1卷第143—360页（中文版，第1卷第109—309页）。

② 参阅《列宁全集》，第5卷第355—544页（中文版，第5卷第313—500页）。

活动的原则（从基本上说，现在仍是那些没有抛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的活动的指导原则）。他阐明了两者相互联系的“经济主义”和“自发主义”的错误。列宁是这样指出的：

“……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sup>①</sup>

《怎么办？》一书的出版和革命战士对它的内容的融会贯通，都表明当时在俄国带有倾向性的“经济主义”和“自发主义”的巨大失败。

在1904年发表的《进一步，退两步》<sup>②</sup>中，列宁发展并确定了未来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在这部著作中，他明确了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组织的决定性作用，政党和群众的紧密联系的必要性以及民主集中制、纪律和统一（这种统一和纪律不要和人为的一致性相混淆，因为统一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89页（中文版，第5卷第350页），着重号是列宁加的。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212页起（中文版，第7卷第189页起）。

和纪律要以公开的讨论为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日益发展)的必要性。

在1905年7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列宁发展了反对孟什维主义——代表当时俄国主要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这本小册子中<sup>①</sup>，列宁强调了这个问题：农民参加民主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而不是象孟什维克所提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sup>②</sup>

《……两种策略》这一著作明确区分了革命的两个阶段并指出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可

---

① 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9—139页（中文版，第9卷第1—125页）。

② 同上书，第97页（中文版，第85页）。

能性，还确定了相应的阶级阵线。<sup>①</sup> 这本著作阐明了无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义。

于是，列宁奠定了基础，在这基础上他可以——依据二月革命带来的变化——提出1917年的《四月提纲》（因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已经存在）；布尔什维克党因而就可以制定十月革命以后将遵循的政治路线的主要部分。

《……两种策略》阐明了行使领导权和起着领导作用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同从拉萨尔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决裂，这些思想在当时的西欧占着优势，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革命阶级。

1905年的革命明显地证实了列宁在《……两种策略》中的分析，尤其对在起义初期和起义过程中“群众的政治罢工”所起的作用的分析。这种罢

---

<sup>①</sup> 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1905年9月，见《列宁全集》，第13卷，ESI，第227—236页），列宁重提这个问题并明确地说：“我们主张不断革命。”（《列宁全集》，第9卷第234页，中文版，第9卷第221页。）



工的作用在 1917 年再一次被证实了。

1905 年革命中，列宁又有一段时期回到俄国。他继续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理论斗争：反对“取消派”（“取消派”在斯托雷平领导的冲击下，准备取消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反对“召回派”（即 1906 年选进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召回派”）。到 1909 年，“召回主义”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正式谴责。

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列宁还在哲学战线上进行战斗，他撰写了 1909 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打击了试图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的反唯物主义的观念。列宁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巧妙的伪造”，这种伪造是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上”的特征。

这样，当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2 年成立时，它已具备了作为思想武器的一整套理论著作，和同时代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工人党所具有的是完全不同的。

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武器，以后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列宁另外两本著作的补充，即《帝国主

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sup>①</sup>和《国家与革命》<sup>②</sup>。

第一本著作具体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阐明了它的矛盾与特征。这个分析指导了布尔什维克党一部分行动以及第三国际头几年的行动。

第二本著作充实了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它和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存在的考茨基的某些观点实行了根本的决裂。

从思想上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所掌握的理论对于过去没有任何经验的问题，当然不可避免地还有缺点。在革命过程中，这些缺点会导致一些错误行动。这些错误有的改正了，有的还没有改正，或者改正了但还没有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这就使俄国革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01—388页（中文版，第22卷第179—297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3—531页（中文版，第25卷第371—478页）。

## (二) 建立和发展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斗争

布尔什维克党基本上是根据列宁在他的著作和很大一部分其他论述如书籍、小册子、论文、演说和书信中所阐明的理论思想和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思想和原则本身在布尔什维克日常的政治和组织活动中得到了发展。尤其是从1905年起，他们加强开展政治活动并在组织方面——战士本身的组织和他们的报刊杂志的组织，越来越多地转向革命运动的群众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这种组织工作是和俄国社会的矛盾以及经济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斗争——有高潮和低潮时期——是和社会矛盾的深化相联系的。这些斗争中的一个主要阶段是与1905年革命达到高潮的群众运动的飞跃相适应的。其他一些大规模的斗争出现在1912到1914年。最后，在战争引起的混乱以后，一个新的高潮在1916年末兴起，点燃了二月和十月两次革命的大火焰。

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活动的特点之一是理

论方面的分析经常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有时候分析在斗争之前并指导斗争,有时候在斗争之后,这就可以进行总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采用简单的“思想的加法”或新的“理论”形式,而是辩证的发展:在生活本身教育的基础上,实行决裂,摒弃和改正错误的东西。这种决裂和改正的过程,这种辩证发展的过程,创造了建党条件,即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从理论上牢固武装的以及和群众越来越密切联系的革命政党。就是这个党使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成了统治阶级。在10月,这个党是不断斗争的产物,是以建党为首要目标的斗争的产物,从1912年起,它又是为保证自身发展和巩固而斗争的产物。

### 1. 建党的斗争

- 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开展的。采用斗争的方式把它改造成成为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898年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列宁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这仅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大会没有通过党纲和党章,没有出现一个能够同在俄国已存在多年的马克思主义

小组建立联系的领导；除若干例外，这些小组实际上并没有同具有斗争要求的工人运动发生联系。马克思主义小组同工人运动最初一次的结合，就是从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建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的。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个协会就是“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的萌芽”。

建立革命政党开始时的真正情况是同1900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小组一起创办《火星报》的时候相似的。《火星报》在俄国各地有通讯员。尽管处于地下状态，它还是能做到比较定期地发行。它刊载了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论述的同样主题，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准备第二次代表大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次代表大会在1903年7月举行，先在布鲁塞尔，后在伦敦。在辩论过程中，《火星报》路线的拥护者和它的对手之间发生了冲突，但是火星派内部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分歧。但在本质问题上，列宁捍卫的路线获得了多数（俄文读音为“bolchinstvo”），布尔什维克一词便是从这里来的，意思就是指这条路线的拥护者，而孟什维克（少数派）指的是它的敌手。

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小组与孟什维克结成同盟，《火星报》就被他们掌握了。为对付分裂分子，布尔什维克一面发展组织工作，一面在1905年1月创刊了自己的报纸《前进报》。这样，在群众斗争运动即将有很大发展的时刻，布尔什维克有了一份新的报纸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成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支部。

1905年初，布尔什维克大约有八千人，但是他们并不想把人数增加得过快。他们决心成为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革命工作的战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05年1月召开。孟什维克实际上已分裂出来，其实这就是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

1905年革命的兴起使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有了显著的扩大。合法活动暂时地成为可能。布尔什维克因而改变了他们工作的某些方式，如同他们从1917年2月起重新做的那样。当然，他们还保持着他们的地下机构，但他们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已公开进行了。他们接收新的成员，并选定各级组织的负责人，这在地下活动期间几乎是不可能的。革命高潮在一部分战士心中，特别在新战

士心中，伴随着一种联合的推动力，就是要使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孟什维克组织合并。孟什维克的领导人，首先是马尔托夫（托洛茨基自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就与他合作）作了一些明显的让步。在这以后，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统一了两个组织。这时候，布尔什维克有一万四千人，孟什维克（入党条件要求不高）有九万四千人。这次代表大会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

统一仍是肯定的。布尔什维克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重新取得多数而斗争。他们组织了分支机构，并且有一个机关报《无产者报》，它是由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圣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

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是由俄罗斯党的七万七千名党员选出的（还要加上波兰、拉脱维亚和犹太人的代表，还有崩得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是显著的，他们的成员增加了许多，来自1905年苏维埃的工人干部也有不少，他们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多数派。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列宁、李可夫和季诺维也夫。代表大会通过

了使少数派服从的、在广泛讨论后经多数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布尔什维克仍有支部的组织，并有他们自己选出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有十五名成员，它的任务是保持布尔什维克的统一，使他们成为一个整体，在党内实行统一的政策。

自 1907 年年中起，工人运动出现了倒退。这种倒退随着斯托雷平的镇压行动达到了严重程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减少了（在 1910 年，已经不到一万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以及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加深了。列宁同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一系列消极倾向作了斗争，特别是同召回主义<sup>①</sup>以及高尔基和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倾向作了斗争。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只能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sup>②</sup>。

经过这段时期的分裂，列宁接受了同孟什维克联合的建议。这件事是在 1910 年 1 月发生的。

---

① 见本卷第 157 页。

② 从列宁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之间“未公开”的争论（见《列宁全集》，第 34 卷，特别是 1907 至 1910 年的通信，中文版，第 34 卷第 374—452 页）。



列宁在1910年4月给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信中是这样评价这个建议的：

“一向促使党的统一的重大的深刻的因素是：在思想方面，从社会民主党里清洗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是必要的；在实际方面，党和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处境非常困难，并且新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已经成熟。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长期全体会议’——足足扯了3个星期……），除了这些……重大深刻的因素外，还……增加了‘调和主义’情绪（没有明显地表明同谁，为了什么，怎么样等），增加了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痛恨，因为它进行无情的思想斗争，再加上内讧和孟什维克老想胡闹，——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满身脓疮的婴儿。”<sup>①</sup>

果然，这个建议没有实现。当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时（罢工和示威重新大规模兴起），列宁认为必须巩固布尔什维克的统一，保存他们的出版机构并创办一所干部学校。1911年这所学校在法国隆朱莫成立，由季诺维也夫领导。许多布尔什维克的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439—440页（中文版，第34卷第432—433页）。

干部在这里受训后秘密地回到俄国。

1912年1月,跨出决定性一步的形势已经成熟。布尔什维克可以组织政党了。这是在布拉格召集的全国会议上实现的。会议驱逐了孟什维克,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会上通过了最低的纲领,包括立即实行的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一切土地。会议还决定布尔什维克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运动,选出中央委员会,与列宁一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奥尔忠尼启泽、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这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即布尔什维克党诞生了。

## 2. 为党的发展而斗争

从1912至1914年,新诞生的党发展很快,这是和作为当时特征的工人斗争的迅速发展相联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就使党在组织上和思想统一上遭到了很大的削弱。随着战争的发展,本来已经很粗暴的镇压现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914年11月,警察突然发觉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正在开会,于是当即逮捕了所有与会者,把他们监禁和流放。只是在一年半以后,一个新的“俄国局”才重新组

成,其中有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柯夫。在全国,原先遭到严重破坏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又重新建立起来了,特别在 1916 年,但各组织间的接触则是很少的。

战争也引起了新的思想上的分裂,后来在列宁于 1914 年提出的一些口号的影响下,才逐渐达成一定程度的统一,列宁提出的口号是:“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使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在齐美尔瓦尔得召开的大会上,参加的有布尔什维克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如托洛茨基,列宁的口号被废除了,然而,在俄国被监禁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却团结在几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周围,组成了神圣的联盟。二月革命时,形势的特点是党内一片混乱,那时斯大林首先表示支持临时政府,要改变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困难的,直到在列宁归国后制定四月提纲时进行了干预才办到的。

然而,即使在最困难的镇压时期,还有一定数量的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小组和个人,在工厂,特别是在军事工业和军队中继续活动。因此,在 1917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党大约还有四万名党

员<sup>①</sup>，它的影响比孟什维克小(后者继续把他们的组织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是布尔什维克发展得很快并在下半年终于远远超过了孟什维克。

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有八万名党员；到了8月，就有二十四万名。它倾向于从一个战斗的党变为一个群众的党：在十月起义时，党已有大约三十万名党员。

然而，列宁并不主张人数增加得过快。这样的增加意味着拥有的仅是一批缺乏政治经验的党员。因此，在1919年3月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仅有党员三十万多一些。<sup>②</sup>

如果从纪律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党大体上是牢固地团结在它的领导周围，即它的中央委员会周围，但这并不表明决议都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实际上，以后将能看到，许多分歧在党内出现。列宁起了无可争辩的杰出作用，但是，要使他的观点

---

<sup>①</sup> 这是《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第531页的估计。参阅T. H. 利格比：《1917—1968年苏联共产党党员资格》，普林斯顿，1968年，第61页。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月只有一万至二万名党员。

<sup>②</sup> 见《百科词典》，莫斯科，1963年。引自《经济和社会问题》，载《法国资料》，1971年5月28日，第33页。

受到重视并不是容易的，当他认为必须纠正先前执行的路线或者改变到当时为止一直为大家所接受的分析时，他经常遇到强大的阻力。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下才能称得上“列宁主义的”党，即承认列宁是一位理论上武装得最好的领导，有了他，才有今天这样的党。相反“列宁主义的”一词不可能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总是“自发地”或轻易地赞同列宁在某些情况下指出的新方向，也不可能意味着列宁的分析正好“表达”了党或它的领导已经多少考虑过的东西的。<sup>①</sup> 事实远非如此。如果要弄懂在1918和1923年间发生的问题，上面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

不应忘记在1917年10月以及以后的几年里，布尔什维克党的基层建设，在许多地方和工厂里，且不说在农村，还是非常弱小的。在许多地

---

<sup>①</sup> “列宁主义的”党一词不应该使人忘记，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时，它代表的党同列宁在1914年领导的党很不一样。一方面，大部分老党员在战争中去世了，为受教育不多的新党员所代替；另一方面，在领导干部里，也发生过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和列宁发生过多次分歧，证明他们远远不都是“列宁主义者”）和来自其他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之间的结合。后者在1917年10月时约占“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半数（有关这一点，见G. 豪普特和J.-J. 玛丽：《布尔什维克自述》，第16页）。

方，还没有党员能够就地解释党的路线并使之成为生动的现实，也没有人——这一点也是重要的——能向党的领导部门报告存在的具体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接受党的政策的态度。从这一点说，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同时还可以使人理解在俄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遇到的困难。

在这一点上，还必须指出，人民群众对布尔什维克党给予支持的主要基础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所提出的政治口号是符合群众的和平愿望和农民为土地而斗争的愿望的。相反，一部分群众，特别是农民，并没有接受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除了能“向社会主义”迈出几步以外，党并不认为形势已经成熟，或者至少在1918年夏季之前，情况是这样的。从这时起，相反，在内战爆发和外国干涉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执行的政策改变了，革命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这时期内，军事需要的压力，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地位以及党对这种中央集权的看法使俄国的阶级斗争条件和阶级关系起了变化。现在主要是要对这种变化的过程进行分析。

## 第二部分

在 1917 至 1921 年期间苏维埃  
政权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

1917年10月以后，由于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由于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或帮助下继续进行斗争，一个非常复杂的革命变革开始了。大家知道，在那时候实行的变革，基本上有两重性质：在农村是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已经在开展运动；在城市是社会主义的，工人群众正在向资本家仍然占有的生产资料的统治权进攻。变革在逐步发展，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种社会关系和组成这些关系的因素。这些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观察俄国革命最初几年的经济和法律关系经受的主要变化之前，必须研究一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变化。



## 第 一 章

###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深刻地打乱了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阶级本身。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所表述的那样：

“……消灭阶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虽然还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

了别的形式。”<sup>①</sup>

阶级依然存在，只是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起了变化，因为旧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取消”，而是被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

在同一本书中，列宁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存在着前者“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和后者“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sup>②</sup>的斗争。

虽然资本主义被打败了，显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依然存在：这两个阶级存在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依然继续对立。

这些阶级的存在条件起了重大的和根本的变化，这是与资产阶级丧失政权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这表明资产阶级不再统治已被打碎和瓦解的旧的政治和行政机关，它们程度不同地已被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以后起着领导作用的阶级机关——领导的、与革命群众有联系的组织和机关所代替。具体地说，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1页（中文版，第30卷第94—9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03页（中文版，第87页）。

这也表明了资本家和地主基本上丧失了“自由支配”生产资料的能力。在工业方面，工厂委员会的管理、工人监督、没收等等深深地动摇了使用生产资料的条件，它不再是直接服从于资本获取利润过程的要求。然而，这些要求没有被“取消”，而是由于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被改变了。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这些阶级存在和实践的基础——没有确切地被“取消”，而只是改变了。尽管资产阶级不再统治社会再生产过程，但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开始部分地有了改变：这个过程的根本结构并没有真正地摧毁。在每个生产单位中，生产者继续处在同一类型的劳动分工中，特别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领导和被领导的差别。所不同的是，领导直接生产过程的人只能在无产阶级、工人群众组织、新的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监督下发挥作用。

无产阶级国家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首要成果是创造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条件，从而有利于生产资料的社会

化,但是它并不就等于这样一种变革。

大家知道,生产关系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人们把这些关系和马克思称之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sup>①</sup> 联系起来。

这些关系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结构,也就是社会生产的实际过程强加给生产者的。这种结构本身规定在劳动分工和劳动资料中(马克思称劳动资料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当然,劳动分工和劳动资料所具有的特定形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形式是过去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过去阶级斗争强加给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每个时期,这些斗争(总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使生产过程的管理和劳动力在不同工作上的分工,成了“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某些生产管理人的专权”<sup>②</sup>。

在劳动分工和劳动资料中,生产关系的“物质性质”所产生的后果是,一个新阶级要立即改变现

<sup>①</sup>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巴黎,社会出版社,1957年,第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2页)。

<sup>②</sup>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8卷第254页(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

有的生产关系，单单从政治上统治其他的阶级是不够的。它只有破坏并重新制定（就是使之“革命化”）实际生产过程，才能实现这种变革。

关于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存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特性，当然也规定在生产过程结构的自身之中。

因此，在建立自己的阶级政权和使某些工厂国有化时，无产阶级有可能，仅仅是可能而已，使实际生产过程革命化，也就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一种新型的社会劳动分工和新的生产力。当这个任务还未完成的时候，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些关系的表现形式和意识形态继续存在着。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旧的关系部分地起着变化，社会主义过渡在进行，这时才可以谈到“社会主义社会”。

所以，社会主义并不是——必须特别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思想方面的论述所造成的混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取消”；而是——在1918至1922年的俄国，在还是刚刚出现的特定的政治和思想条件下——经过破坏和重建，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造成为过渡的生产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成分的混合体。向社会主义发展,就是后者对前者统治的增长,就是资本主义成分的“消亡”和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巩固。

这种发展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与生产条件革命化相适应,这个革命化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下的持续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这条路线能在每一阶段规定对生产关系进行有效的社会主义变革的目标。要制定这样一条路线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用革命理论武装的并能发挥领导作用的无产阶级政党。这种作用是主要的,因为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不能够“直接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而只能由过去的被统治和被剥削阶级进行的斗争来实施。这种使生产过程和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的斗争能结束——只有它才能结束——过去原来“归属”统治阶级的东西。

只要资本主义关系仅是部分地变革了,表现这种关系的形式便会继续产生,例如货币、价格、工资、利润等等形式的重新产生,并不能用简单的“法令”来“取消”。只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才能导致这些形式的衰亡。这种变革使生产社

会化越来越成为社会集体劳动者的劳动队伍协调的结果。集体劳动者的形成过程确实是一个长时期的、分阶段的并要求全部社会关系（包括经济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革命化的过程，因为这个革命化的各个不同方面以复杂的形式相互牵连着。

只要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继续存在着资产阶级因素——直到共产主义——就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的条件，如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遵循一条正确的路线，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发展社会关系中的资产阶级因素，巩固从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关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并最后（通过资产阶级也不能破坏的那种经过改造的社会关系中资产阶级因素所规定的特殊形式）复辟资本主义。

特别是，因为对资产阶级的剥夺并不等于它的消失，所以国家所有制的发展，即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是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因素（只是部分发生变化）继续存在。只要在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因素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的作用就有可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也就能继续在变化了的形式下尤其是在国家机关中存在；但它是国家资产阶级

的形式出现的。

前面提到的，可以根据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书中给社会阶级所下的定义加以确定。这个定义是：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sup>①</sup>

这本书明确指出了几个要点：

1. 分配关系只是生产关系（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它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结果。所以分析分配关系（“领取”某一部分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可以帮助阐明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由这些关系决定的阶级关系，但是仅有这种分析还不能达到认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2. 由法律对生产资料的某些关系所作的“规定”才能“确定”这些关系，但这些关系又独立于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25页（中文版，第29卷第382页）。



“法律”之外。事实上，只有法律才能掩盖不同于它所“确定”的那些关系。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实际上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是这个阶级的“集体”资本的一部分。

3. 阶级是依照阶级的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所处的地位和“社会的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来区分的。

生产者“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之间的区别——由于他们参与阶级实践——对分析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组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就能逐步改变这种地位、作用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实践体制。因此，在初步变化——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但无产阶级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各种不同形式仍继续存在——之外，还可以加上其他变化。如果阶级斗争正确地进行，无产阶级通过社会关系革命化就逐步地掌握经济和生产单位的管理权、对生产力体系进行改造的领导权和教育机构的领导权，等等。

这些变革是革命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可以

使无产阶级越来越不是无产者了,就是说,当无产阶级占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它不能占有的全部社会权力时,才能取消它作为无产者的地位。在这个革命变革过程中,原来与资产阶级相同的“地位”和作用已被改造,处于这些地位并发挥作用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也就越来越不是资产阶级的了,但他们仍能不断地发展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能使无产阶级把已经占领的阵地断送掉。

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体系中,一切占据与资产阶级相同的地位并在其中发展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的人,尽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但还是资产阶级。

在十月革命以后和在俄国的二十年代初期,资产阶级大量地存在于国家经济机关中,存在于生产单位和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存在于行政和教育机关中。历史地看,这种状况是由于这些机关中的多数人的阶级出身造成的,但是,除了这个出身外,起决定作用的,是占据领导岗位的人的资产阶级的实践和国家机关本身的结构。这种实践和结构都有着巩固资本主义关系的倾向,

所以存在着采取国家资产阶级形式的资产阶级。

这种情况显然是和俄国革命当时所处的阶段分不开的。俄国革命只是开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任务。要使这些任务能继续完成，就应该继续进行已经成了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这就要求制定和执行一条革命的政治路线，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

为了分析十月革命以后在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中进行的变革，必须把城市中革命过程的效果和农村中的效果加以区别。

## 第二章

### 城市中阶级关系的变化

城市中阶级关系的变化，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斗争的结果，其次，当新的国家机器建立后，它的变化也取决于工人群众的行动。

从根本上说，自 1917 年 10 月以后至 1923 年初（即本卷分析的那个时期）进行的变革，消灭了以前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但是这种消灭不是、也不可能是全部的和立刻实现的，这一点上面刚谈过。同时，在这几年内私人资产阶级虽被大量地消灭，然而出现了国家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的存在主要是由稍微进行过改造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所决定的。这与阶级斗争本身的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完成的各项

任务的迫切程度、布尔什维克党分析矛盾和处理矛盾的方法等都有联系。

在此期间, 社会各阶级经受的变化是很多的, 这里只能研究主要的变化。我们先研究那些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不久就出现的变化, 然后再研究在以后几年里发生的变化。

### **第一节 关于工业和商业的当前措施**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的时期里, 工人群众和布尔什维克党都没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实行能“争取时间”的变革, 以及发展能向社会主义迈出几步的“国家资本主义”, 并不要求这些变革已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这种类型的变化由于工业和商业方面所采取的一定数量的决定性措施而具体化了。

在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有: 1917年11月19日颁布的关于《工人监督条例》, 关于设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 12月28日颁布的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 1918年4月16日颁布的关于

消费组织的法令（建立受苏维埃监督的消费合作社），4月23日颁布的垄断对外贸易的法令。

### （一）没 收

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决定没收一定数量的企业，尤其是工商业企业。但这种没收绝不是当时执行的政策的主要方面，列宁用“国家资本主义”<sup>①</sup>一词来说明这一政策的特点。

在1917年10月和1918年5月之间，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一点也没有导致扩大国有化和没收。与“左派共产主义者”<sup>②</sup>（其中特别是布哈林）的幻想和要求相反，党的大多数领导深知如果不具备国有化达到真正的社会化的政治和思想条件，扩大国有化和没收并不能向社会主义迈进。这就是列宁所解释的，他写道：

“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由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sup>③</sup>

---

① 参阅本卷第 059 页起。

② 参阅本卷第 529 页起。

③ 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载《列宁全集》第

在文章的后面几行，他明确指出：

“……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可以只有一个‘坚决性’，用不着有正确统计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就不能没有这种才能。”<sup>①</sup>

这种对生产资料社会化所需要的“才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社会性地协调使用生产资料所应该具有的才能；而没收则首先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削弱资产阶级并粉碎它的破坏为目标的。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

自 1918 年春季起，由于越来越受到劳动者的压力和工业资本家的敌视，苏维埃政权被迫在超越它实际组织生产的能力的新基础上使用了这个武器。这就助长了工业组织的混乱。确切地说，同时建立的工人监督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似乎在那时提供了两种办法使苏维埃政权能够用来获得对生产资料社会性地协调使用的必不可少的才能。

---

27 卷第 337—370 页，引文见第 348 页（中文版，第 27 卷第 307 页）。

① 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载《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348—349 页（中文版，第 27 卷第 303 页）。

## (二)工人监督

工人监督就是使工人阶级有可能监督生产资料的使用的一整套措施，这种监督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产生的组织进行的，并在那些还属于私人资本的和已被没收的工厂里同样发挥作用。

列宁在 1918 年赋予工人监督的作用主要是致力于准备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迈进的一个初步措施。为此，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里写道：

“可是在工人监督还没有成为事实以前，……便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sup>①</sup>

在 1917 年期间，阶级斗争的具体发展提出了以发展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工人监督问题。这一运动在 1917 年 2 月和 10 月间已有发展，布尔什维克党也曾坚决予以支持。

在十月起义后的几个星期里，布尔什维克党曾想把千百个工厂委员会的分散的和无政府主义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264 页，法译文已根据俄文原文校订过（中文版，第 27 卷第 233 页）。



的活动转变为有组织的工人监督，以适应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

任务不是容易的，因为在工厂委员会数量增加的同时，他们各自都有扩大自己特权的倾向，并把每个工厂当作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作为该单位的劳动者集体所有，他们自己可以决定应该生产什么、卖给谁和卖什么价格。当时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社会统治需要把工厂委员会异常分散的和相互矛盾的权力隶属于共同的政治目的。

生产的社会协调在工业中特别需要，每个生产单位只完成变革过程的有限部分，只代表高度社会化的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所以，苏维埃工业的继续生存以及反对市场势力和反对把各个不同工厂的特殊利益放在主要地位的斗争，要求各个不同生产单位的活动首先有最低限度的协调。由于缺少这个首先，多少有一点点的协调只是在事后通过市场进行着，或者这种协调是产生于不同工业部门或不同工厂之间的力量对比。实际上，协调也可以不实行；如果是这样，生产就越来越瘫痪。1917至1918年之间的冬季的情况事实上就是这样。

布尔什维克党因而寻找能够解决各工厂委员会活动的协调问题的办法，确切地说，就是建立“工人监督”。它的活动范围应当比每个工厂委员会更加广泛。它应该以协调的、统一的阶级监督来代替分裂的和分散的（从而也是不现实的）并由各不同工厂集体实施的“权力”。

十月革命以后存在的条件不利于向这样的统一的监督过渡。事实上，劳动者没有立即相信限制工厂委员会的权力并使之隶属于一个外部组织是必要的。在许多劳动者眼里，建立一种多少集中的监督，好象是把他们刚刚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得的、并且希望保留在他们自己手中的工厂一级的一种“权力的剥夺”。对事物的这样看法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特别是孟什维克的鼓动。孟什维克鼓动处在他们影响下的工会组织去维护工厂委员会，甚至铁路上的“车站委员会”的自治。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早已预见到全国范围内工人监督的必要性和实现它的困难。例如，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里，列宁写道：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

实行最精密的、最负责的统计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sup>①</sup>

向工人监督过渡和抛弃工厂委员会走向“分散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管理”形式，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在群众中存在的并有深刻影响的、有利于“各自为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企业利己主义和对于“自由”的抽象概念。关于这一点，正如列宁所写的：

“小资产阶级抗拒国家的任何干涉、统计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sup>②</sup>

布尔什维克党对最有斗争性的工人发生政治影响，尽管这样，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影响和它在生产单位中的基础还是薄弱的，尤其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00页（中文版，第26卷第86页）。

<sup>②</sup> 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载《列宁全集》，第27卷第351页（中文版，第27卷第311页）。列宁在这里例外地使用了与一般用语相矛盾的“国家社会主义”一词。他使用这个词汇是为了和以前通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对比，“国家资本主义”即“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大家知道，列宁一般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国家社会主义”的。我们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个词汇的意义和列宁使用的方法。

在说服工作方面，而要把工厂委员会转变为工人监督组织就需要做这种工作。十月革命以后，这种转变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某些布尔什维克党员也对工人监督和限制工厂委员会的权力持保留态度，因而困难加重了。然而，最严重的反抗是由于孟什维克或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在一部分群众中发生的影响，他们利用这种影响尽可能地阻碍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实施。

这些反抗和保留态度说明了采纳关于工人监督的有关决定必须延期，并说明这些决定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可以由一些事实来说明上述情况。

最初预定，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应紧接着10月25日之后举行会议时宣布建立工人监督。工人监督的法令和土地法令本来应当同时颁布；可是并没有这样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工人监督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散会了。同样，当11月3日《真理报》发表列宁撰写的工人监督条例草案时，条例本身也没有立即交付政府机关（也从来没有将草案的初稿交出来）。最后，仅在11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审核了列宁草案的修正本。经过一些修改以后，这个修正本被通

过了。

颁布的条例基本上重述了列宁草案<sup>①</sup>的主要规定，特别是关于工人代表所作的决定有强制性和关于工人代表和工厂主对国家负责等项。工人监督纳入苏维埃制度内；工厂委员会或工厂理事会就这样置于地方、省或地区领导机关的监督之下。法令规定设立一个监督机构的最高组织：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

法令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在工人监督的组织体系中确定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组织双方各自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工厂委员会是各个企业的劳动者直接产生的，而各厂工会（不是一切工人都参加的）有一个集中的组织，这使它们能够协助建立同样集中的监督，但又使它们摆脱了基层的直接影响。法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工人监督的组织体系中给予工会一个重要位置。这种办法引起了某些劳动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监护制度；相反地，在工人运动内工作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员却又认为这样解决还不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参阅《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2—273页（中文版，第26卷第254—255页）。

够；他们认为事情没有明确地朝着有利于工会的方向去解决。在他们眼里，这是趋向于把企业永远分割为独立的单位，例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工会发言人洛佐夫斯基声称：“有必要把事情绝对明确和断然地提出来，以使每个企业的劳动者不要有这样的印象：企业是属于他们的。”<sup>①</sup>

1918年初，《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差不多重新采用了1917年11月条例的原文。列宁撰写的这个宣言于1918年1月3日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它指出工人监督“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sup>②</sup>已被证实。

宣言声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承认劳动者在对工厂、矿山、铁路等的监督尚未实现之前，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就不可能是一种社会所有制。列宁在撰写宣言前不久，曾坚持“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

---

<sup>①</sup> 见 A. 洛佐夫斯基：《工人监督》（俄文版），莫斯科，1918年，第20页，引自 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企鹅丛书》，1966年版，第2卷第73页。

<sup>②</sup> 引自《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3页（中文版，第26卷第396页）。

需的统计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sup>①</sup>的思想。

1918年3月至4月，列宁多次指出，特别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又强调指出，他心目中的群众监督和工厂委员会谋求“各自”管理企业的活动完全不同。他说，工人监督就是苏维埃国家的监督而不是众多的、分散的监督。要实施一种关心整体利益的监督，列宁补充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sup>②</sup>。

在各种不同的决定通过后，每个生产单位可能采取的逃避监督的行为原则上大为减少，在这些决定实际执行过程中，工厂委员会事实上丧失了它们的自治，它们不再掌握自己的真正权力，而纳入了中央的工人监督范围内。

在一切具有某些重要性的（称为“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工厂委员会应对国家负责，“维持

---

<sup>①</sup> 见《怎样组织竞赛？》，载《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7页（中文版，第26卷第384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3页（中文版，第27卷第220页）。

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sup>①</sup>；这种责任落到了指定执行工人监督的、从工人和职员中选出来的代表肩上。

这些不同的规定引起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不满，他们妄想使工厂委员会变成在联合形式下可能组织的、但对国家机关不负责任的自治管理委员会。这些措施的反对者特别声称工人监督法令的制定把“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概念延伸到这样的程度，即由于工人监督条例的实施，工厂委员会完全被置于其他的权力机关之下。

这个权力机关由工人监督基层组织（大体上是旧的工厂委员会）所从属的各种不同机关构成，即地区委员会和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内部，工人监督基层组织的代表是少数派。因此，在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中只有五名代表由全俄工厂委员会会议指派，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则有五名代表；工会中央理事会五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协会五名；农业工作者两名；彼得格勒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3页（中文版，第26卷第254页）。



工会理事会两名以及十万名会员以下的每个工会联合会一名(超过十万名的两名)<sup>①</sup>。

在工人监督的上级机关中，这个监督的基层组织的代表占少数，而工会组织的代表比它们的代表多。

即使进行了这样的变革，工人监督的结构还不能保证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协调，但是俄国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即对城乡的供应以及不久以后对前线的供应，需要有规律地进行生产并且应该尽可能地适应总的形势的要求。

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加强”工人监督的体制，同时建立一些其他的协调和领导生产的形式，其主要的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事实上，在内战开始后的形势发展下——“一切为前线”的口号占优势——，这种协调和领导的形式比工人监督更占优越地位<sup>②</sup>。可以说，工人监督在旧的工厂委员会解体的同时终于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参阅伦敦“团结”小组莫·布林顿：《布尔什维克与工人监督(1917—1921年)》，载《自治》杂志，1973年9—12月号，第74页。

<sup>②</sup> 参阅前引 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78页。

瓦解了。这种解体似乎与在工厂中实际掌握问题的真正的工人组织者人数不足有关。另外，基层工人组织的缺乏，也是和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人数太少有关，也由于党组织、国家机关，尤其是军队为了完成任务而越来越多地吸收了（无疑也是必要的）那些最积极的工人有关；与布尔什维克党缺乏有系统的推动和劳动者对工厂委员会的日益漠不关心有关。最后，在苏维埃制度最初几个月建立的工人监督就堕入了不再觉醒的睡眠之中，工业生产的协调和领导只能在别的基础上取得保证。

### （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 对生产过程的协调

早在11月17日（也就是在工人监督条例公布后三天），就提到将设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事是在宣布解散临时政府设立的经济理事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中提到的；这两个机构应由国民经济委员会来代替。当时，布哈林负责为这个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准备有关文件。实际上他拟定了一个法令草案，这个法令草案的全文于12月

5日发表<sup>①</sup>。

根据这个法令，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全国的经济活动和政府的财政来源”，统一领导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切经济机关的活动，包括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活动在内。实际上，国民经济委员会加强了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即后者也要保证“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此外，法令还把工人监督制纳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体系中（因为法令规定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成员中也有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并把工人监督委员会放在从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地位。

把工人监督委员会从属于经济委员会的体系，这就为前者的消亡准备了条件。列宁在总结苏维埃政权最初几个月所采取的决议时，也认为已经从实行工人监督制进而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sup>②</sup>。

---

① 参阅前引 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 2 卷第 79 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列宁 1918 年 1 月 11 日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477 页，特别是第 493 页（中文版，第 26 卷第 439 页）。

法令中有关筹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应同各生产单位保持关系的具体规定，十分突出地体现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时期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对实行中央集权管理比实行民主集中制更为有利。但是，这些规定的主要方面后来被保存下来了；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中就可以重新看到这种规定的主要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为1920年2月21日成立的全俄电气化国家委员会的派生机构）成立于1921年2月22日，在开始时仅仅是个小型的“技术部门”，负责进行一些研究工作，以便准备一项经济发展计划。只是在很久以后，到1925年2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才拥有一些“分散”的机构，从而部分地取代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sup>①</sup>。

无论如何，从1918至1923年的几年里，经济委员会的体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它的最高机关）正在成为中央集权和集中管理工业的工具。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权力是很大的：它可以没收、取得、封存任何企业或任何生产和商业部

---

<sup>①</sup> 参阅《苏联小百科全书》（俄文版），莫斯科，1929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条。

门；它负责集中和领导所有经济机构的工作，还负责制定有关经济的法令，呈报人民委员会审批。此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是人民委员会的直属机关。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各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有技术特长的专家被任命为这些代表的助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具有双重结构：中央机构，即各总局（领导各个工业部门）和地区机构，即地方的国民经济委员会。

“从技术上说”，设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及随后采取的有关实施法令的措施应在原则上保证国家对各个不同工厂生产活动的协调；同时，这些措施给予工程师、专家和技术人员阶层以很大权力，因为他们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中居于支配地位。通过这个法令，由专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阶层”<sup>①</sup>又重新占有有一些领导职位，但是他们是按照苏维埃政权所通过的决定来占有这些职位的，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随

<sup>①</sup> 毫无疑问，在列宁看来，从旧社会来的工程师、技术员、管理人员和其他的“专家”，就整体来说，是个“资产阶级阶层”，正如他在《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一文中所讲的那样（参阅《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3页，中文版，第29卷第408页）。

时可以收回他们的权力。

由于经济上的无组织状态，使得这个资产阶级阶层的作用不断增长。为了避免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苏维埃政权必须同这种无组织状态进行斗争。这正是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的一个决议所强调的，它事实上把如下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反对混乱、无组织状态和瓦解活动，这是一场灾难性战争遗留下来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后果……，是取得社会主义最后胜利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障碍”<sup>①</sup>。

为了同经济上的瓦解活动作斗争，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一个决议强调指出，必须切实地在各个方面建立起“强大的和巩固的组织，以便尽可能地把整个生产和产品的分配负担起来”<sup>②</sup>。

根据这个决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机关进行了改组。布哈林和其他几个“左派共产主义者”被淘汰了。老布尔什维克米柳亭和拥护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汇编》（1939年），第69页。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90页。

<sup>②</sup> 同上。

国家工业集中管理和实行计划化的前孟什维克拉林参加了新的领导班子。

这样，一个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体系便发展起来了，这个体系就是被列宁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列宁说，工人们对此并不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些“真正的大企业、托拉斯……的组织者”，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这些组织者应该“当做……技术专家”受雇并领取“高额薪金”<sup>①</sup>。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非常明确地为这种看法作辩护。他在这篇著作中说明，由苏维埃国家雇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和资产阶级达成的“妥协”，其规模超过了本来的设想，这是考虑到当时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无力组织社会生产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因此，列宁这样写道：

“如果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政权已经搞好了（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全国范围内的统计和监督，或者至少是搞好了这种监督的基础，那就决不会有作这种妥协的必要。”<sup>②</sup>

---

<sup>①</sup> 参阅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载《列宁全集》，第27卷第365页（中文版，第27卷第323页）。

<sup>②</sup>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载《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5页（中文版，第27卷第234页）。

#### (四) 生产单位领导人的任命和一长制问题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初采取的决定之一，是关于生产单位的管理条件和关于被没收的企业领导人的任命的方式问题。这个决定是同 1918 年 3 月 3 日颁布的在工业中实行的那个法令相符合的。根据这个法令，每个“主要领导机关”有权对所属企业任命一个代表政府的委员和两个经理（一个是技术经理，一个是行政经理）。只是行政经理的决定可以被工厂委员会或相应的部门所否定；而技术经理仅对中央工业局负责。在国有化的企业里，工厂或车间委员会的决定应该提交经济管理委员会通过。法令规定在经济管理委员会中，职员和工人不得占多数<sup>①</sup>；一般地讲，各工业部门的总局所任命的经理都是些工程师和企

---

<sup>①</sup> 关于上述措施和其他措施，在下列几种资料里可以找到说明：《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 22 卷附录；E.H.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 年）》，第 2 卷，特别是第 73 页起；在 1918 年，包括 1917 年 10 月 25 日至 1918 年 10 月 25 日期间在莫斯科公布的关于国民经济的法令和决定汇编中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中，特别是第 171—172 页和第 311—315 页；D. L. 利蒙：《列宁与工人监督》，载《自治》杂志 1967 年 10 月号。关于



业的旧领导人,包括过去的资本家。

关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后进行的思想斗争,这里不想多谈<sup>①</sup>,但必须简短地说明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于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任命工厂领导人的办法所采取的立场。确实,这样的任命原则不仅受到工会中一部分党员领导人,而且也受到那些自命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激烈批评。这些人,布哈林是其中一个,在1918年春天是很活跃的(他们那一派是后来才解散的)。他们起来反对这样任命的工厂领导人,反对授予他们那样的权力,反对付给他们较高的薪金。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违反《四月提纲》所肯定的原则的。根据《四月提纲》,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应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他们应由选民来选举和罢免。

---

1917—1921年苏维埃政府在工人监督和经济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均见M.布林顿:《布尔什维克和工人监督》。并参阅拉布里:《共产主义的立法。布尔什维克政府主要法律、法令和决议汇编》,巴黎,1920年,第131—136页。

① 这些思想斗争我们以后再研究,请参阅本卷第583页起。

列宁显然也不否认实行(任命)企业领导人的法令是和《四月提纲》中明文规定的一些原则相矛盾的,但他强调那是临时措施,为了使企业得以进行工作和克服“无产阶级政权实际上还软弱的情况”<sup>①</sup>而迫不得已采取的。

对列宁来说,这些措施等于“后退”,虽是暂时的,但在当时条件下又是非采取不可的。他说,当时的条件“还不”许可社会主义“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苏维埃的方法”<sup>②</sup>向前发展。列宁在这里所讲的“后退”意味着对资本的加强(尽管在国家企业中并没有恢复资本家的法定所有制),“因为资本并不是一批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sup>③</sup>。因此,列宁的原则立场是清楚的,尤其需要指出,当时自从实行“后退”和加强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以后,没有按照

---

① 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载《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8页(中文版,第27卷第237页)。

② 同上书,第256-257页(中文版,第227页)。

③ 同上(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

“苏维埃的方法”<sup>①</sup>和《四月提纲》而采取什么措施。

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1918年5月出版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列宁又谈到对企业领导人的任命问题和有时也把过去的资本家委派到这些岗位去的事实，他写道：

“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做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做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家。工人们也知道得很清楚：真正的大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技师一样，99%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材。……工人们……不害怕最大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即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散漫和涣散现象。”<sup>②</sup>

---

<sup>①</sup> 夏尔·贝特兰的《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巴黎，《马斯佩罗小丛书》，1973年，第83—86页）讨论了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是联系中国文化革命的变革进行讨论的）。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65页（中文版，第27卷第323—324页）。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对列宁来说,委任“技术专家”去领导国家企业,使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力并且领取高薪,这也是他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

后来(从1918到1920年),内战和外国干涉时期的那些条件使得苏维埃政权给予有经验的管理者以更显著的地位,从而削弱了工厂委员会的职能。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坚持这样的必要性,“……要管理,要建设国家,就应当拥有具备管理技术、治国经验和经济经验的人材”,他接着说:“而这样的人材我们只有从旧阶级中才能找到。”<sup>①</sup>

第九次代表大会也明确规定,从今以后,工厂委员会主要应主管劳动纪律、宣传以及对劳动者的教育问题。<sup>②</sup>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后者当时已和他1918年的立场决裂)参加了竭力把当时所实行的组织形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0—471页(中文版,第30卷第419页)。

<sup>②</sup>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见《列宁全集》,1935年,第25卷第618页起(参阅《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页起)。

式加以“理论化”<sup>①</sup>的人的行列。他们千方百计地把在那时特定情况下实行的措施说成具有“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

布哈林认为这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措施。他企图在他于1918年3至4月间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和他现在赞成极端的中央集权和统一领导的立场之间进行调和。他写道：在无产阶级行动重心“移向经济”（按照他的说法）的时期，必须对那些从工人斗争的第一阶段产生出来的经济机关进行改组。这种改组应该引起“同志关系的后退，并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某个企业中，等等）实行一长制”。他说，后者“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权利的减少，也不意味着它的组织作用的降低。它是无产阶级对工业管理的一种集中的、强化的形式”。<sup>②</sup>

布哈林继续说，当“巩固无产阶级地位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的时候”，就不应再“强调对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应实施能保证最大效能

---

① 参阅本卷第544页起。

② 参阅尼古拉·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德文版），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1970年，第128页。

的管理方式。由基层进行广泛选举的原则（通常由工厂中的工人来选）被一种考虑……效能……而精心挑选技术和行政人员的原则所代替了。”布哈林还宣称：今后，要让其中包括工程师和专业管理人员在内的“负责人”去领导企业，他总结说，因为他们只能“履行无产阶级要求他们履行的职责。”<sup>①</sup>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的问题和同无产阶级思想格格不入的领导人可能拒绝服从党和劳动者基层组织的直接领导和监督的问题，就这样奇妙地得到了“解决”。

布哈林的这种思想演变不足为奇。它表明在“右派”立场和“左派”立场之间有着显著的同—性；这种同一性说明了这些立场事实上具有“时左时右”的特点<sup>②</sup>是正确的。

---

<sup>①</sup> 参阅尼古拉·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德文版），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1970年，第128—129页。

<sup>②</sup> 布哈林在1918至1920年之间立场的改变表明他的观点是“机械论”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不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不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而是一个各方都能反映整个结构的整体。1918年，这种观点导致布哈林认为在工厂里存在资本主义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1920年，还是这种观点使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保证了工厂管理的社会主义特性。同样，在1920年底和列宁辩论时，

特别是在那篇 1920 年 12 月 30 日所做的后来发表时题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sup>①</sup> 的演说里，列宁严厉地谴责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左时右”的极端主义；在该文中，他特别强调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之间可能发展种种矛盾。晚些时候，列宁更明确地讲在某些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采取罢工斗争也可以认为是正确的。<sup>②</sup>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犯的那些“时左时右”的错误，特别在五年计划期间，尤其在斯大林的若干文章里又重新出现<sup>③</sup>（而在 1920 至 1921 年冬天的论战中，斯大林是支持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这样，一整套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观点就逐渐形成了。苏联科学院的《政

---

因为缺少关于矛盾统一体辩证的观点，使布哈林无法理解那时的苏维埃国家是工农国家；在他眼里，这个国家要么就是工人的，要么就是农民的。

① 《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11 页起，（中文版，第 32 卷第 1 页起）。

② 参阅《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87—188 页（中文版，第 33 卷第 157—158 页）。

③ 1936 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中，肯定阶级在苏联已经消灭了，他作为一条原则宣称：“干部决定一切”。

治经济学教程》以最完整的形式把这些观点固定下来。<sup>①</sup> 这和修正主义的观点只有一步之差了。

## 第二节 “战时共产主义”末期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地位

苏维埃政权最初几个月着手进行的对资产阶级地位的改变，在白军叛乱和外国干涉的初期加快了步伐。那个时期的特点是逐步禁止几乎是全部的私人经济活动，这项禁止也同样打击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商业。

事实上，这种做法具有两重性：在消灭私人资产阶级活动的同时，又发展了国家资产阶级。

### (一) 私人资产阶级活动的取缔

1918年4至6月间，由于资产阶级对生产的破坏活动日益猖獗，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

---

<sup>①</sup> 参阅苏联科学院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由巴黎社会出版社于1956年根据俄文版出版。



并进行改组以后，便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对工厂、矿山等等的国有化。内战开始后不久，国有化的工作更普遍地展开了；1918年6月28日的一项法令对所有的大企业，也就是说资本在一百万卢布或以上的企业<sup>①</sup>，迅速地实行了国有化。

1918年6月28日的法令只提出了国有化的原则，应该根据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来作出决定。实际上，大企业的国有化进行得很迅速。1918年5月，国营工业企业的数目还不到一千个，而到1918年秋天，就已有三、四千个了<sup>②</sup>。

坚持实行这些措施和决心切实地禁止私营工厂和私营商业的一切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是，到1921年年初内战时期结束时，俄国资产阶级失去了它直到1918年春天还在工商业中所占有的大部分阵地。以后，它不再拥有构成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部分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它同国际银

---

① 参阅莫·多布：《1917年以来苏联的经济发展》，伦敦，劳特莱吉-基根出版社，1948年，第95页。多布认为，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是立刻实现乌克兰大企业的国有化，以避免德国资本向俄国或乌克兰的资本家“收购”德军占领区的企业。

② 同上书，第96页。

行和金融资本的强有力的联系被割断了，如同旧国家消亡了一样，旧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政策与它的根本利益是相适应的。

同很多过去的地主分子一样，很多旧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以前最富裕的那些人，都逃到国外去了。

但是，尽管经过这样的动荡，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彻底、干净地“消灭”。

首先，作为一部分农村资产阶级的富农和其他富裕农民，或多或少地渡过了难关。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谈到。

其次，数量相当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医生、院士、律师、工程师、专家、教员，等等）仍然留在俄国。当然，他们一般地是靠菲薄的收入生活的。他们失去了几乎全部的非“职业收入”（“职业收入”本身也失去了一部分），但是他们想保持过去那一套活动而加入新的苏联社会。他们在思想上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比如我们从关于学校机构的辩论中以及在研究学校机构改革的性质时就可以看到。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一些人渗入国家行政机关，特别是经济机关以及正在建立的新

的司法机关、政治警察和检察机关<sup>①</sup>。

在经济方面，资产阶级的活动同时以“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进行着。

首先是“非法的”，按照列宁的说法，因为资产阶级具有经营管理的本领<sup>②</sup>并且和国家机关继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即使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部分资产阶级仍然在积极地从事对他们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他们通过非法交易所攫取的利润虽然无法估计，但却是极为可观的。这些活动使资产阶级保持一种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战时共产主义”阶段结束以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分子（那些耐普曼）能够比较容易地“重新冒出来”。但这一部分人永远不能成为直接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力量。然而它的存在及其和国家机关的联系，对于国家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巩固，

---

<sup>①</sup> 这是检察职能的一部分，并监督司法体制的实施，相当多的孟什维克旧律师（如维辛斯基，他是以后三十年代那些诉讼案件的公诉人）都渗透进来，尤其是在政治警察中渗透了旧社会革命党人。

<sup>②</sup> 参阅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两周年时在《真理报》上发表，载《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3页起，特别是111页（中文版，第30卷第95页）。

肯定是起了作用的。

## (二)作为小私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削弱和在 工厂企业、机关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处境

俄国的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是由中农构成的,有关他们的问题,留待以后讨论;这里,我们仅对小资产阶级的另外一部分人谈些看法。

他们的人数是很难估计的,但可以这样认为:在革命以前,他们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八,而其中五分之一是职员<sup>①</sup>。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商贩,已经破产了: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有些人进行非法交易,另外一些人在行政机关和合作社里找到了比较可靠的职业,还有些人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手工业者的处境更糟了。有关交通运输和原料分配的规章制度的制定,迫使他们大部分人停工待料。少数人竟努力争取到工厂去工作,个别人为了得到最低限度的

---

<sup>①</sup> 参阅《1970年国民经济》，莫斯科，1971年，第22页。

原料竟组织起生产合作社(劳动组合)来。

小资产阶级中的这两部分人的政治态度是对苏维埃政权丝毫没有好感。新经济政策使他们逐步采取一种不友好的“中立”态度。

在工厂企业和机关中的小资产阶级(中级和下级的工作人员,工业、商业和银行的职员,等等)的立场也和小私有者的差不多。革命初期,甚至以“行政人员怠工”来表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当人民委员占领了各部以后,发现办公室里人都跑光了,既无官员也无工作人员,有时候连档案也散了一地。但是,后来,这些行政工作人员为了薪金,陆续来上班了。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初期,他们的人数,看来至少和革命前一样多。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根深蒂固,这类小资产阶级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据说他们经常还用“行政人员怠工”来增加工作层次,使工作效率更加低了。这一切表明,从旧社会来的人员的上述做法仍旧是在苏联的工厂企业和机关工作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作特点(部分人调离了),尽管他们最后还是“承认了”苏维埃政权。

中等水平的技术员、专家和工程师同样是属

于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开始的时候，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程度（在这里或在别处，都有个别人是例外）不下于另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是，很快就争取到他们的“中立”，看来，是因为我们给了他们许多物质利益的缘故。由于这一让步，他们的收入明显地高于在工厂企业和机关工作的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其中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分子的收入则更少，经常低于工人的工资。

### （三）国家资产阶级的的发展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部分旧资产阶级继续渗透到国家的行政和经济机关里。与此同时，这些机关也保证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和资产阶级分配关系的恢复。按照我们已经引用过的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的分配关系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另一面”，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它虽然在形式上经过了部分改造，但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继续在再生产<sup>①</sup>。众所周知，正是这样一些生

---

<sup>①</sup> 列宁说资本并不是一批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见本卷第180页），就是强调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指资本主义分工的关系。

活作风和关系的存在，给国家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国家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是同当时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这些关系是不能在一个短时期内“消灭”或者“摧毁”的，何况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所要处理的矛盾（那时主要矛盾是苏维埃政权和地主、俄国资本家以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以武装斗争形式出现的矛盾），不允许优先解决这些关系，因此就更不能“消灭”或“摧毁”了。

在出现国家资产阶级（那时还在萌芽状态）的同时，有利于企业领导人、工业部门的组织者和高级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分配关系也发展起来了。这样，工业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就为新资产阶级所占有。

2月21日的法令使一般工资待遇的等级得以巩固下来：“工资”等级的幅度比十月革命刚胜利时所许可的幅度还要大（这也就是说带来了更大的不平等），但和1914年以前的工资待遇等级的幅度相比已经大大“缩小”了。根据1919年2月的法令规定，莫斯科市区和郊区的最低工资是六百卢布，“高级管理人员”的最高待遇是三千卢

布；在其他地区，这个不平等的程度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底薪还得随着地区的差别而不同。事实上，对于那些“资格很老”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是可以付给超过三千卢布的工资的。

付给这样的工资，在工人阶级中激起一定的不满情绪，在党内引起了分歧<sup>①</sup>。因此，列宁不止一次地谈到“专家”以及他们的工资问题。他说，没有他们工业生产就无法进行，也不可能用简单地强迫的办法逼他们为苏维埃政权工作：“想用棍子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sup>②</sup>，付给专家高薪就是这样被清楚地认为是阶级斗争强加于人的一种妥协，而不是象苏联修正主义分子今天所宣称的那样，是执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列宁在1919年3月18日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很多决定是“为实际的必要性所要求的，”他还提醒说，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活

---

<sup>①</sup> 参阅列宁1919年3月19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29卷特别是第176—177页(中文版，第29卷第15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78页(中文版，第153页)。



动家的功绩在于他们实现的决定不是从什么有偏见的学说中抄袭来的，而是为实际的必要性所要求的”<sup>①</sup>。

实际上，对“资产阶级专家”的工资所采取的措施相当快地扩大到其他“负责工作人员”。因此，不平等已不仅仅表现在货币工资上了。

1919年4月，法令规定了“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员”的待遇，决定人民委员、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一些高级官员可以享受二千卢布月薪的待遇，这就部分地放弃了关于党员最高工资的规定，也就是说，关于党员不能领取高于工人工资的规定。

随着1919和1920年物价的上涨，工资待遇经过几次调整。在提高工资的同时，也略有“缩小等级”的倾向，但在那些年代里，由于普遍贫困、实行配给和物价的迅速上涨，特别是在黑市上<sup>②</sup>，货币工资已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意义。

---

<sup>①</sup> 见列宁1919年3月19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9页（中文版，第29卷第127页）。

<sup>②</sup>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前引E.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05—206页。

随着货币工资的贬值，其他一些不平等形式也有了发展；这样，资产阶级工程师、专家和管理人员又得到了各种物质上的好处。这种演变同样出现在红军中，军官们（很多是从旧沙皇军队中来的）得到了一系列的特权，这不仅表现在货币待遇上，而且表现在其他形式上，如他们有专门的住所，连伙食也和士兵们不同，等等。

在 1920 年，要想对工资和待遇之间的“平均”差别作个估计，简直不可能。事实上，个人收入的差别很大。此外，那时还有“实物奖励”，这是不能用固定的价格反映出来的，因为价格本身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又快。这些“实物奖励”有时是些食品（但由于国家粮食供应不足，很少用这种奖励），有时是各个工厂的产品（其中包括诸如机器用的输送带、金属零件、小生产工具，等等）。发给工人的这些产品显然不是供领取奖励的人直接消费用的，而是用来充斥黑市市场，到那里去换取别的产品<sup>①</sup>。

---

<sup>①</sup> 在 1919 和 1920 年之间，列宁不止一次地揭露过这种状况。把工厂产品的一部分作为实物进行分配的办法是从 1918 年 5 月开始实行的。关于这个问题，参阅前引 E.H. 卡尔著作，第 2 卷第 243—245 页。

领到的奖励产品成了工人工资的一部分，但主要受惠者是“资产阶级专家”。在“实物工资”普遍推行的时期，生产者和“专家”、工程师等等之间的工资的差别之大，是无法衡量的。但是，很多迹象表明，在把产品作为实物预先支付的时候，管理人员和技术员占据了“最大或最好”的部分，他们普遍地拿这些产品去进行非法交易。

以后，新经济政策巩固了这些分配关系，它肯定了1919年2月21日法令所确定的工资等级，允许多种“奖励”的存在，这些“奖励”后来又用货币形式给厂长和总工程师等人。

那几年形成的国家资产阶级，人数不多，不过因为没有相应的统计数字，我们无法估计出他们的人数。但是，总人数不会超过几千人。事实上，它是随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定名的一长制之付诸实施，随着任命各工厂、各托拉斯、各管理总局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委员会一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而逐步增加的。因此，到1920年底，根据统计：在二千零五十一个企业中，有一千七百八十八个实行了一长制<sup>①</sup>。

<sup>①</sup> 见《国民经济》，第4期第56页，1921年（引自前引E.H.

资产阶级渗透到某些国家经济机关里，特别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些部门里的情况是很严重的。那时有位“白色”的大学教师来到鄂木斯克，他对这种渗透作了如下的描述：

“领导着很多机构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机关的仍然是过去那些老板、经理或者私人企业的领导人。一个对过去的工商业界人士很熟悉的来访者，如果预先没有向他介绍这些机构的情况，他便会惊奇地看到仍然是大皮革工业的旧业主在担任这个工业部门的主要领导，仍然是过去的大企业家在领导中央纺织机构<sup>①</sup>等等。”

这样，一个国家资产阶级就具体地形成了，那时主要是由老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sup>②</sup>。

---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194页注5)。在二十年代，要求厂长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得和工厂党委书记和工会书记商量，企图以此来限制厂长的权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重领导制”。这个制度执行得并不能令人满意。在五年计划开始时，尽管有很多情况说明工厂党委书记的权力至少和厂长一样，但是厂长(从那以后越来越多地由党员并且是工人出身的人来担任)的权力重新高于一切了。

① 见 J. K. 金斯：《西伯利亚、协约国和高尔察克》，北京，1921年，第2卷第429页，引自前引莫里斯·布林顿著作《布尔什维克与工人监督》第65页。

② 在开始时，国家资产阶级分子的阶级出身对这个阶级的

这个还在萌芽阶段的国家资产阶级，首先在城市里形成了，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机关的骨干力量。它也在农村中出现了，那里的国营农场的领导人一般也享有特权的地位。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9年12月）上，国营农场被指控用高薪来争取专家，会上还揭发了国营农场一些领导人住在地主过去的住宅里过着奢侈的生活；此外，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地主分子又重新以“国营农场场长”的身份出现。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位代表甚至说国营农场“已经变成了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骚动的工具。”<sup>①</sup>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产阶级处在萌芽状态的特点是由一系列事实所决定的：首先，它刚刚形成；其次，原先为“资产阶级专家”所把持的一部分职位后来被布尔什维克党员占据了，他们在革命的马克思主  
组成起过重要作用，以后的情况就变了。当国家资产阶级巩固以后，它的成员的阶级出身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从那以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看这个新阶级在占有生产资料中所处的地位、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所起的作用、从生产财富中所提取的收益以及看它如何发挥它的阶级作风。

<sup>①</sup> 参阅《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19页和第219页。引自前引 E. H. 卡尔著作第2卷第170页注1。

义思想的鼓舞下，从事无产阶级的实践，把革命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在工作中同工人以及党和工会这样的阶级组织紧密配合；最后，阶级斗争本身的尖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资产阶级分子在国家经济机关中活动的可能性。由于工人对他们不信任以及劳动者为了反对某些等级制和特权所进行的抵制，老资产阶级分子就无法让以他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作风完全占据优势。

工人的抵制是一种阻力，它限制了巩固国家资产阶级的可能性。这类抵制的例子举不胜举。工人们义愤填膺，常常拒绝同领导工厂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他们应该做到的“合作”，抄他们的家，把他们的存粮充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我们可以在当时的苏联报刊以及列宁的著作，比如1919年3月28日在《真理报》<sup>①</sup>上发表的《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中看到。工人们反对把资产阶级专家和技术员吸收到国家经济机关中工作的政策。他们采用这样的抵制形式，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以后，这些抵制活动在多少有些尖锐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31页起（中文版，第29卷第198页起）。

的形式下继续进行，甚至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也还在进行<sup>①</sup>。

但是，这些只是阶级斗争的初级形式，单靠这个形式，既不能改变生产关系，也不能真正阻止那些在经济机关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去发展资产阶级作风和组成国家资产阶级。

无论如何，把那时在工业或者经济机关和管理机关中占据领导岗位的人统统看作国家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实际上，一部分工作岗位是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发扬无产阶级思想作风，最大限度地帮助劳动者从资产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并且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些领导人的主要职责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特点（正象那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党章所规定的那样，他们一般拒绝领取高于工人的工资），他们决不是国家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不论在思想上或在物质上都是道道地地的无产阶级，并且大部分都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人。

---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尤其需要读一读《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5页（中文版，第33卷第164页）。

#### (四) 学校和资产阶级地位以后的巩固

实际上未经革命改革的旧学校对以后资产阶级地位的巩固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它同刚刚变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相比，还是次要的。这些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堡垒，它们越来越向那些一走出苏联学校大门就要担任日益增多的领导工作的工农子弟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由沙皇制度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旧学校，迫使它们的工作人员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在1917年10月以后的几年中，大批的教员和学校的官僚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正如达尼埃尔·林登贝格所指出的，“1917年11月22日成立的以卢那察尔斯基为首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没有接收到一份档案、一份统计表；旧学校的官僚……用搞光一切的办法来进行破坏；至于大部分小学教师，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号召也是充耳不闻；他们消极怠工，在好几年中，拒绝执行党的指示……”<sup>①</sup>。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达尼埃尔·林登贝格：《共产国际和



十月革命以后,学校的状况是这样的:小学教育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教员工会所统治的。中学教育是由同立宪民主党有密切联系的“中学教师协会”所统治的,大学教育也是如此<sup>①</sup>。

内战之后,在苏维埃政权同实际上统治学校的思想和政治力量之间找到了一个妥协办法,这个妥协办法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基础上的。

此外,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对于它在“教育”领域里究竟应该干预些什么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这个问题,也象其他问题一样,有几种对立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娜·克鲁普斯卡娅为一方的,和特别是以卢那察尔斯基为另一方的观点。

从学校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来说,娜·克鲁普斯卡娅在《无产阶级教育》,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2年,第289页。

<sup>①</sup> 关于十月革命后苏联学校的状况,参阅达尼埃尔·林登贝格:《苏联学校建立前的历史》,载《今日政治》,1971年9月号,第57页起。关于在资产阶级关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不断产生情况下的“学校”的地位,参阅克里斯蒂昂·博德洛和罗歇·埃斯塔布莱:《资本主义学校在法国》,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1年,载《汇编》,第213—214号。

普斯卡娅的观点是忠实于马克思的论点的，这个论点是反对国家机关对教育事务的直接干涉。在实践这些观点时，应由“学校委员会”这样专门的苏维埃机构来负责基础教育；由这些委员会选派教员并且在学生参加下，对学校进行管理<sup>①</sup>。原则上，由于“劳动专科学校”的建立，教学内容有了根本的改变。这类学校的基础课“应该是生产劳动，并不是为了维修学校设备或者仅仅作为教学方法，而是作为生产的和社会必需的活动而设立的”<sup>②</sup>。

但是，由于教员的不合作，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内战和外国干涉所造成的财政经济上的混乱，也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问题上，这些措施的实际意义非常有限；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学校重新开始了真正的活动，但进行那些活动的具体条件已和娜·克鲁普斯卡娅所设想的大不相同了。

---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前引达尼埃尔·林登贝格著作《共产国际和阶级教育》，第306—30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04页。

此外，娜·克鲁普斯卡娅的革命观点，同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重要派别的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观点，特别是同维护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观念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经常发生冲突。从1917年起，这些保守的观念对中学和大学的影响非常明显。

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并无改变。直到1928年中学的学制依然如故，而大学入学条件也没有变：实际上，大学总是或多或少地把工农关在门外。

从1918年夏天起，也就是内战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的时候，曾企图开始改变这种状况。1918年8月6日开办了“工人进修学校”，学制相对地缩短，主要进行一些工业技术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教育。这些“工人进修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1918年年底起，为了提升更多的专家，他们的作用就改变了；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大学又恢复了旧的录取规章；原则上，工人进修学校毕业生进大学是免除入学考试的，但因为毕业考试内容是那样一些内容，所以工人出身的大学毕业生是很少的；总之，这些极少的毕业生一般地都是那些

已经接受了大学教育制度中所体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这样,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没有能够使学校革命化,它只是对它们进行了很少的改革。从本质上说,这些学校,无论从教学内容,从教学方法,从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来看,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学校。如果把某些为时短暂的尝试撇开,今后还将与从前一样,这些学校的工作和由此而再产生的资产阶级关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苏联的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步增长起着巨大的作用。

### 第三节 “战时共产主义”末期的 无产阶级的地位

“战时共产主义”结束时的苏联无产阶级的地位是充满着深刻的矛盾的。

一方面,它拥有国家政权;它和农民肩并肩地取得了俄国资本主义、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异乎寻常的胜利(虽然彼此之间物质力量并不一样)。另外,虽然由于普遍的贫困,它的物质条件虽

然还很差,但相对地说,还是“优越”<sup>①</sup>的。

另一方面,它的队伍削弱了,异己分子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钻进来了。一部分原来的工人阶级腐化堕落了,常常需要有一套严格的纪律才能使他们干活。

如果要弄清楚无产阶级在“战时共产主义”结束时的阶级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的特殊性,人们就应该对这个充满矛盾的地位以及所经历的某些阶段进行仔细研究。

### (一)苏维埃无产阶级的“体质”的 衰弱和部分的“解体”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俄国的无产阶级受到了可怕的损失。在内战的年代里,它确实受到很大

---

<sup>①</sup> 这样,从1918年8月份开始,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实行了一些不同等级的配给制度。居民分为三类:重体力劳动者;其他劳动者和所有劳动者的家属;老资产阶级分子。第一类的定量比第三类多四倍,第二类比第三类多三倍。一个类似的制度,但常常更复杂,在所有城市里越来越多地推行开来。事实上,所有的人很快地都感到定量不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前夕,定量最高的工人每天只能得到一千二百至一千九百卡(热量单位),而他们的最低需要量则是三千卡(参阅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33-243页)。

的削弱,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还在继续削弱。因此,到了1922年,在全国范围内,在职的工人数目还不及战前的一半,也就是说,和1913年的一千一百万人相比,只剩下四百六十万人;在1922年有工作的四百六十万人中,参加工业生产的只有二百万人,加入农业无产阶级行列的不过一百二十万人<sup>①</sup>。

在职的工人阶级,不仅在数目上有所减少,而且在组织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很多战斗性很强的老工人,在不同的战场上牺牲了。有的被党、工会和国家机关吸收去了。还有的特别是在大工业中心,由于失业或者缺少食物,离开了工人的队伍,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男子和妇女,一般是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为了享受体力劳动者的配给,或者想使人忘记自己的阶级出身,却钻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在一亿三千六百万的总人口中,半数是适龄劳动者,但新的执政阶级的核心人数很少;即使再加

---

<sup>①</sup> 见《1922—1972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72年，第345—346页。

上可以回到以前生产岗位上去的老工人，那末1922年实际在职的工人数字也同样仍然是很少的。况且，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主要并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人数多少，它首先取决于它的阶级组织和它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的能力。

## (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资问题

十月革命后的日子里，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好转。主要的改变是取消了以前资本家用种种借口专横地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罚金，并且保障劳动时间缩短后的工资和原来的一样；劳动的时间确实改为八小时了，而过去在不少场合都是十到十二小时。工人阶级从1917年2月起就进行经济斗争并从老板那里取得一些改变，今天的改变正是前者的继续。

但是，由于战争和内战而造成的经济的解体，迅速地减低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确实，为了试图跟上官价的上涨，特别是配给品价格的上涨，工资进行过不少次调整，但配给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实际上经常买不到。1919年，用官价仅仅能买

到一半数量的消费品，其余的只好到黑市去按不稳定的高价去购买了。

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整个阶段（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也是这样），在工会组织内部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工资问题（稳定工资的条件以及工资“级别”的制定）进行过多次辩论。那时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已经离开了队伍，而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都涌了进来，这都构成了当时形势的特点，那个时期所通过的决议都是由这一形势所决定的。这一形势——是和总的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一——造成了生产力和工业生产的灾难性的下降、严重的缺勤、工业的解体。

1918年10月10日所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劳动法，批准了从1917年10月起就实行的劳动保护条例，委托工会组织同企业领导人协商，并由劳动人民委员部核定，来确定工资<sup>①</sup>。

从1918年4月初起，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张推广计件工资。确实，劳动法预见到工资等级不仅应

---

<sup>①</sup> 见前引 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01页。



考虑到劳动强度的大小，还应考虑到“责任大小”和“熟练程度”而有所区别。此外，计件工资和奖励被认为是工资的“正常”形式。

事实上，计件工资制在俄国工业中得到普遍的推广，保持这个制度对老工人比对刚进入工人阶级行列中的新工人更为有利。大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赞同这种工资计算方式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认为这是恢复生产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手段。对此，列宁写道：

“必须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制，采用泰罗制中许多合乎科学的进步的方法，以及根据各工厂生产的产品总额，或铁路运输业及水路运输业的经营结果来决定工资等等。”<sup>①</sup>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列宁采取的这个立场进行了广泛的辩论。由于党内有一派（由“左派共产主义者”组成，众所周知，其中包括象布哈林、拉狄克和奥新斯基这样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一种恢复“对企业进行资本主义管理”的尝试，使得这场辩论更为广泛。

---

<sup>①</sup> 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载《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8页（中文版，第27卷第236页）。

列宁在那本《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sup>①</sup>的小册子里，严厉地抨击了“左派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他说，这些立场和孟什维克的立场并无二致，他们也抗议采用计件工资制和根据泰罗制所作的安排，反对改组企业和在“工业托拉斯”领导下的工业部门的领导机关。列宁认为，采取这些措施是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它们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这是能够迅速发展的唯一的生产方式。

列宁所捍卫的方针在当时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后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个方针都没有改变，在1918至1919年年初，尽管采取了和冻结工资级别的倾向相配合的措施，但形势和1914年以前相比，还是没有改变<sup>②</sup>。

前述1919年2月21日的关于工资的法令，把工资分成许多类，每类又分成十二级。在每一类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39页起（中文版，第27卷第299页起）。

<sup>②</sup> 见前引 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05页。

中，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比例系数相当于1.75。计件工资和奖金普遍实行。只有在计件工资无法实行时，才认为计时工资是可以接受的，但“生产定额”应有所规定。

1920年4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工人工资的级别又有所放宽。在每一类内，放宽的比例系数由1.75增至2。事实上，货币工资在那时已很快失去了大部分的实际价值（因为没有可以按官价购买得到的物品），因此决定根据工人技术的熟练程度和产量情况，调整了国家配给品的份额。实际上，这个制度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已经改为实物工资了，它也是根据“产量”和“熟练程度”来决定的。

归根结底，在供应日益困难和货币贬值（它使货币工资越来越没有意义）的同时，一个有利于扩大工资差别、有利于计件工资、有利于奖励的方针便发展起来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货币工资差别的扩大和奖励的实行就更为发展了。

为了理解过去措施的意义——以及现在要谈的措施的意义——不要忘记采取这些措施时，原则上大部分都是过渡性的：它们是用来为应付解

决前线的迫切和突出的需要，为保持和增加工业产品的储备量的，而当时的劳动纪律由于受到严重的损害，使生产经常中断。所以对劳动纪律问题的研究不能和阶级的思想斗争中一系列的事实分隔开来。

### (三) 阶级的思想斗争和劳动纪律

作为高度社会化生产的工业生产，要求生产程序的严格协调，并且要求完成这些程序时保证质量。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劳动纪律，但纪律总是有阶级性的。它可以是由上而下地强加给那些企图“逃避”剥削和消极怠工抵制行政规章制度的劳动者，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纪律。它可以为在工作中进行合作和协调的劳动者所自愿接受，这就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前者是一种专制的形式，它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再生产；后者是和社会主义的协作密切相联的，这并不意味着协调的职能不需要由一个起“乐队指挥”作用的特定的劳动者来承担，但这个“乐队指挥”“并不需要占有乐器”<sup>①</sup>，而只是

<sup>①</sup> 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7卷第51页。

执行劳动者的集体意志而已。

不过，甚至当主要生产资料还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从一种纪律过渡到另一种纪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种过渡是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分若干阶段进行的，在这些阶段中，工厂纪律所表现的自相矛盾的特点，表明共产主义关系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衰亡。正象整个过渡进程一样，这个过渡并不是自发的过程：它是属于阶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这是一个既表现客观方面又表现主观方面的革命过程，正如这类性质的其他革命过程一样，必须由一个革命理论来指导，依靠这个革命理论，才能从群众的经验和创举中吸取教训。

这个革命过程的主观方面是本质的东西，因为生产者应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束缚下的思想关系中以及与资本主义剥削相适应的社会习惯中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指出：

“……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

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sup>①</sup>

使过去的被剥削阶级能够“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的那场革命，显然远远超过一场政治革命。今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要经过好几次“文化革命”才能完成的思想革命。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从资产阶级思想中解放出来，它本身便会发展一些和本阶级利益相矛盾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巩固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而不是消灭这些因素的。

在十月革命及以后的几年中，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使资产阶级失去了并无法重新获得的政权，因为俄国劳动者随时可以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并准备为取得对阶级敌人的军事胜利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那时俄国无产阶级（大量混进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革命化和布尔什维克党推进革命化（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的能力还不足以使无产阶级的纪律形式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作了好几次努

---

<sup>①</sup> 见卡尔·马克思：《哲学著作汇编》，科斯特出版社，第6卷第18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77页）。

力以便在无产阶级纪律的道路上前进，党利用了劳动群众中的许多“有实际经验的工农组织者”，并试图让他们担任领导以便他们发挥最大的创造性。因此，列宁强调劳动者的独创精神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他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写道：

“而天才的组织家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从事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sup>①</sup>

列宁接着说，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全面的、普遍的统计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为了阐明这点，列宁又说：

“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板公式和想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8页（中文版，第26卷第382—383页）。

由上面规定一个统一办法的企图。无论是死板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的统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雄伟的毅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板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sup>①</sup>

不过，正如前面所谈过的，在列宁写这些话的时候，采取了一些限制工厂委员会的权力并把工人监督置于中央管理机构之下的措施。列宁认为，采取这些措施是出于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中央集权的迫切需要，还由于工人对从事监督问题抱着“胆怯”情绪<sup>②</sup>。

列宁还用下面这一事实来为这些措施辩护，即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同贫困联在一起的，“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求荣、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sup>③</sup>。这就使得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2—433页（中文版，第26卷第387页）。

② 列宁说过：“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同上书，第431页（中文版，第386页）。

③ 同上书，第430页（中文版，第26卷第385页）。



建立一个严格的纪律和严格实行中央集权管理成为必要了。

1917年12月，列宁觉得当时形势的主要方面，是群众要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战胜他们的“胆怯”以及发扬他们的自信心和自觉遵守纪律的那股巨大的推动力。他认为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最好地帮助群众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比如，他写道：

“随着被剥削者的敌人——剥削者反抗的加强，被剥削者也在壮大、成长、学到本事，并且从自己身上抛掉雇佣奴隶制的‘陈旧观点’。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sup>①</sup>

几个月以后，在1918年3至4月间，面对俄国经济的日益解体，面对那时代代表小资产阶级思想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1页（中文版，第26卷第377页）。

的最危险地渗透的方式之一的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倾向的发展，列宁认为苏维埃无产阶级由于缺少创造性、决心和团结，还没有在自己身上看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统计和监督的能力，也看不到在工厂里实行无产阶级纪律的能力；因此必须在中央经济领导机关和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中给予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专家以更多的地位。

1918年4月29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里，把没有进过工会学校的劳动者的缺乏纪律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联系在一起，他揭露了“左派共产主义者”以为不用无产阶级纪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纪律就能摆脱资本家的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指出最困难的并不是推翻资产阶级，而是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制度、劳动纪律、劳动生产率、统计和监督……的保证”<sup>①</sup>。

当时，列宁认为对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危险，并不是公开的反革命（就象几周以后发生的那样），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1页（中文版，第27卷第274页）。

而是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1918年4月23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上所发表的演说里，发展了这个思想，说道：

“我们有一个比许多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更危险的暗藏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死敌，……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小私有者只有一个思想，就是‘能捞则捞，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这个敌人比科尔尼洛夫、都托夫和卡列金加在一起还厉害。”<sup>①</sup>

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又重复了这个思想：

“昨天，我们曾遇到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危险，其表现就是科尔尼洛夫、郭茨、都托夫、格格奇柯利、鲍加也夫斯基之流的行动。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个复辟，同样是这个复辟的危险，又表现为别种形式，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应该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9页（中文版，第27卷第214页）。文中提到的三个人是领导反革命武装的白卫军。

会战胜它的。”<sup>①</sup>

因此，当时迫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一整套措施，以便“自上而下”地贯彻一条尽可能严厉的劳动纪律，是有许多很复杂的理由的。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措施会不会更加限制了基层工人的积极性，会不会减少他们依靠自身力量的信心，会不会促使他们重新采取一个同发挥领导作用的阶级不相容的消极态度。人们当然有权提出这些问题，不过显然无法回答。但是，人们所知道的却是——考虑到经济的混乱和工人阶级的解体——如果在企业内部不建立必要的纪律，如果企业之间的活动缺少协调，苏维埃工业就不能继续运转。

人们还知道“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有效地使部分工业重新运转，因此这部分工业能够支持从1918年5月之后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全力以赴的战争活动。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9页（中文版，第27卷第249—250页）。文中提到的人都是白卫军将领，只有格格奇柯利是参加第比利斯孟什维克临时政府的外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律师。

#### (四)劳动纪律和工会的作用

把老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专家委派到工厂、苏维埃托拉斯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部门，在工业部门重新恢复资本主义的纪律和管理，经常在劳动者中间激起真正的不满。从1918年第二季度起，这种不满情绪常常以暴力行动、甚至反抗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在当时的苏维埃报刊和工会代表大会上看到这方面的反应。同时，由于城市缺少食品，也促使消极怠工的发展和工人流向农村。因此工厂和矿山中没有了劳动者，而他们的正常上班生产足够的产品，则是支持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在各条战线上艰苦奋斗的工人和农民所不可缺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采取彻底改变工会职能的措施。这项工作是在1918年下半年进行大规模军事活动和发展企业国有化的时期开始进行的。当时的情况要求工会同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收归国有的企业领导人在行政管理工作上合作，例如制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

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19年1月）批

准了当时叫做“工会国家化”的原则，即工会通过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关系在事实上隶属中央行政机关管辖的原则。

工会隶属行政机关管辖的原则（这个原则不能够同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混为一谈）是由布尔什维克党<sup>①</sup>本身提出，并且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布尔什维克代表批准的。

显然，这种隶属关系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劳动人民委员部这个中央机关就是由工会代表组成的。工会代表对劳动人民委员部负有双重任务：制订劳动纪律和监督工厂资产阶级领导人、工程师、专家等等，不得滥用权力。从原则上说，工会这个领取工资的劳动者的群众组织有正式监督“资产阶级专家”活动和自己维持劳动纪律的权利。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工会代表在劳动人民委员部这个中央领导机构里起不了什么

---

<sup>①</sup> 见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2页起，特别是第442—443页（中文版，第28卷第391页起）。我们注意到当时工业单位向国家所有制过渡一般都叫做“国有化”，列宁在这里却使用了“国家化”一词。

作用，因为在实践上，对工厂资产阶级领导人、专家等行使的地方有效监督权是交给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关，也就是说，是交给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安插在行政机关里的官僚集团的；此外，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关并不属于工会地方组织管辖，因此也不受越来越要求自己决定就业条件和劳动纪律的劳动者的有效监督。

工会“国家化”使工会在事实上和国家行政机关打成一片，并且把一部分理应由工会承担的任务移交给后者；象 1919 年全年进行的劳动动员就是一个例子。

这次劳动动员的发展，使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 年 3 月)采取了许多决议，其中之一是与工会有关的。这项决议<sup>①</sup>提出了一系列既具有普遍意义又适应当时形势要求的重要原则。有一条关于工会任务的原则说，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工会的主要任务不是领导劳动者进行斗争，而是在“组织经济方面和教育方面”。决议规定工会不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和“组织上孤立的力量，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莫斯科，1935 年，第 25 卷附录第 628 页起(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 2 分册第 18 页起)。

而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决议说，工会应该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学校”，一个“把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群众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联系起来的环节……”。决议接着说，为了这个目的，工会“应当对这些群众进行教育，从文化上、政治上和行政上把他们组织起来……”。

此外，决议着重指出，工会应当作为国家机器整体的一个附属部分履行自己的行政管理职责，并且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管理。工会“应当以根据实际工龄、专门技术、坚毅精神、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挑选人员的原则来代替选举的原则”。

工会主要的具体的职责是：“用一切办法（直到采用〔由本企业全体大会选出的〕同志纪律裁判会）来加强劳动纪律，进行生产劳动宣传，……教育工人并使他们对了解工厂的作用感到兴趣……”

决议在阐明“工会的当前任务”时强调工会应当参加“按军事方式工作”的组织工作。

原工会领导人凡拒绝执行工会决议所规定的路线的，可以解除其职务，并由直接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的“政治部”来代替他们。各个部门，特



别是当时面临着全面崩溃的铁路系统，都切实有效地执行了这个决议。在托洛茨基建议下，一个作为党和苏维埃政权临时机构的“交通总政治部”就这样取代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原铁路工会领导机构。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另外一项决议的第十二条，规定了一些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决定<sup>①</sup>。

显然，一部分原工会领导人反对这项决议制定的路线是有许多原因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孟什维克）是为了破坏作战；其余的人则是为了反对这些片面加强工会组织在行政管理和劳动纪律方面的作用的措施。由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sup>②</sup>的许多决议以后，这股反对力量显得更大了。因为这些决议的内容不容易被大部分劳动者所接受。

这些决议（工会应当把执行这些决议当做自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莫斯科，1935年，第25卷附录第625页（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1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19页起（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2页起）。

己的任务) 的目的在于作出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规定: 强制劳动、经济军事化、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征集所有技术工人(号召他们向生产进军,“象军官们一样经受同样严格的考验”)的任务、对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所有的劳动者(把他们编制成配备着技术教师的巨大的劳动部队)的动员工作和“工业科学组织”系统的建立。

另外一部分规定涉及到资产阶级专家、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以及他们的工作待遇和条件:

“应当以适当的形式在行政技术人员中采用个别计算劳动生产率和个别奖励的办法。应当使优秀的行政工作者、工程师和技师有更好的条件把自己的力量完全用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应当彻底消除反对企业和机关中的高级技术人员加入工会的偏见。工会可以吸收工程师、医师、农学家等参加工会组织,以帮助他们在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进行同志般合作的经验中积极参加苏维埃建设事业,而工会也将获得最需要的、有专门科学知识和经验的工作人员。”<sup>①</sup>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莫斯科,1935年,第25卷附录第624—625页。(《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12—13页)。

这些决议的内容说明了当时苏联工业遇到的困难,同时也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矛盾倾向。这些矛盾——后来在1920年底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工会争论”时期公开爆发了<sup>①</sup>——集中表现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一部分决议的当前意义或者原则意义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对劳动者采取强制措施的作用方面。事实是直到1920年底为止,所以采取这种强制措施是和当时的经济无组织现象和革命武装力量对粮食的需求分不开的。

### (五)对劳动者采取强制措施

从1918年下半年起,在战争要求各项工业作出的努力和庞大的劳动大军能够“自发地”完成的实际劳动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完成说服群众的任务的足够的力量,于是只好采取强制措施。

首先必须建立就业制度,避免劳动者经常调换企业单位,并进而强迫他们接受向他们提供的工作。如1918年9月法令规定,失业者不得拒绝

<sup>①</sup> 参阅本卷第552页起。

向他们提供的工作，否则取消他们领取失业补助金的权利。1918年10月底，“就业局”改为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构；从这时起，订立任何劳动合同<sup>①</sup>必须通过这些地方机构，因此这些机构就变成了劳动者和雇主间的必不可少的媒介。

1919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大会通过的党纲特别指出：

“……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所有的劳动力，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内以及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中对劳动力实行正确的分配和重新分配，这应当是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方面的最近任务，苏维埃政权只有与工会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个任务。苏维埃政权应当采取比以前更广泛更有系统的步骤，在工会的参加下，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来完成一定的社会工作。”

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工会有计划地管理劳动力的工作，在实践上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的。工会已经并入国家行政机关，虽然在

---

<sup>①</sup> 参阅《法令汇编（1917—1918年）》（俄文版），第64号第704条和第80号第838条，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02页注1和注2。

形式上还保留着自己的地位。这样,对劳动力进行计划管理,也就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纪律”一致起来。<sup>①</sup>

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大约一个月,人民委员会颁布“总动员令”,并重新把指定派往前线的劳动者的任务交给工会。实际上,这项工作仍由企业领导承担(因为是由它来选定能够离开工作的人员)。

同时,托洛茨基领导的劳动国防委员会也发布命令,就地动员没有到前线去的矿工。

以后又逐步采取了许多措施,对劳动力的使用加强控制:

1919年6月,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给劳动者发劳动手册,上面载明与本人工作有关的情况;希望这样能够更有效地避免劳动者未经许可而擅自流动;这种流动现象,一般都是由于追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引起的,给工厂的正常工作,因而也给国防力量带来极大的危害。其他的城市也逐步采取了这个措施。此外,这时发现工会组织表现出对劳动

---

<sup>①</sup> 参阅《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莫斯科,1953年,第1卷第422页(中文版,第1分册第542页)。

者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它们的监督权于1919年11月被撤消了。从那时起，动员劳动者，把他们派进工厂或指定他们完成一定的任务的权力完全移交给劳动人民委员部及其地方机构。这项动员劳动力的权力从此也对农民生效。

1920年1月，人民委员会宣布，“为了执行总经济计划”，必须“向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其他经济部门输送劳动力”<sup>①</sup>。于是正式设立一个劳动总管理处，不是归劳动人民委员部，而是归劳动国防委员会管辖。后者随后设置了自己的地方机构，主要是为了征募劳动者去完成紧急任务。凡是企图逃避派给他们的不称心的工作并回到原籍农村的工人，国家可搜索、逮捕他们，作为逃跑者论处<sup>②</sup>。1920年4月，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报告甚至还惋惜革命摧毁了“旧的警察机关，因为它懂得怎样不但在城市里而且在农村里对公民进行登

---

<sup>①</sup> 见《法律汇编(1920年)》，第8号第49条，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11页注4。

<sup>②</sup> 同上书。1919年4月建立了强制劳动营，原则上属契卡管辖，后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专门关押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见E. H. 卡尔前引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12—213页。)

记”<sup>①</sup>。事实上，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能够适应形势的需要；单单在农林工业方面，它们就在1920年上半年动员了将近六百万人参加劳动<sup>②</sup>。

1920年春天，军队需要的兵额减少，托洛茨基决定不让前线已经不需要的一部分军队复员，而把他们改编为“劳动军”，专门从事特别艰苦的劳动。

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上面提到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将前几个月采取的许多措施加以系统化和发展。建立上文提到的“劳动军”，制定严厉惩罚“劳动中的逃跑现象”的法律。这项决议第十五节宣布：

“鉴于大批工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粮食条件，往往也为了进行投机，竟擅自离开企业，到处流动……代表大会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工会组织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同这种劳动中的逃跑现象进行有计划、有系统、坚决而严厉的斗争，例如可以公布应受惩罚的逃跑者

---

① 见《全俄职业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俄文版），1920年，第1卷第50—51页；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第212页注2。

② 参阅L. 克里茨曼：《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期》（未注出版日期，可能是1924年），第106页。

的名单，把逃跑者编成受惩罚的工人队，以至把他们关进集中营。”<sup>①</sup>

## (六)无产阶级地位的主要的一面 ——把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

苏维埃政权由于当时所处的形势——在面临国际反革命武装力量联盟时，全国极端贫困，物质极端匮乏——除了对敌对阶级之外，还得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动摇分子采取严厉的强制措施；对这种不得已的情况应当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因为，采用强制措施只不过是当时形势的次要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则是将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会落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一样——的空话中去，因为他们说当时俄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那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家既然不能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1935年，第25卷第626页（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15页）。在这个时期，除了上文提到的强制劳动营以外，又建立了集中营。E. H. 卡尔说得好，1920年建立起来的集中营直到五年计划实施后才变得更为重要，才发挥了更大的经济作用。



对阶级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照他们的说法，自然也无法说明当时究竟是什么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了专政。

那些不对阶级关系作全面分析，只能孤立地看待一些社会现象——如对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某些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人，甚至连历史事件的演变也无法理解。因此，谁看不见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它同拥有比自己优越得多的物质力量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战胜了他们——在于它的阶级本质，在于它代表的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权，那末，他也就不可能理解这些历史的演变。正因为这个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他们才为了它进行顽强的和史无前例的英雄主义的战斗。

只有置身于现实历史发展之外的人，才会说从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诞生的和现在还在继续和这些力量（这些力量当时已经变成了世界规模的联盟了）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苏维埃政权突然改变了本质，因此，它在同它过去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慢慢地变成了压迫人民群众的机关。我们不能因为对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部分人采取

了强制措施，就认为这个采取强制措施的政权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因为恰恰相反，这个政权所展开的全部活动和它的活动能力，适足以证明它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中间，并且发挥了组成统治阶级的和与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苏维埃政权所以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地主和世界帝国主义，是因为它是集中了人民群众意志的无产阶级政权。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缺乏装备和粮食的苏维埃军队同帝国主义列强豢养的白军进行战斗的成绩；也无法理解受到饥饿和疾病折磨的苏维埃俄国怎样和为什么能战胜它的敌人。抛开抽象问题不谈，单单通过历史的实践过程就能够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在实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大团结的实现。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象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样，是复杂的、矛盾的。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党在工人阶级中间根深蒂固和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使党在任何时刻都能完成革命的主要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才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战斗团结。同时由于在建立无产

阶级政权以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和长期的政治思想斗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因而这样实现的群众团结没有完全达到必须实现的任务所要求的高度。一部分农民，甚至也有一部分工人，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习惯的严重影响，把个人利益放在革命利益之上，于是一时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旨在破坏群众的革命团结的思潮的蒙蔽。这不过是当时形势的次要的一面，因为这些思潮只不过产生一些局部的和不稳定的影响，一般地说，都不是公开出现的。这个次要方面恰恰说明无产阶级专政那几年为什么会有那些特点：一部分群众组织陷入瘫痪状态，无纪律的现象相当普遍，于是在情况特别紧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权不得不对动摇分子采取强制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群众的联系、党的群众路线的执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以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与战斗性最强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融合。

不论对一部分劳动者采取强制措施的作用如

何——执行强制措施的是工人分队，并不是专门团体——这个政权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依靠广大群众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在广大群众眼里，党是一个胜利地领导十月革命，实现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愿望，实现要做土地的主人的农民的愿望，并且善于把他们团结起来，同革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政党。不但如此，广大群众所以信任这个政党，不但因为它有实现人民的根本愿望和采取符合人民要求的决定的能力，而且是因为它执行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不可少的群众路线。

### (七)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路线

列宁经常提到执行群众路线的必要条件，并且着重指出，执行这条路线是区别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标志。因此，他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里写道：

“不要害怕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要相信群众的革命组织，那你们就一定会有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看到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奋勇打击科尔尼洛夫匪帮时所表现的那种力量和那种伟大而不可战胜的精神。”

“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他们之所以动摇犹豫，无休止而又毫无成效地企图在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旧皮袋里装新酒，其最深的根源之一，就在这里。”<sup>①</sup>

在最困难的时刻，列宁经常提到同样的原则和同样的思想。

因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sup>②</sup>一书里，列宁特别有力地阐明联系群众的原则意义，反复说明联系群众的条件。他同时指出，无产阶级的纪律（同官僚主义的纪律、高高在上的强制性纪律恰恰相反）要求我们要“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sup>③</sup>。

列宁在这篇著作里提到另外一条非常相近的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8页起，引文见第402页（中文版，第25卷第361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页（中文版，第31卷第1页）。

③ 同上书，第18—19页（中文版，第7页）。

原则，即党的作用不是把一条政治路线强加在群众头上，而是说服群众，使他们根据“切身经验”<sup>①</sup>相信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列宁接着又说，有了这些条件，无产阶级纪律才能够建立起来；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sup>②</sup>。

对于能够使党说服群众的条件问题，列宁指出，它们“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形成。而正确的革命理论，会加速这些条件的形成，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密切联系真正群众运动和真正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最终形成”<sup>③</sup>。

最后这个结论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一个联系群众的革命政党只能是正确的实践和正确的理论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意味着，如果通过这样的理论和这样的实践逐渐形成的历史产物——即一个相信群众同时也受到群众信任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页（中文版，第31卷第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的政党——一旦被一定数量的错误毁灭了，那就需要经过同样长期的努力，才能重新建立这样一个政党，没有这种长期的努力，什么纪律、信任等等，只不过是些“空话”。

党的“考察群众情绪”<sup>①</sup>和学会从群众的经验<sup>②</sup>出发的能力，是和遵守党和群众的紧密联系、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打成一片”或者说和他们的内在联系这项原则分不开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存条件之一，就是重视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关于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面提到的内容已经证明——布尔什维克党在任何时刻和任何情况下都能切实有效地重视这些要求。由于党迅速地夺取了政权，由于党的成分，由于党缺乏经验和党内展开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群众路线没有得到全部贯彻。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和一部分人民群众之间，曾经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发生过真正的紧张局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页（中文版，第31卷第26页）。

② 关于这一点，参阅列宁于1920年11月21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演说最后一部分，载《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3页起，特别是第442页（中文版，第31卷第386页）。

面,这种情况在农村更为突出。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在群众路线的要求方面不论发生什么偏差,党的实践的主要的一面仍然是重视这条路线的要求。不然的话,布尔什维克党就不能够继续领导苏维埃政权和保证取得胜利。

### (八)无产阶级专政和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融合”

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增加党员人数并且和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融合,这样就保证了自己能够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作用。

直到1920年底,大规模地吸收党员表明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扎根越来越深;同时也给党的成分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党员人数由1917年1月的二万四千人<sup>①</sup>,增加到1920年3月的六十一万二千人,和1921年3月的七十三万二千人。但

<sup>①</sup> 除特别注明者外,所有的数字都是每年1月1日公布的,这些数字原载1967年10月《党的生活》,第19期第8—10页,引自T. H. 利格比:《1917—1967年共产党党员资格》(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52—53页。自1919年起开始登载“预备党员”人数(在预备期中),自1922年开始统计。从原则上说,他们被算入以前的统计数字里,但同其他记载如《苏联大百科全书》有时有出入。



自 1921 年起由于清党, 党员人数大大减少。到了 1923 年又增加到四十九万九千人。

党员中的工人人数<sup>①</sup>由 1917 年的一万四千人增加到 1920 年的将近二十七万人和 1921 年的三十万人。农民党员的人数由 1917 和 1920 年间的一千八百人增加到 1921 年的二十万人以上<sup>②</sup>。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国家里, 如果说农民党员(或者更正确地说, 农民出身的或者是农村里的党员)太少的话, 在 1921 年, 代表活跃的工人阶级的工人党员人数则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从工人阶级在国家机关里发挥的作用来看, 正因为在这个时期(1919 年), 百分之六十的党员都在国家和党的行政部门工作, 四分之一的党员在红军里工作, 他们往往负责政治或军事工作, 布尔什维克党的无产阶级党员的重要性才特别有意义<sup>③</sup>。因此, 在主要的国家机关里有工人共产党员干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① 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成分和这方面的统计意义, 下文还要进行研究(见本卷第 451 页起)。

② 前引 T. H. 利格比著作第 85 页曾提到党的阶级成分并根据苏联的有关资料作出百分比。

③ 参阅前引 T. H. 利格比著作, 第 81 页。

在 1919 和 1920 年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般地说，是一件无可争辩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事。当然，党已掌握政权，可能有个人野心家混进党里来，但也经常在进行清党工作。此外，在党行使权力时，经常受到白军进攻威胁，白军往往在他们占领的地区里大批地杀害干部；因此落在干部肩上的负担就更沉重了。

这个时期党和先进工人是真正地 and 充分地融合在一起的。

这种融合是当时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一面。但是应该说明一下，久而久之，由于大批工人参加行政工作——有一个时期，无产阶级人数减少，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它的队伍——，于是出现了消极面。过了几年，这许多工人可能变成国家的官吏，他们的无产阶级成分也逐渐丧失原来的意义。显然，在 1919 年，在工厂里工作的党员只有百分之十一<sup>①</sup>；但是在这个时期，那些活跃的工人阶级的党员由于离开自己的工人队伍不久，他们的阶级出身还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尽管如此，当时也并不是没有感觉到“非

<sup>①</sup> 参阅前引 T. H. 利格比著作，第 81 页。

无产阶级化”的危险(三年以后,列宁就严肃地提醒党要注意这种危险的存在),因此从1919年起,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就规定担任行政职务的工人必须每四个月回厂劳动一个月<sup>①</sup>。

当时正处于内战时期,这项规定似乎没有引起重视。以后也就显然被“遗忘”了。这个“遗忘”的消极影响所以特别严重,尤其是因为当时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既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加之,在行政部门里,工人共产党员同无数旧官吏和行政人员一起工作,逐渐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也就是说“官僚主义化”了(其实,还是说“资产阶级化”更正确些)。但是在内战时期和以后,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许多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人党员还不至于因为他们的工作关系而大批地“资产阶级化”。当时不论是从人数、力量和忠诚来讲,他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保证。

因此,党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融合和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正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内战时

---

<sup>①</sup> 见《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莫斯科,1959年,第423—424页,引自前引T. H. 利格比著作第82页(参阅《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1分册第565页)。

期能看到在人民群众的倡议下出现了显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崭新的生产关系。

#### 第四节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新生产关系的出现

共产主义星期六是苏联革命特别有意义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方面，因为这是战斗性最强的劳动者积极承担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表现。在1918至1921年间，劳动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思想革命化，曾经在某些地区出现过短暂的新型的生产关系，即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党的某些基层党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进行思想教育的成果。

##### 1.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列宁最早明确地提到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即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出现的著作之一《伟大的创举》<sup>①</sup>，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因为它突出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13页起（中文版，第29卷第371页起）。《伟大的创举》于1919年7月在莫斯科第一次出版。

地说明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证明列宁有能够抓住一切真正新的和革命的东西的才能，这对那些资产阶级庸人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具有一种“人性”，这种“人性”的“充分”表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和斤斤计较作风。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群众的一种自觉自愿的劳动形式。一般是为了突击完成某一生产任务，特别是指修理或者建造道路和交通设备（主要的是铁路）方面的任务，但并不排除其他方面的任务。对于劳动者自己发起的这次义务劳动的意义，列宁是这样评价的：

“……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

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sup>①</sup>

在下面几页里,列宁又一次阐明他自己对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的看法,他写道:

“……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比兴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国人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中的任何一次胜利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帝国主义者们的胜利是为了英美法三国富豪的利润而对千百万工人进行的屠杀,是垂死的、快胀死的和活活腐烂的资本主义的残暴行为。而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惨祸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sup>②</sup>

列宁当然知道新出现的这种社会关系的软弱性,但是他知道主要的不是它的软弱性,而是这些关系中值得注意的新事物。所以他说:

“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15页(中文版,第29卷第37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28页(中文版,第29卷第385页)。

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sup>①</sup>

列宁也知道这些“幼芽”必然有一些会死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命运或许也是如此，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也不能肯定这种义务劳动是否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正如他着重指出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sup>②</sup>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列宁反复说明，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最适当的办法为止”<sup>③</sup>。

这是一位反对教条主义的人的语言，一位相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人的语言，一位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人的语言，因为他知道——正象以后毛泽东说的那样——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同时也是一位认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29—430页（中文版，第29卷第387页）。

② 同上书，第430页（中文版，第387页）。

③ 同上。

识到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必须进行几百次试验，其中只有几次能够得到预期效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语言。

对列宁来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在于它是来自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特别是处于最困难的条件下的工人群众的真正的创举。同时也在于，当工人进行“不领任何报酬的”劳动的时候，这说明向共产主义过渡已经开始了。所以列宁说：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稀罕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

“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sup>①</sup>

在这篇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里，列宁也提到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1页（中文版，第29卷第388—389页）。



妇女解放问题和她们中间已经出现的摆脱了“营业性企业”的“模范的共产主义工作”<sup>①</sup>。

## 2. 共产主义劳动和社会主义纪律

这篇著作提出的主要概念之一是“共产主义劳动”。这个概念指的是工人或者农民“为社会、为全体劳动群众”从事“无偿”的劳动<sup>②</sup>，一种可能“把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阶级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的劳动<sup>③</sup>。

列宁所说的劳动纪律和劳动组织的新形式，是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够使劳动过程革命化，才能够消灭具体的生产劳动和领导生产的劳动的差别，把特殊劳动改变为一般劳动并且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的和经常发生的调整形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4页（中文版，第29卷第391页）。

② 同上书，第436页（中文版，第392—393页）。

③ 同上书，第427页（中文版，第384—385页）。

式”<sup>①</sup>：工资劳动。

在《伟大的创举》这本小册子发表以后大约八个月，列宁在他的《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sup>②</sup>里又重新提到共产主义劳动这个题目。他在这本书里发挥了下面的思想：

“……可以而且应当直接提出共产主义劳动问题，更正确些说，不是共产主义劳动问题，而是社会主

---

<sup>①</sup> 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未发表的一章)》，丛书第10/8种，巴黎，1971年版，第263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着重指出：“必须先把个人活动的产品变成交换价值……这个必要性证明下面两点：(1)个人只是为了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还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还不是一个在自己成员间分配劳动的联合体的成果。个人仍然隶属于象厄运一样压在他们身上的社会生产；社会生产还不隶属于能把这种生产当作公共财产来使用的个人。”

因此，他指出：“象上述发行小时券的银行所实行的那样 [今天也许可以补充说，象现在的苏联经济的实践那样]，把对生产总体的监督建立在交换价值和金钱上，没有比这个办法更错误的了。”(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法译本，巴黎，人类出版社，1967年，第1卷第95—96页。)马克思在下面几页里又一次阐明，只有在“集体[变成]生产基础”时，劳动才是“一般劳动，而不是特殊劳动”，因此，个人“用自己的劳动买回的不是某个产品，而是在集体生产中所占的一定份额。”(同上，第109—110页。)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产生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关系。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529页(中文版，第30卷第474页)。

义劳动问题,因为这里指的不是从资本主义当中长出来的新社会制度的高级发展阶段,而是它的低级发展阶段、初级发展阶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sup>①</sup>。

在这里,列宁又重新提到共产主义劳动的飞跃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的紧密联系。他着重指出,这样的飞跃是一个需要做几十年工作的长远事业的体现,因为这个事业是同能够吸引群众提供不要个人报酬的义务劳动的思想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上面引用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几天,列宁在1920年5月1日指出,战胜了白军叛乱和外国干涉以后,“为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建立新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530页(中文版,第30卷第474页)。

的社会关系、新的共同劳动的纪律和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并进而建立国际经济结构）扫除了道路”<sup>①</sup>。他接着说，要征服这个地盘，必须打倒“旧的经济关系”，同时也必须“移风易俗”，“准备忍受任何牺牲”，“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sup>②</sup>。

### 3. “战时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劳动

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劳动的著作虽然不很多，但都具有极重要的理论价值。他所说的移风易俗和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离开在生产发展的推动下改造经济关系的时期还很远。

他在谈到随着推翻剥削者的大革命而来的真正的“建设任务”在于“建立新的经济关系”<sup>③</sup>时

<sup>①</sup> 见列宁：《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载《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2页（中文版，第31卷第10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22—123页（中文版，第103—104页）。

<sup>③</sup> 见列宁：《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载《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3页起，特别是第433页（中文版，第31卷第378页）。

所发挥的论点,也是一个例子。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少数几部著作中,必须提一提列宁于1921年4月9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这个报告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战时共产主义”以后的著作。列宁在这篇报告里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更概括的定义。他说: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我们时常看到的東西——国营工厂中工人的社会主义态度;在那里,工人们自己收集燃料、原料和食物,或者竭力设法把工业品合理地分配给农民,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给农民。这就是社会主义。”<sup>①</sup>

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1918和1921年间在群众倡议下出现的新的关系后来逐渐消失了。这些原因包括中央集权主义的发展、繁多的规章制度和国家的强制措施(这对基层的首创精神是不利的)以及“资产阶级专家”渗透到国家机关里以后产生的“官僚主义化”。“官僚主义化”的后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及第25卷第313页(中文版,第32卷第284页)。

果之一是出现了名不副实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因为它后来变成了非参加不可的劳动了。这样的实践（甚至连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sup>①</sup>的某些条款也间接鼓励这样的实践）倾向于摧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产生的新的幼芽。它表现在两种对立的纪律的矛盾上，即同真正的共产主义星期六连结在一起的自觉的集体纪律与同建立和发展对群众采取强制措施的中心集权机器连结在一起的强制性纪律的矛盾上。

尽管如此，“过分的”集权和规章制度也不足以说明 1920 至 1921 年以后共产主义劳动<sup>②</sup>逐渐丧失生命力的原因。事实上，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内战时期一结束，共产主义劳动就由于整个社会关系的改造受到很大的限制，逐渐丧失了生命力。这种限制是由俄国革命当时所处的阶段决定的。

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制度仍然没

---

① 见《列宁全集》，1935 年，第 25 卷第 626—627 页（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 2 分册第 2 页）。

② 当然，即使是在今天，苏联仍然存在着“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但这和当年群众发起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毫不相干，只不过是向劳动者勒索额外劳动的强制性仪式罢了。

有发生动摇（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所经历的过渡阶段也只能如此），因此共产主义劳动只能具有“额外劳动”的性质；它主要在工业生产过程以外出现。从相互关系上说，资产阶级思想关系的体系只有很少一部分发生动摇：在农村里，民主革命阶段仍然没有过去，这对社会主义关系和共产主义劳动的发展是不利的。

当然，在这个狭窄的圈子里所以能够出现几个脆弱的共产主义劳动的“孤岛”，是有客观原因的。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些“孤岛”的发展甚至巩固都必须以大规模变革整个社会关系为前提；然而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变革工作。

## 第三章

### 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在1917至1923年期间，苏维埃农村阶级关系的变革是革命发展的产物，基本上具有民主革命性质。而革命的发展又是工农联盟的产物。在支持农村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与巩固下，农民群众行动起来，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立即采取的许多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土地法令》（1917年10月26日，经俄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法令取消土地私有制：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一律交给县委员会和农民苏维埃处理。这项法令具体表明苏维埃政府是工人和农民政府。显然，苏维埃国家和旧政权不同，它不保护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剥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不但如此，



苏维埃政权还进一步宣布它鼓励农民自己夺取土地，并且号召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规定使用土地的条件。

十月法令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新政权通过实践证明它不是剥削阶级的政权，这项法令推动当时农民中处于犹豫不决状态的阶层站到苏维埃革命阵营这边来，因为对他们来说，土地问题（象和平问题一样，苏维埃政权宣布准备立即签订和平条约）是一个根本问题。城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给农民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向新的发展阶段迈进的保证。

《土地法令》和随后颁布的施行法条文的内容，同布尔什维克党以前的纲领不相符合，但同1917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起草的法令草案却几乎全部吻合。

许多布尔什维克反对他们的党采用它曾经谴责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因为这些规定不废除私人土地使用权，以促进社会主义大面积生产的发展，反而助长小土地经营——，列宁回答他们说，这些规定

是“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唯一愿望”<sup>①</sup>。

十月法令的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1918年2月19日颁布了一项几乎可以叫做“土地社会化法”<sup>②</sup>的法令——不主张把关于土地使用的严格规定强加于农民，布尔什维克党当然赞成集体耕种的方式，但是它希望农民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采用这种方式。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同样要求布尔什维克相信农民。例如，他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就说：

“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懂得，真理究竟在哪里。……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外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sup>③</sup>

---

①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917年10月26日），载《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5页（中文版，第26卷第239页）。

② 社会革命党人也赞成土地国有化，列宁直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一直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后的让步”。

③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917年10月26日），载《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中文版，第26卷第239—240页）。

从 1917 年底至 1918 年初，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许多决定和简单的“法律条文”完全不同。这些决定是向群众发出的号召书。它们相信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和耐心的工作，能够帮助农民懂得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对他们最有好处。它们开辟了一条比单单从法律上转移所有权（引起生产关系的混乱）更好的道路。只有群众运动能够考虑客观和主观条件，决定从农村阶级斗争中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从摧毁旧社会关系到建立新社会关系，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俄国农村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和以前占统治地位并且在 1917 至 1922 年间只遭到部分破坏的社会关系的特点，才能够了解俄国农村革命发展的实质。

## 第一节 俄国农村旧社会关系的特点

在革命前夕，俄国农村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特别复杂，并且很难了解。唯一能够了解一些俄国革命前农村现实的“资料”，都是从资产阶级

专家——地方自治局<sup>①</sup>的统计学家和农村经济学家——那里得来的；他们根据自己的阶级实践和阶级思想写下了一部分农村现实。因此，布尔什维克要从这些专家的“知识”里“研究”生产关系，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毫无疑问，列宁是一个曾对这些资料做过系统研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令人钦佩地指出了沙皇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重要性。他在他的早期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论所谓市场问题》<sup>②</sup>等文里，对这个问题曾进行分析；他主要的经济著作之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论述了这个问题；以后同民粹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论战时，他也经常提到这本著作。

列宁指出，俄国农村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多样性，是由于一个脱离了过去的农民村社的生气勃勃的农民资本家阶层的存在和一些大地主转

---

<sup>①</sup> 地方自治局是旧俄时代的地区或者省的统计机关，该局官员负责编制旧俄时代的农业和土地统计材料。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7—140页（中文版，第1卷第1—108页）。

变为资产阶级剥削者的现实造成的。他也指出，即使是在农民村社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农民村社米尔的存在是俄国农村特点之一，它曾经引起许多幻想和争论。

米尔是以村庄为单位的共同体。它经常将它所占有的土地<sup>①</sup>，按照不同的、能够维持一定的“平等”的标准，重新分配给各个农民家庭。自十九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开始，法律规定占有土地不满十二年的，不得进行再分配。

分配土地是以家庭为单位。每一个家庭分到的土地一般都是本村的一部分土地（不包括不进行分配的构成公有土地的森林和牧场）。土地的多少根据每一个家庭的“人数”计算，但各个村社的“人数”标准不同，有的指需要家庭养活的“人口”，有的指能够劳动的人数，也有根据每一个家庭所使用的生产手段，例如这个家庭所占有的耕畜的头数计算的。当时进行的调查证明，在分配土地时，往往总是富裕的家庭（一般都是人口

---

<sup>①</sup> 据一般估计，在本世纪初，农民村社所掌握的土地大约占全国耕种面积的一半；其余的土地有地主、脱离米尔的农民的土地和“殖民地”的土地（大部分都在一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新征服的地区）与国家、皇室和教会的土地。

最多的家庭，特别是因为它们经常领养子女)最占便宜。此外，穷苦的家庭(由于没有足够的劳动工具)往往被迫出租原来属于它们使用的一部分土地，身强力壮的家庭成员不得不去做雇农。因此统治整个村庄的只是几个富裕的家庭。

不平等现象之所以能够这样发展下去，是因为米尔这个“农民村社”的门面背后的基本现实是小土地劳动、个体耕种、个体畜牧和劳动工具如耕畜的私人所有制。因此，马克思在1881年就已经指出，米尔正在从内部瓦解，因为“私人占有的泉源——小土地劳动。它是……动产积累的基础”<sup>①</sup>，即社会分化。社会分化自然要对决定“公共事务”和土地再分配的村会的活动产生影响。于是，原来的“平等主义”的米尔逐渐变为巩固和重新产生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地主(米尔实际上受地主的管辖)和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又促进了米尔的这种发展。

民粹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片面地解释《共

---

<sup>①</sup> 参阅马克思1881年3月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三稿)，载《马克思著作》，巴黎，《七星丛书》本，第2卷第15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50页)。

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企图否定这个演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序言里写道<sup>①</sup>：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马克思一年前在他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一封信里说的话。马克思在这封信里着重指出了瓦解米尔的强大的内部的力量和从外面打击它的力量。马克思在1881年已经

---

<sup>①</sup> 这些主要的文章首先包括恩格斯于1875年为《人民国家报》（4月16日和21日）写的两篇短文。马克思赞成两篇短文的内容，后来又加进另外几篇文章，编成小册子出版，题名《俄国的社会》，并附一篇有重要意义的序言。1894年，这本小册子在日内瓦出版俄译本，题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附有恩格斯的跋和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其次也包括马克思和维拉·查苏利奇的通信；通信里主要的材料是1881年3至4月间的一封信，现在这封信留下四份草稿；最后的一份草稿逐字逐句几乎完全与寄发的信相同。在同一时期，马克思还写了许多札记，没有发表过，一般叫做《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恩格斯1875年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8卷第556—557页和第584—586页及第22卷第421—435页。马克思的文章见同上书，第19卷第384—406页和第407—425页。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见《卡尔·马克思著作》，法译本，《七星丛书》本，第2卷，并见《人与社会》，1967年，7—9月号。

看到“农村公社”“几乎被推向灭亡的边缘”<sup>①</sup>。

十三年以后，恩格斯在1894年说，多少年过去了，“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sup>②</sup>。

列宁在指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时，通过具体分析，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他同时对民粹主义者的幻想保持警惕（象他在1905年写的《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里所写的那样），因为民粹主义者相信，如果对各方面的“改革”加以鼓励，就能使原有的农民村社重新获得力量。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资产阶级私有者’（同时又是劳动者的）农民已经为了本身的利益利用了民粹派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空谈。这些知识分子妄想用自己的劳动组合、合作组织……地方自治局的仓库、银行来支持‘劳动传统和生活方式’，而实际上是支持了村社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sup>③</sup>

---

① 《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见前引著作，第2卷第15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41页）。

② 恩格斯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柏林，迪茨出版社，1963年，第22卷第4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06—507页）。

③ 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79—80页（中文版，第8卷第66页）。



列宁引用的许多统计材料说明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下几位作者另外的统计材料,也许是有用处的,他们希望“证明”米尔作为一个“平等化的工具”真正在进行活动,但是却证明了它的对立面。例如,T.沙宁的统计证明,1894年,在卡卢加省每人使用的土地面积之比是一至二十六(或者不把没有土地的农民算进去,就是一至三),并且指出,人口最多的家庭,即富裕农民(众所周知,他们是用领养子女的方法增加家庭人口的)每人占有的土地最多<sup>①</sup>。

虽然一般的统计都想证明每个家庭的土地都受到“连续增长周期”(由于在各个家庭间按期进行土地重新分配)的支配,但是关于“家庭历史”的统计却证明“连续增长周期”并不起作用。例如,有一份统计表表明,在三十年间(1882至1911年),原来占有不到六俄亩土地的家庭百分之七十五情况没有变动,另外,原来占有九俄亩土地以

---

<sup>①</sup> 见 T.沙宁:《难对付的阶级》,牛津,1972年,第64页, M.格伦巴赫在他的高等技术学校毕业论文《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第42页里曾引用过。

上的家庭大约五分之二也是如此<sup>①</sup>。

对俄国农村的社会分化进行的分析表明，米尔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障碍；但它的存在引起许多问题，因为它肯定会使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不断地再生产，必须注意这一点才能够了解俄国的和以后苏联的农村阶级斗争可能采取什么形式。事实上，虽然遭到内部矛盾的严重破坏，但是米尔在1917年革命时期依然存在，而且在革命以后，对农村的革命发展和以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方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米尔是一个政治性机构，也是一个属于思想范畴的机构，因此农民可以采取相对的“自治”行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没有强大的影响，这种相对的“自治”使富农能够轻而易举地统治贫农和中农。因为，我们不应当忘记，直到1917年底，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只有二百零三个支部和四千一百二十二名党员，到了1918年，才有二千三百零四个支部和一万四千七

---

<sup>①</sup> 见 A. V. 沙亚诺夫：《农民经济原理》，霍姆伍德，1966年，第67页。附注：书内的统计表都是在一个县里作的。一俄亩等于1.0925公顷。

百九十二名党员。即使在这个时期，“农村”支部的数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同时农村党员（大部分是农村公务人员和教师）的人数只占全党人数的百分之五。

米尔存在的作用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正因为当时把米尔当作特殊的“生产方式”和“平等化”工具的幻想还相当流行，所以才特别引人注目。总之，必须指出下列各点：

(1) 米尔不是一种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法）而是一个重新分配土地的政治机构，它只保证个体耕种，不保证集体耕种。结果每一个生产者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产品，特别是他可以出卖产品，也可以“自由地”进行积累。当然，米尔强制它的成员遵守某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都是有利于在分散的土地上进行个体耕种的，同集体耕种毫无关系。古老的村社生产方式唯一的“残存部分”是在邻居中间进行的互助合作。但是这种合作的规模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往往发展成为偿付劳务的交换方式。

(2) 米尔既然是一个政治机构，自然不会“保持中立”。它是内部阶级斗争的场所，同时也受到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一般地说，总是最富裕的农民在统治米尔（他们经常被选为村长或者常设行政机构的成员），他们利用自己的统治权永远保持他们享受特权的地位；在重新分配土地问题上也能看到违反那些指导分配的“平等主义原则”。在1917至1922年间实行平分土地时所得的效果也是有限的，这足以证明最富裕的农民仍然保持着他们对米尔的统治权，尽管那几年阶级斗争很尖锐。

(3) 虽然时代不同，米尔和村会（全体农民大会）仍然保持着农民村社的形式，倾向于把每一个村庄建成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以行使自己的权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生活形式只会产生一种“爱村主义”（一种地方自私主义），对村庄以外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从历史上说，米尔是生长沙皇专制政体的园地。沙皇专制政体是各农民村社间主要的形式上的“统一”工具。沙皇为了向农民村社提供“军事防御”的保证，让它们之间建立联系，以便奴役它们。此外，令人深思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农民的暴动总是反对地主而不反对沙皇。直到帝国主义时代，沙皇还仿佛是农民

反抗地主的“庇护者”；在被动员的时候，农民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俄国”而战，而是在为“沙皇”而战。米尔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支持“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同米尔的活动所造成的地方自私主义结合在一起，足以说明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民为什么能够相当冷淡地听任城市缺乏粮食、陷入极端困难的原因。

(4) 这种平等主义形式普遍产生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几乎只是在土地问题上)，同样也在思想方面巩固了小资产阶级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两者极端膨胀的结果反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最后导致“土地零星化”(为了使每一个农民对每一种土质不同的土地都能分到一小块)；土地零星化使农民疲于奔走，并且荒废大量的土地，同时使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即使革命以后也是如此)一直使用同样的耕作方法：这就是生产力降低和农民遭受饥馑的打击的根源。

我们不能不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加强自己的力量，并设法利用米尔的村社传统残存的东西的话，也许可以建立集体农业的起点。但

是，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末期已经对这个问题表示怀疑的话，那末，在十月革命时期就更有理由怀疑这种设想是否能够实现了：因为这时米尔崩溃的程度更为严重，它已变成一种掩盖真相的、与原来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了。

## 第二节 民主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 土地革命的希望

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法令》和以后颁布的许多法令，推动了从1917年革命高潮时期起农民自己掀起来的夺取地主土地的运动。

### (一) 1917至1918年间的冬天的 民主土地革命

在1917至1918年间的冬天和以后几个月里，农民——他们从这时起，有苏维埃政权在给他们撑腰了——把大部分<sup>①</sup>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基本上是通过米尔进行的）。他们这

---

<sup>①</sup> 另外一部分土地是“国家的土地”，留作“苏维埃农场”（或称国营农场）基地。

样占据的土地面积很大,因为在1916年,俄国大地主拥有全国可耕地的百分之四十<sup>①</sup>。

同时也夺取了(一般都是通过米尔进行的)一部分(没有正确的统计)富农的土地。这些都是在1861年和1906年实行土地改革以后脱离米尔的富裕农民的土地。在十月革命前夕,这些富裕农民拥有多少土地,我们不大了解<sup>②</sup>,而十月革命以后,农民夺去他们多少土地,我们更不了解<sup>③</sup>。无论如何,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

---

① 见 A. M. 安菲莫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农村》(俄文版),莫斯科,1961年,第88—91页,引自西格里德·格罗斯科普夫的高等技术学校毕业论文《俄国谷物问题和新经济政策》(1970年9月提出)第73页。

② 在十月革命前夕,估计在俄国欧洲部分四十七省,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脱离米尔,但有的地区则达到百分之二十甚至三十。见奥尔加·A. 纳尔基耶维茨:《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形成》,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18页。

③ 在这里,平均数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所夺取的土地面积各个地区差别很大。这个差别是以当地在革命前脱离米尔的农民的农庄的大小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力的强度(活动力不大,因为它没有在农民中扎根)为转移的。显然,在“脱离米尔”的农庄比较多的地区(如“农庄和农场”),被农民夺取的土地比较少(因为在那里,脱离米尔的农民拥有真正的社会力量);同样的,在彼得格勒省,这类农庄在1916年达到全部农庄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在1922年还保持百分之二十二点七。(见 G. 沙拉波夫:《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土地问题》(俄文版),莫斯科,1966年,第140—150页)。

到了显著的改善<sup>①</sup>。

米尔夺回土地后，把它们分配给本村的农民家庭，进行个体耕种。于是个体耕种方式就保持下来了，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虽然鼓励进行共同耕种，但收效甚少。

只有到了1919年，才有可能对农民群众运动在苏维埃政权支持下掀起的革命变革的进程的结果进行统计。根据苏维埃政府的统计，当然是约略估计，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可耕地掌握在农民手里，进行个体耕种（在米尔范围内或在米尔范围以外），百分之零点五由农业合作社耕种，百分之二点七由国营农场耕种<sup>②</sup>。因此，这次土地革命是民主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改革。

这次土地革命没有彻底改革米尔的作用。土地的再分配继续象以前一样以“家庭”（农“户”）为基础，按照同样的标准进行。我们手头上的一

---

① 在俄国欧洲部分各地区，农民使用的土地大约增加百分之五十。（参阅 L. 沃林：《俄国农业一百年》，剑桥，马斯出版社，1970年，第133页。）

② 参阅 A. 波利亚科夫：《十月革命的社会经济土地改革（1917—1920年）》，载《苏维埃农民和苏联农庄的历史》，第15页，前引奥尔加·A. 纳尔基耶维茨的著作第27页曾引用过。



些罕见的材料说明,在分配土地时,仍然能够使人感觉到(拥有耕畜和农具的)富裕农民的“权力”。但是就大体上说,由于展开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取得了米尔以外的大片土地,贫农和社会不平等现象都减少了,尽管如此,仍然还有许多贫农存在,自1918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准备特别依靠他们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打击富农和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 (二) 1918年夏开展贫农自治运动的尝试

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中优先依靠农业工人和贫农(农村半无产阶级)的愿望早已写进称为《四月提纲》的纲领中。1918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帮助这两个农民阶级直接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机已经来到。因为,它认为土地的民主革命已经基本结束,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准备工作已提到日程上来了。与此同时,它还在农村动员一批它认为是无产阶级政权应该依靠的特定的社会力量,以便对付遭到破坏的经济。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在这些力量中,首先要考虑贫农的力量,因为社会主义对他们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1918年夏天，农业大幅度地减产（特别是在白卫军和武装干涉者开始扩大战争时）。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农民掌握的商品粮数量极为有限，他们不肯出售了：物价暴涨，他们缴起租税来反而容易了（正如有人说：“货币在农村泛滥”），在城里，他们基本上什么也买不到。

根据以上情况，布尔什维克党与苏维埃政府打算放弃至今还在执行的有关农民的政策，一个从“农民整体”来看农民的政策，把他们看成是与无产阶级“没有区别”的同盟者，在同盟者内部的阶级差别尚处于次要地位，他们正在争取完成自己的任务，即土地的民主革命。

1918年6月11日颁布的法令把党和政府的打算变成了现实。法令规定成立一个独立于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一个完全由贫农组成的政权机构。法令的文本正式把布尔什维克党与苏维埃政府引向有计划地区别对待各个阶层的农民的道路。1918年7月11日，又明确规定只有不雇用雇农，手中又没有余粮可以征购的农民才可以参加贫农委员会。1918年7月15日，确定贫农委员会是在农

村执行苏维埃政策的一个工具。尤其重要的是，该委员会可以没收富农的粮食，并把其中一部分粮食留作自用<sup>①</sup>。

列宁认为，至少1918年他是这样想的，贫农委员会的成立表示农村的阶级斗争有了发展，农业工人一方面和贫农分裂，另一方面也和富农分裂。他觉得只有这样，城市无产阶级和贫农结成联盟基本上才有可能，城市无产阶级才能帮助贫农组织起来，并承认后者在农村的特殊领导作用。

1918年11月8日，列宁在对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的讲话中，说道：

“……我们决定分裂农村，……”

“工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帮助贫农去同富农作斗争。在农村爆发的内战中，工人们是站在贫农方面的，正如他们在实行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法令时是站在贫农方面一样。”<sup>②</sup>

列宁接着说，必须使那些最终要成为苏维埃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莫里斯·多布：《1917年以来苏联经济的发展》，伦敦，1948年，和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59—60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178—180页（中文版，第28卷第156—157页）。

的贫农委员会遍布俄罗斯,也就是说,成为政权完全承认的一种机构。同时,他着重指出向集体劳动过渡,向公社过渡,所以要在农村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

在同一个时期,1918年10月至11月,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小册子中,列宁强调指出,随着贫农委员会的成立,革命终于超出了至今还未能超出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在说明1918年6月以前的形势的特点时把这个形势说成是“在两个京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在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sup>①</sup>。

这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认为在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即放弃自耕制和过渡到“真正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列宁认为“战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经济破坏,根本不容许我们恢复这种旧的小农经济”<sup>②</sup>;战争也唤起许多人这样一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页起,引文见第314页(中文版,第28卷第284页)。

② 参阅列宁:《在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12月11日),载《列宁全集》,第28卷第350页起,引文见第353页(中文版,第28卷第323页)。

种思想，即曾经用来进行破坏的技术奇迹，也可以用来为以集体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服务，因此得出“在大多数劳动农民当中已有建立共耕制的愿望”（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和从此有可能发展共耕制、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的结论<sup>①</sup>。

列宁每次发表演说时都着重指出，农村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应当由农民自己去做。他说，单单革命领导人确信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是不能够使之实现的；单单进行宣传，也不能够说服几百万人：他们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才能够获得这种信心<sup>②</sup>。

列宁强调指出，农村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不但同废除土地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他说，如果“贫农、劳动农民”自己不经过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废除土地私有制必然会是一纸空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在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12月11日），载《列宁全集》，第28卷第355-360页（中文版，第28卷第325页）。

<sup>②</sup> 在上文引用过的在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2页，中文版，第28卷第125页）和《对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的演说》（同上书，第180页，中文版，第157页）里都提到这个论点。

文”<sup>①</sup>），而且是同本村政治关系的变革（通过组织贫农委员会）和能使农民群众过渡到共耕制的思想关系的改造联系在一起的。

事实证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所希望的迅速向社会主义土地革命过渡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当时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准备走这条道路，同时贫农委员会也表现出没有生命力。它们还没有分布到全国各地，而已经成立的组织也只代表少数贫农。甚至连这些只代表少数贫农的组织也不是由这个阶级最富有战斗性的分子所组成的；里面可以找到许多希望占有一部分没收富农的产品的赤贫分子，他们根本不想为建立共耕制进行斗争。

在这个时期，农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化还不象 1918 年下半年初那样进展得快。

事实上，平分土地使贫农的份地略微减少，使中农的份地略微增加。特别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的势力不够强大——这样又使米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在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352—353 页（中文版，第 28 卷第 321 页）。

尔恢复了生命力（因为米尔又作为平分土地的工具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与城市相抗衡的农民“团结”，因而给富农和中农带来了好处。

因此，只有这个阶级中的极小一部分没有代表性的贫农跟随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建立贫农委员会的尝试。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于是作出结论说，继续坚持这条道路是危险的，特别是在白卫军和外国干涉者开始加紧进攻时必须巩固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的联盟。

1918年底，普遍成立贫农委员会的尝试已经宣告失败，只好放弃这个尝试（但不是有计划地进行）。1919年初，这些贫农委员会都并入农民代表苏维埃。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党的农民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把重点放在农村民主革命后人数大量增加的中农身上。

### **第三节 1919至1920年时期以及引导 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1919年3月

18日至23日),列宁要党特别注意“对待中农的问题”。他说,“当我们必须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权利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能提到首位,但是今后应该正面触及这个问题,以便“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牢固基础”<sup>①</sup>。

为了确定应该采取的态度,列宁说:

“这种态度是不能用斗争或支柱这样简单的回答来确定的。如果说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我们的任务是用‘斗争’、‘镇压’这样的词表达出来,在对待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态度上,这一任务是用‘我们的支柱’这样的词表达出来,那末,在对待中农的态度上,毫无疑问,任务是更复杂了。社会主义者,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中立农民,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懂得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

---

<sup>①</sup> 见列宁1919年3月18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载《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7页起(中文版,第29卷第120页)。



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所考验过的[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基本规则和指示,我们应当以这种规则和指示为准绳而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使得那些屡次产生的、使中农离开我们的偏向和错误再也不能发生……”<sup>①</sup>。

这几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在这里提出了人们以后称作“使中农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否定了以前的信念,即中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会是一个同盟者,无产阶级只能致力于使中农“中立”;因此他肯定,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中,中农可以也应该是一个可靠的同盟者。他谴责了过去的“错误和偏向”,这种错误和偏向只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看作是在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的同盟者;提出了建立这种还没有实现的巩固联盟的具体条件问题。

列宁并不希望能够就这一问题立即给予解答。他认为必须研究农村工作的经验;但是,他明确指出要提防这样的情况:“原定的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我们在这里犯了极大的错

---

<sup>①</sup> 见列宁1919年3月18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载《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0—141页(中文版,第29卷第120页)。

误”<sup>①</sup>。

在文章的上下文里可以看出这个错误同贫农委员会成立的方法以及这些贫农委员会在征收和供应粮食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毫无关系的。

1918年下半年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是因为过去有单纯“中立”中农的思想，但是这些错误首先表明了以前缺乏实践经验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着“时左时右”的倾向。这种倾向把集体生产中形成的劳动关系的任何改革都看成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只要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改革的执行者，即使这种改革是上面压下来的，是强制执行的也未尝不可。

1919年3月初，在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强烈地谴责了党的某些领导人违背农民的愿望，把他们“推向”集体生产。他提醒说：“任何强迫手段都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采取的……。农业公社是根据自愿原则建立的，过渡到共耕制只能是自愿的，在这方面，任何强迫手段

---

<sup>①</sup> 见列宁1919年3月18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载《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7页(中文版，第29卷第134页)。

都是工农政府所不能采取的，而且是法律所不容许的。”<sup>①</sup>

显然，列宁在提醒这些原则时，他关心的并不是合法性的形式；他所关心的是要指出通过强制手段而建立的农业公社不能产生共产主义的劳动形式。

在这次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上，列宁还反对妥协，即在保存自留地的情况下建立集体生产。他认为，如果这样的小块地还存在，它们就将是集体生产瓦解的萌芽。比如，他说：

“如果又拥有个人的菜园、个人的牲畜和家禽等等，也许一切会象以前那样又回到小经济去。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何必建立国营农场呢？”<sup>②</sup>

在3月23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宁重新谈到联合中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他还指出，必须不使用强制手段，不应该强制

---

<sup>①</sup> 见列宁1919年3月18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载《列宁全集》，第29卷第39—40页(中文版，第29卷第2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9页(中文版，第24页)。

中农走他们还不准备走的道路。他曾再三坚持这一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被某些党员接受的。他说：

“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农，那就是愚蠢，鲁钝，毁灭我们的事业，只有别有用心分子才会这样做。……在这里暴力毫无用处。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sup>①</sup>

他还说：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

“我们鼓励建立公社，但应把公社办好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经济方面对中农采用暴力。

“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向农民学习过渡到最好的制度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sup>②</sup>

---

① 见列宁 1919 年 3 月 18 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载《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11 页(中文版，第 29 卷第 181 页)。

② 同上书，第 211—212 页(中文版，第 181—182 页)。

附注：引文里谈到的“公社”，不是米尔，而是农民在那里进行集体劳动的农业公社。

原则很清楚：不对中农采用暴力，在他们中间进行说服工作，取得他们的信任以便让他们自己改变经济关系，向农民学习，决不可发号施令。

对这些原则，布尔什维克党在形式上表示赞同，但是行政机关在 1919 和 1920 年中只是部分地加以遵守。行政机关在征收问题上甚至还违反了这些原则<sup>①</sup>。这些原则只是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才得到遵守，以后在二十年代末期集体化的时候又重新被抛弃了。

党赞成列宁所捍卫的观点，这表现为党通过了一项《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sup>②</sup>。这项决议谴责在对待中农问题上“地方政权的专横”；并且指出，中农“不是剥削者，因为他们并不从别人劳动中取得利润”；鼓励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公社<sup>③</sup>；谴责对中农所实行的征收并且认为向中农征收的税应减轻；最后，再三强调，苏维埃政权应给予中农以帮助和支持，使中农能

---

① 参阅本卷第 317 页起。

② 《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18—221 页（中文版，第 29 卷第 188—191 页）。

③ 见本卷第 312 页注 2 的附注。

够改善他们的个体经济并通过合作组织得到财政上和组织上的支持。因为这项决议是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幻想，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幻想占优势的时候通过的，所以它具有更大的原则意义。

实际上，这项决议的实施是很不平衡的。在整个俄国社会阶级斗争日益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党没有在农村中扎根的弱点以及城市供应的严重危机，都使布尔什维克党只能部分地遵守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待中农的各项决定。

### (一)农村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关系

只是在涉及过渡到共耕制和在这方面必须不使用强制手段时，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定才更加使人看出它们的作用。

1919年10月，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sup>①</sup>一文中，列宁认为，俄国在这一方面，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sup>②</sup>。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3页（中文版，第30卷第87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中文版，第89页）。

事实上,在1919年,人们计算最多只有二千一百个农业公社,三十五万名社员,而且公社的数目在以后有所减少;到1920年3月只有一千五百二十个公社了。某些公社面对着其他农民的敌视态度而不得不解散。由于这种被富农煽动起来的敌视态度,一些公社的社员有时候竟被邻村的农民所杀害。

农业公社主要是由贫农和无地农民而不是由中农建立的。在最初的农业公社中,有几个是由一些工业中心的工人所建立的,特别是从1918年开始,在彼得格勒郊区的公社是如此(这证明了产业工人与农业所保持的关系)<sup>①</sup>。

从那个时期起,就已有由“苏维埃农庄”或“国营农场”构成的另外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们是由苏维埃国家而不是直接由劳动者所建立的;在那里劳动的人拿工资。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视它们实际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程度而定。

1919年,苏维埃农庄的数量比农业公社稍高

---

<sup>①</sup> 关于这些农业工人公社,参阅前引 G. 沙拉波夫著作《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土地问题》,第 212 页。

一些，达到三千五百个（1920年是四千四百个）。这些农庄的面积还相当小：大多数农庄的土地不到二百公顷，一般说来，土地贫瘠，耕种面积不到一半。

最后，在这两种方式以外，存在着一些劳动组合，也就是一些在私人占有的田地上进行集体耕作的低级生产合作社。劳动组合要比农业公社的数量稍多一些：1919年为一千九百个，1920年为三千八百个<sup>①</sup>。

总之，这些生产方式在个体生产的汪洋大海中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它们在原则上的重要意义仍然是很大的。

各种集体生产方式的缓慢发展表明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深入农村，同时还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到说明：当主要矛盾是工人和农民反对保护资本家和地主的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避免强制采取这些生产方式，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看到农村当时的任务。

---

<sup>①</sup> 以上的数字摘自前引 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160页和前引奥·A. 纳尔基耶维茨著作《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形成》第42—43页。



## (二)对中农的帮助

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预定的对中农的帮助没有能够实现。在当时的俄国经济情况下,事实上就不可能提供给中农以改良的种子、人造肥料、种畜,建立一些农具修理站或垦荒场。所有这些意图当时只是一些愿望而已。

其实,给予中农的主要帮助是在政治方面,地方当局从中农的农业经营着眼,不再(或多或少地)把他们当作富农看待。1920年夏天采取的法令对他们作出诺言,不再收回他们的土地——这是许多米尔内部普遍的现象,——只要他们是用自己的双手耕种这些土地,尽管他们掌握的土地面积大于地区重新分配时所定的标准<sup>①</sup>。

这个法令在于支持中农对付贫农的要求。它被正式地解释如下:

“……[本法令]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每个农民应该相信他的那份土地归他所有,不会因为大多数人要求进行一次新的分配而被收回……”<sup>②</sup>

---

① 参阅1920年6月10日《消息报》。

② 参阅《农村公社》,1920年,第98期。引自前引奥·A·纳尔基耶维茨著作《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形成》第43页。

总之，中农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在当时（1919 和 1921 年之间）没有得到苏维埃政权的物质帮助，但苏维埃政权正式采取的立场有助于保证中农的前途，而在以前，由于把重点片面地放在与贫农的联盟和由一部分贫农组成的委员会的活动上，所以他们受到威胁。

### （三）征收问题

关于征收问题，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没有得到贯彻，中农虽然手拿武器保卫了苏维埃政权（没有他们，就不能取得对于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军队的胜利），但他们几乎没有把自己不消费的农产品提供给苏维埃政权，而是把其中很大一部分拿到黑市上去出售。他们只顾目前的物质利益，而不顾前线工农战士的需要。

列宁在 1919 年 11 月 18 日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这一点上中农的两重性；他说，一方面，他是一个劳动者，一个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的人，因而他是站在工人一边的，但是另一方面，当他具有超过他所需要的麦子时，他们就是“习惯于把 [余粮] 看做可以自

由出售的私产的”私有者；但是，列宁接着说，“在饥饿的国家里出卖余粮，这就是变成投机者，变成剥削者，因为挨饿的人是要拿出他所有的一切来买粮食的”。<sup>①</sup>

从上述这个观点出发，列宁指出中农应该按照他是劳动者或者是剥削者来受到两种待遇。他提醒说对中农不使用强制手段不是说中农可以有剥削无产阶级的自由，但是“强迫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根本谈不到的”<sup>②</sup>。

1919年12月，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明确地要求加强征收措施，把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农产品；实际上，这些措施打击了几乎全体可能拥有消费方面的“剩余品”的农业经营者。

这些措施为了保证前线士兵和工厂工人（其定量已经很小）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时候和在这个方面，不得已使用强制手段是由于经

---

<sup>①</sup> 见列宁：《在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列宁全集》，第30卷第141页，引文见第144页（中文版，第30卷第12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45页（中文版，第125页）。

济的和军事的形势以及农民群众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些关系不能使大多数农民自愿地把他们的农产品交给国家机关，因为国家机关没有什么东西同他们“交换”。

1919年底采取的普遍的征收措施当时恶化了苏维埃政权和农民之间的政治关系：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其中大多数中农是被当作投机分子和“剥削者”来对待的。再者，在经济方面，这些征收措施促使农业生产大幅度地下降。

苏维埃政权为了同农业生产下降作斗争，试图把播种计划强加于农民，也就是仍旧使用强制手段<sup>①</sup>。其实，在个体生产的基础上，实际上不可能保证这些计划的实现。因而形势不断恶化：在继续执行和越来越打击农民的情况下，征收工作激起了农民对于苏维埃政权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在1920年10月15日的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列宁看到了这种不满情绪。不满情绪是如此表现的：在这次会议上，苏

---

<sup>①</sup> 我们将在下面说明（见本卷第495—498页），在1920年夏天，用强制手段增加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怎样出现的。

维埃政权的发言人常常难以发表他们的主张。列宁在他的一段讲话中说：

“会上不断有人表现出很不满意和很不耐烦，我们大家都知道，会议的进行方式首先是自由发言。可是你们破坏了这种方式，因为大多数农民深深感到地方上情况极其严重。大多数农民非常痛苦地感到饥饿、寒冷和课税沉重。”<sup>①</sup>

因此，与布尔什维克党所希望的相反，1920年是这样的一个年头，即为了满足前线和城市的需要而对大多数农民实施苛刻的征收。这样就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在1920年的秋末到1921年的冬季，当白卫军和外国干涉者实际上被打败之后，农民暴动在许多地区发生了，特别是在俄国的南部和东南部。这些暴动迫使粮食部在十三个省里停止了粮食的收集和征收工作。<sup>②</sup>

1920年底粮食收集的危机显然不仅仅是由于农民拒绝出售他们的一部分产品所造成，农作物歉收也是一个原因。而这种歉收同战争、经济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7页（中文版，第31卷第300页）。

<sup>②</sup> 见《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宣言》，前引 E. H. 卡尔的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173页注2曾引用过。

的混乱以及农民的不满有联系，相当多的农民把生产限制在只够自己消费的范围内。结果，根据一般认为可靠的估计，粮食的年产量从1909至1913年的七千二百五十万吨下降到1920年不到三千五百万吨，而农民自己的消费是低于一千七百万吨的，与战前相比，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下降<sup>①</sup>（将近百分之四十）。

由于农业情况严重，由于在某些省里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情绪，最后由于战胜了白军和帝国主义军队，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修改它的农民政策，只有到了现在它才可能有效地进行这项工作。

这个修改纳入了新的总经济政策概念中，也就是符合人们所称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将

---

<sup>①</sup> 1909至1913年粮食生产的数字摘自1958年《人民委员部资料》，第70页；1920年的数字摘自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十年（1917--1927年）》（俄文版），莫斯科，1928年。

战前农民的消费总额符合一般的估计，1920至1921年的消费总额摘自P.波波夫：《俄罗斯联邦的谷物生产》（俄文版），莫斯科，1921年，西·格罗斯科普夫的《俄国谷物问题和新经济政策》（高等技术学校第六系毕业论文）第122页曾引用过。

这些数字，由于统计依据不可靠，并且对消费和生产衰退有估计过高的倾向，虽然不能进行精确的比较，然而可以使人们看到生产和消费已衰退到什么地步。关于总的农业生产，见本卷第331页注1。

在本卷的最后部分里分析。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一下某些主要涉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农民政策的若干决定与措施，以及这个政策对农村阶级斗争直接产生的效果。

#### 第四节 “战时共产主义”末期与新经济政策 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政策的修 改和农村中的阶级关系

1920年底和1921年初，列宁主张必须对农民政策进行很大的修改。然而这个修改实际上只是在1921年3月才开始，当时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煽起的农民的不满引起了农民的反抗和造成了喀琅施塔得的叛乱。

1921年3月8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如同他以前那样指出，由于没有足够地认识到不同地区的征收的可能性和农民的需要，征收政策“使农民经济的危机特别严重起来”<sup>①</sup>，并导致了“农民对无产阶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82页（中文版，第32卷第164页）。

级专政日益不满”<sup>①</sup>，这就迫使要调整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 （一）农民的要求以及“交换自由”的恢复

1921年3月15日，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列宁长时间地和明确地谈到党对农民政策的这种必要的修改。他说：

“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爽直地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志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了。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所以能够爽直地说：让我们来重新审查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目前的这种状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他接着说：

“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满意的。我们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情况是不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84页（中文版，第32卷第167页）。



能继续下去了。’怎样去满足农民呢？满足农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对怎样满足农民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自然，这要从农民的要求本身中去寻找。”<sup>①</sup>

这些阐述又一次指明，按照列宁的意思就是，除了领导革命的理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总结经验和人民群众本身的要求。

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给予农民支配他们的产品的自由（当他们交税后）并允许小商业和小工业有一定的自由。同时，给外国资本一定限度的“租让”<sup>②</sup>。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使国家从饥饿和经济崩溃中解救出来，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得到巩固，因为它受到农民不满而导致工农联盟破裂的严重威胁。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6页和第227页（中文版，第32卷第204页和206页）。

<sup>②</sup> 所谓“租让”，就是在严格监督条件下，允许外国资本对一定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工厂）投资，将苏维埃俄国所缺少的设备运进国内，同时允许将所得利润让给它们。

以后对恢复“交换自由”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将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因此，从仍然是“规定的”交换形式过渡到“自由的”商品交换和恢复重要的商品流转<sup>①</sup>。这些变化是最初的修改、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和采用新经济政策的继续。

揭开新经济政策序幕的主要法令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几天中发表的。3月21日的法令结束了粮食的征收工作，以及28日列宁签署的法令“解放”了对贸易、农产品的买卖和废除了关于运送食品的限制。

## (二) 1922年的土地法

我们将在以后<sup>②</sup>看到在实践经验本身的基础上，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概念是怎样变化的。在这里，当我们讨论农村中的阶级关系时，必须谈一下1922年5月22日关于土地协作社或土地协会的法令。

这个法令实际上承认米尔的存在，并且力图改变它，以便使它的活动和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更

<sup>①</sup> 参阅本卷第678页起。

<sup>②</sup> 参阅本卷第690--691页。

好地相配合。其实，这种意图没有得到什么成果：在“土地协作社”的新名称下面仍然是旧时米尔或多或少地继续存在；如同后者一样，实际上，土地协作社是在村一级活动的。

1922年11月15日的土地法重新采用了5月22日法令的规定。它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1922年的土地法树立了一些为建立农业公社的更正确的基础，这些农业公社能够在土地协会内部或由几个村庄建立起来。

土地协会，也就是经过改革的米尔，由所有的人都有表决权的村会和选举出来的一些机构来管理。原则上，这种组成的变化是重要的。事实上，在以前，只有一家之主才能参加大会（也就是农业生产者每户的户主）。今后，在理论上，凡年满十八岁并拥有土地的人都可参加村会和选举领导机构。村会决定谁有权加入米尔和谁可以离开；它能决定耕种的种类和分配土地的方式。这些决定以简单的多数通过。经过革新的米尔具有法人资格，它能够从事买卖。

革新后的米尔的实际状况和上述原则有明显的不同。其实，在土地法颁布以后完全同以前一样，真正的地方政权往往是掌握在富农和富裕中农手中。他们是通过村会和由它选出来的领导或“全权代表”（一般说，他本人也是富农）来掌权的。

这种一般是被富农和富裕农民控制的村会比村苏维埃拥有更大的权力。实际上它操纵土地分配。有时，它甚至对最缺乏土地的农民也不给予土地<sup>①</sup>，借口他们不能管理生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集体化时为止，举例说，如同1928年底一篇关于农村形势分析的文章中承认的那样：“村会在村的生活中继续占据一个主要的地位。”<sup>②</sup>

几个苏维埃作者<sup>③</sup> 因此认为加强米尔对富农

---

① 见前引 E. H. 卡尔和 R. W. 戴维斯著作《计划经济的基础》，第1卷第121页注2。

② 同上书，第2卷第248页注7，引自《苏联建设》，1928年12月，第12（29）期，第73页

③ 参阅 M. 乌斯季诺夫的文章《开发土地的形式问题》，载《布尔什维克》杂志，1927年，第19—20期。

有利，富农是米尔的主要拥护者，因为当农村中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他们能够利用他们在代表大会中拥有的统治地位。这种断言似乎是相当真实的。一般说来，富农都不是优秀的种植者，而是善于把农业活动与一些商业活动，甚至高利贷活动结合起来，例如出租一些拉车的牲口、农具和农业机器等。

1922年的法令试图取缔土地的零星分散和促进在每个耕种单位中集中土地，以便纠正导致把许多可耕地变成道路和分界线这种严重损失耕地的现象。这种做法强迫农民越过很长的距离（有时同属一个耕种单位的各块土地处在离村庄十五或二十公里的地方<sup>①</sup>，这就增加了运输费）。然而这些努力和米尔不时进行的土地分配发生矛盾，于是法律也同样试图限制这些分配，但只取得相对的成果。

最后，法令批准出租土地的时间最多不得超过三年，并以不得使用雇佣劳动来耕种为条件。1923年初，在某种限制下准许使用雇佣劳动。

---

<sup>①</sup> 数字摘自前引西·格罗斯科普夫的论文第55页。

因此，某些“农民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然而，由于农村中的力量对比，这些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能够影响农民群众的富农的要求相同的。

### (三) 国内战争后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新经济政策初期农村中的阶级分化

农民是社会集团，它的经济地位由于革命而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他们掌握的土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他们在过去要向国家缴纳的租税被废除了，并且在地主被剥夺后停止原来因向地主租地而不得不缴纳的地租。因此，农民积极支持革命并使红军能打败白军和帝国主义军队。如果没有占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群众的支持，要取得胜利将是不可能的。在物质方面，红军是极端缺乏的，它的胜利是，也只能是一种政策上的胜利，工农联盟的胜利。

虽然农民掌握的土地面积得到了扩大以及清除了地主，可以根本地改善农民地位，但是他们当前的经济情况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首先，工业品价格（这些工业品只能在黑市上找到）提高的速度比农产品价格提高的速度快得

多；其次，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崩溃<sup>①</sup>，并且一直进行到1920年底的征收工作拿走了农民大量的产品，以致他们遭受到饥饿的痛苦。

从1922年起，农民的情况开始改善，但是只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许多年之后，收成才超过战前的水平。

### 1. 贫农和中农经济地位的加强

革命把一部分原来的贫农改变成中农和相应地改善了他们的地位。

对于从1917至1922年在农民中发生的变化进行“评价”是极其困难的。要认真地进行评价，就应当进行至今尚未进行过的仔细的研究。因此应当限于不应过高估计的总的指数上，况且这些估计主要是涉及“农民耕种”中的土地分配（而不是把农民分成阶级）。

在这些不同的估计中，提供了一些最真实数字的是来自 N. D. 康德拉捷夫和 N. P. 奥加

---

<sup>①</sup> 据官方估计，农业总产量比1913年降低百分之四十（参阅《人民委员部资料》，1958年，第52页），而谷物产量则更加少（见本卷第322页注1）。事实上，人们经常认为在歉收年，实际生产的四分之一可能私自隐藏起来，不上缴，这样一来农产量就要减少百分之二十；看来，还是“乐观”的估计。

诺夫斯基。这个估计如下<sup>①</sup>：

每个生产单位的可耕地面积	1900 年	1922 年
从 0 -2.7(俄亩)	15.8	15.1
从 2.7—5.4(俄亩)	34.7	35.2
从 5.4- 13.1 (俄亩)	40.0	45.8
13.1 以上(俄亩)	10.5	3.9

当然，不能把按生产面积的分类看成是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土地分配面积。其实，即使占有土地面积相同的农民，也还是要根据土质和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来分类。从农民的变化来看，要从上面的图表和其他资料中作出结论，必须特别慎重。

如果采取这种慎重的态度，可以看到占有很少土地的农民的人数已经略有减少。从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下中农的耕种面积略有增加，而其

<sup>①</sup> 见 N. P. 奥加诺夫斯基和 N. D. 康德拉捷夫，《苏联农业发展的前景》(俄文版)，莫斯科，1924年，第115页，摘自西·格罗斯科普夫：《新经济政策时期土地的占有、使用和分配》，载1973年10—12月《俄罗斯和苏联手册》。



他中农的耕种面积则大大增加，土地很多的农民的耕种面积反而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二。

但是要注意不要从上面的图表中得出草率的结论，因为在 1920 至 1922 年的具体条件下，许多贫农和中农没有耕种他们占有的全部土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把土地当作分配的目标，而很少把其他的生产资料当作分配的目标。这就是米尔的传统，是最富裕的农民在米尔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物继续强加于人的传统，也是被最贫穷的农民所接受的传统。

其实，贫农一般认为他们贫穷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土地，所以应该纠正这种情况。在贫农委员会发展时期，这些委员会很少关心农具<sup>①</sup>。

由于土地分配不能适应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即部分农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sup>②</sup>，1922 至 1923 年间未耕地面积大约占 1913 年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因此，如果计算实际耕地面积，可以看出小单位生产面积（约相等

---

① 参阅《贫农委员会》，第 2 卷第 26 页，引自前引西·格罗斯科普夫的论文第 87 页。

② 见本卷第 335 页。

于贫农和中农的耕地面积)增加了,在1917年和1922年之间,耕地面积从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九点六,然而处于两者之间的一批人的小单位生产的面积却减少了(从百分之四十二点七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九点二),同样,富裕农民和富农<sup>①</sup>的生产面积也减少了(从百分之十三点五下降到百分之十一点二)。

总之,俄国革命使贫农和中农——从可支配的土地来看——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平均增长百分之三十,加上原来已有的土地面积)。但是,在1922年,革命并没有提高这些农民当时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只是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在1923至1926年之间)才能看出来。

过去,大多数农民都认为最重要的是占有土地,对贫农和中农来说,增加他们的土地面积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农民群众在国内战争时期给苏维埃政权以无可否认的政治支持。众所周知,仍有一部分农民起来——当战争快结束时——反抗苏维埃政权,因为它把征收和不允许

---

<sup>①</sup> 参阅前引康德拉捷夫和奥加诺夫斯基著作第118页的估计。

有贸易的自由搞得过火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新经济政策满足了农民提出的一些要求，重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广大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

## 2. 俄国农民和农村小资产阶级

当时，很清楚，除了以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为一方和以富农为另一方以外，俄国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它和商品关系有联系，并在俄国社会结构（刚刚经过变革的资本主义关系继续在支配着）中处于中间地位，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地位。

实际上，一部分中农的生产是供自己消费的，另一部分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以便通过交换获得他们的生产和非生产消费所需要的钱。这种生产是受到通过流通而实现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需要支配的。

对于构成农村小资产阶级的那部分农民来说，以及对农村资产阶级来说也是一样，生产是完全受市场销售情况支配的。因此，1917至1922年生产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卢布的贬值和缺乏同农产品交换的工业品：这个形势限制了农业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下降。新经济

政策的头几年说明俄国农业受市场和价格条件的影响达到了什么程度。

一部分中农之所以属于小资产阶级是由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进行可能改变这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的政治思想工作，它的社会实践不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

因此，在经济方面，农业提供的产品数量的急剧下降，部分原因是生产的物质条件恶化所致。其实，能使生产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的物质资料几乎到处都有。1917至1921年之间，产品数量之所以显著下降，是因为能够向城市、工厂和前线提供农产品的农民群众把他们的生产降到只能供自己消费的水平，他们不能（几乎不能）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到任何东西。在这方面，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物物交换”的习惯在起作用。城市暂时还拿不出东西来，因此向城市提供农产品的人当然就没有了，或者说，几乎没有了。小资产阶级的交换方式从而破坏了他们同士兵（前线的工人和农民）和城市工人（都是农民的表兄弟或亲兄弟），甚至和歉收地区的农民的团结。

提出这样的意见，当然不是要向俄国农民提出什么“起诉书”，而是看到阶级实践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对改造从事这种实践的人感到无能为力（其实，后来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种改造是可能的）。

在政治方面，1920至1921年之间的冬天，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事件（这是前者的继续）同样证明了农民给予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这种支持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支持。这种支持如果是中农给的，那就不坚定了（这个在农民中占多数的中农能够影响一部分贫农）。中农之所以支持苏维埃政权，是因为苏维埃政权帮助他们摆脱了地主和使他们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但是当战争一结束，苏维埃政权不让他们自由地进行交换时，他们的支持就减少了。我们因此很清楚地看到，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支持的动摇性，是因为他们要“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产品和用这些产品进行贸易。这样一种类型的支持可由俄国农民提出的口号体现出来：“布尔什维克万岁！[他们帮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体和打倒了地主]打倒共产党员！”。为了了解二十年代初期的俄国农民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

就应该认识到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活动的阶级特点，同样也应该看到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能够改造从事这种活动的人的思想。

布尔什维克党的这种无能为力，原因很多。有的是和党的历史有关：在农村中的基础薄弱，对阶级地位和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理解非常僵化（因这些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是以政治为主而不是以思想为主的）等等。另外一些原因是和俄国当时的形势有关：在俄国农村中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分化，社会革命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受到虽然经过改革的米尔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 3. 农村资产阶级

如果只看到可耕面积的分配得到了改进，对农村的阶级关系所起的变化就会作出错误的结论。对于在 1917 至 1922 年间可耕土地减少的富农来说，这样的结论尤其错误<sup>①</sup>。为了判断农村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特别应当注意除了土地之外的生产资料的分配；遗憾的是，缺乏这方面的全面的统计资料。仅有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数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331 页。

字说明生产资料分配不均的现象有所减少，但是这种现象还是有而且仍然是农村中重新出现的剥削关系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也就是说农民还存在着差别，即有贫农、中农和富农。富农构成农村资产阶级的核心。

应当首先驳斥那种认为生产工具“简单”，农民能够为“自己生产”，因而只有土地分配才是重要的思想。这种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说一个无轮犁有时能够个体生产，那末犁或大镰刀个人就不能生产了，——特别是手推车就更办不到了；至于耕畜，事实上应该是买来的（因为不重新分配），这就需要很多钱（对于大多数贫农和中农来说，唯一的一头耕畜如果死了就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大灾难：耕畜的死亡就会使全家陷入最悲惨的境地）。

但是，贫农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是很不够的。以俄国的西北部为例，可以用下面一些数字来说明：由米尔经营的百分之二十九的农庄没有农具，在一百个农庄里只有三十五头耕畜可供农民使用。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在1920年，每一百俄亩的播种面积只有十一

点二架犁（在 1923 年只有九点六架）和九点六架摆杆步犁。

此外，农庄的农具配备的好坏对于亩产量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同一个地区里，农具配备较好的农庄的产量要比中等配备的农庄的产量高百分之六十<sup>①</sup>。

然而，农民的分化问题不能归之于“配备上的差别”，而是一个阶级分化的问题。在农村中社会两极的一端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受富农剥削的贫农（有时候是受最富裕的中农的剥削），他们不得不向富农和富裕中农租借马、犁和其他的农具。另一端是农村资产阶级，即富农，他们剥削半无产阶级、贫农和一部分中农。

没有具体的资料来计算这种剥削，但是大家知道这种剥削是很重的（因此，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贫农不得不把在他自己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的三分之一作为租钱交给耕马的出租者）；人们还知道，在苏维埃政权下，这种剥削往往采用

---

<sup>①</sup> 关于以上的情况，参阅前引奥加诺夫斯基和康德拉捷夫的著作，特别是第 60--61 页和第 123 页。



隐蔽的手法以逃避惩罚，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剥削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

在那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它是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相结合的。富农通过出租劳动工具和粮食上进行投机比改进他自己的“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要大得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讲过的这几句话，在1920至1922年<sup>①</sup>期间仍然基本上有效。

农村资产阶级的存在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它通过米尔，企图对村庄进行统治并操纵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的农民群众。尤其是因为苏维埃机关（设在县城）离开村庄很远，何况它本身在地方上也受到富农的严重影响。

以上这些情况造成村庄的两极分化，使中农成为力求发财致富和争取不加入半无产阶级和贫农队伍的小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剥削贫苦农民。

下面我们要研究的是国家机关在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和阶级实践的基础上所发生的变化。

---

<sup>①</sup>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提到富农时使用了“资本主义寄生性”一词。



## 第三部分

# 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机关 的变革

分析 1917 至 1922 年期间主要的政权机关中发生的变革，就能够了解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一些政治变化(经列宁屡次阐明的)。这种变革以后的发展对无产阶级将有越来越大的消极作用。这项分析也使人们看到这些变革是客观社会进程的结果，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和组织观念的“产物”。

即使其中某些观念具有局部的“不充分”的特点，不能使人们预见到正在进行的变革的效果，或不能预防其后果，但也不应该把一部分未被掌握的客观社会进程同这个进程的动力混淆起来。

为了说明本质，应该提醒一下政治关系从来不是“颁布的”；归根结底，它们向来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而是和生产水平相一致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写的那样：“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sup>①</sup> 生产方式决定政治形式的关系，使人了

解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的变革所具有的局限性(特别在工厂内部的分工、城乡之间的分工以及农村里阶级的划分),归根结底是削弱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就在这几十年的时期中,这种决定关系同样使人了解在缺乏对生产关系进行深入的新的革命攻势,以及缺乏一条保证这一攻势胜利发展的政治路线时,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终于要被消灭。我们还看到在今天的俄国,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出现的一些国内政治关系和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可以视为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甚至沙皇时代的这种关系的“恢复”。

经济水平对于政治水平的决定作用(列宁精辟地论述过这种关系,并用著名的公式加以概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显然是一个绝对的决定性关系,而不是一个“表现的关系”(即“另一面”使政治关系成为经济关系的单纯的“表现”),因此,政治水平对于经济水平是相对独立的。

这个相对的独立表明革命斗争能够使资产阶

---

① 参阅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巴黎,社会出版社,1957年,第153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参阅巴黎社会出版社的法译本,1960年,第8卷第17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91页)。

级的政权崩溃，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同1917年10月的情况那样；无须事先或同时推翻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只有在剥夺了资产阶级权力和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时，这项推翻工作才能更好地完成。

正是由于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斗争和不断革命的要求，基本的经济关系就不能得到彻底的改造。但是，只要这些关系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摧毁和建立新的），只要这些关系还包含资本主义关系的成分，现存的社会关系就会有助于恢复旧的政治关系，向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社会实践提供一个客观基础，以至最后（资产阶级通过巩固它们的阵地，并从这些阵地出发从事阶级斗争）恢复资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条件，以及资产阶级专政本身。

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目标之一就是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只有这种发展才能以革命方式改变整个社会关系。没有这种发展，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就会恢复，社会组成的各个方面就会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利于巩固和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条件。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革命政党的重要的和无法代替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实践的飞跃发展。为此，它应该每时每刻都依靠成熟了的阶级矛盾，同时注意到这些矛盾的各个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对待这个任务的做法很不完善；结果，布尔什维克党使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得以恢复，使十月革命仅仅给予第一次震撼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特别是在政治、法律方面）得以继续巩固。这些关系的巩固过程首先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的机构的改革过程。下面我们即将分析这个过程的主要方面。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是面临指导建设社会主义关系的史无前例的历史任务的第一个革命政党，因而它对这个过程的意义和作用，过去是，也只能是，部分地了解。





## 第一章

### 国家政权的中央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变革

苏维埃政权朝着完全不同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阐明的根本特点的制度迅速演变。根据列宁沿用的恩格斯的说法，这些特点只能使苏维埃政权成为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sup>①</sup>；这个政权应该从根本上建立在地方苏维埃的基础上；而国家中央机关首先是作为中央集权的地点来进行活动的。实际上，部分地不是国家性质的、在苏维埃政权下以萌芽的状态出现的这种关系并没有得到巩固。中央国家机关内的权力集中超越了中央集权。地方苏维埃的作用或者没有发挥，或者

<sup>①</sup> 参阅 1875 年 3 月 18 日至 28 日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和列宁对此信的评语，该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巴黎，社会出版社，1950 年，引文见第 111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30 页）。

逐渐减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作用同样也降低了。这一趋势在继续，并随着“战时共产主义”加速发展。它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国家行政机关自治化的倾向。国家行政机关实际上并没有被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它们甚至想逃避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领导。

### 第一节 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关系的变化

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原来的计划，应由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大会闭幕期间应由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央执委会）代行职权。事实上，1918年以后，在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年只召开一次。1921年，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决定今后的代表大会只是年会，全俄代表大会和地方苏维埃代表大会也是一样。

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会议次数不仅减少了，而且它的权力也缩小了。从1918年7月起，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不再向代表大会作

有关在他们领导下的机关的工作报告；以前，这个报告是要提请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的。

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直接产生的中央执委会的工作减少了（与此同时它的成员人数却增加了，1920年达到了三百名）。<sup>①</sup> 本来，中央执委会应当是一个常设机构；实际上，它很少开会，而且越开越少。到1921年，每年只召开三次会议了。

1919年12月，中央执委会所掌握的权力实际上已移交给它的主席了；但是很快地，主席也只不过起着有名无实的作用：他担任“国家元首”<sup>②</sup>的职务。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际上起着主要作用的国家机构不是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委会，而是列宁生前一直到去世都在领导的人民委员会。从形式上来看，所有重大的决议都是毫无例外地或者由人民委员会，或者由党中央委员会，或者由两个委员会中的一个和中央执委会

---

<sup>①</sup> 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把中央执委会的人数减少到二百名（见本卷第140页）。

<sup>②</sup>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见 E. H. 卡尔：《苏联的形成》，巴黎，1950年，第217—218页和第227页。

共同决定的。众所周知，在某些中央机关中形式上的集权和实际使用权力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空白点：权力正朝着从理论上讲处于被领导地位的行政机关的方面转移。列宁不止一次地说明这样一个形势并力图纠正它。

## 第二节 取消各党派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刊的过程

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的党派和报刊将占什么地位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从来也没有预先制定过一个确定的纲领。然而，在十月革命前，对直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刊和党派（如“立宪民主党”）——对它们应该采取一些约束的措施——同代表小资产阶级愿望的民主主义报刊和党派之间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区别。对于后者，布尔什维克党认为，为了把在它们影响下的人民群众争夺过来而进行的斗争，主要形式是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这就意味着在苏维埃内部与这些党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并给他们办好自己报纸的机会。这样的方针显然不意味这

些党和它们的报刊可以开展反革命活动而不受法律制裁。

事实上，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就让民主党派开展活动，甚至还和它们商量参加政府的可能性，对资产阶级各党派和报刊的约束也是有限的。

### （一）立宪民主党及其报纸

十月革命后不久，没有立即取缔立宪民主党。只是在1917年11月底，当该党公开支持卡列金进行反革命叛乱准备工作时，它才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党”，并被人民委员会的法令所禁止<sup>①</sup>。然而，一些立宪民主党代表（以及一些其他资产阶级党派代表）仍被选进立宪会议<sup>②</sup>并参加了它召开的时间不长的会议。

苏维埃政府最初在实际工作中对待资产阶级报刊的态度要比它的声明宽大得多。

资产阶级报刊原则上是禁止发行的。因此，

---

<sup>①</sup> 参阅《法令汇编(1917-1918年)》，第4号第64条，前引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117页曾引用过。

<sup>②</sup> 见本卷第133页。

列宁在1917年11月4日所作的《关于出版问题的发言》一文中提到：

“我们从前就说过，我们一取得政权，就要封闭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我们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了。……

“我们不能让资产阶级有诬蔑我们的机会。”<sup>①</sup>

然而在这个讲话以后，列宁说执行法律将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因地制宜的，这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不是用粗暴的禁止方法办事。

实际上，从1917年的冬天到1918年的春天，苏维埃政权没有封闭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因此，当立宪民主党解散时，这个党的报纸《俄罗斯自由报》还在继续出版，甚至在1918年夏天内战时期还在发行<sup>②</sup>。只是在以后，当武装斗争已经很激烈，以至不能允许作为武装的敌人的喉舌的报纸发行时，才要它停刊。

立宪民主党人最后一次正式出面是在成立一个全俄救济委员会的时候；这个委员会是根据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26卷第297页（中文版，第26卷第267页）。

<sup>②</sup> 参阅前引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173页。

1921年7月21日法令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国际救济俄罗斯灾区的募捐活动。苏维埃政府当时指定几个立宪民主党的知名人士参加这个委员会。这些人在委员会里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当然还有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中的一个人担任委员会主席）坐在一起。不久就出现这个组织中的资产阶级成员打算直接与外国谈判，力图使自己成为“反政府派”的情况。因此，根据1921年8月27日的法令，宣布解散这个委员会，并逮捕了其中主要的资产阶级成员<sup>①</sup>。从那时起，立宪民主党和它的成员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922年，也就是新经济政策刚实施的时候，最后一批资产阶级刊物（其中有“自由主义者”的杂志《经济学家》）也停刊了<sup>②</sup>。这些事实表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发展、战争年代的危急局势和后来的一些严重困难，才逐渐禁止资产阶级的组织和报刊进行任何活动的，因为它们的活动已超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经

---

① 参阅前引E.H.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181--182页。

② 参阅E.H.卡尔：《一国的社会主义》，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4年，第1卷第65页。

常不断地朝着公开反革命的活动方向发展。对于“民主”党派和报刊也有一个同样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更为复杂、更为缓慢。

## (二)同“民主”党派的初步谈判

虽然十月起义既是针对资产阶级又是针对“民主”党派继续支持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政策的，但是在开始时，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把“民主”党派当作反革命政党。不仅没有取缔它们，而且还力图让它们参加政府。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决定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时，1917年10月29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说：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苏维埃，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可是他们要等打垮克伦斯基之后再作计较。”

他接着说：

“……大家都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由于占少数才退出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sup>①</sup>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8—279页（中文版，第26卷第247—248页）。



事实上，10月25日和26日两天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不承认今后由苏维埃掌权，他们并且决定退出代表大会，因此就站到反革命一边去了。然而，10月29日，中央委员会在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接受了和这些党<sup>①</sup>讨论组织一个联合政府<sup>②</sup>的问题。但是这些党公开表示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要求中央执委会要有大量的资产阶级代表（担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市参议会的委员），并要求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从联合政府中驱逐出去。11月1日，列宁承认谈判可以成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不过目前他还是认为应该中断谈判，“或者是同卡列金的代理人站在一起，或者是同下层群众站在一起”<sup>③</sup>。他就是照以上这个意见把一项决议案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但是这个决

---

① 参阅皮·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第99页。

② 就在这天，列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说，当时“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这就意味着他现在已不愿意了。

③ 参阅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7年11月1日。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86—287页（中文版，第26卷第256—257页）。

议案以十票对四票被否决了<sup>①</sup>。第二天,11月2日,列宁谴责那些主张同不承认政权是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的党派继续谈判的人,说他们“从而完全丧失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根本立场,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说:

“对苏维埃中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让步,就等于完全背弃苏维埃政权,完全背弃民主主义,因为这种让步就等于多数派害怕运用自己的多数,屈服于无政府状态,纵容任何少数派再提出最后通牒。”<sup>②</sup>

列宁的这个决议案只是在经过三轮投票后才以八票对七票得到通过。在这次投票之后,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退出了中央委员会<sup>③</sup>,还有一些人民委员离开了政府。事实上,少数派继续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谈判的企图和后者的反苏维

---

① 参阅马·利布曼:《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年,第2卷第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88—289页(中文版,第26卷第259页)。

③ 在这个少数派里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参阅《列宁全集》,第26卷第592页(中文版,第26卷第512页)。

埃活动发生了矛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放弃领导权之后，最后决定停止一切谈判。<sup>①</sup> 于是，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又回到中央委员会里来了。

应当指出，11月2日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说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派应被排斥出去。事实上，列宁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决议案声明：

“中央委员会确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排斥任何人，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苏维埃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他们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说布尔什维克似乎不愿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是彻头彻尾的谎话。”<sup>②</sup>

在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谈判破裂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包括列宁在内，仍竭力继续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没有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进行谈判。在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时候，列宁还建议他们参加政府，但遭到了拒绝<sup>③</sup>。在和中央

---

① 参阅马·利布曼：《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第5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89页（中文版，第26卷第259页）。

③ 同上。

委员会少数派立场一致的人民委员辞职的第二天，又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一些新的建议。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终于在1917年12月12日签订了一项协定，并成立了一个由十一名布尔什维克和七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此外，一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契卡的副主席。这个联合政府一直延续到1918年2月底；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两党之间的协定也停止生效了。然而，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人民委员辞职后的一些时候，两党的关系还一直不错。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甚至在契卡里面一直都有代表，但是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之后以及在国内战争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关系才公开恶化。

这样，布尔什维克党就根据“民主”党派实际采取的是反对还是接受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来决定对待它们的态度。然而，只要这些党派不进行严重的反革命活动，就不会受到阻碍；同样，根据各种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根据国内战争时期的军事形势，这些党派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活动机会和受

到不同的待遇，主要是看它们对苏维埃政权抱什么态度。

### (三) 社会革命党的政策

“民主”党派里最早和最公开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是社会革命党（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又当别论，将在以后再谈）。在十月革命的时候，这个党的社会基础是由农村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和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农村和城镇里的教员和公职人员组成的。在1917年2至10月间，这个党越来越接近立宪民主党人，它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分土地。俄国的银行在收归国有之前，曾向该党提供过经费，该党还接受过美国商人的金钱<sup>①</sup>。从1917年10月26日起，它决定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武装行动，一面同哥萨克兵团和士官生们谈判。在立宪会议解散后，它又利用个人恐怖手段，干了不少暗杀的勾当。在国内战争时期，它公开支持反革命，还参加了好几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sup>②</sup>。

---

① 参阅马·利布曼：《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第2卷第55—58页。

② 同上。

尽管社会革命党干了这许多反革命活动，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把它解散。一直到内战初期，它还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因为它只退出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它的报纸还在继续出版，虽然逐渐地受到新闻检查（新闻检查于1918年3月实施）。然而，当国内战争扩大时，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同众所周知的反革命相勾结”<sup>①</sup>才被驱逐出苏维埃。但是，他们的党并没有正式解散。根据当时的情况，它的活动还是多少得到允许的。

这种宽大还是有效果的。因此在1919年2月，彼得格勒的社会革命党人揭发了反革命和外国干涉的阴谋。1919年2月25日<sup>②</sup>，根据中央执委会的决定，让立场转变了的社会革命党人又重新回到了苏维埃机关。从那时起，有一些会议，允许社会革命党自己召开。1920年底，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在无表决权的情况下，还参加了第十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

① 参阅前引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165页。

② 同上书，第175页。

#### (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段时期内受到的待遇与其他社会革命党人大不相同。事实上，从社会革命党分裂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在战争时期与社会革命党脱离关系的。他们和社会革命党相比有另外一种社会基础，因为他们在中农中间有很大的影响。

在1917年10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继续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不久，便组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党（他们组织的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召开）<sup>①</sup>。虽然这个党参加了苏维埃政府和中央执委会，但是，在1918年年初它与布尔什维克党的破裂已不可避免了。首先是因为它反对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从1918年夏天起，它谴责关于成立贫农委员会和派遣工人分队去农村的决定。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苏维埃政权断然决裂了。

公开的破裂是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26卷第589—590页（中文版，第26卷第269—270页）。

(1918年7月)上开始的。这次代表大会有一千一百三十二名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占七百五十四名，左派社会革命党占三百五十二名。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发言人利用大会讲台号召造反。其中有一个还赞扬了那些破坏纪律的军队。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个女领导人玛丽·斯皮里多诺娃说：

“在我们中间只有一些偶然的分歧，但是，在农民问题上，我们是准备进行斗争的。”

她宣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将进行恐怖行动，她本人也将带着手枪或炸弹来对付布尔什维克。她话讲到这里，人家就不准她再讲下去了。第二天，一批自称是左派社会革命党运动的人谋杀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企图重新挑起战争。他们还在莫斯科进行武装叛乱。从那时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被看作是反革命营垒里的人。果然，他们的党分裂了，凡参加反革命活动的人一律被清除出苏维埃，正在叛乱的人遭到逮捕。然而，应当指出，未参加恐怖活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则不在禁止之列，对他们的惩治是有限度的：决定继续留在苏维埃工作的人没有被清除<sup>①</sup>。显然，布尔什维克党考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基础，



不想最后决裂。但是不可能，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数日益增多；其余的成了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宗派主义的牺牲品。

### (五)无政府主义者

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也说明了想同不搞反革命活动的人进行合作的愿望。然而，这些关系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内部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派别而变得混乱不堪。他们中间有些人偶尔也支持过苏维埃政权，而另外一些人却坚决敌视它。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也同样由于他们中间存在着脱离自己阶级的人和阴谋家而变得困难了。无论如何，一直到1918年4月，无政府主义者都是自由地开展他们的活动的，特别在两个主要城市里更是如此。1918年4月，警方对于在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办事处采取了行动，因为一些反革命军官混在他们中间。1918年7月，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了社会革命党的叛乱阴谋；同年9月，一群无政府主义者袭击

---

① 参阅前引马·利布曼著作《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第2卷第75--76页和第157页。

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的党委会所在地，造成十二人死亡和五十多人受伤的事件<sup>①</sup>。

从1918至1920年，虽然由于上述事件，列宁还竭力想与某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无产阶级阶层保持良好关系。1919年8月，他在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一封信中指出，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成为“苏维埃政权最忠实的拥护者”，并接着说：“他们是我们最好的同志和朋友，是优秀的革命者，他们过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由于误会，……由于第二国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sup>②</sup>。1920年7月，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全体同志都有责任全力帮助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从无政府主义转到第三国际方面来”<sup>③</sup>。布尔什维克党对于无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采取的政策是致力于在较好的条件下开展对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避免镇压和

<sup>①</sup> 参阅前引马·利布曼著作《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第2卷第69页。

<sup>②</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28卷（原书有误，应为第29卷。——译者）第567页（中文版第29卷第514—515页）。

<sup>③</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4页（中文版，第31卷第176页）。

使受无政府主义理论影响的劳动者认识到这些理论是错误的、不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的<sup>①</sup>。

以涅斯托尔·马赫诺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农民”倾向在乌克兰表现得特别强烈。在一段时间内，马赫诺领导着一支农民队伍，布尔什维克党和他谈判以便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白卫军。然而，这种合作为时不久，因为马赫诺分子是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他们不能容忍在他们控制下的村庄里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们并在那里屠杀共产党员<sup>②</sup>。1920年11月，苏维埃政权和马赫诺部队达成的协议被破坏了，红军很快就击败和瓦解了马赫诺分子的力量。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喀琅施塔得的叛乱重新导致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对立，但后者以后又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他们的组织在莫斯科有一个办事处负责出版各种刊物。实际上，最后一批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只是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后期才解散。

---

<sup>①</sup>参阅《列宁全集》，第31卷 27页（中文版，第31卷第16页起）。

<sup>②</sup>参阅前引马·利布曼著作《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第2卷第69页。

## (六)孟什维克党人

同孟什维克党人的关系，主要是根据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来决定的。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孟什维克党人就象社会革命党人那样，退出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不过，他们的党并没有解散，而且一直到1918年7月为止仍参加苏维埃的活动。社会革命党叛乱未遂的第二天，所有的孟什维克党人都由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而被开除出苏维埃组织。专门反对苏维埃活动的孟什维克骨干在1918年夏天被捕。与此相反，对只是搞意识形态斗争的孟什维克组织的活动并未有计划地要它停止，因为苏维埃政权正是要用说服和辩论而不是用镇压来同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

1918年10月底，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了五天会并通过了一项支持苏维埃政府来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决议。虽然这个决议全文的内容既不清楚又有矛盾，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孟什维克的决议的字里行间看出他们有放弃反革命立场的表示；因此，1918年11月30日，中央执委会命令撤消以前把孟什维克开除出苏维埃各级

机构的决定。这项决定“对于坚持同外国以及俄国的资产阶级结盟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组织<sup>①</sup>”显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由于孟什维克的态度暧昧，1919年和孟什维克的关系仍然紧张。尽管如此，还是邀请了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参加1919年12月举行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如唐恩和马尔托夫还在会上发了言。前者发言赞成“革命统一战线”，而后者却要求“恢复宪法的作用，……出版、结社、集会自由……”<sup>②</sup>。列宁在回忆苏维埃政权反对世界资本主义而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解释说：马尔托夫要求的实际上是“退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去”，他接着说：

“当我们听到申言同情我们的人发表这种宣言时，我们就说：不，恐怖手段和肃反委员会都是绝对必要的。”<sup>③</sup>

---

① 参阅前引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175页。

② 《第七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莫斯科，1920年，第60—63页。前引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177页曾引用过。

③ 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177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02页）。

1920 年间，孟什维克党的活动在莫斯科和各省中发展起来。它掌握了一些办事处，发行各种小报，它的活动虽然受到严密监视，但是仍旧参加地方苏维埃的选举，得到了几百个席位。孟什维克党人举行群众大会，召开中央委员会，1920年8月还组织一次党的大会（苏维埃报刊曾经报导过），并在工会内部非常活跃，他们象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一样来参与活动。当举行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时，一些孟什维克代表还受到邀请。这些邀请能使意识形态斗争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展开，同时也置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的基层组织的反对态度于不顾，这些基层组织认为不许孟什维克的代表在地方苏维埃以上的组织内当选是正确的。

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孟什维克代表或社会革命党最后一次参加的大会。事实上，在1920和1921年之间的冬天，某些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是使喀琅施塔得叛乱条件不断成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孟什维克党人利用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地位，对彼得格勒的罢工推波助澜，而社会革命党人则对农民在某些地区积极开展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加以怂恿。

## (七)开展对“民主”党派及其报刊的镇压活动

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象在 1918 年下半年由于进行反革命活动以致他们有一部分人被捕入狱那样，在 1920 和 1921 年之间的冬天，他们又由于颠覆活动招来了对他们的镇压，并使苏维埃政权不仅对他们的组织，甚至对他们的报纸也限制得越来越紧。

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党 1921 年以后的做法上和列宁采取的立场之间有着重大的分歧，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也是这样。1918 年 11 月，列宁在谈到孟什维克表示放弃反苏维埃的态度时说：“……我们现在不应该推开他们，相反地，应该容纳他们，使他们能够同我们一起工作。”<sup>①</sup> 在同一个时期，列宁认为“当局势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的时候，还一味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恐怖的策略，那是同样荒唐可笑的，甚至更加荒唐可笑的”<sup>②</sup>。

---

① 《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203 页（中文版，第 28 卷第 179 页）。

② 同上书，第 195 页（中文版，第 172 页）。

大家知道,列宁在宣布禁止资产阶级报刊(资产阶级出钱支持或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产阶级报刊)的同时,允许“民主”报刊出版自由,也就是说这些报纸是属于群众组织的或是由一些很愿意局限在苏维埃制度范围内从事政治斗争的党派出版的。

因此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由列宁起草的一项决议草案宣布不受资本控制的报刊将有出版自由,1917年11月4日的这个草案规定:

“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控制,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一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sup>①</sup>

这个草案从未实现,首先是由于纸张的严重缺乏,以及由于1918年以来越来越紧张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扩大后更是如此。事实上,新闻检查从1918年3月开始(当时,并未对小报和油印的小册子进行检查,到后来才实行);同年7月起,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或无政府主义的许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94页(中文版,第26卷第264页)。



多出版物被禁止了。然而，一直到1921年，这些出版物如要重新出版，一般说只要换一个名称就可以。可是它们的内容仍然经常对布尔什维克党保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事实上，从形势普遍恶化的1921年起，在打算于1921年7月成立一个委员会开始和帝国主义政府直接谈判之后<sup>①</sup>，对“民主”党派和它们的报刊的镇压才变得无情和越来越坚决了。然而列宁似乎未曾考虑要禁止那些在他看来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sup>②</sup>的“民主”党派，他甚至到1922年还在考虑“重新给予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sup>③</sup>。

布尔什维克党，一部分是出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中有许多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原因，已在另一方面采取有效的做法。于是，在1922年2月，社会革命党四十七名领导人被指控阴谋反

---

① 参阅本卷第353—3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41页（中文版，第32卷第219页）。

③ 参阅前引马·利布曼著作《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第2卷第92页。

对苏维埃。1922年6月，对这些社会革命党的被告人进行了审理，最后许多人判了刑<sup>①</sup>。此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发现他们已处于越来越无法活动的境地。然而它们的党却未受到禁止。全俄中央执委会的一项法令（1922年8月8日）批准了以前给予社会革命党人的惩处（但暂缓执行），也含蓄地承认了这些党派存在的合法性，法令宣布：

“如果社会革命党在事实上和行动上停止以恐怖的阴谋叛乱和军事奸细的地下活动来反对工农政权的话，就将对过去负责这些活动的该党领导人免于极刑……”<sup>②</sup>

从此，这些“民主”党派的合法存在越来越成为一种空想：虽然没有被正式解散，实际上它们已无法活动。它们的领导人不断被捕，大多数人终于逃亡国外。它们的报刊，虽然这几年间仍在俄国流传，但再也不能在俄国出版，一批没有侨居国外的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逐渐加入了布

---

① 见前引 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 185 页。

② 诉讼记录，同上书第 186 页曾引用过。

尔什维克党。因此，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地就成了“唯一的党”。

原先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立起来的政治关系中给“民主”党派以一定地位的尝试失败了。这个失败主要是由于这些采用阴谋颠覆手段意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的痴心妄想所造成的；这些政党本身也拒绝加入到新的政治关系中去。这种态度肯定地会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错误而保持下去，布尔什维克党经常是宁可使用镇压机器而不愿把重点放到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去的。

二十年代初期苏维埃政权所遇到的重大困难——这些困难造成了一个显然无出路的形势——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使得小资产阶级的组织产生了一个将有可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妄想，这个妄想导致了它们宁可选择走颠覆的道路也不走纳入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道路。这些党首先受到了这种做法的后果，它们受到镇压而最终消失。但是这种消失对苏维埃制度的作用和对布尔什维克党都未起到有利的影响。如果这些党存在的话，布尔什维克党就需要进行思想斗争，就需要答复它们的批评，这样，就会有助于革命的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

### 第三节 苏维埃各机关作用的变化

中央政府机关之间关系的变化，使选举出来的议会即苏维埃只具有形式上的作用。同样，在省、县、市一级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也产生了这种变化。

在这里，情况也是一样，实际权力由代表大会转到执行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的权力事实上的一部分转到布尔什维克党（但我们将看到，这还往往是形式上的），而另一部分实际上已转到常设的行政机构手里。

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一过程具有多么客观的性质，随之而来的改变不是人们“自愿”的，而是自行产生的。这种情况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就存在了。因此，从1917年4月起，人们看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变成一个运转灵活的行政机构。几百个职员，一般是书记，都在他们的岗位上努力工作……苏维埃政府摆脱了代表们认为要对政府

实行的监督”<sup>①</sup>。

十月革命后，这个过程延续下去，各级（地方和省）行政机关和苏维埃代表们之间的关系已有所改变，甚至人民群众对他们代表的活动所给予的关心事实上也起了变化。这个过程造成了行政机构臃肿，并逐渐落到老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些旧官僚）手中，目的是向无产阶级政权闹自治。

列宁在 1920 年证实这种情况时说道：

“每个乡政权都是代表，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它必须记住，我们拥有庞大的国家机构，但这个机构工作得还不好，因为我们不会和不能够很好地掌握它。……”

“苏维埃政权管辖几十万苏维埃机关职员，他们或者是资产者，或者是半资产者，或者由于受到压制而根本不相信我们的苏维埃政权……”<sup>②</sup>。

地方和县苏维埃的权力由于另一种变化而受到更深刻的影响，这个变化就是：权力大量集中到

---

① 参阅前引 O. 安魏勒著作《俄国的苏维埃》，第 133—134 页。

② 参阅 1920 年 6 月 12 日列宁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70 页起，引文见第 180—181 页（中文版，第 31 卷第 155—156 页）。

各个中央政府机关。这个集中首先是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以后在更长的时期内，由于地方政治干部的软弱，经常激起来自那些一直不安于从属中央机构的地位的“下级”苏维埃机构的反抗。

剥夺地方苏维埃的实权把它交给中央政府机关，甚至交给一个中央行政机关，这对于劳动者关心基层苏维埃机关来说起到了一个消极的作用。因此，苏维埃不是一个通过群众来管理的政府机关，列宁在1919年3月证实这种情况时写道：

“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sup>①</sup>

1921年4月人民委员会的一项法令要求增加妇女、女工和农妇参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各个部门，临时或长期地担任一些行政工作。这项法令丝毫没有改变群众对于作用非常有限的苏维埃机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载《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2页(中文版，第29卷第156页)。

关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具体的管理权已集中到事实上苏维埃已不能对它行使任何有效监督的常设官僚机关手里去了。

因此，1918至1921年间，发生了苏维埃机关衰退的过程。这些机关给予劳动者表达他们的批评和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国家行政机关则有一个自治化和日渐脱离群众的过程。这个机关所起的作用产生了与布尔什维克党不同的后果，布尔什维克党对国家机关也很难行使监督和政治指导。

#### 第四节 国家行政机关对于党和政府的自治

在中央一级，党对政府的领导作用从1917年10月16日<sup>①</sup>起，通过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的成立和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此时所起的作用而体现出来。这种领导作用是一项原则，但是要使布尔什维克党实际掌握对国家的具体领导，仅仅宣布这项作用是不够的。其实，在苏维

---

<sup>①</sup> 应为10月26日。——译者

埃政权开始的一段时间内，行政机构的具体活动有一大部分是避开了党和政府的领导的。不仅在遥远的农村，而且在城市，包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也是如此。

因此，雅克·萨杜尔指出，从1918年起，由忠诚的党员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被资产阶级出身的行政官员所包围，这些官员是“一些钻营者，专谋私利的人，他们除了想很快装满自己的口袋外没有别的明确的念头”。他接着说这些人“巧妙地发展了在沙皇时代就已盛行的贿赂制度”，因此贪污之风在某些党组织内发展起来。雅克·萨杜尔特别指出，老资产阶级分子的财物按理说是冻结的，但只要贿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钱，老资产阶级分子就可以从银箱里拿回他所要的全部有价证券和金钱。<sup>①</sup>

中央政府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在改变，就象人们所看见的那样，最高当局发布的命令和行政机关的实际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参阅雅克·萨杜尔：《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札记》，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1年，第217页。



行动是经常不同的。

从1918年3月起，为了把中央政府的监督扩大到所有的行政机关，曾经作了一番尝试。为此建立了国家监察部。但无实际效果，因此，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苏维埃共和国的监督工作应该加以彻底的改组，以便建立真正的、实际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监督”。实现这个监督的领导作用应归于“党组织和工会”<sup>①</sup>。

在这个决定通过以后，一个新的国家监察部于1919年4月9日成立了。这个部由斯大林领导，斯大林同时还担任另外两个新成立的机构——政治局和组织局<sup>②</sup>——的领导工作。

其实，国家监察部对这一局面并未作重大的改变。1920年2月7日的一项法令致力于重新改进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把国家监察部改为同样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察院”。这个机构应当和人民群众发展新型关系。法令规定今后应由工农

---

<sup>①</sup> 参阅《联共（布）党》，第1卷第306页，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28页（《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1分册第570页）。

<sup>②</sup> 见本卷第422页。

“同苏维埃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与贪污盗窃作斗争”，这些工农是由选举苏维埃代表的议会选举出来的。从理论上说，这关系到组织一个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群众监督。1920年4月，所有工会也都参加了工农检查院的活动。事实上，在苏维埃机关活动收缩的情况下，工农检查院被指责为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机关，列宁在它成立几年后说：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也没有什么要求可提。”<sup>①</sup>

## 第五节 红军的发展

随着十月革命而来的是沙皇的旧的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旧军事机器的彻底崩溃。1918年3月2日正式公布的关于旧军队各级人员复员的命令，事实上证明了人民武装的巨大胜利：剥削阶级使用的镇压机器被粉碎了。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504页（中文版，第33卷第444页）。

然而，由于在分析整个过程中已提出的许多原因以及本卷在后面即将分析的一些原因，致使十月革命未能导致建立一支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并以崭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为特征的军队，因而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变革以及反对资产阶级势力重新抬头的斗争工具。

### (一) 建立红军

红军不是工农大小部队合并的产物，这种武装力量早就存在，它们以赤卫队为核心<sup>①</sup>，是在十月革命前直接从斗争中产生出来的。然而，这支武装兵力太少，以致苏维埃政权不能仅仅依靠他们来提供巨大的军事力量。赤卫队和其他的革命队伍只是苏维埃军队的一小部分。这个军队必须从“最高级”起迅速建设。

从旧陆军部机关改造成的作战和红军人民委员部在军队的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人民委员部在清除了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和被置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之后，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要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47·148 页。

授与它“集中、组织由于拥有大量特点而仍然强大的旧的、被解散的、失灵的庞大军事机器，使它适合于我们现在要建设的军队”<sup>①</sup>的任务。

托洛茨基的这段话清楚地指明了红军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旧军事机器”的继续。因而，红军保留的“特点”是由一部分沙皇旧军队的纪律、等级关系等等构成的。

这支军队的领导，部分是由士兵出身的革命军官担任的，但也包括许多沙皇军队的旧军官。这些人中的某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而“赞成”苏维埃政权，另一些人是由苏维埃国家决定收编的<sup>②</sup>；所有这些人都会被任命。

给予旧军官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技术要求”相一致的，而更重要的是给予“军事上的权力”，据推测“军事上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旧军官手中。类似技术“超阶级”的思想在这里起作用；托洛茨基多次谈到过这种思想。

---

<sup>①</sup> 参阅关于“红军”的讲话，载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巴黎，埃尔纳出版社，1967年，全书共999页，引文见第130页。

<sup>②</sup> 关于这一点，参阅托洛茨基的《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军事著作》，第1卷第178页。

这样，1918年3月28日，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市俄共（布）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宣称“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教授、旧军官都象没有生命的机器一样，是国家的一笔资本<sup>①</sup>，如果我们想解决所遇到的主要问题的话，就有责任去经营和利用这笔资本的”<sup>②</sup>。

这种观念是与无产阶级不会有自己的一套战斗和作战方式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在托洛茨基看来，军事策略好象不是由组织军事行动的政权的阶级性所决定，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他断言：“在技术和文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指俄国的水平〕，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和比资本主义高利贷者中最文明的军队所达到的更为完善的策略，〔是不可能的〕。”<sup>③</sup>

托洛茨基同时对领导阶级的阶级性和在这个

---

① 我们注意到，“资本”这个名词是指它习惯上的意义（即积累，如知识的积累），这样便掩盖了它真正的现实意义，即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而这些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专家”所特有的。

② 参阅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军事著作》，第1卷，第57页。

③ 列甫·托洛茨基1922年5月21日文章《红军的道路》，引自《怎么办？》杂志，1970年，第3--4期第8页。

阶级领导下的军队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机械的叙述。他是这样叙述的(在前引的文章里):

“军队以及它的指挥集团的组成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行政机构和管理部门则取决于由领导阶级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国家结构。”<sup>①</sup>

这不是辩证地提问题的方法,而是先验地排除了执政阶级同它自己的国家、行政、军事或其他机构之间矛盾的发展。

新军事机构,由于给旧军官们,特别是给来自旧军队里的那些军官们的后代以地位,由于旧的军事学校在培养新干部方面仍起作用,由于把刚解散不久的军队里的许多准则保存下来,而显得非常突出。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技术主义”思想在起着作用,根据这个思想,有可能存在一个由现有技术强加于军队的“组织形式”。托洛茨基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

“我们需要一支在军事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锐的军队。因此军事专家积极地和有组织地参加我们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人们应该保证这些军事专

---

<sup>①</sup> 列甫·托洛茨基 1922 年 5 月 21 日文章《红军的道路》,引自《怎么办?》杂志,1970 年,第 3—4 期第 4 页。

家为建军工作充分提供他们的力量的可能性。”<sup>①</sup>

由于建立苏维埃政权时缺乏过去的真正有用的实际军事经验,因而军队的和军事策略的“技术主义”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占优势的观念——对建设一支新型的军队起了阻碍作用。相反,这种思想却助长了在红军内部建立和巩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等级关系,这个建立和巩固的过程,由于国家机关从1918年春天开始普遍开展了自治化的过程,而发展得更快了。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里,这个思想和不相信群众的思想结合起来了。例如在谈到人民群众的过去时,托洛茨基说他们只是“一群象蝗虫一样生活和死亡的稠密的人群”<sup>②</sup>,在谈到人民群众的现在时,说他们是按“最基本的天性”住在一起,以致于“每个人……都试图把他所能弄到手的東西都占为己有,他只想到自己,而正在忘记他是民众阶级中的一分子”<sup>③</sup>。

由红军保持下来的旧的等级关系(形式多少

---

① 见前引列甫·托洛茨基《军事著作》,第1卷第165—166页。

② 同上书,第59页。

③ 同上。

有些改变)，不仅强加在参加红军的革命干部身上，同样也强加在从苏维埃军校毕业后被提升的人身上。年轻的军官被提升后，实际上就处于某种等级关系中，他们享受物质方面的特权，并学会了只相信自己的技术知识而不相信武装了的劳动群众。

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这支军队的监督来说，显然是存在不少严重问题的。士兵对军官的监督事实上不可能，特别是由于通过征兵制征来的大批受布尔什维克党影响较小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监督的任务就落到由苏维埃政权任命的政治委员身上。这些政治委员是根据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忠诚表现挑选出来的，而军官的任命则首先根据他们的“技术能力”。政治委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部队不要被军官们用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相反，原则上政治委员是不参预军事活动的。这种军事活动（除了最重大的战略问题之外）被认为主要是“技术性”问题，于是军官们可以高兴怎样领导就怎样领导。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说：

“那些纯粹是军事的作战的问题，特别是与战斗



直接有关的问题,由各部门军事专家说了算……”<sup>①</sup>

## (二)地方民兵问题

1918年夏天,苏维埃政权曾决定建立一支“后方民兵”(1918年7月20日法令)。但是,由于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建设红军上面,也由于偶然未给一直疯狂仇视无产阶级政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军事经费后所引起的麻烦,阻碍了民兵的真正发展。由于民兵不足,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19年,后方对人数越来越多的敌人骑兵的袭击没有作好准备,必须马上建立一个地方民兵体系。地方民兵建立了,至少在某些地区胜利地建立起来了。这个胜利证明有可能进行不同于红军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形式,这样的做法将可以很好地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服务。托洛茨基不得不承认:

“马蒙托夫骑兵的长驱直入使组织地方部队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次可以说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在努力完成一个突如其来的任务时表现了相当的灵活和才

---

<sup>①</sup> 参阅《红军》(1918年4月22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载前引列·托洛茨基著作《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131页。

能；在许多地方……不仅是陆军而且还有骑兵都一点一点地‘从零开始’建立起来了。”<sup>①</sup>

在这里可以看出工农群众卓越的品质、独创的能力和“军事才能”，他们“从零开始”，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类似“突如其来的任务”的一些问题。

然而，有关“军事科学”和武装部队的结构占主导地位的概念，以及新军官们因反对一切他们控制不了的军事措施而作的抵制，造成了地方民兵制未能得到很大发展的后果。人们以怀疑的目光来看待民兵制。有些游击队也是如此——面对敌人的侵袭——托洛茨基根据“军事当局”提出的要求，一面试图限制他们的作用，一面也只好承认他们存在的必要<sup>②</sup>。

### (三)红军的胜利和它具有的人民军队的特征

红军——在上面简短地追述过的条件下建

---

<sup>①</sup> 参阅《红军》（1918年4月22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载前引列·托洛茨基著作《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77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796页。

立——取得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胜利。它依靠微不足道的物质力量，混乱和发展缓慢的工业，在只有少量给养的情况下，击败了由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白卫军。俄国士兵——不久前曾奋起反抗临时政府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表现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不可战胜的意志和非凡的英雄主义精神。没有这种意志，任何胜利都是不可能取得的。

红军从装备无限优越的军队手里取得胜利，证明十月革命深入人心。这次胜利还表明它具有双重性，既有无产阶级性质，又有民主性质。革命可以依靠一个不是按照无产阶级原则建立起来的军队来保卫，但这个军队必须实际上是在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之下，并且领导军队的党必须执行正确的总政治路线。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并没有严重动摇红军战士斗争和胜利的意志，因此这些错误应该看作是次要的。

如同 1920 年 5 月 13 日列宁在向工人和士兵的讲话中谈到的那样：

“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士兵们相信战争的正义性并且意识到有必要为了自己弟兄

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提高斗志并且肯忍受空前沉重的负担。沙皇的将军们说，我们的红军能忍受沙皇制度下的军队从来没有忍受过的痛苦。这是因为每一个手握武器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战，所以自觉地为正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流血。”<sup>①</sup>

在国内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战争同时发生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战士的革命意志能成为红军胜利的决定因素，何况这支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还没有具备无产阶级军队应该具有的那些十分重要的特征。

事实上，这个军队的内部政治关系在本质上是符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需要（这个革命是农民为了得到土地和反对地主而进行的斗争）。这些关系有助于对付俄国革命在当时阶段的主要任务。然而，按照它的组织情况，红军还不是一个适合于革命以后阶段的工具。它不是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它是一支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军队。因此它完全不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成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7页（中文版，第31卷第117页）。

立时的情况。事实上，后者是直接由中国共产党从基层出发，通过把已在党领导下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中最有战斗性的人合并成军队的形式而建立的。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成立那天起，就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思想的领导之下，它的军官则处于由政治委员协助的士兵的监督之下。

关于苏维埃红军，主要应当指出以下两点：

这是一支实行集中制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这样），而不是一个民兵的集合体。这种类型的军队为形成一种大规模的具有灵活性和统一性、对帝国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军队作斗争的武装力量，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种要求，在苏联和在中国都建立了一支真正的军队。<sup>①</sup>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维埃红军的从属关系，在当初（为了许多原因，特别是由于招募军官的条件）更多地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

---

<sup>①</sup> 在中国，红色政权的问题一提出，就认识到建立一支军队的必要性。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写的那样：“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赤卫队是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贝特兰]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1928年10月5日文章。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9页，中文版，横排本，1966年第50页。）

治领导而不是属于它的思想领导。这个政治领导主要是由和苏维埃军队军官在一起的政治委员来担负的。

无产阶级对苏维埃红军的思想领导不强，是建立军队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造成的。这个缺点主要还在于红军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思想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因此“形式上的礼节”还占有重要的地位，士兵和军官的生活条件（住房、伙食等）还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别。

红军内部的政治关系不是无产阶级关系占统治地位，和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托洛茨基倡议的、主要由退伍军人组成但随时可以重新应征入伍的一支“劳动大军”。这一倡议说明参加生产劳动不是苏维埃军队正常的任务之一，这个倡议也表明它害怕看见旧日的士兵“溃散”，害怕看见他们“流浪”和害怕在可能重新需要他们来担负军事任务的时候不能把他们重新编入队伍，这就肯定了这个军队的纪律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管理方式上而不是靠无产阶级思想去统帅的。

如果说红军的组成基本上和国家行政机关有

着同样的特点，那末，它却还有紧密服从于政治权力机构的显著特点。由于红军的任务十分重要，它必须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保证苏维埃政权长期存在，因此，设置政治委员作为加强政治上从属关系的工具之一是绝对必要的。这个任务就要求布尔什维克党把注意力放在红军身上，这种注意力和在同时期用于苏维埃行政机关的注意力有所不同。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甚至在以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仍然特别警惕地注意着军事机关内部发生的一切。党把大部分最优秀的政治力量都放在军事机关里。然而，这种特别的警惕和注意仍不能改变苏维埃军事机关中所特有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关系。因此，苏维埃红军未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机构；相反，在总的过程中，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却逐渐地加强了。

“战时共产主义”之后，红军的最主要的一个贡献是为国家行政机关和经济机关提供了强有力的、老练的行政人员；他们在努力提高只有传统的严格纪律才能够达到的“效率”，但这个纪律和

无产阶级的纪律完全是两回事。

## 第六节 契卡的成立与发展

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就是它能够打破资产阶级和沙皇的镇压机器。旧军队、旧警察机构也同样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被砸碎了。旧的司法机构也是同样的命运(被1918年11月24日的法令正式废除)<sup>①</sup>；这个机构的职责由人民群众的直接代表,即革命法庭来承担。

在革命过程发展的具体条件下,苏维埃政权很快地就建立了一个治安和镇压反革命的机构。这个机构由革命委员会直接产生,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叫做“特设委员会”或契卡(俄文名称)。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2月7日下令解散军事革命委员会,但保留了契卡。1918年3月,当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时,契卡也跟着迁

---

<sup>①</sup>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科莱特·伯戈·弗朗科特:《苏维埃检察机关》,载《东方国家研究中心评论》布鲁塞尔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2期,第52—53页。



到那里，搬到卢比扬卡广场。契卡的重要性在国内战争期间增加了。

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为了它的存在而进行斗争，而契卡则是它用来向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个工具。1918年下半年，当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活动越来越为反革命的利益服务时，就决定使用契卡来监视它们的组织<sup>①</sup>。

在1918年秋天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9月19日正式决定授予契卡不向革命法庭报告就可以进行逮捕和处决的权力，这就把过去所做的一切合法化了。正如契卡领导人之一彼得写的那样：

“在行动中，契卡完全独立地进行搜查、逮捕和枪决，只在事后才向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机构报告。”<sup>②</sup>

1918年底和1919年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生存斗争而明确采取“革命恐怖”手段的时期，这是按照1793年救国委员会的“恐怖手段”进行

---

① 见本卷第375页。

② 引自皮埃尔·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第124页。

的<sup>①</sup>。而契卡就是负责执行这种革命恐怖的机构。这个机构，由于它有权利消灭一切反对它的人，又由于它是秘密活动的，所以特别有可能使它的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事实上，从1919年起，它已超越了对它的活动在原则上所规定的限制，它不仅打击反革命活动，甚至也打击表示稍微不满的人；特别是把镇压范围扩大到了反对征税过重的中农。契卡的某些行动——特别是因为它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其干涉的方法与日俱增——因此和布尔什维克党最高机关确定的政治路线发生了矛盾。

1919年3月，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醒党和镇压机关注意不要对中农实行强制。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

① 苏维埃政权使用的恐怖手段经常被“解释”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参照1789至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经验。然而，这种参照只是由于俄国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民主革命过程相结合的特别形式，以及后者比前者占据的重要地位（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思想领导的作用不强）才能起着实际的作用。国家的中央集权制以及通过专门机关执行的强制办法在俄国革命中所占据的地位可以用上面的原因来说明。这种两个革命过程结合的特别形式没有出现在中国革命中；在中国革命中，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思想在农村中起着领导作用。

“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用到中农身上，那就不仅是最粗暴地违反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及其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暴地违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指出：在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坚决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和中农成立协议……”<sup>①</sup>

这个决议和 1918 年底召开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决议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决议都不能把契卡的活动限制在苏维埃政权想给它指定的范围内。

契卡因此很快就处于相对的独立状态，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一样，这个决议规定契卡必须从逮捕之日起两周内释放所有被它逮捕的人，除非能对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提出确切的控告<sup>②</sup>。同样，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实际上很少得到重视，按照这个决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地方执行委员会有权监督契卡的活动；这个决议同样提醒“所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18 页（中文版，第 29 卷第 188 页）。

② 参阅前引 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 173 页。

有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这个决议给全体公民对于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以控告的权力。

然而，1919年是反革命猖狂进攻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给了契卡一些新的权力，这就使得对契卡的活动进行严格控制的决定成为无效。

1919年4月15日，契卡的权力加强了，目的是为了镇压抢劫和违反苏维埃纪律的行动。为此，成立了一些“劳改营”，把被革命法庭、地方苏维埃或契卡判罪的人送进去。契卡在各省的机构负责建立这些劳改营的，让犯人为苏维埃机关进行劳动。有一些单独的劳改营是关押小孩和未成年人的<sup>①</sup>。

1919年10月21日，另外一项法令决定成立一个由契卡直接领导的“特别革命法庭”。这个法庭应对盗窃分子和投机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在当时，不管是谁，只要是从农村向城市带一点点粮食都被认为是搞投机活动。

---

<sup>①</sup> 参阅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12—213页。

1920年初，“特别法庭”取消了，但到了11月，契卡的地方组织被授予和革命法庭同等的权力，包括有权就地执行，这些判决只需向司法人民委员部报告一下就行了<sup>①</sup>。

总的说来，自1917至1921年，契卡的活动逐渐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个“维持秩序”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干预，向盗窃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在农村进行不同程度的搜查，或者叫人遵守劳动纪律。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同时用来对公开进行反革命的人和参与反革命行为的党员进行斗争。

在这几年内，契卡很少干涉布尔什维克党内生活。然而在某些场合（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的最后阶段和尤其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准备时期以及代表大会后不久），这种干涉非常厉害，以致引起党员的反对。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1921年12月23日至28日），布尔什维克的一位发言人要求彻底改组契卡的各个机构，

---

<sup>①</sup> 有关这些问题，参阅《俄罗斯联邦工农政府决议和命令汇编》（俄文版），莫斯科，司法人民委员部，1919年，第504页和1920年，第22--23页及第115页和第454页。

“限制它们的权力和加强革命法制的原则”。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包括这些措词的决议。<sup>①</sup>

以后，1922年2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命令，解散契卡和它的地方委员会。这项命令把契卡的职权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并在这个部中建立了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俄文缩写音译为GPU），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督下行使原来契卡的职权。在原则上，省、自治共和国和地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政治分局都对苏维埃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这一措施是为了保证苏维埃当局对治安机构的活动更好地进行监督。同时把“军队的特种部队”归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特种部队的任务之一是“打击军队中和铁路上的犯罪行为”。

在理论上，国家政治保卫局比契卡实际享有的行动自由更受限制，拘留不得超过两个月，过此期限，所有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拘留的人应被释放或移送司法机关，除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相反的决定时另作处理。这些限制条文没有得到执行，至于“政治罪行”的案件，则继续完全不受司法

---

<sup>①</sup> 参阅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莫斯科，1922年，第254页，前引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183页曾引用过。

机关的管辖，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这方面独揽了比原来契卡更为广泛、更加专横的权力（而原来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是为了限制这个警察机构的权力）。其实，从1923年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之后，国家政治保卫局再次摆脱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即使是形式上的监督<sup>①</sup>。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必须提一下：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先是契卡后来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直接正式参加了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活动。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机构和自己的档案（来源不受检查）的镇压机关就扩大了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的干预。国家政治保卫局活动之一就是在党内越来越多地进行干涉、调查和追踪党的“分裂分子”<sup>②</sup>。

国家政治保卫局活动的扩大以及它的决定的专横的特点，给言论自由和发挥首创精神的自由造成了不利的气氛。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

---

<sup>①</sup> 参阅前引 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 183 — 184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215 页。

上(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这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亲自谴责了国家政治保卫局过分扩大它的活动,但并没有阻止住这个机关继续加强其活动的过程,它的活动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活动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了。大家知道,列宁在他逝世前不久曾说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了。

最后,在1921年——这种倾向在以后的几年里更加清楚——镇压机关的地位和干涉范围之广,造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列宁打算在1917年和1918年初所要达到的局面。



## 第二章

### 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机关 布尔什维克党的演变

1917年10月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实质上是一个要在群众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革命的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组织劳动者,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矛盾,根据群众的思想情况,总结他们的经验,将阶级斗争引向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人数不多、主要是由久经考验并且随时准备作出最大牺牲的党员所组成的党。<sup>①</sup>

十月革命以后,该党除了要完成原来的任务之外,还要迎接新的任务。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必须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加各级权力机关,包括由选举产生的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经

<sup>①</sup> 见本卷第152页。

济、军事以及行政指标，并协助这些机关完成任务。由于它的许多新职务和它在权力机关中所处的地位，必须增添工作人员。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涌现出大批新党员（1917年党员人数是二万四千，到1920年3月人数增加到将近六十一万二千）<sup>①</sup>。有些人无疑是出于为革命服务的愿望，另一些人则认为党证能有助于满足他们的野心。这样一些党员大量涌进党内的危险到1920年底已成为现实了。1922年，虽然经过清洗，列宁还认为党员人数过多，挑选不当。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在战争及内战年代，苏联的无产阶级伤亡惨重；另外，它的队伍也因失业的关系缩小了），三四十万党员，从数字上来说，仍旧“过大”<sup>②</sup>。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在这几年中发生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不是主要因为投机分子和野心家的涌入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党的机关和无产阶级性较差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这些机关和红军中以及契卡中发展起来

---

① 见本卷第2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8页（中文版，第33卷第224页）。

的那种工作作风对党的工作，对各级党的关系以及党与群众的关系都产生了影响。

## 第一节 布尔什维克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正如列宁所说的，执政党的领导作用，要求“党的‘上层’”和其他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上层在一定程度上“融成一体”。<sup>①</sup>

不过，这种融合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领导集团”的融合可能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产物，这种工作造就了有能力在各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从而巩固党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领导作用；但是这种“融合”也可能是指派工作积极的、不过与当地群众联系较少的党员去担任领导工作的结果。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在许多地区往往具备产生第二种类型的“融合”的条件。

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在农村、中小城市和广大地区刚刚建立组织。不过在许多地方，党还没有

---

<sup>①</sup> 参阅 1921 年 3 月 8 日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183 页（中文版，第 32 卷第 166 页）。

任何基层组织，也没有已经同群众有联系并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的党员。党的领导应该向全国各地输送来自各大工业中心的组织者和干部。由于党员太少，派往全国各地的党员必须一身兼任数职，包括行政职务在内。有些地方，往往还没有建立苏维埃机关，或者是即使有这样的机关，也不能从那里抽调信得过的人，去完成必要的行政任务。

人民委员波德贝尔斯基到全国各地去视察后写了一份报告，叙述 1919 年 7 月他在唐波夫省见到的一些情况：

“确切地说，在大部分农村里是没有苏维埃政府的（指行使地方政府职权的苏维埃）。目前，在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仅仅在理论上存在；实际上都是些富农和投机分子的代表、怀有个人企图的人或没有主张的为所欲为的人借苏维埃的名义在工作”<sup>①</sup>。

这些假苏维埃如同大多数正常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一样，“拥有”一个由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官员

---

<sup>①</sup> 摘自兹纳缅斯基：《唐波夫省苏维埃机关发展史》（俄文本），载《苏联建设集》，莫斯科，1925 年，第 1 卷第 266 页，引自奥·纳尔基耶维茨：《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形成》第 64—65 页。

所组成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员都是些腐败的、形式主义的或对工作漠不关心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可能从中央机关或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少数党员不得不负起更多的责任来。他们必须在无法依靠与当地群众有联系的党组织的情况下工作：在许多地方，这样的组织根本不存在，或者还仅处于萌芽状态。在任务紧急的情况下，只得在萌芽状态的党组织变成真正的党组织之前，在真正的苏维埃建立以前行动起来。

这种情况必然对党本身的工作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在大多数城市和地区，这种情况在当地导致兼职过多，使党的基层机关（这些机关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对兼职过多的党员缺乏监督，也经常使这些党员单纯埋头于业务，影响了政治思想工作，即群众工作。

第八次党代表大会（1919年召开）的某些代表确切地阐述了当时的情况。例如，他们指出，在省里，党委会主席经常就是苏维埃主席、契卡主席、革命法庭庭长以及其他机构的主席。代表们指出，这种一身兼数职的混乱现象加强了执行委员会代替苏维埃的倾向（如果苏维埃存在的话），

也加强了党的委员会代替党组织的倾向。<sup>①</sup>

换句话说，党的机关有同行政机关合并的趋势（其特点如上述），同时，它还有“代替党组织”，就是说，代替党组织行使职权，并不受党的基层组织监督的趋势（党的基层组织在许多地方徒有其名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党有受到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行政机关的控制的趋势，而不是党去实际领导它。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用“驾驶者”（即处于国家领导地位的执政党）这一譬喻所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

“国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虽然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驾驶者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sup>②</sup>。

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些“别人”就是资本家、投机分子，就是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企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保持“自治”的行政机关。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84页（中文版，第33卷第245页）。

上述引文的后面部分表明,列宁清楚地看到,几年来的演变可能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实际上,列宁在提出“驾驶者”的譬喻以后不久,就对自己提出苏维埃政权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并且在分析关于在乌斯特里雅洛夫<sup>①</sup>周围的俄国的流亡者的新策略时,毫不犹豫地宣布,苏维埃政权经受的危险之一就是最后要走“向通常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sup>②</sup>。

当时列宁是这样描述党和国家机关之间建立的那种关系(1922年的情况)的:

“……如果拿莫斯科的4700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这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在领导谁呢?……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共产党员。——贝特兰〕在领导,

---

<sup>①</sup> 乌斯特里雅洛夫是一个侨居在国外的老立宪民主党人。逃往布拉格的乌斯特里雅洛夫同其他的人——其中有前任“政府部长”、高尔察克组织的白卫军——在一起,出版了一本题为《路标转换》文集,他在文集里赞成他的人员渗入苏维埃政权机关;他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正是在这个集团建立时开始的),向资本主义演变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布尔什维克……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引用了这一段话,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2页(中文版,第33卷第252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2页(中文版,第33卷第253页)。

而是他们被领导。”<sup>①</sup>

谈到这一点时，列宁还重复说：

“共产党员担任机关领导的时候，往往被人愚弄，因为怠工者有时故意拿他们当招牌。……”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国共产党的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是否了解他们不会作管理工作呢？是否了解他们以为自己在领导，其实是被领导呢？”<sup>②</sup>

这时，列宁把占据着国家统治地位而实际上未能领导国家的布尔什维克党比诸一个民族表面上征服了另一民族，然而久而久之，虽仍继续占领被征服者的领土，但实际上受被征服者的控制（因为被征服者的“文化高……，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sup>③</sup>）。

列宁在这里谈到的“控制”不是别的，就是指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3—294页（中文版，第33卷第254页）。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sup>②</sup> 同上书，第294页（中文版，第255页）。

<sup>③</sup> 同上（中文版，第254页）。



资产阶级对党实行统治，特别是那些已经渗入到国家机关里的资产阶级对党实行统治，而这些国家机关恰恰是党在前述情况下想与之“融合”的。这种“控制”只会使布尔什维克党走向反面，从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

在 1922 年，这还仅仅是一种遥远的威胁，但列宁能把它揭示出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值得指出的是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一年左右，布哈林又一次提出和发展了列宁的意见，并用值得注意的词句醒目地描述了以后发生的情况。

布哈林描述这一问题的文章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sup>①</sup>。布哈林是以列宁的观点为出发点的。列宁认为，“主要的真正的危险”<sup>②</sup>不是直接的进攻，而是在国家和党的机关中推翻阶级的统治，从而导致资产阶级统治的全面复辟。同列宁一样，布哈林也提到过乌斯特里雅洛夫及其同党

---

① 这里指的是 1923 年春天在彼得格勒作的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译成德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俄国通讯小丛书，第 82—83 期，汉堡，C. 霍因—纳克福尔格·L. 肯布莱出版社出版，第 82 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292 页（中文版，第 33 卷第 253 页）。

路标转换派<sup>①</sup>。这些人以后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其名称也为《路标转换》）的主题之一是建议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俄国革命。实际上他们希望从此以后革命会走上“热月的道路”。他们的杂志颂扬那些留在苏维埃俄国，并加入党或为政府服务的知识分子。

布哈林非常正确地预见到，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自以为掌握了“知识的垄断权”，并在“知识垄断”的外衣下，有悄悄地在苏维埃俄国进行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的可能性。他指出，路标转换派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朋友”，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完成的一项历史任务，是为新资产阶级得以充分利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任务。对路标转换派来说，十月革命的丰功伟绩在于唤起并动员了“腐朽的沙皇旧制度的最勇敢最无情的敌人；这些人粉碎了知识分子阶层中只知道谈上帝和鬼怪的堕落了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把人民的各个阶层发动起来了”；因此，“他们开辟了一条创造一个新的资产阶

---

<sup>①</sup> “路标转换派”的名称来自《路标转换》，见本卷第411页注1；亦见E. H. 卡尔：《一国的社会主义（1924—1926年）》，第1卷第56页起。

级的道路”。这一资产阶级在经过许多考验以后，“锻炼了意志及性格，而现在正登上历史舞台……比以前更为朝气蓬勃，更为年轻，更有毅力，更‘美国化’。”

新资产阶级的这种“朝气蓬勃”，这种“毅力”显然只存在于路标转换派的想像中；相反，路标转换派幻想新的资产阶级从内部颠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可能性，却正符合目前人们所知道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两条路线和两条发展道路之间的一种斗争形式。

布哈林在揭露路标转换派所走的道路时指出，资产阶级以一种极为特殊的形式“支持”苏维埃政权，“一点一点地渗入其机关的毛孔”，将他们的人派进去，缓慢地但是坚持不懈地改变着苏维埃国家的面貌。布哈林在描述了当时的过程——这一点列宁在一年以前就已担心了，当时他说，往往不是共产党人而是资产阶级在实际领导——以后说，如果这个过程还未结束的话：

“我们将处于……这种状况，我们所有的宣言、旗帜、国际歌、政府的苏维埃形式都将变成表面现象，而这一切的实质内容却已发生了变化：这内容……将符

合这个新的资产阶级阶层的期待、愿望、希望、利益。这个阶层一直在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强大，它将通过机构的缓慢的变化途径来达到全面改变苏维埃国家的面貌，并逐步地将苏维埃国家纳入纯粹资本主义政策的轨道……由于俄国革命，靠沙皇政府布施而生存的腐朽的、老的资产阶级……就会被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所代替……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在任何事物面前都毫不退缩，它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为自己开辟道路，但躲在国际主义的词藻和旗帜下朝着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和一个强大的新资产阶级前进。”<sup>①</sup>

布哈林从他的分析中得出这样一个总的结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革命、无产阶级国家和党的内部蜕化的威胁”<sup>②</sup>，他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进行一次“文化革命”<sup>③</sup>。

这里，布哈林又提到列宁所举的“野蛮的”民族征服“有文化的”民族的例子。列宁之所以举这

---

① 引自前引布哈林著作第6—10页。

② 同上书，第48页。

③ 同上书，第49页。

一例子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在不断采用被推翻阶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时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布哈林接着说：

“工人阶级能够机械地使其敌人屈服……，它能从物质上占领所存在的东西，但同时也可能为敌人的文化力量所吞没……这种危险必然会威胁夺取国家政权的整个工人阶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由新的技术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新资产阶级所组成的一个新的阶级……因为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和完全离开了无产阶级的基础，变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sup>①</sup>

布哈林揭发那种关于干部的无产阶级出身足以保证防止他们向新的资产阶级演变的幻想。他说，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取得了垄断地位并演变成一个新的阶级时就会脱离劳动群众。<sup>②</sup>

这个关于资产阶级重新夺取政权的过程的一般特点，即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一般的、带普遍性的特点的意见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同样，

---

① 引自前引布哈林著作第 62—63 页。

② 同上书，第 64 页。

布哈林所发展了的（在娜·克鲁普斯卡娅早先的指示以后）关于只有“文化革命”才能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尽管布哈林在谈到进行这样一次文化革命的条件和形式时，只提出了一些非常不确切的提法。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内战时期开始并在以后继续在苏维埃政权内部进行的颠覆过程具有普遍性，因而也具有普遍的教训。那末，这个过程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与布哈林所预料的相反——确实在几年后，当新经济政策被放弃，和布尔什维克党走上集体化及五年计划的道路时，就被全部推翻了。

##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关系的演变

在内战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关系是在逐渐演变。这种演变至少部分地是同执政党在以后肩负的新的迫切任务有关，这种演变的原因更在于布尔什维克党要在特定条件下去完成任务：党必须应付突如其来的重大而又复杂的经济和军事问题，但是党需要通过基本上还不是无产

阶级的国家行政机关去发挥作用，而且它同农民群众的关系很不密切也不是互相信任的。

为了了解十月革命以后产生的演变的程度，人们应该回忆一下，布尔什维克派，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多少年来都过着紧张的政治生活，其中也有重大问题的争论，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也是如此。党的领导遇到复杂的或新的问题时，一般的只是就问题的性质进行深刻的、细致的、尽可能公开的辩论以后，才作出决定。<sup>①</sup> 辩论不仅是非常公开的，而且持有不同于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的党员可以直接向全党提出。他们可以或者在党的机关报上，或者在适当的定期刊物或不定期刊物上发表他们的意见。<sup>②</sup>

至于指导这些思想和政治方面的争论和斗争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后所明确提出的：团结——斗争——团结；按照这些原则，那些与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持不同结论的党员，就不

---

<sup>①</sup> 在本卷的第四部分，我们将谈到这些辩论和斗争的内容。

<sup>②</sup> 例如，在1918年最初几个月，“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行了他们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报》。

是“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sup>①</sup>的对象；党希望参加讨论的人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理论的探讨，从而真正能够认真地解决问题。

对某些问题的辩论，即使积极参加的人数是有限的，也绝不是通过行政或规章制度的途径而强加于人，总之，党的基层经常不得不表态，这说明讨论是与党员群众有关的。但自 1918 年年中开始，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 （一）党的基层组织同各上级机关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最早的变化是在镇压白军叛乱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出现的。大多数领导人分散在各地也促进了这些变化。这些领导人的时间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一些确定的、紧急的、必须马上决定的（特别在军事方面）重要任务。

在 1918 年的最后几个月，党的领导机关本身

---

<sup>①</sup> 这是毛泽东在说明用谩骂和恐吓进行“思想斗争”的形式时所用的词汇。关于这一点，参阅《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载《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31—65 页（中文版，横排本，1966 年，第 769—803 页）。



也不得不经常在未同党的基层组织商量的情况下就作出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由于政治领导机关实际上并不拥有一个同基层组织有经常联系的中央机构,党的集体作用就更有限了。1919年初,中央委员会参与决策的人实际上已减少到在中央委员会书记斯维尔德洛夫周围的十五人左右。

自1918年6月至1919年初,领导机关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开会;几乎所有的决定都是通过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与各部门的领导人之间的直接联系而作出的。

在这时期,党同国家机关合并的倾向极为严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甚至借口党已和国家机关合并而建议(并没有掀起反对的浪潮)取消党。奥新斯基也提出同样性质的具体建议:例如合并中央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这些建议未被采纳。<sup>①</sup>

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召开)标志着重要的转折。它提出重新建党,并使党成为更能保证领导作用的组织。从此以后,中央委员

---

<sup>①</sup> 除了苏维埃立陶宛的特殊情况以外(关于这一点,参阅前引皮埃尔·布鲁埃著作《布尔什维克党》,第129页)。

会应该每个月至少开两次会，在休会期间，应由一个新的机构，即政治局来作决定。在这以前，类似政治局的机构只是在为了准备十月起义而完全是临时性的。

第一届非临时性的政治局是在 1919 年 3 月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成立的。政治局有五个常委（列宁、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和三个候补委员（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里宁）。政治局很快就成为党的真正的政治领导，它作出必须立即执行的重要决定。

第八次代表大会还宣布要成立一个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人们知道，这个机构（一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 1920 年改为“工农检察院”。

第八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另一项对布尔什维克党以后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即关于建立组织局的决议。该局也由五人组成（其中有斯大林）。每周应开会三次，“领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此外，还建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原则上负责执行任务。斯大林也参加这些机构，因为斯维尔德洛夫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逝世以后，

斯大林就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了。

1919年，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从理论上说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机构”。然而，这一书记处和组织局逐渐地变成了一种与党的政治领导相并行的“行政领导”了。这种变化在三年之后得到了证实。1922年4月4日设置了总书记的职位，根据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斯大林担任了这一职务。

因此，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作用及其内部关系发生迅速变化的起点。党越来越变成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它要受到与前截然不同的纪律、一种具有某种行政集中制（还仅处于萌芽状态）的纪律的约束。

1919年，在当时的情况下——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被资产阶级习惯势力所把持的国家行政机关的难以控制——，开始使人们强烈地感觉到实现行政中央集权制的倾向。

人们也可以看到党的行政机关向政治领导机关闹独立的过程，同促使国家行政机关向无产阶级专政而自治的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多少年来这种过程都在加强。随着党的中央行

政机关作用的增强，中央委员会的行政工作人员也相应地剧增。人数从1919年初的十五名左右，增加到1920年3月的一百五十人，再过一年以后达到六百零二人<sup>①</sup>。在这一行政机关中形成一些组织严密的部门。负责党的行政工作的作用最为显著的两个部门是组织指导处（负责组织和制订规章）及分配登记处（负责保管记录、注册、卡片和党员的工作安排）。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部、组和局，逐渐地进一步掌握党的干部的活动。

实际上，大多数任命都是党的书记处和分配登记处发出的，只有一部分是通过由选举产生的组织局的。因此，在1919年4月和11月之间分配登记处宣布了二千一百八十二项任命，而组织局只宣布了五百四十四项<sup>②</sup>任命。在1920年4月至1921年2月中旬之间，分配登记处宣布了四万项任命。

---

<sup>①</sup> 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报》（1919年5月至1929年10月之间定期用俄文出版），特别是1919年12月2日、1921年5月5日和1923年3月等号（引自夏皮罗：《苏联共产党》，梅休因有限公司出版，1970年，第250页）。

<sup>②</sup> 同上书，1923年1月号，前引夏皮罗的著作第253页曾引用过。

有一个时期，这些任命没有经过很好的挑选，但后来就逐渐根据中央越来越完善的档案来进行挑选了。1921年11月，分配登记处掌握了将近二万三千五百名党员干部的材料，又根据他们的特长将这些干部重新分配。几个月以后，分配登记处已经建立了将近二万六千名干部的档案，这使它了解并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1922年6月，分配登记处同组织指导处合并后成为更强大的部门，由卡冈诺维奇领导。组织指导处从此有了它自己的“指导员”组成的参谋部，负责检查党的地方组织，阅读所有的文件并且参与所有的会议，包括秘密会议。指导员们能提出任何建议来改变省委的决定，但是，省委有权向中央委员会申诉。

这样一个过程发展下去有使党的省、市、区各级会议逐步失去真正的政治权力的趋势。党的省一级会议的作用逐渐削弱，可以从开会的时间相隔越来越长表现出来。还特别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尽管党的各级代表会议还能够选举自己的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实际上是受某些关键部门的领导人所控制的，而这些人的任命是由中央行政

机关内定的。过了不久，党的各级会议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只起咨询的作用，而重要的决定都是由委员会的“常务局”（最初称“主席团”）通过的。

组织结构因而逐渐变成这样：基层组织通过的决议是次要的，重要的决议得由上级行政机关作出；所以省委书记越来越经常地由中央任命，而这些政治领导人的权力也迅速增长。省委书记不再隶属于党的代表会议和委员会；相反，正是这些组织的成员逐渐隶属于省委书记，并通过他隶属于中央的行政机关了。党的行政机关的结构本身也是照搬国家行政机关的结构；特别是在级别和薪金方面<sup>①</sup>，如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样，分成了五个等级。

在原则上，中央行政机关作用的增长，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党的干部和合理地选择一些负责人。实际上，其结果却很快就使党内行政机关（选举出来的领导机构很难监督它）加强了对整个组织，特别是对其干部的政治监督。这种监督主要

---

<sup>①</sup> 见《党的工作者手册》，第1期第57—58页；第2期第49—51页；第3期第110—112页；前引夏皮罗著作第258页曾引用过。

是通过“任命”和“调动”职务的制度来进行的，从而使党的某一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变化。“调动”职务可以孤立那些与党的行政领导具有不同意见的人。最初，这些调动基本上符合正确使用干部的实际要求或符合正确的行政批准手续。但自1921年开始，例如在与“工人反对派”的斗争中，这些措施开始成为排挤那些在地方党组织中有某种影响的反对派和压制党的干部言论自由的一种手段。

省、市、区的党组织曾多次反对这种演变。为了了解这些反对意见，1920年9月成立了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级地方监察委员会。党员如认为党的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是武断的，他们就可以向这些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向一个独立于党的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申诉的情况或多或少地一直延续到1922年，以后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为了避免监察委员会同党的行政机关之间的冲突，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sup>①</sup>，决定“统一”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实

---

<sup>①</sup> 见前引《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卷第636页（中文版，第2分册第193—194页）。

际上，这些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行政机关的一个新的部门，不但不去监督它，反而成了它手中的一个辅助工具。

党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同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也使其政治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同全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行政机关，特别是它的中央核心，成了党的领导的第二个中心：一个形式上的“行政”中心（当然，实际上也是政治中心）。它能影响党的政治领导，甚至为党的决议和这些决议执行的方式指出方向。

1921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明确地提出要警惕“官僚主义”机构的日益庞大，这种机构会使领导机关对国家和各种事态的现实发生隔膜。此后，列宁坚决主张必须精简官僚主义机构——但实际上没有执行——，不但要确保基层组织，而且还要确保无党派人士对党的工作的监督。所以列宁在《关于清党》<sup>①</sup>一文中强调指出，必须把官僚化了的分子清除出党，为此必须收集群众的意见：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页起（中文版，第33卷第20页起）。



“但是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在否定‘混进党里来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了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都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善于区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为谋生而辛勤劳动、没有任何特权也不会‘讨好上级’的人们所厌恶的共产党员。”<sup>①</sup>

## (二)党被它的行政机构“包围” 的概念

直到第十次代表大会,许多党员觉得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关系的演变是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造成的特殊情况的产物。因此,这一演变所引起的反对意见(主要是老党员提出的)也是有限的。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的决议还反映出一种思想,即党内关系中发生的这些演变是临时的,与当时形势有关的。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些促进民主关系的决议,允许基层组织更好地发表意见,但同时也通过了一些限制批评的决议,这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32页(《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4卷第562—563页)。

主要是因为受到农民日益不满的政治形势所引起的恐惧的影响。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这种不满达到了顶点。

实际上，第十次代表大会要求在党内发展更为民主的关系的决议几乎没有有效地执行；因此在1922年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行政的等级制的关系占有统治地位的现象又提出了新的异议。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写道：

“在党组织的周围就经常出现为党组织服务的庞大的机构。这种机构逐渐扩大，连它本身也蒙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而且占用了过多的人力。”<sup>①</sup>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反对一个在党的“周围”出现的“庞大的机构”，但毫无效果。党的行政机关，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隶属于书记处的中央各部、局，实际上并不理睬这个决议，因为党的行政机关当时正在竭力扩大和增加自己的干预范围。

党被它的行政机构“包围”这一概念大致上是指某种双重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导致党的中央机

---

<sup>①</sup> 见前引著作《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卷第621页（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175页）。

关单方面地统治其基层组织，另一方面是逐渐在中央机关内部转移权力，这后一方面正在加强行政机关的地位，从而削弱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政治领导机关。以后，这种权力转移的影响将在表面上消失，因为代表大会本身及其产生的政治领导机关的组成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央行政机关决定。在1922至1923年，还不到这一地步，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党的政治领导机关的权力之间还确实存在着区别。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反对的“包围”党的第一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要求保持党的政策的无产阶级性质相符合的。这是要把重要的决定权集中在有经验的革命的“老近卫军”手中，因为在当时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党内涌进了大量的新党员，其中有些人忠于革命但经验极为缺乏，另一些人则是为了要当干部或可以在国家机关中官运亨通而加入党的。

在1922年初，列宁就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分中所发生的变化，当时他说，“在这样困难的时候，……为了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一般说来（如果从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说来），我党在

政治教育上还是比较差的”<sup>①</sup>。列宁认为，这种情况由于缺乏严格的措施(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而只会加剧;列宁预计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分子和简直敌视整个无产阶级的分子”冲进党来的浪潮就要“更加汹涌”了<sup>②</sup>。

在1918至1923年的历史条件下，要保持党的政策的无产阶级性质就要将权力集中在那些掌握了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人手中，也就是说，实际上一开始就要集中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手中。

“包围”党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对保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最危险的一个方面，就是认为有必要将越来越多的决定(有关党内生活及党的成分等决定)不仅交由中央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去作，而且还通过他们，交由一个党的领导集团去作。事实上，这种权力集中的结果是使许多重大决议既不受到基层组织的监督，也不受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监督。因为党的领导集团和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9页(中文版，第33卷第225页)。

② 同上书，第260页(中文版，第225页)。

由这些领导干部组成的行政机关，由于数量上的发展、结构的复杂及其吸收人员的条件（这些条件同非革命化的国家行政机关的条件日益接近）而取得日益增长的自治性。

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8 和 1923 年间的演变过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要保持党的政策的无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它要使党的行政机关获得自治，进而增加那个领导集团的独立性。在当时情况下，这个领导集团已越来越具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性质。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第二个方面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其特点是党的领导集团脱离党的基层组织 and 群众）日益发展，有逐渐压倒无产阶级的政治关系的趋向。

在列宁逝世前夕，党的行政机关和领导集团手中权力集中的程度已很高了。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这次代表大会于 1923 年 4 月 17 日至 25 日举行，当时列宁病重，未能参加），老布尔什维克要求改变当时党内关系的发言大大增加，他们要求恢复过去的关系，使全党能过更积极和更实际

的政治生活。在这次大会上，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弗·柯秀尔谴责总书记左右党的方针，用调动工作的办法来排斥敢于提出批评的积极分子，重视听话的人而不重视有能力和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此外，布哈林和拉柯夫斯基又用列宁的话<sup>①</sup>来批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党的中央书记处执行的使少数民族俄罗斯化的政策。这些抨击并无效果。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由于列宁已不能领导国事，提批评意见的党员被捕人数增加了。1923年9月，契卡的创始者老布尔什维克捷尔任斯基在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说：“我党的衰弱、我们党内生活的消失、选举被任命所代替等正在成为一种政治危险。”<sup>②</sup>但是这并不影响捷尔任斯基本人在以后一段时期强调要镇压“工人反对

---

<sup>①</sup> 例如，列宁在1922年10月6日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第一次登载在1937年1月21日《真理报》上，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45卷第214页）（中文版，第33卷第334页）；或者象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载《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8页（中文版，第36卷第628页）。

<sup>②</sup> 加米涅夫在1923年12月13日《真理报》上曾引用过这句话。

派”集团，并向政治局提出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揭发可以认为是“反对活动”<sup>①</sup>的一切情况。

实际上，党内关系的变化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要真正地使党内政治生活重新活跃起来，必须有基层的公开干预，以及无疑还要有对党的作用、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无产阶级观念的全体劳动者广泛的干预。这种变化的条件没有成熟。因此，随着列宁的逝世而开始的领导危机导致了权力又一次集中到党的行政机关手中，这也证实了列宁在1922年3月26日给莫洛托夫信<sup>②</sup>中的预见。

从此以后，党的行政机关所掌握的政治权力迅速扩大。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政治领导完全转入党的行政机关手中而不受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影响，但是这两级组织的影响正在缩小，而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前引皮埃尔·布鲁埃著作《布尔什维克党》，第182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9页起（中文版，第33卷第225页起）。这封信的一部分内容将在下面加以探讨（见本卷第453—454页）。

行政机关的影响却在增长。由于脱离基层和群众，行政机关正向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渗透敞开大门。

### 第三节 布尔什维克党的演变对其固有职能的影响

党同脱离群众的国家行政机关合并的倾向以及布尔什维克党被它自己的行政机关“包围”起来的倾向，对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实践的阶级性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首先是在党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党的领导作风和作为党的基础的意识形态中可以感觉得到。

#### (一)领导作风

上述两种倾向的加剧造成了有利于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发展的条件。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领导作风——在这里领导和盲目服从纪律的要求起着重要作用——逐渐在取代列宁竭力主张的无产阶级的民主领导，这种民主领导把重点放在正确意见的集中、说服和广泛的讨论上。

这种不同的领导作风以及支持这种领导作风



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如“下级”组织“尊重”“上级”组织的意志），把一部分党员，首先是政治干部，从积极分子变为一种最关心的是要知道领导要他们做什么的工作人员，而不是关心分析形势，指出最高领导所犯的错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亲自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以便使领导及时避免采取错误的措施，等等。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过去几乎完全不懂得的新的一套政治实践出现了。

这些实践已经变成了“官员”、“机关工作人员”或者“管理机器的工人”（当时已有人这样称呼他们了）的党员的实践。当时，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索斯诺夫斯基，是这样来描绘管理机器的工人的实践以及他们的作风的：

“他们既不热，也不冷。他们阅读各委员会的所有通知，……他们为已规定的活动进行各种数字统计，迫使党的一切活动纳入他们精心撰写的报告的合乎逻辑的范围内，当所有各点都做到了，并能使中央知道已按规定完成，他们就满意了。各种各样的计划、纲要、指示、提纲、调查材料、报告，向这类党的工作者涌来。只要他们的组织中一切都很平静，没有‘阴

谋’，没有人反对他们，他们就满足了。”<sup>①</sup>

1921年初，第十次代表大会曾试图制止这种领导作风和这种作风所特有的不实行工人民主制的状态。人们以为这种领导作风和内战造成的“党的军事化”有关。因此，布哈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

“必须将我们的力量用于工人民主制方面，并要用同以前使党军事化一样的毅力来实现这一民主制……人们应该懂得，党内的工人民主制是一种组织形式，它保证所有党员能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讨论提出的一切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使任命的制度成为不可能，而且工人民主制的特点就是从上到下的一切组织都有被选举权，都有各自的职责并受到应有的监督。”

这一报告还强调必须“广泛讨论一切重大问题，使党内批评绝对自由以及集体起草党的决议”<sup>②</sup>。

---

<sup>①</sup> 参阅列·索斯诺夫斯基：《行为及人》，维也纳，文学与政治出版社，1924年。《真理报论文集》，译自俄文，第152页；引自前引皮埃尔·布鲁埃著作《布尔什维克党》第165页。

<sup>②</sup> 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见《共产党人》杂志，1921年7月9日第24期，第401—405页；前引皮埃尔·布鲁埃的著作第159页曾引用过。

人们知道，根据布哈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采取的决议并没有改变前几年所形成的领导作风。

1921年底，列宁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有力地批评正在党内形成的另一种采取压制方式的领导作风。他谴责行政机关的一种做法是“揭发”而不是“善于纠正”<sup>①</sup>。列宁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也批评行政机关人员阿谀奉承的作风，并把这种作风讥讽为“共产党人的谎言”。列宁在逝世前写的一篇题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sup>②</sup>的文章中，毫不犹豫地指出，必须粉碎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列宁揭露了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是又一次对官僚主义发动进攻，这种进攻已持续多年了。

人们知道，“官僚主义”这个纯粹描述性的词汇是有过值得注意的运气的。首先它是用来谴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4页（中文版，第33卷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501页起（中文版，第441页起）。

责某些干部的行为，如专横、“个人”领导作风、个人野心，等等，显然多半归咎于“性格特点”而较少地归咎于组织形式。但这个词汇很快就具有第二种意义，即指一种（妨碍无产阶级民主的）组织形式，又指由此而产生的工作作风。以后“官僚主义”这个词汇又用来指一个社会阶层；托洛茨基就是按照固有的传统在这个涵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的<sup>①</sup>。最后，有些人甚至认为，官僚主义是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和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sup>②</sup>。

现在不是讨论这些不同概念的时候，我们只是通过“官僚主义”这一描述性词汇来观察人们通常注意的某些社会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地位，

---

① 据克利斯提安·拉柯夫斯基的回忆：“没有一本共产党的小册子，在谈到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变时，不同时提到党和工会的官僚主义的最高领导在党的失败中所起的不幸作用。”（见拉柯夫斯基于1928年8月写的《政权的职业性危险》。上述引文可以在F.马斯佩罗出版的《论官僚主义》一书的第126页找到，该书是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克·拉柯夫斯基和列·托洛茨基的论文集。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这个词汇的最初涵义。）

② 例如，克洛德·勒福尔在《官僚主义批判原理》一书（1971年日内瓦德罗兹书店出版）中的概念就是这样的。

这些地位是由一整套关系决定的，这些关系使这些工作人员形成了一个既与统治阶级（他们还集中了这一阶级的部分权力）又与各被统治阶级相对自治的集团。自1921年起，列宁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批评“官僚主义”的出现时，是用这个词来指使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的领导集团处于相对自治地位的那一套实践和关系的。当时，只是处于这些实践发展的初期，随着这些实践逐渐巩固，就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并使政权落到领导集团手中；随着领导集团掌握了所有的或主要的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分工）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这个领导集团就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如果说，1921年离这种情况还很远，但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真正的和最终的关键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立场，因为“官僚主义”是国家和执政党的机关中出现的新资产阶级的胚胎。

## （二）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人数及其社会成分

上面已经谈到，1917至1923年间党员人数迅速增长，党的社会成分发生很大变化，这就造成

了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关系的变化。这里人们面临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影响：如果党员不加控制地大量增加以及党员社会成分的变化确实会造成上述影响的话，那末党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中的变化、党同实质上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紧密联系，也确实会吸引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会导致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世界观向资产阶级方面演变。

对党有影响的变化包括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党内。早在1919年，列宁就曾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揭发了这种现象，当时他强调指出，过去被赶出行政部门的“旧官僚主义分子”又召了回来，某些人并装成共产主义者而钻入党内。<sup>①</sup>

在1921和1923年之间，列宁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指出，“小资产阶级分子和简直敌视整个无产阶级的分子冲进党来”<sup>②</sup>的危险一直在增长。他认为，要排除那些“摆委员架子的”和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1页。（中文版，第29卷第156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0页。（中文版，第33卷第225页）。

“官僚化了的”人，必须依靠非党群众。他要求，“只有在大工业企业实际作工不下十年的工人”<sup>①</sup> 入党的预备期可以缩短为半年。

对党有影响的变化的另一方面可能比前一个方面更为严重，因为它更难于直接控制：这是指许多党员，特别是干部的世界观的改造。

这两种变化同党的作用和党在全部政治关系中的地位的改变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同党和国家行政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党特有的行政职能的增长紧密相连的。

这种改变会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吸引到党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入党成为“必然的”。同时，这种改变及其全部后果也促成了一些革命战士脱离党，因为他们拒绝服从行政规章的严格要求，也拒绝服从一个趋向于脱离群众的集权的行政组织所要求的惯例和纪律。拒绝这种组织形式及其规章制度和纪律规定，造成了1918和1923年之间党内的一些斗争。这种拒绝的行为也表明党的基层组织的某些人员为反对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7页（中文版，第33卷第223页）。人们知道，列宁的这个要求没有实现。

党的“官僚主义化”而作出的分散的努力。这些努力的失败使得这些失望的战士脱党，甚至由于批评了党的行政机构而被开除。在后面要谈到的清党的情况下，这样的开除特别多。

某种行政任务的增加也会大大地改变负责这些任务的党的干部的生活条件，并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因为最终还是生活条件决定人的意识。

这里讨论的首先是行政职能中的“专业化”。由于这种“专业化”，担负这些工作的人越来越埋头于一些脱离生产、脱离人民群众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业务。因此，他们也会倾向于脱离群众，并“从他们职责的高度”来对待群众。

这一趋势的加剧是由于大多数行政任务都是在群众自治机构以外、不受群众监督、集权的、等级森严的、越来越形式主义的行政机构中完成的。

1923年初，列宁是这样来揭露这种演变的：

“在尊敬上司，遵守办公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sup>①</sup>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511页（中文版，第33卷第450页）。



根据这些论述,党员人数的增加、党员的社会成分及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担任任何工作的数字资料具有真正的意义。

人们已经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人数从1917年的二万四千人增加到1920年3月的六十一万二千人<sup>①</sup>。1921年3月达到七十三万二千人,三年以后超过八十六万人<sup>②</sup>。

如果不把党员人数迅速增长是在什么具体条件下发生的以及其后果如何的因素考虑进去,那末可以认为这样的速度是“健康”的标志。

在党员人数增加的具体条件方面,有好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在第一阶段(直至1919年3月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是执行一种“开门”政策,造成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后,人数高达三十五万)。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决定进行党员登记,以便开除那些不配入党的人。这

---

① 见本卷第268页。

② 见皮埃尔·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巴黎,1963年,第131页,以及《政治与社会问题》,《法国资料》,1971年5月28日,第74期,第33页。

样就开始了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1919年秋天，党员只有近十五万人。1919年10至12月（在内战特别艰苦的时期，投机分子入党的危险性显得较小）开始了第三阶段。入党又是成批的了，这就使党员人数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时达到近六十一万二千人。这种“开门”政策一直延续到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前夕。

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是一次新的清洗的起点。代表大会所作决议的目的是通过开除“非共产主义分子”、削减行政岗位上的党员人数以及用更多地吸收工人的办法来使党更加“无产阶级化”。党内不同派别都同意必须达到这一目标。<sup>①</sup>

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执行后，1923年1月，党员人数减少到不到五十万人。列宁逝世以后（与列宁的指示相反，因为列宁希望当时党员人数减少到四十万以下）开始了一次新的吸收党员运

---

<sup>①</sup> 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至4月），莫斯科，1963年，特别是230—231页及330—331页；见T. M. 利格比：《苏联共产党党员资格》，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3—94页。

动，使入党人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又一次急剧上升了百分之七十左右。

与此同时，在党员总数中工人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变化不大<sup>①</sup>。与此相反，把“合拍的人”吸收入党的政策以及进行清洗的条件引起了某些不好的结果。

清洗运动的重要的一面——这是造成不良影响的部分原因——是这一运动基本是靠“行政”来进行的。清洗工作实际上没有依靠群众，特别是没有依靠非党群众。在1921年，清洗工作是由一个中央审查委员会进行的，它下面还有一些地方委员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工作作风大大地加强了党的行政机构的权力。它或者开除在基层的人，或者开除干部中批评它的“官僚主义”工作方法的人，或者用清洗来威胁他们，迫使他们保持沉默。从当时提出的一些抗议表明，许多老牌“左派”反对派就是这样被开除出党的。当然，任何统计都不能说明这样的“清洗”的重要意义，也不能说明在政治和道义上都是正确的清洗的重要意义。从老的“工人反对派”的声明中人们也可以知道，这些人

---

<sup>①</sup> 见本卷第451页。

就是这样被打下去的。许多同这一反对派有类似意见的人，特别是工人，宁愿自己脱党也不愿意承担在虚假的借口下被开除党籍的危险。<sup>①</sup>

把“合拍的人”吸收入党的政策在改变党的成分方面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它显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这种成分的变化总是不按照俄共（布）代表大会及其政治领导机关所希望的那样改变的。

党员总人数的增加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之一是在党内相对地减少了在革命前经过战斗考验的成员。1919年3月以后，在党员中1917年2月以前入党的不超过百分之八，十月革命以前参加的只占百分之二十。<sup>②</sup> 这些数字表明，自1919年起，大多数党员毫无党在过去的经验，也不了解那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关系。这样就很容易让新的关系占优势，特别是在选拔干部方面没有基层的监督，也导致基层不参与批判地分析党

---

<sup>①</sup> 在这些方面，特别应该参阅《中央委员会通报》（1923年4月第4期）及《党的工作者手册》（第1期第79页）。前引L. 夏皮罗著作《苏联共产党》第237页曾引用过。

<sup>②</sup> 《中央委员会通报》，前引L. 夏皮罗的著作，第237页曾引用过。

的路线、可能出现的错误以及干部的行为。此外,由于党内成分基本上是新的(新的无经验的人占百分之八十左右),那些面临着日益上升的新的关系,仍想保持旧的内部关系占优势的基层或中层干部,也处于孤立状态。事实上,自1921年起,在反对老牌“工人反对派”的斗争中,很大一部分出身于无产阶级、在地下斗争中起过作用的老党员,尽管没有被开除出党,却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根据已有的统计资料,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成分的变化一直不是太清楚的。这种不清楚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对党员进行社会分类的方法决定的。一般是根据每人入党前或入党时的职业来区分的。因此,只要当很短时间(经常是刚够取得党籍的时间)的工人就行了,(这是常见的现象,就如列宁所指出的,其目的是为了被人们认为是个“无产者”,并一劳永逸地在党的统计资料中以“工人”的身份出现)。

要了解有关党的成分的统计,必须注意到上述说明。这些统计表明,在1919年10月(在清洗的第一阶段就把一定数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开除出党),党员中百分之五十二

是“工人”，这说明在一定的时期内，党员中工人的比例就是这样的。同一统计表明，百分之十五的党员当时是“农民”（事实上，这经常是指在农村居住的党员而言，包括农村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在这个时期，从统计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职位的实际分配情况：百分之五十三以上的党员是政府中的公职人员，百分之八是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在工业部门百分之十一的职员中有许多是行政人员或领导人员<sup>①</sup>。不到三年，人们估计三分之二的党员都已在“负责”的岗位上，享有一定的权力和某些物质利益。

为了便于了解党的社会成分发生变化的全貌（又不要忘记这些统计的局限性），人们可以引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一张统计表；统计表中的比例见下页。

在1921至1923年，由于执行了党的“无产阶级化”决议，确实使工人出身的党员所占的百分比重新有所上升，非工农出身的人数的比例下降了。

---

<sup>①</sup> 《中央委员会通报》，1920年3月24日，第15期，前引L.夏皮罗的著作第238页曾引用过。

### 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成分<sup>①</sup>

	工 人	农 民	职 员 及 其 他
1917	60.2	7.5	32.2
1918	56.9	14.5	28.6
1919	47.8	21.8	30.4
1920	43.8	25.1	31.1
1921	41.0	28.2	30.8
1922	44.4	26.7	28.9
1923	44.9	25.7	29.4

然而必须补充说明，不是通过增加党员中工人所占的比例就可以“自动地”使党真正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使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战士在党内占优势。某种“工人主义”也可以导致并不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劳动者入党。列宁曾提出要警惕这种危险，但在工人阶级中吸收党员的运动并不是总能避免这种情况的。

总之，在 1917 至 1923 年，尽管布尔什维克党

<sup>①</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版），莫斯科，1930年，第1版，第11卷第534栏。（一般是在每年的3至4月，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进行统计的。）

在领导十月革命以及对地主、俄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尽管它吸收了工人阶级中最有战斗力的一部分人参加它的行列，但党员人数的迅速增长、几次清洗采用的方式、许多党员担任的任务的性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去完成这些任务的，都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逐渐变得更为软弱了。

### （三）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软弱性

在1922年，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内关系的变化、党的领导作风及社会成分的变化会严重影响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还认为这种威胁为期不远了。他也曾寻求防止这些威胁的适当的方法。

1922年3月，列宁在几天之内就写了两封信给莫洛托夫；这两封信主要是谈有关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在3月24日的第一封信中，列宁提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多小资产阶级以“工人”的身份出现，或装成工人。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毫无疑问，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



即大工业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往往把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工人不久的十足小资产者列入工人之类。一切聪明的白卫分子都十分肯定地估计到，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无法保证党使小业主分子在最短期间不在党内占优势”<sup>①</sup>。

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和防止布尔什维克党变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危险，列宁建议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他认为这样可以击退或排除这种危险。人们知道，这些建议未能付诸实施。1922年8月4日至7日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列宁正因病住在高尔基城。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仅仅是形式上包括了列宁的某些指示，而与其实质内容相差很远<sup>②</sup>。

列宁在1922年3月26日的另一封信中又谈到这个问题：

“如果不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党员成分，而是决定于可以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小部分党员所拥有的巨大无比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7—258页（中文版，第33卷第223页）。

<sup>②</sup>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莫斯科，1953年，第7版，第1部分，第655—656页（中文版，第2分册第217—218页）。

的威信。只要这部分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这种威信即使不被完全破坏，也一定会降低到他们不能再作什么决定。”<sup>①</sup>

上面这些话是极其重要的。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特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并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党还应该由得到劳动者充分信任的以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者来领导。这些革命者在党内的领导作用（以后在中国称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及保持这种性质的最终保证。

在谈到党的无产阶级政策是取决于“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团结时，列宁已经察觉到下面的几个危险：

1. 公开分裂的危险。这样就不能在主要是农民组成的国家中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的情况下，分裂必然会产生两个党：一个党力求依靠工人阶级，但采取的却是“工人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使它脱离了其他的平民阶层；另一个党力求主要依靠农民阶级，强调对农民“让步”。在下面我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0页（中文版，第33卷第226页）。

们将看到一些“左派”反对派由于其“工人主义”性质而主要构成第一种危险。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sup>①</sup>中指的就是这种危险。

在这封信中，列宁提出了公开分裂的危险，因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他写道：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党的不稳定性是可能产生的，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一般地来议论我们中央的稳定性，都是无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sup>②</sup>

2. 暗中分裂的危险。将一部分党员从当时的领导机构中开除出去会造成这种情况。这是列宁在这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续篇中指出的一种分裂。他没有把这种分裂的危险直接同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同党的两个主要领

---

<sup>①</sup> 这封信本来应该在列宁逝世后交给党代表大会的，可是没有交去。只是在中央委员会一次扩大会议上发了一条简单的“消息”；信件全部内容一直保密到1955年。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06页（中文版，第36卷第616页）。

领导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工作方法联系起来。在谈到前者时，列宁说，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还说：“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在谈到后者时，他写道：

“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于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sup>①</sup>

这些意见经常被解释为强调两个领导人“心理”上的某些特点，这也不错。但是它特别是指某种领导方式，依列宁看来，这对全党的团结是危险的。列宁在写了这些意见以后，又继续写道：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sup>②</sup>

在口授了上述信件以后十天，列宁又加了一个补充，在这里他更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的领导作风和性格，他特别指出：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07页（中文版，第36卷第617页）。

② 同上。

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sup>①</sup>

3. 党的路线不再由“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来决定的危险。也就是说不再由在严酷的斗争年代中经受了考验并享有崇高威望的无产阶级领导核心来决定的危险。出现这种危险特别意味着党的政治路线不再由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来决定,而是由党的行政机关来规划。这会为无产阶级失去政权及通过不再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机关而产生的资产阶级专政复辟开辟道路。

4. 最后,列宁还看到,即使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分裂,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相互的信任关系日益恶化的危险也在形成,这就越来越难于制定一条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08页(中文版,第36卷第618页)。

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并改正已犯的错误。这种演变的危险可能更为尖锐起来，因为尽管在 1921 年年初的几个内，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时，党战胜了这种恶化的萌芽，但其后果直到 1923 年也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在后面还可以看到在总结五年革命的经验时列宁从中看到的具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政治后果。

然而，为了很好地了解布尔什维克党所经历的演变的重要性质及意义，必须把这些演变重新置于 1917 至 1923 年之间的社会过程中，然后再分析阶级斗争如何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各种思潮、不同路线或不同政治路线的原则的对抗的形式来产生影响的。这将在第四部分弄清了国家机关“自治化”过程的涵义以后，再进行研究。

## 第 三 章

###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的自治化 过程的客观性质

国家行政机关自治化的倾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性机构中资产阶级作风和关系的发展以及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变化，基本上构成了在同一个客观过程的各个方面。为了便于表达起见，我们把这些现象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的“自治化过程”。

列宁曾多次指出，领导苏维埃机关的不是劳动者自己。他谴责一个没有名称的和难以捉摸的机构，夺取了本来应由苏维埃行使的权力。他着重指出必须“重新把权力归于苏维埃”。但是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过程压倒了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上级领导机关的决定和列宁的号召。在研究这种过程的

社会基础之前，必须先弄清楚这种过程的阶级影响。

## 第一节 自治化过程的阶级影响和重新摧毁国家机关的要求

自治化过程的阶级影响在于它削弱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这种削弱是由资产阶级分子渗入机关和资产阶级作风增长所造成的。

自1919年起，列宁就注意到这一现实情况，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他指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被迫把一些“旧官僚主义分子”“安插到新的位置”上。他接着说：“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好地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因此把他们赶出了大门，他们又从窗户里钻进来。”<sup>①</sup>

列宁在1920年12月所提到的“官僚主义毛病”使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特殊性质。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1页（《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3卷第788页）。



这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风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里所占的地位也是有关的。

一年之后，1922年1月，列宁在他那篇论工会的作用和新经济政策的论文中（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再一次从他在1920年12月所说的话中引出一些明确的结论。他把苏维埃国家称为“过渡形式的无产阶级国家”，这样的国家有必要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即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并同它的“机关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进行斗争。这就说明“采取罢工斗争”<sup>①</sup>是正确的。

1922年末，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描述当时的国家行政机关时，甚至把它比作沙皇的机关。他说：

“我们接收了旧的国家机关，这是我们的不幸。……现在我们有大批职员，但是缺乏相当有学识的人来切实地管理他们。实际上往往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还能发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3卷第188页（中文版，第33卷第157—158页）（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

挥一点作用,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但是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反对我们,一部分是自觉的,一部分是不自觉的。”<sup>①</sup>

最后,在他因生病而不得不保持沉默以前,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器作出了最严厉的批判。他说,这是“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他还说:

“这一个被我们称为自己的机构的东西,实际上还完全同我们格格不入,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的乱七八糟的东西……”<sup>②</sup>。

因此,列宁直至在他最后的著作中,对国家机关自治化过程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对“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机构的再现,不断加以谴责。从1920年末起,列宁毫不犹豫地对这一问题写下了这些话:

“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在于把旧的机构完全消灭

---

<sup>①</sup> 参阅列宁于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0—441页(中文版,第33卷387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9页(中文版,第36卷第629页)。

(在十月革命时它们已经被消灭了),并且把权力交给苏维埃。”<sup>①</sup>

人们知道,重新建立起来的旧的国家机器从来没有象列宁所要求的那样被摧毁;它还得到发展和加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结束之后,就是说在私人资产阶级消灭之后,这个旧的国家机器变成了资产阶级势力汇集的场所。

国家机关自治化过程的阶级影响,削弱了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国家机关的领导作用和与此相应的资产阶级势力的加强。因此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过程客观基础是什么?促使这个过程发展的是哪些条件?

## 第二节 阶级斗争过程的客观基础

阶级斗争过程的客观基础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自治化这一点,不能仅仅归结到一般的阶级存在。研究这个客观基础,应该从当时具体

<sup>①</sup> 参阅列宁于1920年11月21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会议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3页起,引文见第437页(中文版,第31卷第382页)。

存在着的所有实践和关系入手，后者赋予对立的阶级以各自的特性。事实上，正是这些关系和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践决定了阶级存在的形式和斗争的形式。

为了理解国家机关自治化过程的客观基础，必须以1917至1923年俄国革命的那个阶段为出发点。这是因为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所完成的变革取决于这一阶段的特征，也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中进行较量的形式下完成的。

俄国革命那一段时期的特点是它的主要任务仍属于民主革命性质的。对于当时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当务之急是帮助农民群众抗击白卫军，也就是说同地主作斗争，并从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这就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一个主要任务。

事实上，这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相信在某个时期内(从1918年下半年起)已把“建设共产主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且成为真实的了。这种幻想(列宁后来认为这是一种幻想)<sup>①</sup>只能使完成革命

---

<sup>①</sup> 参阅本卷第五部分。

的主要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却不能“取消”这个任务。

俄国革命这个阶段的性质和革命前的具体条件对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所能产生的变革确定了一些限度。在这些限度之内所实现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根本性的历史意义；这些变革就是把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和没收地主以及大部分私人资产阶级的财产。另一方面，那时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开始出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刚刚开始，实行这种性质的改造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只有当这种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主要任务时才能大规模地进行。只有在1917至1923年期间仍占有主要地位的矛盾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民主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在这个基础上巩固了工农联盟以后，社会主义的改造才能实行。

在1917至1923年期间，俄国革命尚未达到——也不能达到——革命发展过程中真正的社会主义阶段。正因为这样，尚未得到改造的、或刚刚开始改造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和前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分工制刚受到一

些挫折，个体生产或宗法社会的生产在农村仍占优势，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也没有改变。在资产阶级和前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会再生产和发展资产阶级或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关系。按照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的说法<sup>①</sup>，经济关系就是构成政治形式的“秘密”，这就是说当时形成了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过程。

以上所述能使人了解这种过程的基础，但不能说明产生这个过程的条件以及那些使人反对这个过程的条件。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条件加以分析。

### **第三节 国家机关自治化过程发展的条件和与这个过程作斗争的条件**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自治化过程的根本条件是资产阶级或前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实践占优势。这些资产阶级社会实践使资本主义关系得以再生产，并使“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

---

<sup>①</sup>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8卷第1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891--892页）。

关系。

当资产阶级掌权的时候，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关系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动力，但它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种种矛盾制约下——反对变革资本主义关系的实践的动力。这就引进了一些预示社会主义关系的因素。这些因素处于一种完全从属的地位，并受制于整个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需要。当把上述因素放在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未出现时，这些因素只能处于这样的情况。正如马克思在研究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所、托拉斯、资本主义国有化等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的那样，保存资本主义关系的过程是通过在形式上改变这些关系而实现的。

历史唯物论使马克思得以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矛盾性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也是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关系的变革过程。马克思就用那个方法，针对各种不同的、不能改造世界的“空想社会主义”，建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揭示了目前社会内部孕育着的社会主义条件，而无产阶级应该从这些条件中促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这就是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大纲》<sup>①</sup>中所阐明的思想。当时他写道：

“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正在发展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都是行将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社会统一体的无数矛盾形式不可能通过平静的演变来炸毁。此外，如果我们找不到隐藏在原来社会中的、为一个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相应的交往关系，那末任何爆炸的企图都是唐·吉珂德精神。”<sup>②</sup>

现在社会内孕育着新世界的诞生这个比喻从上述的分析中获得了充分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只要发展革命实践，就能帮助新世界的诞生。

其实，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社会关系所包含的无产阶级社会实践也有两重性，即既保存又改造它的现有的社会关系两种作用。当无产阶级基本

---

① 我们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法译本（巴黎，人类出版社，1967年），引证了马克思的话，但我们根据德文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年）作了某些修改。

② 参阅前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卷第96—97页，译文根据前引德文本第77页作了修改。重要的修改是，马克思使用的 *Verkehrsverhältnisse* 一词不能象法译本那样译成“分配关系”，这个词组不符合德文原意，德文词意涵义更广。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交往”（“普遍的相互关系”）。



上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支配时，无产阶级的实践，包括阶级斗争的实践，仍将服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需要（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是如此），从而产生了工团主义者活动的局限性，因为这种活动没有按照具有科学根据的革命方向去进行变革（空想主义者的愿望是不能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这种革命理论是从分析无产阶级自身的斗争、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再生产的条件以及从分析现存关系的改造中产生出来的），才能使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占统治地位，不过这些实践不是保证现存的关系能够保存下来和继续使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而是要粉碎这些关系和这种统治，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因此这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实践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

现在让我们回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自治化过程上来（这个过程是潜伏在这些机关里的资产阶级统治过程的一个开端），对这个过程进行有效斗争的基本条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必须在变革各种关系的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正是这些实践，而且只有它们，才能对社会关系进行革命变

革，才能使社会主义成分在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必须在适当的历史阶段，就是革命力量统一和协调的行动能实现的时候才能进行。

把上述提法加以概括，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在1917至1923年期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自治化过程可能发展的条件是因为在必须变革的各种关系范围中，资产阶级的实践居于优势地位，而革命的实践却很微弱。资产阶级实践的优势地位是和当时俄国革命所处的历史阶段密切联系着的；由于这个原因，这个过程能够在如我们所见到的速度和形式下发展起来。

然而，我们必须跳出上面提到的概念，才能对这个过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因为对这个过程缺乏全面理解是无法从它的具体发展中吸取教训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重提一下这个过程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这个过程发生时期的具体特点。这些特点要求：必须把革命的力量集中在一个首要的目标上，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允许把对全部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立即

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一)当务之急

在这里谈一谈急迫任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需要对付白卫军和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的联合军事进攻。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并尽快地供应前线，否则就有可能一败涂地。

在无产阶级政权已建立的情况下，由于商品关系和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物物交换”的习惯仍占优势，工业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供应农村，因为战争的迫切需要是刻不容缓的。苏维埃政权除了已采取的措施以外实际上就无路可走。于是只好通过先进工人或国家机关采取征收办法和强制执行的办法。这样的措施即使会暂时损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即会在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受到这些机关强制措施的一部分群众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要的。

列宁在1920年6月重提过去提过的“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时，是用下面的话来强调当时紧迫

任务的性质的：

“这是一个拯救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千万同志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战胜饥荒的问题。我们所以挨饿，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战争进行到底，而我们是能够并且应该迅速把战争进行到底的。为此，无论如何要非常严格地实行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在后方，在任何非军事工作中，稍微放任一些、松弛一些，都会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都会造成这里的饥荒。”<sup>①</sup>

## (二)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村的历史关系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在农村几乎没有组织，因此急迫的任务使它无法采取其他方法，也无法帮助农民改造他们自己的习惯。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建立真正的贫农委员会的尝试，业已失败。除了极少数以外，这些委员会既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得到巩固，大多数的村苏维埃仍在乡村资产阶级分子的控制之下，甚至本身也受到参加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77-178页（中文版，第31卷第153页）。

反革命活动的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治干部还太少，他们在前线实在太重要了，不能大批地派往农村，或让他们帮助贫下中农摆脱农村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同前线和城市发展深厚的和经常的革命团结的实践。

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中的直接影响的微弱，可以从很少农民参加村苏维埃选举这一事实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在 1919 和 1922 年之间，参加选举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二二的农民，有时甚至降低到百分之九<sup>①</sup>。党员在俄罗斯地区各省村苏维埃中所占比例为百分之零点三到一点八不等<sup>②</sup>。因此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在乡一级的苏维埃里，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位稍好一些：苏维埃中百分之十一点七的代表是党员。只有到了县一级的苏维埃里情况才有所改变，特别是从 1922 年各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来看，党员和预备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一，但是其中百分之七十六是在革命

<sup>①</sup> 见《苏维埃、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俄文版），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1924 年，前引奥·纳尔基耶维茨著作《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形成》第 60 页曾引用过。

<sup>②</sup> 在非俄罗斯的省份中，似乎作过特殊的努力以增加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人数在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二十五之间（同上书）。

后才入党的，而且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旧国家机关中的行政人员。至于隶属于各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正如列宁多次指出的那样，主要是由被砸烂的旧机关的留用人员组成的，后来这种旧机关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sup>①</sup>。

党在农村的根基极端薄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在俄国广大地区仍占优势的原因之一。在大部分农村，甚至在许多中小城市，党员的数目仍不过是“沧海一粟”（按照列宁的说法）。由于人数太少，他们既无法搞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也无法到人民群众中去有系统地听取意见和建议，以便采取新的做法。因此，那些重新建立起来的旧机关（或者虽然是新的但同样是脱离群众的机关）更加积重难返，因而资产阶级习气便在这些机关内部发展起来。

这些重新建立的类似沙皇机关的国家机关，以及这些机关对群众的专断统治的关系，反过来又产生思想上的影响，这里面包括一部分工人和农民对“已建成的当局”的不信任和对镇压的恐惧。这种思想上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使那些远离苏

<sup>①</sup> 见前引奥·纳尔基耶维茨的著作，第61页。

维埃中心和组织的党员脱离群众，党在这些中心和组织内有效地进行着领导活动。这些中心和组织对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它们还不足以在全国规模内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实践。

### (三)在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进行必要的社会主义变革中缺乏足够的经验

在 1917 至 1923 年期间，在俄国最突出的是有一些有利于国家机关自治化的客观条件，一些有利于重建资产阶级或前资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机关，即列宁曾用生动的语言说过的涂上红色的沙皇机关的客观条件。然而，除客观条件外，还加上对布尔什维克党活动的种种限制。党在对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进行改造方面缺乏经验是同这些限制有密切关系的。而这些限制又是由党的某些理论观念所决定的。

且不说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可能和过去有极大的区别——这里考虑到俄国革命所处的阶段、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它的党员和它的基层工作的性质——，人们可以这

样认为：如果党过去为了反对这种过程而斗争积累了一套经验，那末今天，它就可以更好地同无产阶级政权机关中的自治化过程进行斗争，并且使这个过程发展缓慢。历史事实证明，党没有这种经验，即使靠自己的有限实践发出的指示也是笼统的、很不够的。

为了反对国家机关自治化过程亦即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在俄国以新的形式巩固其地位所能够或应当做的事情，不是可以“凭空想出来”的。而只能是从实践中学到，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实践中来的；不一定要从成功中来，而且也要从失败中来，正是为了使失败的人（或者是情况大体相同的人）从中吸取教训。从1921年和1922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列宁，才开始从自己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将在本卷第五部分再讨论这个问题。

#### （四）党的理论观念和1917至1922年的总结

如果将1917至1922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和理论阐述同支配中国共产党



的思想和行动的实践和论述相比，人们就有理由认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某些思想，早已形成了同苏维埃政权国家机关自治化作有效斗争的道路上的障碍物。当然，用“一些假使来写历史”，设想“假使当时不是这样，那就会如何如何”，都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可以断定——因为这是事实——布尔什维克党的某些理论观念，在一定时间内使党看不见、不理解、无法预见到一种过程的真正的性质和真正的意义，而这一过程的某些影响曾被党指责过。

在那些无法捉摸的观念中，可以指出——在本卷最后一部分中再加以讨论——曾对中央集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某些形式起作用的一些有关观念。在一定的程度上——在客观条件严格限制的范围内——这些观念阻碍布尔什维克党去开辟一条道路，让群众能够从他们切身的经验中发展一些不同于在当时许多场合起主导作用的实践，也就是说发展一些在这些范围内能使群众组织和苏维埃变得更有生气的革命实践。

再补充一些看法，自然也很需要。

首先必须强调，错误的观念决不是一个社会

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决定这个过程的发展的是当时存在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创造历史的不是思想(即使是党所宣传的思想),而是群众。

正确观念的作用也并非不重要,它可以帮助群众有系统地发展他们的革命实践,抛弃奴役他们的习惯。正确的观念只能开辟道路,但不能“创造”什么,除了还有这样的可能,即对群众来说,巩固他们的革命实践的可能,联合的可能,协调的可能。此外,什么作用也没有了。

这就是列宁在《怎么办?》一文里正确地论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很显然,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理论“创造”革命运动;而是说理论指导运动,给运动指出道路,使它继续前进。这也不是说有什么“创造”,而是说在它整个的历史范围内,从运动本身吸取理论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

再回到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自治化的问题——我们应该说布尔什维主义理论观念中的弱点并不是这个过程的起因(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由于存在着这些理论观念,后来又没有什么能够得到充分的纠正,

因此，俄国人民群众在发展、综合和整理他们的革命实践的过程中，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以致未能“再一次摧毁”重新建立起来的“沙皇机关”。

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观念中存在着不少的弱点，因为这些观念是脱离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留下来的部分遗产。实际上，从第二国际产生的布尔什维克党，由于没有实践的经验，不能一举肃清第二国际观念中错误的东西。这些错误只能通过一场理论上的阶级斗争才能逐步清除。

在这里，有必要回头再看看当时的历史条件，因为革命理论的弱点（这是指还令人感觉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那些弱点），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清除的。清除这些弱点以及随之而来的纠正，本身就是客观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在矛盾成熟的基础上，在革命运动内部的不完善的理论发展成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清除。只有在这些矛盾得到真正的解决时，理论上的弱点才能得到清除和纠正。

当谈到布尔什维克党未能摆脱的第二国际的“理论遗产”时，必须把与民主集中制格格不

入的某些集权主义的观念以及某些中央集权国家机关作用的概念包括进去。同样，当人们研究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7 至 1922 年未能摆脱这些观念的原因时，必须记住，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俄国革命所处的那个阶段的性质和当时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民主的任务分不开的。这个占主导地位的任务趋向于突出与法国革命特点相似的方法和观点，即雅各宾派的方法和观点，而这些方法和观点也是第二国际遗产的一部分。

1919 年初，支持十月革命的罗莎·卢森堡在谈到实行“资产阶级式的专政，雅各宾派式的政权”<sup>①</sup>的时候，确认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存在着相同之处。她说这一类型的政治关系会招致“苏维埃生活……的瘫痪”，使国家机关的生活缺乏生气，而只有“官僚主义是唯一活跃的因素”。<sup>②</sup>

同时，她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要求列宁和他的朋友象变魔术那样创造出最美好的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典范。”<sup>③</sup> 罗莎·卢

---

① 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载《卢森堡选集》，巴黎，《马斯佩罗小丛书》，1968年，第2卷第8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89页。

森堡在承认具体历史条件的作用时，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

当时雅各宾派的方法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其实就是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和雅各宾派观点相结合的结果。雅各宾派的观点对布尔什维主义来说并不陌生<sup>①</sup>，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要警惕对雅各宾派思想的留恋<sup>②</sup>。

无论如何，在 1917 至 1922 年期间，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国家机关中的自治化已经成为现实，这一现实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思想 and 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必然是很大的。

---

<sup>①</sup> 例如，在 1903 年的《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已意识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作用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分子”的作用一样（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77 页）。

<sup>②</sup> 参阅《神圣家族》，巴黎，社会出版社，1959 年，第 144—150 页，或 1870 年 9 月 4 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第 33 卷第 53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56 页）。



## 第四部分

# 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和 政治斗争

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所开展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党的路线和政治活动的思想基础，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党给予人民群众斗争的支持的性质，这些斗争是一切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这样的分析不仅仅具有“追溯性”的意义：它不仅帮助我们理解在列宁时期影响当时革命斗争的各种对立思潮，同样它还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以后（列宁逝世后不久或更久的时间，甚至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共产国际内部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存在的思想斗争的意义和范围。通过这种分析，可以看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断为实践经验和理论上的深思熟虑所充实——同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表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发生冲突，这种观念正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分析列宁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所进行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还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列宁在党



内所处的卓越地位和他在制定革命路线时所起的主要作用。“卓越”一词是用来突出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列宁所持的立场总是被证实为正确的，虽然起先往往只有他一个人或者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在坚持着。实际上，在列宁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同布尔什维克党大部分领导人满足于一再重复早已被历史进程超越了的旧公式的那种倾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众所周知，列宁早在流放期间就曾谴责对1917年二月革命后组成的临时政府采取的任何“支持”政策、甚至是“有条件”的支持政策，并号召立即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展斗争。当时，绝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还持有一种过分“谨慎”的态度，他们只是逐步地采取列宁早先采取的立场。要说明列宁在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是很不容易的，尽管每当实际生活需要对战略和战术作出重要的新规划时，或是对原来所遵循的路线进行修正时，每次都确认了列宁的这个地位——他不仅在党内居于首位，而且是党的领路人。但是，列宁特有的倾听群众意见的能力和理论修养的扎实是两个能说明列宁地位的主要因素。这

两个因素，同他的敢于反潮流和不怕被暂时孤立的政治勇气相结合，说明了列宁之所以能经常站在党的前头，这同样也包括对党和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

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所发生的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分析，也能帮助了解列宁自 1920 年末开始进行和直到 1923 年还在使之深入的对路线修改的幅度，从而开创了只被党的其他领导人所部分接受的新的前景<sup>①</sup>。

在分析布尔什维克党内各个时期开展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最有意义的方面之前，应该回顾一下在党与人民群众关系中所发生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基本方面已经在前面作了分析，这里只是简短地回顾一下。

---

<sup>①</sup> 这一点将在本卷第五部分专门论述。

## 第 一 章

### 布尔什维克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 的变化

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是布尔什维克党与人民群众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源。然而这些变化直接从属于党所遵循的政治路线，从属于党的行动方针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以及党对矛盾如何分析和正确处理革命各阶段中主要矛盾的能力。因此，在剖析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变化时，必须同分析党在各个时期所担负的主要任务联系起来。

在分析布尔什维克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最难的是确切说明这些关系主要方面的特点。这些关系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实际上，这些关系总是很不相同的。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来说，它们是

不一样的。在工人和农民内部这种关系也因把他们看成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落后分子(指或多或少地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所支配的人)和中间分子而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在十月革命以后的那些年代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中间分子是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援的话,苏维埃政权将无法抵抗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军事进攻,也无法克服由于资产阶级的种种反抗和破坏而造成的巨大经济困难,更无法解决由于六年战争所引起的经济混乱。

然而,在党与群众的关系中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以及党争取原属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那些人的进一步支持以逐步扩大先进分子队伍的能力。这是一种持续的斗争,一种旨在使人民群众中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那部分人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时起时伏的,因为党或者某些党员所犯的错误促使一部分群众对党的支援与支持有所减少。因此,研究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首先不是看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给予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当然没有这种支持,苏维埃政权就会垮台),而是看中间分子的态度

度。中间分子的动摇和波动（它们是与生活条件的变化和布尔什维克党通常采取的决定相联系的），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程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最初的过渡形式进入到更高形式的的能力。所以我们应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布尔什维克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变化。

在这里，除了提醒一下在1917年2月至1918年5月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对群众的影响发展得很快以外，我们不再追述这个时期的情况。自2月至10月，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尤其在城市里，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参加革命组织的活动和支持党的各项倡议。至1917年10月，阶级力量的对比到了这样的程度：资产阶级政权崩溃了，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

在以后几个月内，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行动（尤其是对农民民主革命的帮助和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使党获得了人民群众更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在农民中间，尽管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定会利用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与战争的持续和资产阶级的阴谋活动有关

的。但是，这些政党由于他们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所作所为已经丧失人心，以至他们的影响已经不能严重地阻挠苏维埃政权了。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重要的某些部门中，情况并不是如此：如铁路工会中的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曾致力于加剧运输上的混乱局面。

内战开始以后，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困难的阶段，首先是由于党对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民中深入的程度作了过高的估计，也是由于党认为那时有可能在农村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已经具备而犯了一些错误。

### **第一节 农村中“无产阶级进攻”的尝试 与转向中农的过程**

1918年下半年起，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对付白卫分子的叛乱和外国干涉而动员群众，于是产生了幻想，认为当前形势已变为有利于在农民中发动一次“无产阶级进攻”。那时，因为党相信“在大多数劳动农民当中已有建立共耕制的愿

望”<sup>①</sup>，所以它认为着手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已经来到。

在这期间，党认为可以在贫农中发动一次革命运动，把他们组织在与苏维埃分开的和不同的委员会中。大家知道，这些“无产阶级进攻”的尝试失败了。形势尚未成熟。在农村中的革命不能超越民主阶段。

第一个必须放弃的尝试是建立贫农委员会的尝试。正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左派”（控制着大部分的村苏维埃）发生分裂时，1918年6月发动了这一次尝试，它并不能导致一个牢固地扎根于广大贫农中的运动。仅有小部分贫农参加了这个运动，而这样组织起来的农民往往追求与个人利益密切有关的目的，并攻击中农。在这些委员会活动积极的地方，他们反对村苏维埃并企求形成“第二个政权”，而在面临着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武装进攻，正需要将工人阶级和农民团结在一起共同进行战斗的时候，却在农民中制造了分裂。

---

<sup>①</sup> 见本卷第303页起，引文引自《列宁全集》，第28卷，特别是第353—360页（中文版，第28卷第321—327页）。

从1918年11月起，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对发展贫农委员会的后果表现出动摇和恐惧心理。在彼得格勒地区的一次贫农委员会代表大会会议上，这些委员会的代表们要求把苏维埃的全部政权移交给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季诺维也夫（显然是获得党领导的同意的）提出一项决议案，宣称贫农委员会曾与富农斗争，但要很好地完成它们的任务，它们“就不可避免地必须超越6月11日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因此）在农村建立双重政权，就会导致无益的力量分散和混乱”。<sup>①</sup>

一星期后，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类似的决议。

1918年1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贫农委员会，理由是在农村中发展了“双重政权”<sup>②</sup>。事实上，各地区阶级斗争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当俄罗斯取消贫农委员会时，这

---

<sup>①</sup> 这次彼得格勒会议的报告曾由季诺维也夫本人提交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参阅这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162页曾引用过）。

<sup>②</sup> 同上书，第163页。



些委员会却在（德国帝国主义崩溃后被苏维埃政权夺回的）乌克兰发展起来。

取消贫农委员会的决定并不是对富农“让步”，它是出于避免无产阶级政权和中农之间出现破裂的愿望。其实，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的力量薄弱，所以它不能将贫农委员会的运动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并防止它们脱离中农而陷于孤立。原则上中农是应该被包括在贫农委员会中的（党的领导机关曾一再作出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可是，在实践中往往把中农当作富农对待。

自1918年12月起，布尔什维克党逐渐寻求对中农，更普遍地是对小资产阶级扩大影响的途径。11月底，列宁发表了一篇题为《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的文章，他在该文中谈到那些无产阶级性最少、小资产阶级性最多的正在转向苏维埃政权这边的劳动阶层、动摇者和中立者时指出，“当前的口号是善于利用他们的转变”。关于这点，他强调“同中农、同工人中昨天的孟什维克、同职员或知识分子中昨天的怠工分子成立协定”的必要性。

在宣告不会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也不

会忘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过去的动摇时，列宁在文章结束语中说：

“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深刻的变化使得非党的、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民主派必然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而且一定要学会利用这一转变，支持这一转变，在一定的集团和阶层中促进这一转变，尽一切可能同这些分子达成协议……”<sup>①</sup>。

1918年12月和1919年3月间作出的决定就是自1918年3月起确定的同中农结成直接联盟的新尝试的开端。

人们知道，列宁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努力确定对中农这一“人数众多的、强而有力的阶层”的新的态度。就在这次大会上，他说，在苏维埃革命到达这样一个阶段时，不能满足于“中立农民”，而应当“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使得那些屡次产生的、使中农离开我们的偏向和错误再也不能发生，只有这样，我们，作为第一次帮助俄国农民彻底摆脱了地主压迫并为他们建立起真正民主制度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就能真正得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189页（中文版，第28卷第175页）。

到他们的充分信任”<sup>①</sup>。

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是明确地趋向同中农结成联盟的。党纲明确指出，中农不属于剥削阶级，对他们决不可用强制方法。党纲还指出，应当采取措施帮助中农提高他们耕作的生产效能，并有节制地向他们征税。

## 第二节 征收粮食和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之间矛盾的发展

1919年期间，特别在1920年，1919年初提出的并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原则仿佛已无法实行，这是因为生产、农产品运输以及前线和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在增长。为此，前面已经看到<sup>②</sup>，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增加征收，经常不加区别地打击中农（他们是人数最多的生产者）。

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农民群众感到征收是客

---

<sup>①</sup> 见列宁于1919年3月18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载《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9页起，引文引自第140—141页（中文版，第29卷第120—121页）。也可参阅本卷第308页，这一页的引文开头部分也提到这个问题。

<sup>②</sup> 见本卷第321页。

观的需要,那就不管愿意与否,仍是当作不可避免的灾难接受下来的。1920年年中起,当胜利已成定局时,情况有了深刻的变化。这时,继续执行征收——甚至在歉收时,征收也要扩大——就引起大部分农民的严重不满和布尔什维克党同农民之间严重的紧张局面。

自1920年6月起,党越是把无限制地执行征收政策当作它认为是当前任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必要的工具,紧张局势就越是迅速加剧。

列宁的一些著作就证明当时存在的错觉。因此,在1920年6月12日举行的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列宁号召“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先进的、最觉悟的……那一部分人,去教育和训练其余往往是不觉悟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农民”。他要求抛弃“温情主义”,从外部加强农民的纪律,因为“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是劳动人民的备受压制和愚昧无知,他们不懂得不仅可以在资本的棍棒下工作,而且……”<sup>①</sup>。

在当时,列宁认为征收措施不是一项临时的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79页(中文版,第31卷第154页)。

措施(由于战争情况而实行的),而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同掌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间存在的关系的性质有内在联系的措施。

与“战时共产主义”有联系的错觉的特征是,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征收措施是党认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正面进攻”的组成部分。因此,由于形势所迫而通过的临时性的征收制今后就被看作是正常的“社会主义措施”了。这不仅是布哈林——他当时是主张对农民实行强制的,他的《变革时期的经济》<sup>①</sup>一书足以表明——而列宁也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1920年夏,当列宁读到瓦尔加写的匈牙利革命经验的分析时,看到瓦尔加提到:“由于征收制会带来生产的下降,所以它就不可能使人达到预期的目的”,列宁在这一句边上加了两个问号<sup>②</sup>。在看到瓦尔加文章后不久,列宁赞成布哈林在《变革时期的经济》中说的,特别是布哈林肯

---

<sup>①</sup> 参阅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1970年,第153页。

<sup>②</sup> 见《列宁选集》,俄文版,1928年,第7卷第363页,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173页。

定无产阶级专政对农民实施的强制，因为这帮助了“经济的普遍发展”，就不能认为是“单纯的强制”；列宁在文章边上加注：“很好”<sup>①</sup>。

1920年11月，列宁甚至想到——特别是在征收措施使国家得到的粮食数量激增后——“我们已使农民相信，无产阶级给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资产阶级给他们的好的，我们是在实际上说服他们的”。列宁还说：“农民现在处于观望状态，他们已由对我们采取敌视的中立态度转变到对我们采取同情的中立态度了。”<sup>②</sup>

其实，那时农民的不满情绪公开表现出来已有近两个月了<sup>③</sup>。到了9月，随着部队的复员以及白卫军威胁的结束，可以看到出现了人们称之为“农民的强盗行为”的行动，这只是农村中深刻不满的表现。这种“强盗行为”特别在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有所发展，在唐波夫省尤为严重。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俄文版，1945年，第35卷第175页，亦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第173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4页（中文版，第31卷第378—379页）。

<sup>③</sup> 自10月以来，列宁就觉察到这种不满（见本卷第320页），但他认为这不是征收制的缘故，而只是执行得过分造成的。

在1920年至1921年之间的冬季，粮食人民委员部最后不得不在骚乱有所发展的十三个省停止征收<sup>①</sup>。此后，直到1921年3月正式放弃征收措施时为止，农民不满情绪的表现就没有停止过。

尽管形势如此，列宁在1920年12月还是认为对农民的强制是必要的，这是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个方法。

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强调对农民，特别是对劳动农民、贫农和中农的说服工作的必要性的同时，坚决主张这样的思想：“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实行国家强制……”，他并且要求强制机构应当是“生气勃勃的和巩固的”<sup>②</sup>。

这是列宁关于这方面的最后声明。当列宁越是离开对农民采取强制的立场，他就越深入纠正他的无产阶级政权同农民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在

---

<sup>①</sup> 参阅《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1921年），第231页，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173页曾引用过。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5页（中文版，第31卷第458页）。

本卷第五部分，我们将看到列宁是怎样从事这种深刻研究的，这种研究在他写的五年革命的总结中又占了什么地位，以及他所说的影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中达到怎样的程度。目前，只能就列宁在1921年初进行的对农民政策的重新评价作一些说明。

### 第三节 农民的不满情绪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政策重新评价

1921年1月，列宁增加了和农民代表的接触。他越来越认识到对农村所犯的错误。到了2月，他撰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为“满足非党农民……的愿望”，他建议“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多少有些专横地征收“余粮”。——贝特兰〕，并指出应当“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数额”。他还建议“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sup>①</sup>。2月17日和26日的《真理报》刊登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7页（中文版，第32卷第123页）。



了两篇阐述列宁预见到的措施的必要性的文章；中央委员会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拟订有关这方面的计划。这样，在喀琅施塔得叛乱<sup>①</sup>的几星期前，列宁已把党引入一条新的道路，即新经济政策的道路。

1921年3月7日，中央委员会重新审查并批准了特别委员会制定的计划。3月8日和15日，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支持这个计划。<sup>②</sup>列宁以报告形式所作的这两次讲话提供了布尔什维克党直到当时为止执行的政策的第一个重新评价，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从中发现对所犯错误的明确认识和对它们的直接根源的阐述，即先前不了解农民群众的精神状态。

在3月8日的报告中，列宁谈到了不仅在党的“计划”和“估计”中犯了错误，“而且在确定我们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方面也有不正确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阶级是应当通过同这些阶级的合作，有时也要通过同它们的斗争来决定共和

---

<sup>①</sup> 见本卷第508页起。

<sup>②</sup> 《列宁全集》，俄文版，1937年，在第26卷第601页起可以看到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主要阶段的一系列细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56页起）。

国的命运的”。他接着说：“根据这一点，我们应当谈谈过去工作的总结，……”<sup>①</sup>。

列宁当时所作的、并要求全党参加的、诚恳和明确的自我批评符合列宁领导作风的无产阶级革命性格。他引向新的政治路线的方式是这种领导作风的典型。面对过去的错误（不仅是由于这些错误，还由于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军事斗争的需要）所带来的困难形势，列宁从农民的要求本身，从他们的愿望中寻求和发现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一条符合新形势要求的路线）。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从把已经承认的失败作为科学实验、作为进行总结的客观过程来进行毫不掩饰的分析出发，列宁在纠正布尔什维克党同农民的关系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人们将看到，正是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期间所犯的错误进行严肃分析推向深入时，列宁在1921至1923年为无产阶级专政对农民的政策开创了一个根本性的新的前景。这样，列宁分阶段地对他关于无产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部分思想做了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9页（中文版，第32卷第161页）。

重大的纠正。这种纠正的程度是如此深刻，以致不能把列宁先前对农民问题的全部著作所表达的结论看作是他在进行五年革命的总结时所得出的结论。

1921 年头几个月开始的纠正和后来的深入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一个具体的和理论的分析中产生出来的。

在论述这次危机之前——这次危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也引起了一次空前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危机——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工人群众的关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 **第四节 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

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就其表现和发展趋势来看，同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大不相同。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工人阶级内部有机地存在着，至少在大城市和大产业中心是如此——在那些地方有工人群众中战斗性最强的人——而

且党的思想、理论观点以及政治实践都使党与无产阶级，特别是与其中最先进的分子经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种密切的关系——当然并不排除党与工人阶级内部的大小派别之间存在着矛盾，尤其是象俄国那样的一个国家，在农民政策上所犯的错误，必然要在无产阶级内部产生消极影响——特别符合关于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风和领导作用的列宁主义原则。

### (一) 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

在上面<sup>①</sup>我们已经论述过党的列宁主义观点，即规定在党与工人群众关系上必须遵守的某些原则：注意工人的积极性，因为这种积极性是党进行教育的源泉；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干劲；党要置身于无产阶级之中，并且要与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保持紧密的联系（列宁说，一直到“融合”为止）；必须让劳动者通过切身经验来搞通思想。

列宁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他和党的作用有关的原则，即作为制定政治路线的工具和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49 页起。

革命理论的传播者的原则。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党的政治指导者和理论教育者的作用。列宁认为，一个政党如果不能起这种作用，那就不是一个革命的党，因为它不会超出“经济主义”和“自发性”的水平，因为经济主义和自发性不管群众有什么样的积极性和愿望一律都看成是革命的。自从列宁开始参加伟大的政治运动起，特别在《怎么办？》一书中，他就强调指出党的教育者和指导者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包括该党的革命倾向性在内，有着根本的分歧。该党的一位最著名的代表是罗莎·卢森堡。

列宁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中写道：

“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秘密组织来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sup>①</sup>。

党对无产阶级所起的教育者和指导者的作用是符合列宁主义赋予革命理论的地位和同作为统治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必要性的。这个作用意味着抛弃“天真”的想法。按照这种想法，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8页起，引文见第330页（中文版，第22卷第300页）。

无产阶级随时都会大批地参加革命运动。在这里，列宁主义与马克思所作的分析又联系上了。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理论（是从无产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所处的关系和它所进行的斗争的科学论断中得出的），同无产者在某种情况下看成是自己的作用或利益的东西区分开来。众所周知，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写道：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sup>①</sup>

列宁主义的这些原则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已付诸实施而使它在群众革命运动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并实际上帮助群众在1917年10月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 （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实践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

---

<sup>①</sup> 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巴黎，社会出版社，1969年，第4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5页）。

做法始终没有严格遵循列宁主义原则，这些原则是党必须说服工人群众，取得他们的信任以及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来看清哪些是正确的。

党内的变化<sup>①</sup>、紧急行动的需要、无产阶级的分化（在它的队伍里失去了战斗性最强的人，钻进了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军情紧急、经济形势的恶化、工人阶级中比较落后的分子因饥寒交迫而在绝望中挣扎，以上这些情况不允许列宁主义原则充分地、经常地得到贯彻。况且，这些原则不是“偶像”，而是行动的指南。重要的是要尽可能遵循这些原则。不考虑条件和情况，想要去“贯彻”原则是荒谬的。布尔什维克党有理由认为，把俄国的资产阶级赶下台，这一事实是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事件，因此，应该竭尽全力地阻止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它们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这一口号的意义。

无产阶级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意识到形势的客观需要。他们以非凡的毅力参加军事和生产战线上的斗争，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

<sup>①</sup> 见本卷第 418 页起。

党，尽管物质上有很大的困难，还会取得最后胜利。这场惊人的政治胜利，证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最积极的分子（数年前，他们抵抗帝国主义战争导致了沙皇制度的崩溃）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也证明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实践是根本正确的。

这个根本正确的性质并不排除犯有某些错误。一旦取得对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后，所犯的这些错误——列宁在起草批评“战时共产主义”的总结时所承认的——不仅造成了党与农民群众关系的恶化（关于这一点，列宁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而且还破坏了党与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的关系。党群关系向坏的方面发展导致了1920至1921年之间冬季的政治危机。

### **第五节 1920至1921年间冬季的政治危机**

1920至1921年之间冬季的严重政治危机，一方面引起了部分农民对征收粮食的不满，另一方面，使城市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从1920年



初起，通货膨胀大幅度上升。从4月起，官方分配给城市劳动者的定量食品（不是供应红军战士的那部分征收来的农产品的定量）只能维持生存所需量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因此黑市便起了很大作用<sup>①</sup>。

从1920年4月起，许多农产品的黑市价格比牌价高四十至五十倍。此后，货币制度濒于崩溃，劳动者越来越经常地领取实物工资<sup>②</sup>。货币贬值是增加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幻想的因素之一。实际上，这种幻想表现在把“取消货币”同建立导致废除工资制的全新的经济关系看作是一回事。

极端贫困迫使城市居民和许多农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工厂则由于燃料不足而陷于瘫痪状态。这种形势是引起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比较落

---

<sup>①</sup> 关于工资和定量食品分发不足的情况，尤其是在1920年4月召开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不久以后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都承认过（参阅两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俄文本，特别是前者的119页和后者的237页。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43页注1和注2曾引用过这些资料）。

<sup>②</sup> 关于这一问题，见前引《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60—261页。

后的人不满的根子。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应对这些困难负责，而不肯承认困难是因多年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所造成的。

经济状况的恶化起因于 1920 年年底农民暴动和 1921 年 2 月爆发的罢工，尤其是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工业中心爆发的罢工。这些罢工不是针对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是受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之苦的工人们不满情绪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当时，在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中也夹杂了某些原先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的口号。这些罢工运动的某些领导人确实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再次掀起一次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运动。这些头目的希望很快就成了泡影。在彼得格勒，2 月 24 日开始的短期罢工，两天之内就蔓延开来了。2 月 26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及季诺维也夫领导的保卫委员会开展了解释工作。同时，采取了措施使工厂的粮食供应稍有改善（显然用的是红军的储备粮）和镇压那些企图用颠覆来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活动（如社会革命党在一张传单上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孟什维克则到处呼吁“根本改变政策”）。布尔什

维克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进行解释工作后使局势得到了澄清：从2月28日起，彼得格勒的罢工停止了，复工的信号是由彼得格勒“工人堡垒”普梯洛夫工厂发出的<sup>①</sup>。在其他城市里，事情经过也是如此。这证明罢工工人的不满情绪并不普遍，也不严重，主要是因为日常生活困难而引起的。

然而，在农村，1921年初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形成了，而且还影响到某些部队。危机是在彼得格勒罢工结束几天后死灰复燃的。从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上召开的一系列水兵和工人大会足以说明当时在基地上的不满情绪已经具体化了。这些大会选出了三百名代表，他们组成了代表会议。1921年3月2日，这个会议又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办公室，由“佩特里钦科”舰书记（水兵）主持。不久，这个“办公室”的人员增加到十五人，自称“临时革命委员会”，与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相抗衡。

从那时起，事态发展很快。根据该委员会的命令，三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被捕，其中就有老革命

---

<sup>①</sup> 关于这些情况，参阅《喀琅施塔得真相》，布拉格，1921年，前引O.安魏勒著作《俄国的苏维埃》第314—315页曾引用过。

家瓦西里也夫代表(他丝毫没有“官僚”习气,可是“革命委员会”仍然要把责任推到他身上)。这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员施加的压力,目的是强迫他们退党。在笼罩着喀琅施塔得的混乱气氛中,不到三分之一的党员屈服了。过了几天,苏维埃政权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了。数百名党员干部遭到逮捕<sup>①</sup>。

叛乱头目曾经为之进行过辩护的那个纲领,是为了取得广泛的支持的各种口号的大杂烩;他们的目的是掀起一个把布尔什维克从全国各级政权机关中赶出去的运动。纲领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几点是:要求苏维埃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开门(众所周知,他们中许多人与反革命勾结,或者即使他们暂时在地方上重新掌权——在内战时期,当红军不得不撤退时——也不过是充当了白卫军的“桥梁”,因为他们即使想对白卫军进行抵抗,也无能为力)。这些喀琅施塔得分子还提出建立“无党派苏维埃”的要求。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选举的话,也不过是排斥布尔什维克候

---

<sup>①</sup> 参阅保罗·阿弗里奇:《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86页。

选人的一种方式。

在喀琅施塔得分子的纲领中，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要求撤消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可是正是因为有了政治委员，才能对编入红军的前沙皇军官进行监督。一批前沙皇的高级将领，虽然不抛头露面，却忠实地干着为喀琅施塔得分子效劳的勾当，这是不足为奇的；例如，亚历山大·N. 科兹拉夫斯基将军和他手下的军官就是如此<sup>①</sup>。

在经济方面，喀琅施塔得分子的纲领主要是要求贸易自由和尊重农民的所有权。

实际上，该纲领的内容虽然说明问题，但并不重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是那些支持喀琅施塔得分子运动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

要了解这些力量的性质，必须把领导运动的头目和跟着他们跑的群众区别开来。对于前者的情况，相比之下，我们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其中有一个人，即 A. 拉莫诺夫是一个老社会革命党人的最高纲领派；特别还有一个是“革命委员会”主

<sup>①</sup> 见前引《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第98—99页。人们知道，1921年3月2日，科兹拉夫斯基对布尔什维克委员说：“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轮到我做我应该做的事了”（同上书，第100页）。

席，社会革命党人佩特里钦科，他曾做过几个月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后来，他脱离了党，去从事反革命活动（为此他曾被捕过几次）；以后，他又试图重新参加白卫军，但遭到了拒绝，原因是他曾做过布尔什维克党党员。<sup>①</sup>

关于这个运动的社会基础，应该说，在1921年初，老水兵（他们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最坚强的支持力量）在喀琅施塔得为数不多了。支持“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力量是来自乌克兰的新入伍的年青战士，他们未经过政治考验，极易响应“革命委员会”头目提出的“反专制”的号召。实际上，在喀琅施塔得分子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无政府民粹派的思潮，是反对国家主义的思潮，带着强烈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虔诚的正教色彩；人们不止一次地在他们身上看到白卫军所宣传的混合身份：共产党=犹太人<sup>②</sup>。

在国际方面，喀琅施塔得运动得到所有的反

---

<sup>①</sup> 见前引《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第94—95页，保罗·阿弗里奇对“革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的情况曾经作过介绍。

<sup>②</sup> 同上书，第172—180页。

革命思潮的全力支持。喀琅施塔得的头目和主要是由立宪民主党人在巴黎建立的“民族中心”之间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弄清楚过。但有些情况确有其事。叛乱前几周，“民族中心”拟定了名为“秘密备忘录”的计划，预计可以把喀琅施塔得作为反革命向彼得格勒发动新攻势的基地。在叛乱期间，该“中心”以及社会革命党流亡者的所有力量都动员起来支援叛乱（几天功夫就募集到数百万法郎）。最后，当叛乱失败后，“革命委员会”的十五名成员中有十一名（布尔什维克党怀疑他们与“民族中心”及其在芬兰的代表们有联系）逃到反革命的军队里去了<sup>①</sup>。

事实上，与叛乱头目的愿望相反，在国内基本上没有人起来响应这次叛乱<sup>②</sup>。大多数群众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仍然是防止资产阶级秩序复辟的唯一保障。

显然，布尔什维克党尽了一切努力阻止叛乱

---

<sup>①</sup> 见前引《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第106—125页和第208—209页。

<sup>②</sup> 只有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俱乐部散发传单，号召人们支持叛乱（见前引O.安魏勒著作《俄国的苏维埃》，第321页）。

扩大化和继续下去。由于喀琅施塔得所处的地位一边接近彼得格勒，另一边离驻扎在芬兰的反革命军队不远，所以不允许布尔什维克党进行长期“谈判”。必须在解冻之前结束叛乱。因为一旦可以通航，喀琅施塔得就可以从海上得到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军队的接应。这样，俄国的主要城市就要直接遭到军事威胁。

要叛乱分子投降的最后通牒，遭到“革命委员会”的拒绝，红军便转守为攻。3月17日，进攻真正开始了；18日拂晓，喀琅施塔得这个以“坚不可摧”著称的堡垒停止了抵抗。在1920至1921年之间的冬季危机中，令人特别痛心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这个事件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发生叛乱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部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如在喀琅施塔得刚入伍的年青战士）的不满情绪，在有些地方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因此一部分农民很容易接受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甚至轻易接受一些得到立宪民主党人支持的人们利用“极端革命”的语言进行的宣传。



其次，虽然喀琅施塔得分子发出叛乱号召，但喀琅施塔得事件并没有在国内蔓延开来，这就说明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征收粮食问题如何紧张——，布尔什维克党永远是领导革命的党，它的组织能力是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斗争胜利的保证。

喀琅施塔得事件导致布尔什维克对过去的“苏维埃各政党”的态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硬，因为它们与最反动的政治流亡分子和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后者支持“民族中心”）；布尔什维克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决摒弃让这些党派重新参加苏维埃活动的想法。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内在对待叛乱的态度上再也不犹豫不决了。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完全是出乎意料地团结。与此相反，党内在对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群众不满情绪的看法上存在分歧，并引起党内派系之间的斗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向来是布尔什维克党生活中的一部分。1920年至1921年之间冬季危机的严重性促使党的领导改变了斗争方式。为了了解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的重大意义以及布尔什

维克党的思想的生命力，有必要简单地提一下布尔什维主义内部斗争的一些情况，这对继续研究有关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这些斗争的情况将是十分有益的。

## 第二章

### 国内战争前在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传统。1903年，即布尔什维主义在政治上确立的一年，亦即《怎么办？》发表后一年，列宁着重指出“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上辟出一定的篇幅，让大家交换意见”，让党得到全部的、真正全部的材料来作出独立的判断；他谴责那些极其莽撞地和那样尖刻地对待“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人，因为他认为对党的生活来讲，容忍“在一定程度上抛开集中制……不要绝对服从纪律”<sup>①</sup>是更为可取的。

1904年，列宁重新指出，广泛交换意见，甚至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15页（中文版，第7卷第99页）。

进行各种倾向的论战，对党的生活是十分重要的。<sup>①</sup> 其实，党内存在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分歧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因为党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孤岛”。有些党员在某个时期不免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只有通过党内争论，才能为阻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取得无产阶级运动领导权而斗争，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立场上，并在原则上不妥协。当然，当决议作出之后，所有的人都应当遵守，因为党不是一个争论俱乐部，而是一个斗争的机关；正因为如此，党应当是有纪律的，应当服从领导机构。

总的来说，党认为列宁这样制定的思想斗争路线，对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执行决议时应遵守党的纪律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条路线不仅一直到1917年，而且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几年，都占据着优势地位。当时，党内的讨论甚至格外活跃，反映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广泛性。

有不少文章谈到了在十月革命前夕和1917至1918年间所发生的冲突，对这些文章进行分

---

<sup>①</sup> 参阅列宁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载《列宁全集》，第7卷第212页起（中文版，第7卷第189页起）。

析，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主要观点和了解这些观点的主要的阶级内容。

## 第一节 1917年2月至10月间的 党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在2月和10月之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两条路线。首先，在列宁从流亡回国之前，出现了一条支持临时政府的路线。列宁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和拒绝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作战的革命斗争口号，但这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部分领导人却对临时政府给予有条件的支持。

这条“护国派”路线从1917年3月14日起，得到了刚刚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主编的《真理报》的支持。

在新编辑部领导下出版的第1号《真理报》上，斯大林号召“保持[革命的。——贝特兰]既得的权利，以便彻底消灭旧势力并……把俄国革命向前推进”<sup>①</sup>。

---

<sup>①</sup> 参阅1917年3月14日《真理报》发表的《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文章。载《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1页（巴黎，社会

次日，在3月15日的《真理报》上，加米涅夫支持更鲜明的“护国派”立场；16日，斯大林建议要“对临时政府施以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sup>①</sup>。这等于是采取孟什维克“助长资产阶级”的观点，以代替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立场。

七年后，斯大林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中提到了这个时期的事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这篇演说中，斯大林试图为自己辩护，说当时采取这个立场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他说：

“党（党的多数）……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sup>②</sup>

---

出版社，1954年，第359页，中文版，第3卷第3页）的译文没有清楚地译出俄文的原意。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前引E. H. 卡尔的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苏联的形成》，第81页。

① 见前引《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页（中文版，第3卷第9页）。

② 见《斯大林全集》，英文版，莫斯科，1953年，第6卷第XIV页和第450页，引文见第348页（中文版，第6卷第289页）。只字未提“反潮流”可能是正确的思想。

列宁于1917年4月3日回国,使他所捍卫的革命路线逐渐取得胜利<sup>①</sup>,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例如,在列宁发表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前景为基础的《四月提纲》的次日,加米涅夫还继续声称:

“关于列宁的计划,就其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它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这个原则出发的,并且他认为应当立刻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sup>②</sup>

由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赞成列宁的提纲,加米涅夫不久就陷于孤立。但是,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全面的胜利。例如1917年9月,当列宁发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却赞成布尔什维克参加苏维埃以外的“民主会议”,这时仅仅由于受到列宁要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威胁,中央委员会才不得不接受他的决议。

不久后,列宁要求中央委员会准备起义。委员会以十票对两票通过,这两张反对票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的。这两人向列宁的革命路线

---

① 见本卷第98页起。

② 关于这一点,参阅前引E. H. 卡尔的著作《苏联的形成》,第87页。

进行公开的挑战。这时，斯大林——七年后他把这些分歧说成是“意见不一致”——作出了下面的判断：

“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坚持争取革命胜利的方针和回头看看欧洲，第二条路线是不相信革命，只打算做一个在野党。”<sup>①</sup>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并没有象列宁要求的那样被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于12月20日）仅仅以五票赞成三票反对决定接受他们的辞职。事实上，辞职的事以后也没有下文。十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并担任了重要的政治职务。

十月革命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当然还在继续，但斗争针对的具体问题改变了。

## 第二节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斗争

引起严重分歧的问题之一——前面已经看到——就是“联合政府”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提出

---

<sup>①</sup> 引自前引 E. H. 卡尔的著作《苏联的形成》第101—102页（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66页）。



来的：起义胜利后的当天晚上，布尔什维克组成了一个清一色的政府，这个政府以后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强大压力，两党要求组织一个由苏维埃中所有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央委员会答应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举行谈判，但对列宁来说，谈判无非是一种策略性的行动（列宁称之为：“应该使谈判成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sup>①</sup>），然而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来说，谈判应当达到组织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的目的。

当列宁于1917年11月1日建议放弃谈判时，党领导内部发生了新的危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放弃谈判的决定。被布尔什维克党指派为谈判代表的加米涅夫和李可夫甚至违反决议，不按照决议行事。

1917至1918年间冬天和1918年春天，开始了一次极其严重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和党的几个机构内引起了分歧，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广泛的发展。就在这时期成立了

---

<sup>①</sup> 见1929年发表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56页），前引E. H. 卡尔的著作第113页曾引用过。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当时展开的思想斗争主要是环绕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 第三节 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的和平谈判和以后的条约本身所引起的危机，实际上是从1918年1月5日开始的，这时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刚开始同德帝国主义进行谈判。显然，这时德帝国主义只有在苏维埃政权同意割让德军仍然占领的大片领土：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二分之一的条件下，才肯和苏维埃政权签订和约。

列宁决定接受这些条件，立即签订条约。他意识到全国的和平愿望。他也了解军队的力量如此涣散，已不能抵抗德军新的进攻。

托洛茨基赞成拖延政策（“不战不和”）。布哈林则主张进行“革命战争”（不过当时没有任何进行战争的武装力量），但当他看到自己陷于孤

立时，就转到托洛茨基这边来，以致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处于少数派地位（九票支持托洛茨基的提纲，七票支持列宁的提纲）。

中央委员会作出了这个决定后，德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又发动了进攻，并深入苏维埃领土。1月17日，列宁重新提出他的提纲，但又一次以六票对五票（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说德国的进攻将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影响，并将掀起支持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浪潮）被击败。

德军进展得如此迅速，以致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于1月18日重新召开会议。这时，托洛茨基同意列宁的意见。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提纲，但只是七票对五票。

数天中，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所采取的立场（形式上是“左”的立场，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这时期前线的失利，使苏维埃俄国不得不接受德帝国主义的新的要求。在德帝国主义要求割让的领土单上，又添进了乌克兰、利沃尼亚、爱沙尼亚。按照这些要求，苏维埃政权所管辖的领土将损失百分之二十六的人口，百分之二十七的可耕地和百分之七十五的钢铁生产能力。

列宁要求不加讨论，直接签订和平条约。中央委员会犹豫不决。斯大林提议不要无条件地接受德帝国主义的要求，重新进行谈判；可是列宁的提纲以七票对四票获胜<sup>①</sup>。

1918年3月3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正式签订了，但过去几个星期说明了党的分裂是多么严重。实际上，分裂的情况是，一派同列宁一起认为在俄国保持无产阶级政权，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是极端重要的，另外一派则认为宁肯让政权消灭也不能拿无法接受的让步作为代价来苟延残喘。因此，条约的签订并没有缓和党内危机，例如，各地区党组织纷纷发表的声明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时期党的各个组织还是可以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

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后，莫斯科省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声明不再承认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直到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选出新中央委员会时为止。

---

<sup>①</sup> 当时以布哈林为主要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非现实主义，最能说明问题：即使在战火重新燃烧的情况下，他们也拒绝接受旧“协约国”法国和英国的武器，而列宁则准备接受“帝国主义强盗的土豆和军需品”。

这时仍在继续工作的中央委员会正式承认，凡不赞成中央委员会一个月前所作出的决定的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列宁在评论莫斯科省委员会的决议时，写道：

“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背道而驰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sup>①</sup>

1918年3月4日，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不久，彼得格勒党委员会出版了叫做《共产主义者报》的日报的创刊号；这家日报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报。当时，他们组成一个反对派，公开走上了分裂和另建新党的道路。

#### 第四节 “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国家 资本主义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签订后，“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是对对外政策和战争问题，而是对党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63页（中文版，第27卷第54页）。

的领导认为必须对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资产阶级分子作出让步，展开了越来越猛烈的攻击。这些攻击是一部分工人对党施加压力的反映，他们希望保持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的组织形式，不同意把工厂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个机关的负责岗位或领导岗位交给资本家、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管理人员。

我们知道，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决定改变苏维埃政权同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的关系，因为他们的能力对国营工厂的经营和管理，对经济活动的协调，被认为是需要的。因此，旧的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被部分地保持下来或者重新建立起来，同时对资产阶级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也作了一些让步，以取得他们的合作，并且采用了企业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同样，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决定采用由工会监督的奖金制度。

“左派共产主义者”谴责了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报》创刊号上，他们攻击“旨在引进工人劳动服务制、采用计件工资制和延长劳动日的劳动政策”。照《共产主义者报》的说法，“引进这种纪律，同时恢复资本主义的工业管理方法，不能真正提

高劳动生产率”，它只能“损害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积极性和组织性。这些措施有奴役工人阶级的危险，将在觉悟较低的人中间，同样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间助长不满情绪。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破坏分子’的不满情绪，共产党要引进这种制度，就不能依靠劳动者，必须依靠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岂不是自取灭亡”。

同一期《共产主义者报》还揭发了“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各人民委员的权势，地方苏维埃失去了独立性和事实上放弃了从基层起自行管理的国家公社的特征。布哈林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过“每一个厨妇都应当学习管理国家”<sup>①</sup>，布哈林接着又说：“但是，如果每一个厨妇背后都有一个不停地发号施令的委员，那将要怎样啊？”。

在《共产主义者报》第二号发表了另外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奥新斯基的一篇文章。他写道：

“我们主张通过劳动者自己的阶级创造性，而不是通过企业领导人的命令来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如果无产阶级自己不能创造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必要条件，那末，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谁也不

---

<sup>①</sup> 这句话在《国家与革命》中未查到。——译者

能强迫他们这样做。如果向工人举起棍棒，那末，棍棒不是在另外的社会力量手里就是在苏维埃政权手里。但那时，苏维埃政权必须寻求另外一个阶级(……)的支持，来反对无产阶级，这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建立，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而是另外的东西：国家资本主义了”<sup>①</sup>。

列宁对这些言论作了答复，证明在当时的俄国革命阶段，问题不在于“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也不在于对生产关系进行深入的变革，而在于尽快防止正在增长的经济混乱。为了说明什么是当前的紧急任务，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观念。

1918年3月初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谴责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措施。大会以后，“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党内一直到那时所拥有的组织力量迅速垮台（一部分是采取行政措施、干部调动等手段完成的）。《共产主义者报》不再作为日报出版，虽然迁到莫

---

<sup>①</sup> 这儿段文字引自前引莫里斯·布林顿的著作《布尔什维克与工人监督》第110—111页。



斯科以后还出过几号，但“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个城市和乌拉尔地区失去了他们的多数派地位。他们放弃了另立新党的打算，依旧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

一年后，列宁从这次危机中得出了积极的结论，他说：“去年我们党内进行的斗争收到了极大的成效；它引起了不少的尖锐冲突，但是没有尖锐冲突，也就没有斗争。”<sup>①</sup> 在这个时期，以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又回到党的岗位，包括领导岗位上来。

布尔什维克党于1918年初遇到的危机，证明它当时有在党内展开公开的思想斗争的能力；同时也说明“极左”立场、小资产阶级立场（特别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和确实反映出一部分基层工人党员愿望的立场是互相结合的。显而易见，“左派共产主义者”所以能得到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拉尔（都是大工业中心）有力的支持，决不是偶然的。

1918年春末，“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个集团消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文版，第29卷第54页）。

失了，但许多拥护它的政治路线的分子——例如，不论是在苏维埃里还是在劳动场所里，这个集团总是以劳动者更大的首创精神来对抗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还经常出现，逐渐形成了新的反对派。下文将重新提到这一点。

无论如何，当白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叛乱，武装斗争问题占据首要地位的时候，由于主要矛盾转化，“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纲领”所挑起的问题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在转入对刚刚开始的这个新阶段进行分析以前，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列宁于1917年10月前后，为了使他的观点取得胜利而不得不进行的广泛的斗争。

所以要这样再三强调，这是因为争论和分歧的广泛性和列宁有好几次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这使人看出，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官方历史”说的恰恰相反，公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在这个时期特别尖锐。同时，所以要这样再三强调，也因为这些斗争证明在整个俄国社会发展起来的阶级矛盾对布尔什维克党施加的压力。

以上种种也说明了——这对了解列宁逝世后

的情况是十分重要的——从 1917 年 2 月至 1918 年 6 月这个决定性阶段中，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没有出现过坚定而持久地站在列宁立场上的领导集团；充其量不过是有几个人比较容易、比较迅速地拥护列宁捍卫的提纲罢了。

如果没有可以说差不多经常同列宁站在同一立场上的领导集团，那就有可能把同列宁有严重分歧的先后两股思潮看成是一个东西。

第一股是“右倾”思潮。它主要在 1917 年 2 月至 12 月表现出来。属于这股思潮的不仅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且有时还有斯大林，他们在列宁逝世后立即组成了党的领导核心，即被称为继承列宁的“三人小组”。

第二股思潮主要从 1918 年 1 月开始发展。属于这股思潮的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同时还有斯大林（他到了最后的时刻才支持列宁关于必须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立场）；而主要的还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此外，这股思潮比第一股思潮更有势力，同时时间也比较长。许多和它的立场接近的人以后也得到了各种反对派的支持。

然而，随着苏维埃俄国进入一个反对白军叛

---

乱和外国干预的武装斗争的阶段，许多问题就都以新的面貌出现了。这就是现在应当研究的在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展开的思想斗争的几个主要方面。

## 第三章

###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 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在“战时共产主义”大部分时间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表现得不如前几年那样尖锐；当时党的注意力和努力基本上集中在防御的问题上。总的说来，布尔什维克党对于这些问题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因此这些问题没有引起重大的争论，更何况在这些问题上持有与大多数代表不同看法的人，一般都很快地表示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仍有一些违反纪律的行为，这些行为同反对历届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所决定的政策的那个“不公开的反对派”是一致的。

但在这段时期内，“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过的一部分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尤其是从1920年

起,当胜利即将到来,应该讨论“战后”问题的时候,新的派别又出现了。这些新的派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形成,到临近 1920 年底就更明显了。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以前那个时期的情况。

### 第一节 1918 和 1919 年的反对派

甚至在白军发动武装叛乱以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不是一个“公开的反对派”;它是在党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它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必须使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国内战争一旦结束,它又重新出现,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这一趋势的最早表现之一发生于 1918 年 4 月,那是在成立以布尔什维克尼·阿·斯克雷普尼克为首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时候。

1918 年 4 月 3 日,列宁发出了一份支持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电报,“对今天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支先进队伍的乌克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英雄斗争,表示热烈的同情”。这时斯大林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反对成立这个不属于俄罗

斯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斯大林所采取的立场引起了斯克雷普尼克的下列反应：

“我们对斯大林委员的公报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我们声明，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动不是取决于俄罗斯联邦某某或某某委员的态度，而是由乌克兰劳动群众的意志决定的，一如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所表达的那样。象斯大林委员那样的声明将破坏乌克兰的苏维埃制度……这些声明是直接同乌克兰劳动群众的敌人串通的。”<sup>①</sup>

斯大林对成立一个不包括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国内的苏维埃共和国抱敌视态度，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政治观念的表现，这个政治观念曾多次重复出现，而且后来得到流亡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及其在苏维埃国家机关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中的资产阶级的支持。

1918年5月，这个政治观念又有所表现。这时斯大林发给驻达格斯坦（反革命武装匪帮正

---

<sup>①</sup> 这封电报是4月6日乌克兰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斯克雷普尼克致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在1966年6月26日至28日，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组织的讨论会上，老布尔什维克A. V. 斯涅戈夫提到这个电报。引自鲁瓦·阿·梅德维捷夫：《斯大林主义》，巴黎，瑟伊出版社，1971年，第64页。

在那里活动) 苏维埃代表斯捷潘·邵武勉的指示中,对反革命头目同受骗的农民群众不加以区别。指示的内容是采取毫不犹豫的行动,“把一些村庄化为灰烬,以儆效尤”<sup>①</sup>。

### (一)“军事反对派”

从 1918 年夏季起,另一个反对派发展起来,该派显然是属于“左倾”的,被称为“军事反对派”。关于这一思潮很少有文件记载,但这个思潮的存在是相当公开的,被认为是亲信的有伏罗希洛夫、E. N. 雅罗斯拉夫斯基、A. Z. 卡缅斯基、和 S. 米林等人,其中有些人当时是——以后也往往是——同斯大林有密切关系的<sup>②</sup>。

“军事反对派”纲领中的一点是拒绝招募军事专家参加红军。斯大林没有作出赞成“军事反对派”的任何公开声明,但 1918 年他在察里津前线担任政治工作时所作出的决定是同“军事反对派”

---

<sup>①</sup> 参阅 1963 年 9 月 20 日《真理报》。

<sup>②</sup> 几年前, D. Iou. 佐林曾写过一篇文章,文章没有发表,题目是《军事反对派问题》,鲁瓦·梅德维捷夫在前引著作中曾引用过,参阅第 62 页注 29。



捍卫的路线相符合的：例如，他违反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解除了大批军官的职务。由于这些决定，最后斯大林本人也被解除了在南方战线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的职务，而斯大林曾试图解除其指挥权的S·N·西京则保留原职。人们从口头汇报中还知道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一篇未发表的发言中）曾严厉谴责第十军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这些决定是在“军事反对派”的怂恿下作出的，并使红军损失了许多战士。<sup>①</sup>

但是这个反对派所起的作用毕竟是比较小的。它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征性的：它的活动方式表明，就在这一时期，党的机关内部已存在着充分有组织的势力，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反抗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决定。

## （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新党纲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左派共产主义者”以前纲领中的各种观点继续得到少数原属这

---

<sup>①</sup> 关于以上各点，参阅前引鲁瓦·梅德维捷夫著作，第61—62页，注26—28。

一集团的分子如斯米尔诺夫<sup>①</sup>等的支持；另有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如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也为类似的立场辩护。

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1919年3月18日—23日），奥新斯基要求让足够数量的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使中央委员会“无产阶级化”（人们将注意到，大约四年后，列宁将提出类似的建议）。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萨普龙诺夫和奥新斯基要求苏维埃的工作更民主化，在他们看来，这些苏维埃所起的作用已降低到批准机关（即“盖印”机关）的作用。这些论点都被第八次代表大会否决了，相反，代表大会赞成一种强有力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就是这次代表大会设置的<sup>②</sup>。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在有关经济方面的第五条指出：

“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

---

① 斯米尔诺夫以及其他几个从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后来在1936—1937年的案件中向被告席上重新出现；他们将站在1918—1920年间反对他们当时所维护的立场的主要反对者一边。

② 见本卷第422页。

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同时，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参加经营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是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sup>①</sup>。

事实上，党纲第五点并没有带来具体的后果；企业的领导人绝不同意在布尔什维克党强调个人负责制的时刻，让工会参加企业的管理。第五条的通过，显然主要是当时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对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日益增长的作用抱有不满情绪的反响。此外，党纲有关经济方面第五条所提出的原则以后将被认为是一种“工团主义毛病”的反映；这将成为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与一个要求尊重党纲这一部分的新的反对派之间冲突的出发点。

## 第二节 1920 年与党内危机

1920 年，主要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1920 年

---

<sup>①</sup> 参阅前引《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1 卷第 422 页（中文版，第 1 分册第 541—542 页）。

3月29日至4月5日)起,重新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危机,这次危机将扩大和深化,一直延续到第十次党代表大会。1920年3月,出现了一个新的“左倾”反对派,该派以名为“民主集中派”集团为代表。这个集团的成员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成员很少有关系。但其中也有奥新斯基、瓦·斯米尔诺夫和萨普龙诺夫在内。“民主集中派”集团认为过分集中,谴责集中制和滥用强制方法。1920至1921年间,他们积极参预托洛茨基与布哈林同列宁的争论,托洛茨基与布哈林采取和列宁不同的立场,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提案,要求工会完全服从国家机关。<sup>①</sup>

### (一) 1920至1921年托洛茨基和 布哈林的立场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战时共产主义”的观点统治着党的大多数代表,并促使大会通过了有利于“劳动军事化”并使工会严格服从国家行政机关的措施。可是这些措施,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及普遍存在于领导班子内的各种思潮的人看

---

<sup>①</sup> 见本卷第545—546页。

来,意义有所不同,重要性也不一样。一些人认为,当时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具有适应形势需要的性质;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原则性”的决定,战争结束后仍将保留下去。这种分歧造成了意见冲突,一直继续到第十次党代表大会。

1920年,托洛茨基是最坚决赞成劳动和工会“军事化”的“理论家”之一。他否认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所讨论的措施仅有偶然的、临时的性质。相反,他认为这些措施体现了长期的要求,是要把工会变为严格从属于政权的国家机关,工会的领导人应当由政府和党来指派。这样,托洛茨基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宣称:

“应当向工人说明,他们应该在哪里,应当调动他们、领导他们,完全同士兵一样……,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劳动的要求将达到最高强度……劳动的‘逃兵’应当关入管教营或集中营。”<sup>①</sup>

在同一次大会上,托洛茨基还说:

“没有工会本身的军事化,不建立一种使每一个

---

<sup>①</sup> 参阅《托洛茨基选集》(俄文版),第15卷第126页,引自前引莫里斯·布林顿著作《布尔什维克与工人监督》第149—150页。

劳动者自视为一个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军人的制度,军事化是不能设想的;如果他接到调动的命令,就应当执行;不执行,即将作为逃兵受到处分。谁负责这件事呢?工会。工会创立新的制度。这就是工人阶级军事化。”<sup>①</sup>

拉狄克也向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说:“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应当克服孟什维克和各种调和分子所心爱的劳动自由的资产阶级偏见”<sup>②</sup>。不过,只有拉狄克一人提出这样的论调。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没有通过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所支持的路线。大会否决对劳动者施行强制的方法,否决军事化是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大会肯定只有在战争的形势下,实施劳动军事化才是正确的。大家知道“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第十四点说:“因此,只有在必须

---

<sup>①</sup> 参阅《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1934年,第101页;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14-215页。

<sup>②</sup> 拉狄克发言的这一部分刊登于1920年4月2日《消息报》。象E. H. 卡尔那样,提出下面这个情况不是没有用处的:拉狄克发言全文没有收入大会的正式记录中,借口是将另外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参看前引《记录》,第277页)。事实上,这本小册子从未出版过。

保持整个军队来执行军事任务的情况下，才适宜于使用保持军队机构的整个劳动军。”<sup>①</sup>

因此，大会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使劳动和工会军事化的观点。大会甚至通过了“民主集中派”集团的提案。这个提案规定要设立一个监督委员会，负责揭露滥用强制手段的错误，“不管犯错误的人地位或职务的高低”；事实上，这不过为了在一定形式上满足这一集团的要求，因为这个委员会实际上似乎并没有起过作用。

1920年整整一年和1921年初，托洛茨基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列宁的不同立场越来越抵触。

在第三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甚至为强迫劳动辩护，比如他说：“说强迫劳动常常是没有生产效能的，真的是如此吗？……那是自由主义最拙劣最卑鄙的偏见：成群的奴隶也是有生产效能的……奴隶的强迫劳动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现

---

<sup>①</sup> 参阅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载《列宁全集》，莫斯科，1935年，第25卷附录第626页（《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15页）。

象。”<sup>①</sup>

托洛茨基追溯到奴隶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认为可以证明在整个历史阶段采用军事化劳动都是有理由的，到现在，只要这个军事化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决定的就行。托洛茨基作为国家强制的拥护者，反对那些要给工会组织以更多自治权的人，这些人认为工会组织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表现形式之一。这里可以提前引用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中的一段话（发言中为了避免攻击列宁所主张的路线，是以“工人反对派”作为“靶子”的）：

“他们（指工人反对派。——贝特兰）提出了一些危险的口号。他们把民主原则奉为偶像。他们把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的权利置于党之上。好象党没有权利来确保自己的专政，即使这个专政同工人民主变化莫测的脾气有暂时的冲突……

“党必须维护它的专政，……不管工人阶级暂时犹豫不决，……专政不是经常都建立在工人民主的拘泥

---

<sup>①</sup> 参阅托洛茨基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大会记录，俄文版，莫斯科，1920年，第85—97页）；引自前引莫里斯·布林顿著作（同英译本核对过），第155—156页。



于形式的原则之上的。”<sup>①</sup>

只要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党，一个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的党，就可以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存在下去，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论点，布哈林从而得出了这样一个说法，即“强加的自觉纪律”<sup>②</sup>。

按照布哈林的说法，无产阶级通过党和国家把一种纪律强加“给自己”。党一方面和无产阶级是“同一体”，另一方面又“高于”无产阶级，这样在布哈林看来，党就有理由对工人群众实行强制；这种强制等于一种“自觉纪律”。对于国家的权力、国家各种不同机关和国家所任命的技术人员的权力，布哈林就是用同样方式来进行推论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论点归结到这样一个思想，即党是绝对正确的，党“本质上”高于群众，党和它所领导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不会改变”，不论它在思想和政治方面采取什么做法。

---

<sup>①</sup> 引自柯伦泰：《工人反对派》英译本再版附录的《历史札记》。该书再版是由“团结”小组付印的，法译本载《社会主义或暴行》杂志，1964年1—3月，第35期（引文见第119页）。

<sup>②</sup> 见前引尼·布哈林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54页。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论点还给党指定了一项新的任务；党不再是听取群众的建议和批评、领导群众的先锋队；党看到自己已负有对群众进行“监督”和强制的任务。

前面已引过的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系统地发挥了他的不合辩证法的观点，并用这些观点来支持他的政治立场。

从此，布哈林（他在1918年曾反对给每一企业委派一个由个人来负责企业经营的领导）把建立个人领导制度看作是“无产阶级管理工业的一种集中而严密的形式”<sup>①</sup>，把“人民的军事化……看作是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方法和工人阶级组织农民的方法”；他还补充说，无产阶级专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产阶级军事专政”<sup>②</sup>的形式。

此外，布哈林还把代替货币工资制的食物分配制看作是工资制的消亡，在他看来，这证明有理由采取劳动义务制；他认为在过渡时期将看到货币制度的崩溃，从而也是商品制度的崩溃，这是通

---

① 见前引布哈林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27页。

过人们所说的“货币贬值”<sup>①</sup>表现出来的。

## (二) “工人反对派”<sup>②</sup> 提纲

在托洛茨基声称拥护竭力加强集中制和军事化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内另一个派别发展起来了。这一派是过去“民主集中派”集团的立场的继续和发展。这一派扩大后(原来不属于“民主集中派”的，如施略普尼柯夫、亚历山得拉·柯伦泰也成为该派的积极分子)，取名“工人反对派”。“工人反对派”引用了 1919 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有关经济一章的第五点。它揭露了党和国家机关内命令主义的发展和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入这些机关。

在“工人反对派”看来，党的路线必须彻底改变，特别是要把工业的管理权交给工会组织(“国家工会化”的说法说明了这一立场的特点)。这个反对派要求工厂委员会起广泛的作用，要求采

---

① 见前引布哈林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第 145 页。

② 关于“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参看《社会主义或暴行》杂志，第 35 期。列宁对这些提纲的一些批判，将在下文研究(参阅本卷第 561 页起)。

取使工资更平等的政策。<sup>①</sup>

在列宁看来，“工人反对派”的提纲是一种“工联主义”（即工团经济主义）观点的反映；这些论点同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取消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

在1921年头两个月中，对“工人反对派”的提纲进行了讨论。这个提纲在1月2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并由该派印成小册子散发。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1921年3月8日至16日）召开的前夕，“工人反对派”在各个工业区，主要是在莫斯科、顿涅茨河流域等地区的党组织中有着显然很巩固的据点，但在整个党内，只是少数，它出席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人数也很少。

### （三）列宁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观点的斗争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几个月内，进行着一场规模很大的政治斗争。

这场斗争的最初一段发生在1920年11月8日

---

<sup>①</sup> 参阅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记录（俄文本），附录2，第789—793页；引自前引莫里斯·布林顿著作《布尔什维克与工人监督》第173页。

和 9 日，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展开的。托洛茨基断言必须继续推行国内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措施，甚至还要扩大，即使是非常措施也应如此。他还坚持这一观点，即工会领导人对于纪律和工资如果持有与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不同的看法时，苏维埃国家应当有权从上面采取一项简单的决定解除他们的职务。因此，他赞成“工会国家化”，目的是使工会成为提高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工具。他要求重申——即使在 1920 年底出现的新局势下——有权撤换那些不承认工会是为生产服务的工会领导人。

1920 年 11 月 8 日，托洛茨基遭到了列宁的反对。列宁指出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措施具有特殊的性质，并必须考虑到局势的新特征（不再处于军事紧急措施的控制下）。列宁的观点获得胜利，但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以八票对六票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观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指出“应该开始逐步而坚决地从重点突出过渡到均衡”；“应该把……取得优良效果的种种方法，如发扬民主和首创精神、参加工业管理以及

开展竞赛等等，运用到整个工会运动中去”<sup>①</sup>。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针对托洛茨基所维护的立场的文件，谴责“中央集权制和劳动军事化蜕化的一些现象：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狭隘的公职人员制度、并对工会进行令人讨厌的干涉”。设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党同工会的关系；季诺维也夫被指定为该委员会的发言人。<sup>②</sup>

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分歧已达到这样的规模，即决定在1920年12月初举行一次广泛的公开辩论会。党的全体领导人——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施略普尼柯夫和其他许多人——都参加了这次辩论会。

这场政治斗争的一个有意义的插曲是两次群众大会：一次在1920年12月24日，托洛茨基对广大的工团主义者和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发表讲话；另一次是在六天后，会上许多人再一次发言，主要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

---

<sup>①</sup> 参阅列宁提出并于1920年11月8日通过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9—390页（中文版，第31卷第339页）。

<sup>②</sup> 关于这几点，见前引皮埃尔·布鲁埃著作《布尔什维克党》，第141页。

布哈林、施略普尼柯夫等(大会的发言于1921年用俄文出版,书名《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第二次大会后一星期,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另一个群众大会上作了发言。<sup>①</sup> 1921年整个1月份,《真理报》几乎每天刊登一篇有关劳动军事化和工会国家化问题的文章。

列宁的论点在辩论会上得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客观形势本身也起了变化,逐渐使八名中央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安得列也夫、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和谢烈布利雅柯夫)所代表的集团丧失阵地,只得到少数人支持,而且支持的人越来越少,加上“工人反对派”集团采取了同托洛茨基根本对立的立场,但这个立场也没有得到列宁的赞同。

1920至1921年之间的冬天的论战,给列宁提供了一个谴责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用死气沉沉的教条主义文章来为自己立场“辩护”的机会。列宁就这样公开地反对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些

---

<sup>①</sup> 关于这几点,可参阅前引 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24页起。

问题不仅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人所有，而且无形中几乎全党都有，即把苏维埃国家和“工人国家”等同起来的问题。

1920年12月起，列宁虽然没有做到彻底决裂，没有提出他以后明确表示的那样，但是已经指出一些基本观点。最重要的观点是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论点的片面性，把苏维埃国家说成是一个“工人国家”，而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恰恰是非常复杂的。<sup>①</sup>

这个国家的性质使工人不得不拥有自己的组织，对执政党保持足够的独立性，足以“保护自己，……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sup>②</sup>。大约一年后，列宁重新提到这个问题，并在1922年1月12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案，经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就是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sup>③</sup>的决议。在决议中，列宁着重指出工人阶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页起，特别是第16-17页（中文版，第32卷第1页起，特别是第6-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7页（中文版，第7页）。

<sup>③</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85页起（中文版，第33卷第155页起）。



级同苏维埃国家之间可能有“利益的对立”，以及劳动者由于有必要打击官僚主义偏向和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可能有理由采取“罢工斗争”。<sup>①</sup>

列宁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其他几位领导人）在原则立场上的斗争，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显出列宁同这两个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分歧，“是因为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sup>②</sup>

争论还显出更深刻的分歧，这些分歧触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实质。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用错误的抽象方法，认为苏维埃国家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纯粹的表现形式”，而列宁则竭力阐明苏维埃国家的双重性质，在作为由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且这个党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的国家这个程度上来说，是“工人国家”，而在一些特点方面，即在它对资产阶级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依赖方面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它的行政机构的特征的政治关系方面，则是“资产阶级或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3卷第188页（中文版，第33卷第158页）。

<sup>②</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页（中文版，第32卷第5页）。

小资产阶级国家”。列宁毫不犹豫地指出，在苏维埃国家有权利称为“工人国家”之前，还要经过“15—20年……，而且……”<sup>①</sup>，显然在1921年就应该消除那些不能使苏维埃国家取得这一称号的特点。

争论使列宁能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巩固政权而斗争（因此也是为了掌握群众而斗争）的问题，而不是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为生产而斗争。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中所讲的话，其意义远远超越当时论战的范围：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sup>②</sup>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页（中文版，第32卷第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83页（中文版，第72页）。

## 第四章

### “战时共产主义”末期和新经济政策 初期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1920至1921年间的冬天，布尔什维克党内展开的斗争是同党的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相呼应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某种方式提出的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也反映了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首的集团“原则”上所要建立的东西），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后已没有公开的市场了。这并不是说斗争所反映的实践已完全绝迹，而是在退却，尤其是不再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需要”进行辩护了。在进行五年计划期间，人们仍将看到重新出现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接近的观点，主要是有关工会的作用方面，认为基本

上是在“生产”和“纪律”方面的作用。

另外，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是最后一次能够公开广泛展开讨论的代表大会，在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各个反对派不再能如此自由地发表意见，而这是违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各个反对派越来越感到他们的舆论工具受到限制，以至终于消失。

### **第一节 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和 1920年同两个反对派论战的结束**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个阶段内，各种不同倾向的斗争证明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的广泛性和党所经历的危机的深刻性。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开始时（1920年12月），有七个不同的“纲领”。在大会期间，两种有组织的倾向继续反对列宁所捍卫的提纲。<sup>①</sup>

事实上，经过广泛讨论后，“工人反对派”集团终于拟订了一个提纲，得到其他接近的派别的支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前引皮埃尔·布鲁埃著作《布尔什维克党》，第142页。

持；同样，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拟定一个单独的文件，得到中央委员会八名委员的支持（因此，他们提交大会的提案被称为“八人小组提案”）。至于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是和列宁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同这个立场相适应的提案，名为“十人提案”。这个提案主要得到斯大林、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支持。

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结束了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两大反对思潮的论战。“工人反对派”的提案只获得十八票，“八人小组”的提案获得五十票。“十人提案”获得三百三十六票。<sup>①</sup>代表大会上，最剧烈的论战是针对“工人反对派”的，因为“八人小组”的立场在以前几个月已经受到了许多批判。

### （一）对“工人反对派”提纲的否决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对“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攻击得特别厉害。事实上，这种攻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对托洛茨基的立场的批判，即对

---

<sup>①</sup> 关于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和大会前的论战，见大会公报（俄文本，1921年在莫斯科出版）和前引皮埃尔·布鲁埃著作《布尔什维克党》，第138—143页和第157页起。

命令主义、行政解决和“唯生产论”的倾向的批判，对布哈林的某些提法所造成的混乱也是有利的，布哈林企图充当托洛茨基立场和“工人反对派”之间的“桥梁”，既要求“工会国家化”，同时又要求“国家工会化”。<sup>①</sup>

最初，“工人反对派”的某些提纲，是代表着——一如列宁所承认的——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命令主义倾向的一种健康的反应。提纲反映了广大工人阶层的实际愿望。但是“工人反对派”把这些愿望片面地系统化，他们忽视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使自己的纲领越出了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的范围。这样，他们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完全一样，“忘记”了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这一问题要求人们对列宁正确地称为“革命的适宜性”给予最大的注意。<sup>②</sup>因此，不管形式如何，托洛茨基的提纲和“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在所强调的方针上是互有关联的，在当时

---

<sup>①</sup> 关于布哈林的观点，见《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第十六，第802页，引自前引莫·布林顿著作《布尔什维克与工人监督》第171页。

<sup>②</sup> 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86页（中文版，第32卷第75页）。

的形势下，如果采取这个方针，就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因为它不考虑到客观存在的一切阶级关系。<sup>①</sup>

“工人反对派”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以遭到严重的失败，除了这个主要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大会筹备工作的“高度行政化”，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化”分子的力量增长（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纲所取得的票数证明了这一点）。犹豫不决的代表们愿意在困难时刻促进党的统一，对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提出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

季诺维也夫反对“工人反对派”纲领关于召开一次全俄生产者最高代表大会的要求，他提出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考虑到“革命的适宜性”。季诺维也夫指出，这样一次大会“在这一严重时刻，代表的大多数将由非党代表，其中一大部分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组成”<sup>②</sup>，而当时的任务是把非党群众组织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85页和第90页起（中文版，第32卷第74页起）。

② 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本），莫斯科，1921年，第190页，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27页（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

“十人提案”承认，在原则上，“工人反对派”纲领中的某些要求是正确的——例如关于工资的较大程度的平等——，但认为这些要求只适合于长远目标，而不能成为立即要达到的目的。“十人提案”也否决了托洛茨基所要求的工会国家化；它重申了党的领导作用在工会活动中的必要性：

“俄国共产党无疑仍然象过去一样通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领导工会的全部思想工作。……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员的选拔，自然应当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进行。但是党组织正是在工会中应当特别慎重地采取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方法，因为在工会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需要由有组织的群众自己来推选领导者。”<sup>①</sup>

关于“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在大会前曾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但在开会时并不如此。事实上，正在此时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危机，它显示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为此，列宁主要是对付这个问题，而关于“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仅仅采用基本上属于论战的方式加以

---

<sup>①</sup> 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第7点，载《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卷第540页（中文版，第2分册第78页）。



驳斥，把它比之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立场；此外，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还间接警告“工人反对派”，譬如他说：

“我们花费在争论上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因此我必须指出，现在‘用步枪来争论’要比用反对派拿来的提纲来争论好得多，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无论在哪里，需要的都是步枪，而不是反对派。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sup>①</sup>

稍后，列宁明确指出，他说“用步枪来对付它”时，他的意思绝不是指采用这种方式来同“工人反对派”“辩论”，而是指对付党的公开的敌人；更有甚者，在继续讨论中，列宁认为反对派的某些提议是合理的，对此他屡次加以表扬。<sup>②</sup>

## （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从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的观点来看，第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9页（中文版，第32卷第189页）。

② 关于这一点，参阅《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的结论》（3月16日），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9页起（中文版，第32卷第243页起）。

十次党代表大会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制定了禁止成立“派别”的新的党章。在原则上，这是关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禁止成立以某一“政纲”为基础并且有它们自己内部的纪律的有组织的集团。换言之，要在党内组织一种党。该项禁止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是由于形势特别严重而通过的。<sup>①</sup> 任何党员，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内，谁违反这一条决议，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出党。这是一项极端严厉的处分，它赋予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以特殊权力。事实上，该项规定的实施，使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能改变委员会本身的组成人员。

列宁在解释《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这一项规定时指出：

“至于说中央委员会对中央委员有这种权利，那是我们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也没有容许过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这时要召开非常会议，由中央委员、候补中

---

<sup>①</sup> 所谓禁止成立“派别”的决议，即《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全文见前引《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卷第527页起（中文版，第2分册第63页起）。

央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参加，并且都有同等的表决权。这种制度，这种 47 人的全会，在我们党章上没有规定，实践上也从来没有用过。”<sup>①</sup>

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工作的环境，使该项决议成为制止发表同政治局和党的书记处有分歧的意见的方法，这就彻底改变了党内可能展开思想斗争的条件。

这一结果是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其他规定相矛盾的，因为决议并不排除不同意见的辩论，并且还预定要出版一种名为争论专页的刊物。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也证明他建议在发生“根本分歧”时，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他还要求在党代表大会上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一致时，大会上互相对立的主要倾向的代表应被选进中央委员会。<sup>②</sup>

实际上，不管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怎么说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将成为日益限制党内公开思想斗争的起点（因此争论专页从未出版过）。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270 页（中文版，第 32 卷第 244—245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274 页（中文版，第 248 页）。

列宁逝世后，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的多数派，甚至党的书记处，逐步地自认为垄断了正确思想以及对一切思想能否在党内进行真正讨论拥有决定权。

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还用另一种方式来限制公开的思想论战的可能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而中央委员会恰恰是进行广泛和深入讨论的场所。从此以后，中央委员会在实际上已不再是历届代表大会之间的党的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周期性延长了，会议只是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实际已转交给政治局，政治局从1921年起有委员七名。甚至在政治局内部，领导地位日益归于党的行政机构的代表，归于领导书记处和人事局等机构的人。这样，政治局过去只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工作机关，现在变为同权力已大大增加了的中央委员会的行政机关和书记处紧密联系的党的最高机构了。

因此，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在许多方面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末期的论战的结束。它谴责了两个反对派的提纲，并在事实上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公开争论加以限制。然而，具有更深刻意义的

是，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成为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正是这次大会推行了“新经济政策”<sup>①</sup>，这个政策的特征主要是放弃了农产品的征收，代之以征收实物税并规定工农业之间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可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逐步地改变了政治气氛，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发展各种私人活动提供了可能性，这就促使经济不平等的加深，其负担则主要由工人阶级和贫农承受。

在同新经济政策联系着的政治气氛发生变化的影响之下，尤其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发生变化，人们便看到党内思想斗争的公开化逐步消失了。这些斗争往往越来越只在党的最高组织内，即在政治局内，偶然也在中央委员会内出现，党员和干部并不全体参加。

在对列宁逝世前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的“不公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一简略论述之前，似乎还需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内多数派同“工人反对派”之间的分歧的某些限度，并追述

---

<sup>①</sup> 在本卷第五部分，我们可以从列宁最后几年的活动里看到新经济政策概念本身是怎样发展的。

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内整个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所牵涉到的事情。

## 第二节 党的多数派同“工人反对派” 之间的分歧的局限性

1918 和 1921 年之间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的历次思想斗争中，就其重要性，同时就其范围来说，最有意义的一次斗争是“工人反对派”的提纲所引起的斗争。“工人反对派”挑起了一系列根本问题，在这个方面，“工人反对派”的这些提纲具有重大意义。该派指出资产阶级专家和行政人员所享受的权力的增长给俄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带来严重的危险；他们为了给予工人以广泛的主动性和广泛的信任，为了建立能使工人的主动性得到真正发挥的一些组织形式而战斗；他们要求对行政机关的自治化和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倾向进行有效的斗争；主张党内批评自由，站在全体劳动者首先是工人及其工会组织一边；他们要求全体党员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并缩小工资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已表现得很突出。

“工人反对派”的这些提纲，很大程度上是同列宁在《四月提纲》和《国家与革命》中阐明的论点相联系的；提纲表达了苏维埃工人阶级内一部分人的愿望，以及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革命进展中的某些要求。

这些提纲的提出，正是在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刻，在1920至1921年间冬天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在发生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时期，也就是说，这时那些客观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能直接被帝国主义利用在政治舞台上公开干预的一些势力，提出了同“工人反对派”的提纲似乎——至少部分地——相同的要求。这一情况无疑地促使列宁对“工人反对派”采取一种特别严厉的态度，但是由于当时的情况，对这些提纲暂不进行深入批判。

只要读一读列宁的发言，就可以看出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喀琅施塔得事件占据什么地位，以及“工人反对派”恰恰在这个时候提出它的提纲而受到多么严厉的指责。列宁在1921年3月9日的讲话中，对“工人反对派”声明说：

“你们带着柯伦泰同志的印有‘工人反对派’字样的小册子来参加党代表大会。你们已经知道了喀琅施塔得的事件和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高涨，可是你们还是把这个小册子的定本拿出来了。在这种时候，你们把自己叫做‘工人反对派’！你们不了解，你们这样做要负什么责任，你们在怎样地破坏统一！”<sup>①</sup>

列宁在讲了这一番话以后，接着进一步把“工人反对派”看作是那些否认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这当然超出了“工人反对派”所说的范围，但如果把他们的“逻辑”推论到底，在他们的提纲中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但是，除这些情况外，与这些提纲的内容有关的其他因素使提纲的实际意义受到了很大限制。

首先，提纲在理论上并没有表达清楚。即使在阐述最关心的问题时，在涉及对保证革命向社会主义迈进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时，提纲也没有提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4页（中文版，第32卷第184页）。



出有力的论据。提纲不是建立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分析的基础上；此外，也和多数派的提纲一样，它们简直不了解关于同农民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的条件这一决定性问题；就“工人反对派”的提纲而论，这一点特别严重，因为他们要求扩大工会的作用——在首先要满足工人的要求方面——可能容易导致同农民的深刻分裂。从这方面看，“工人反对派”是站在“工人主义派”的立场上，这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尤其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内，是不相容的。

总的说来，“工人反对派”的提纲表达了部分正确的愿望，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立场方面，他们没有同“经济主义”的残余决裂；他们最大的弱点是在有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中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这两个方面。

具体地说，“工人反对派”的提纲本身有矛盾，这也大大减弱了提纲的作用。例如，一方面提纲要求生产者的职工会在经济方面占领导地位（这样就给“工团主义”的实践开辟道路，不把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把部门或职业的利益放在首

位),而另一方面,“工人反对派”分子却指责——确实有理由——“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苏维埃工会中出现的“官僚化”,这使列宁在谈到由萨普龙诺夫提出的“工人反对派”提纲时,指出:

“‘萨普龙诺夫派’竟达到这种地步,在同一条提纲(第3条)中,一方面大谈其工会的‘深刻的危机’和工会的‘官僚主义麻痹’,同时又建议‘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权力’,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大概是要在工会发生‘官僚主义麻痹’的情况下这样做吧?对这样的一些人难道能够认真吗?”<sup>①</sup>

但是,上面已经说过,“工人反对派”提纲的主要弱点在于未涉及有关坚持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的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党同全体人民群众的特定关系的问题。上述这一切,为了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讨论时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有必要加以明确说明。

### (一)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委派方式”问题

在“工人反对派”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争论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页(中文版,第32卷第35页)。

中,牵涉到一个问题:要使布尔什维克党能正确地起领导作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应有相互信任的问题。可是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工人反对派”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却讨论政治、行政、经济负责人的委派方式。在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看来,除非由党任命一大批负责人,包括工会的负责人在内,否则党就不能真正起到领导作用。在“工人反对派”看来,只有通过选举产生负责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对自己所选出的负责人的信任。

“工人反对派”把争论放在这个范围内,拒绝首先分析具体情况;而且把自己局限于“选举或由上级委派”这两种思想内;因此他们依旧是资产阶级政治法律观念的俘虏,这就妨碍他们明确地提出实质问题,即在一定的情况下,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应有哪些具体关系的问题。

如要了解“工人反对派”为什么有这种立场,重提一下这种立场就是从1918年初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的各种“左”倾反对派的政治路线是有用处的。这些反对派一般都引证列宁为维护全体公职人员均由选举产生的“原则”的文

章,例如列宁所说的:

“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必然会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必然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sup>①</sup>

可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上,列宁对那些重提他以前提出过的关于公职人员通过选举产生的声明的人的论点进行了驳斥,因为列宁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实行的,而且同执政两年的教训不相容。列宁声明,在取得这“两年的经验”之后,对于某些问题,不能再象第一次探讨时那样的想法:

“在斯莫尔尼时期和斯莫尔尼时期以后不久的时期,我们作了够多的蠢事。这是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第一次干新事业,哪里会有智慧呢!”<sup>②</sup>

在列宁于1920年3月29日用中央委员会的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5页(中文版,第25卷第408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1页(中文版,第30卷第419—420页)。

名义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同一报告中，列宁反对那些提出赞成集体领导以及（工会或其他机关的）干部和负责人用选举产生的提案的人们说：

“所有这些关于任命委派叫喊，所有那在各个决议案中、在各种谈话中常常说到的陈腐有害的滥调，应当一律扫除干净。否则我们就不能获得胜利。如果我们在两年内还不能领会这个教训，那我们就是落后，而落后的人是会挨打的。”<sup>①</sup>

实际上，隐藏在“选举或由上面委派”这个虚假的问题背后的，是一个实质问题，征求群众意见的问题，不仅是号召群众提建议，而且主要是号召群众提意见的问题。只有通过这样的征求意见和号召提出批评，才能使党集中群众的倡议和意见、从中作出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体利益的结论。

这因为，实质问题并不是“委派的方式”问题，而恰恰是党、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具体的、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性质，基本上不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2页（中文版，第30卷第420页）。

是由机关人员的“委派的方式”决定的。它从属于一整套社会实践以及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

在1921年初，列宁日益设法从限制在“委派或选举”这两种思想范围内的场合，转移到另一场合。他清楚地看到必须开辟表达群众愿望的新的可能性，他又深知如果这种表达隐藏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内，就有通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开展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攻的很大危险。正是为了转移阵地，为了跳出“委派或选举”这两种思想的圈子，列宁才考虑增加非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应给予布尔什维克党员听取群众批评、加以重视并作出具体答复的可能性。1921年初，列宁（作为对那些害怕非党代表会议、担心会议会有利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回答）写道：

“非党代表会议不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 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的政治工具。”<sup>①</sup>

事实上，由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恶化，尤其是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5页（这是列宁准备写《论粮食税》的纲要）（中文版，第32卷第315页）。

由于 1921 年的饥荒,《论粮食税》一书的定本与关于非党代表会议问题的最初方案相比,保留很多(这正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特别在农民群众中的连续不断的影响);为此,列宁在书中指出: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已学会如何装扮为‘非党分子’。这一点已经完全证实了。现在也只有傻瓜才看不见这一点,才不了解我们是不能受人愚弄的。非党代表会议并不是可以盲目崇拜的东西。如果我们能用这种会议来接近尚未接触过政治的群众,接近不问政治的各阶层千百万劳动者,那它们就是有益的,但如果这种会议变成装扮为‘非党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讲坛,那它们就有害了。”<sup>①</sup>

这样,实际上,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末期突出的极端困难,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利用这些困难而进行的猖狂活动,布尔什维克党在 1921 年没有采取在群众中发动一次进行讨论和有系统地听取群众批评的广泛运动的方针。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85 页(中文版,第 32 卷第 354 页)。

## (二)国家行政机关的自治化与 有效率和无效率的概念

另外两种思想造成了错误地确定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自治化进行讨论和考虑的范围。这两种思想是“有效率或无效率”的问题。考虑这些概念时趋向于把一个基本上属于政治性的问题仅仅看成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赞成国家行政机关应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化的主要论据，事实上是或多或少地从“技术效率”的概念出发的。而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这种自治化的人，大多数提出的论据也是从效率概念出发的。

表面上，“工人反对派”是倾向于打破一直限制着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考虑的圈子，特别是他们承认权力机关同工人群众的关系的政治问题，既不能用把工会纳入国家机器（这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观点）的办法来解决，也不能用要求等到群众受到足够的“教育”后再恢复苏维埃制度的办法来解决。<sup>①</sup>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社会主义或暴行》杂志，1964年1—3月号上柯伦泰的小册子的法译文。



“工人反对派”有理由谴责把恢复苏维埃民主推迟到遥远的将来的幻想（推迟到群众受到更好的“教育”后的那一天——但由谁来教育呢？），在资产阶级专政不能很快地复辟和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恢复它的统治的条件下，“工人反对派”是无法指出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和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到锻炼的道路。事实上，“工人反对派”仍停留在“经济主义”的范围内，他们的“自发性”方式暗示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会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的觉悟；这最后是把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一切问题都“变得没有”了。此外，同一些表面现象相反，“工人反对派”在不放弃一定程度的“经济主义”方面仍然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站在同一立场上，虽然他们直接作出的实际结论是不同的。

在“战时共产主义”末期，布尔什维克党希望由于生产的恢复和产品交换的发展，群众能自觉地参加苏维埃民主和发挥作用。这样的希望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经济主义”，列宁也没有完全摆脱这一点，列宁主要不是用整个社会关系和资产阶级掀起的阶级斗争来解释国家行政机构的自治化和官僚化的滋长，而是从中看出这是经济形势本

身的一种产物，换言之，是缺乏流转和贫困等等带来的后果<sup>①</sup>。这样的分析可能使人认为“官僚化的减退”将是生产的恢复、生产集中制的恢复和同文盲作斗争等的后果。当然，这不是列宁的观点，列宁明确指出官僚化的存在是由于小商品生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列宁还称那些反对官僚化而不反对官僚化的社会基础的人们为“爱说漂亮话的骗子”<sup>②</sup>，但是列宁的某些话以后曾被人从狭隘的“经济主义”的意义来理解，特别是被托洛茨基主义，因为后者借口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低”来“解释”官僚化的存在。

现在再回到“工人反对派”问题上来，可以说他们的失败主要由于它的提案的极端局限性，由于他们没有能力（这无疑是被他们的“自发的工人主义”和缺乏足够的经验所决定的）来打开一条真正新的道路，从而在各种矛盾的整个场合中，进行

---

① 参阅《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4页（中文版，第32卷第343页）。

② 参阅列宁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2卷第51页，中文版，第32卷第41页）和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198页，中文版，第32卷第179页）。

一次能保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这种局限性和缺乏能力，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身上也能找到，这对以后为丰富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而在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群众路线方面所作的尝试(特别是列宁所作的尝试)起了阻碍的作用，在这方面，以后的“左”倾反对派比起“工人反对派”更是倒退。从此，为并不以公开形式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发动的进攻打开了大门。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还应再提一下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最后焦点。

### **第三节 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 和政治斗争的焦点**

无产阶级的政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党内出现的分歧(即使分歧似乎仅仅建立在“程度的差异”上)关键在于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使工人阶级能取得并巩固自己的思想和政治领导权；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关键在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本身。只有党的

思想统一是建立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上，只有党遵照这些原则进行工作，才能成为得到工人群众支持的革命先锋队，这个性质才能永远保持不变。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统一，在政治路线发生错误以后，就不可能继续长时期地维持下去；一个党在长时期内推行一条非无产阶级的路线，最后注定要背弃自己所提出的原则，并失去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先进分子的支持。

但是，为了确定——尤其是没有任何先行的经验的时候——所遵循的路线有多少正确的方面，并根据取得的经验和客观情况的变化对这条路线作必要的修改，就必须进行广泛的讨论，目的在于总结推行这条政治路线后实际得到什么结果。讨论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秘方”使人能预先肯定哪一项措施或哪一个口号有利或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除非是显然违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只有对现实、对实践以及对存在的论点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正确地解决正确路线的具体方案和实施办法所提出的问题。只有尊重以民主为主要方面的民主集中制，才能使

坚持正确观点并处于少数的人们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敢于反潮流的话。

一条具体的政治路线必须不违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但除此之外,还应在实际上符合具体情况的需要。因此,这条路线应使人们能正确处理——用无产阶级观点——作为当时所处特殊情况的特征的主要矛盾和从属于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

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一条特定的政治路线或一个口号,在一定时期内是正确的,而在不久以后,则可能变为错误的了。例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1917年2月27日至7月4日之间,在没有武装的反革命势力威胁的时期,是一个正确的口号;而在7月4日以后就不再是正确的了。这时,正如列宁所写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同保皇派和黑帮勾结在一起,用威胁的手段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吓住,实际上把国家政权交给了卡维涅克分子,交给了……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阀。”<sup>①</sup>

---

<sup>①</sup> 见列宁:《论口号》,载《列宁全集》,第25卷第200页(中文版,第25卷第175页)。

对于这一个或那一个口号、这一项或那一项措施是如此，对于一个政党的具体政治路线也是如此。这条路线，只有在符合具体形势的需要时，才能是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路线。同样，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例如在从国内战争阶段进入和平建设阶段的时候——党的路线，党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所提出的口号，也应作相应的修改。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适应它所面临的形势需要，应该知道及时承认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一个革命的政党可能犯错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但并不会丧失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如果它持久地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改正它的政治路线，那它就会丧失这种性质。

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过程，只有在进行一次充分公开的思想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展开；没有这样的斗争，党会越来越难于制定和执行一条无产阶级的路线，久而久之，也越来越难于维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如果党掌握着政权，那也就是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

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当几条政治路线彼此对立，而表面上都符合革命的需要时，那只有

进行理论分析和具体分析（也是对当前和过去的实施情况进行批判性的审查），才能确定哪一条路线能最有效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公开的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并能使人进行尽可能深入的分析，掌握一切细微的差别，作出详细的总结，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而纠正错误的东西。

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就以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式反映到党内来。同样，针对着无产阶级路线（实际上它是最适宜于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可避免地有一条对立的资产阶级路线。后一条路线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能最好地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路线。同资产阶级路线与无产阶级路线相比，其他路线代表着各种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倾向。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在更为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能成为一条资产阶级路线。在一定的时间内，一条特定的资产阶级路线的存在，掩盖着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实质，这种倾向表面上同无产阶级路线“混合”在一起，但到了以后的阶段，将以明显的方式反对无产阶级路线。正确的思想斗争

要求在任何时候都以资产阶级路线为主要靶子，而不要忘掉机会主义倾向。1920年11月至12月，列宁的主要靶子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组成的反对派，当这个反对派实际上被打垮后，“工人反对派”便成了主要靶子了。

并没有什么“秘方”能使人“一眼就看出”当前的资产阶级路线。问题是往往有一条路线表面上同革命路线特别“接近”，实际上，正是这条路线最能欺骗一大部分党员，它似乎只是促使革命的方向达到“合乎逻辑的结论”。资产阶级路线只有一旦暴露出它的真正的阶级本质，才会失去它“接近”革命路线的表面现象，但这时它必然为另一种倾向所取代，这一倾向又似乎同革命路线“混合”（或“混淆”）在一起。

维护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的人，客观上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代表，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自觉的代理人”。应该以他们能够被争取到无产阶级路线一边来（对那些仅仅受非无产阶级路线影响的人，更应该是如此）的原则作为出发点，由此可见，对那些反对无产阶级路线的人，只要他们不制造分裂和不要两面派手法就“给出路”，这是



有重要意义的。

显然，经验证实，不存在什么“保证”可以使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经常都能从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出发，坚持正确路线，坚持革命路线。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制定，既不能取决于一次人民大会或工人大会的简单的“多数票通过”，也不能取决于党代表大会或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多数票通过”。经验证明，在一个崭新的形势面前，一般只有少数人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即使在一个有经验的无产阶级政党内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多数票通过就能解决难题，就能制定正确路线，这完全是幻想。在一般情况下，正确的东西不是立刻就显示其正确性，而是要付出斗争和自由讨论的代价，要通过经验和时间的考验。

为了使新的和正确的东西能不经受太大的困难而开辟道路，不应该主张用简单的表决方式来分清正确和错误，因为牵涉的问题要求进行分析和讨论（这并不排除碰到一些要立即实施的决议时，在对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之前，有时应先采用投票表决的办法）。

这样，列宁曾不止一次地在进行表决的关键

时刻遭到失败而不得不“反潮流”，就不是偶然的事了。毛泽东也着重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sup>①</sup> 因此，最根本的是新的革命思想能够得到捍卫，以及具有这些思想的人有权利和勇气加以捍卫。

与剥削阶级几千年的剥削经验相比，无产阶级政权的实践在历史上还处于幼年时代，因此，要解决有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方面的正确和错误的问题，是更为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十年前可能是明显正确的，在当时的经验和相应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是明显正确的，可能到了今天只显得部分是正确的原因。一切科学真理的特点，就是它能够发展，能够充实自己，把“旧真理”中实际上是错误的东西加以抛弃，从而成为一个新的真理。

即使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大多数人拥护一条特定的政治路线或一定的措施，也不能“保证”这条路线或这些措施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当行动的时刻来到以及党的最高组织表示赞成的时候，仍

---

<sup>①</sup> 见1973年9月10日《北京周报》，第21页。

然需要少数人在行动上表示服从，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以便后来能更好地帮助改正错误。只有在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且不可能用其他方法改正党的方向时，分裂才比统一更为可取<sup>①</sup>，在这一情况下，违反原则的人应承担分裂的责任。

当然，如果方向性错误不是公开提出，而是用一种实际措施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用不公开的反对派的形式出现，那末，纠正方向性错误的可能性就变得更有限了。<sup>②</sup>

#### 第四节 1921至1923年间的不公开的反对派

从1921年起，展开了一个不公开的反对派的思潮——以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为特征——它能使人们觉察到它的存在，并能实际干预政治决议。这一反对派扎根于党和国家的行政机关以及这些机

---

<sup>①</sup> 对此，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书中已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见《列宁全集》，第32卷特别是第78页（中文版，第32卷第67—68页）。

<sup>②</sup> 上面已经指出，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反对派与“反潮流”的原则并不相干（见本卷第29页）。

关中重新出现的资产阶级措施和政治关系中。行政机关内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势力，利用他们所据有的地位，设法使有利于他们利益的倾向占上风，以影响党的一些领导人的利益，这些领导人由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应有的路线抱有看法，是准备接受这种影响的。

这样，在列宁患病期间<sup>①</sup>，人们看到屡次出现一条和列宁的路线不同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一般不同列宁发生正面冲突，而是赞成一些同列宁所提倡的相矛盾的措施，在这一意义上，这条路线可以列为“不公开的反对派”的路线。可是在这里“反对派”的名称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个“反对派”——当时实际上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所提倡的措施，不止一次地得到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这种支持一般只是暂时的，因为只要列宁同他们接触后，这些组织往往就恢复他们过去所决定的措施。既然在列宁患病期间，中央

---

<sup>①</sup> 列宁由于患病，不得不放弃领导工作，第一次是在1921年底，第二次时间较长，从1922年5月底直至同年10月，最后一次则在1922年12月。1923年3月，列宁完全停止政治活动。在此以前，即使他不能进行领导工作，仍经常用写信、口授记录和短文的方式来指导。

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多数派就倾向于右的方针。因而在列宁逝世之后这些方针深刻地影响着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就没有什么可以惊奇的了。

### (一) 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

正是在有关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上，右倾立场(以后并未用同一形式重新表现出来)在中央委员会一级表现出来了，这时列宁开始感觉到了疾病对他的最初影响，不得不离开工作几星期。里加会议<sup>①</sup>正在此时召开(1921年底)，出席会议的苏维埃代表米柳亭甚至答应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

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另一些人支持米柳亭。他们认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不可能管好国际贸易；因此他们要求或者放宽垄断制的条例，或者完全取消垄断制。斯大林是赞成这样的论点的，但是列宁认为这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是一个威胁。他着重指出，这些论点的通过，将容许外

---

<sup>①</sup> 指1921年10月28日至31日在里加召开的波罗的海经济会议，会上讨论了发展俄国对外贸易的条件。弗·巴·米柳亭领导着苏维埃代表团。

国出口商同耐普曼直接取得联系，并冒着使苏维埃工业完全崩溃的危险：国外大资本在必要时肯定要采用廉价倾销和对出口给予补贴的办法来使苏维埃工业陷于瘫痪的。

在一段时间内，中央委员会不同意列宁的看法。直到1922年3月，列宁才能使一些巩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法令获得通过。然而，在中央委员会内反对无条件保留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委员们的影响之下，垄断制的问题继续被提了出来，以致正在同苏维埃代表团进行谈判的外国企业家，抱着垄断制将被取消的希望，竟然中止了在他们本来准备同意接受的合同上签字。1922年5月15日，列宁对这种情况越来越担心，便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重申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原则，并禁止提出任何企图修改垄断制的计划。<sup>①</sup>这封信到1959年才发表，斯大林在信纸边上写道：

“在现阶段，我并不反对正式禁止有关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方面的措施。但我相信这种削弱已成为

---

<sup>①</sup> 对于有关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分歧，参阅《列宁全集》，第42卷第442—443页和第638—639页，又第45卷第566—567页和第777—778页。

不可避免。”<sup>①</sup>

在列宁提出意见后，政治局在5月22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列宁的观点。但在三天后，列宁得了重病（他的右手和右腿瘫痪，讲话也很困难）。

当时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反对者重新采取攻势，这就是右倾路线存在的一个特点。1922年10月6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索柯里尼柯夫所提出的同国家垄断制有重要抵触的提案。列宁还在病中，但是他能了解当时的情况。因此，他再一次写信干预，他在10月13日的信中特别指出：

“中央全会10月6日的决定，规定了一项似乎不重要的局部的改革：……但是事实上这是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sup>②</sup>

中央委员会看到这封信，并考虑到列宁的政治威信以及列宁似乎就要恢复工作，才改变了它的决议。

---

<sup>①</sup> 参阅 L. A. 弗齐也娃：《回忆列宁》，莫斯科，1964年，第28—29页；引自莫谢·勒方：《列宁的最后战斗》，巴黎，子夜出版社，1967年，第49—150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2页（中文版第33卷第337页）。

以上所讲到的种种变化，证明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右倾势力或可能受右倾路线影响的势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里，一种强烈的“经济主义”倾向，使下述论据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论据认为：对外贸易垄断制由于“缺乏经验”会使苏维埃政权暂时损失几百万卢布，从而认为“有理由”放弃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领导地位。

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斯大林不断表示赞成“放宽”对外贸易垄断，他只是在列宁的坚决要求下才终于作出让步。此外，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转达列宁的信时，加上一段附注，特别说到：

“列宁同志的信并不使我对于中央全会……有关对外贸易的决定的正确性改变看法。”但斯大林在信末仍表示同意：“鉴于列宁同志的坚决要求”，进行一次修改。<sup>①</sup>

最后，在1922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出面支持列宁所采取的立场，中央委员会才撤

---

<sup>①</sup> 引自前引莫·勒万著作。也可参阅《列宁全集》，俄文版，莫斯科，1964年，第5版，第220—223页和第561—563页，以及第333—339页和第588—591页。



消了10月6日所作的决定。

这样，“对外贸易垄断制事件”结束了。这一事件特别清楚地显示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部力量的对比，而这种力量对比在列宁不可能再出面干预时，就决定着党的领导方向。

## (二)民族问题

苏维埃俄罗斯与非俄罗斯的独立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从1918年起布尔什维克党内就出现了一种有利于保证俄罗斯政府的领导地位的集中制观念的倾向。当时，这种倾向试图反对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列宁的路线。这一尝试可能好象只构成一种插曲性的现象，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人支持一条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特征的政治路线。1921年后，这条路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列宁看出这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表现。

在1918年，中央委员会有几名委员，包括斯大林在内，就已经用审慎的方式，表示反对承认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的自决权，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尚未掌握政权。1918年1月15日，斯大林在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在指出了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利用“民族习惯”之后,接着说:

“这一切表明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sup>①</sup>

斯大林采用这样一个论点,实际上是赞成当时属于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这两人在他们合著的《共产主义入门》<sup>②</sup>一书中又重新提出了这个论点。

只有在1920年向卡累利阿人民发出的号召是一个例外,在以后几年的苏维埃正式文件中,就不再有“劳动群众”的“自决权”的观点了,但是,斯大林仍旧力求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内实行“自决权”。至于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则

---

<sup>①</sup> 参阅斯大林这次发言记录,见《斯大林全集》,巴黎,社会出版社,1955年,第4卷第36页(中文版,第4卷第29页)(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

<sup>②</sup> 参阅该书第7章。法译本是1968年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的。

站在维护民族自决权的立场上，而且1919年3月，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讨论民族问题时，重申了这一权利。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仍企图为“各民族的工人阶级的自决权”这一观点进行辩护，为此他甚至还引用了斯大林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皮达可夫也发表同样的论调，指摘自决权是一个“把一切反革命势力统一起来”的“资产阶级口号”；对他来说，“一旦我们在经济方面统一后，一旦我们建立了一个唯一的机构、一个唯一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个唯一的铁路管理机构、一个唯一的银行等等，整个这个有名的自决权将不值一个臭鸡蛋”<sup>①</sup>。

这句话清楚地暴露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几个领导人的超国家观点的联系。

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在捍卫党的赞成各民族的自决权的传统立场上，开始是孤立的。

---

<sup>①</sup> 关于所引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话，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39年（1933年俄文版，1939年再版）第49页和第80—81页；引自前引E. H. 卡尔著作《苏联的形成》第274—275页。

列宁说明了“自决权归工人阶级”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仅适用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经出现分裂的地方。他指出自决权应给予那些阶级分裂尚未产生的国家，也应给予象波兰那样共产党员尚未组成工人阶级的多数派的国家。他说，只有这样，俄罗斯无产阶级才能避免被人指责为在共产主义名称的掩盖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sup>①</sup>

最后，列宁取得了胜利。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的各点是符合列宁的论点的。有关民族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指出：“曾经是压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无产阶级，对于被压迫民族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特别留心，特别注意。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才能为国际无产阶级各不同民族的成员之真正稳固的、自愿的团结一致创造条件，……”<sup>②</sup>。

事实上，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表达了

---

<sup>①</sup> 对于这一点，可参阅列宁 1919 年 3 月 19 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172—173 页（中文版，第 29 卷第 148 页）。

<sup>②</sup> 关于这一点，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1 卷第 417 页（中文版，第 1 分册第 536 页）。

列宁的论点的决议，不足以解决和不同民族的关系问题<sup>①</sup>，尤其在布尔什维克党接着就发生人们所知道的变化时更是如此。

1922年夏天，列宁又一次离开政治领导工作，这期间民族问题又特别尖锐地重新出现了。这时，在这一问题上，暴露出一个不公开的有力的反对派的存在。

同年8月，斯大林（作为负责处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的委员会主席）拟定了一项名为“自治化”的决议草案。草案规定一些独立的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将作为“自治共和国”，事实上也就是附属国，包括在俄罗斯联邦内。斯大林的草案还规定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它的人民委员会将成为各国共同的政府。这些提案取消

---

<sup>①</sup> 前面（参阅本卷第597—598页）已讲到苏维埃俄罗斯同非俄罗斯民族的关系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和理论意义：要正确对待这些关系，必须执行一条使无产阶级能在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所进行的革命运动中起实际领导作用的政治路线；更广义地说，这关系到无产阶级在各种形式的民主革命运动中保持领导地位的问题，因此，列宁对这个问题给予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了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性，遭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反对。乌克兰的党中央委员会没有进行讨论，但它的委员们都表示不赞成。

9月26日，列宁看到了这个草案，谴责了把其他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原则，他建议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联邦，各共和国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按照列宁的意见，这个联邦应采取欧洲和亚洲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的形式，而俄罗斯政府不应是联盟的政府。<sup>①</sup>

主张把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纳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人们，试图把列宁的批评置之不顾。斯大林不等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听取列宁的意见，就把自己的草案交给了他们。<sup>②</sup>他甚至在政治局专为这个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上宣称“对列宁应表示坚决的态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42卷第445—447页。列宁在这封信中特别着重指出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应有“平等的权利”（同上书，第44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42页。

度”：他在9月27日的一封信中，竟然说列宁在这件事上表现了“民族自由主义”。<sup>①</sup>

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0月6日的会议上，最后通过了稍作修改后的斯大林的草案。这个文件仅仅在形式上考虑到列宁的某些意见，如“联邦”一词代之以“联盟”，但具体的措施实际上是确保大俄罗斯领导权。<sup>②</sup>

列宁在既成事实面前，考虑到1922年10月6日的决定具有极端的严重性，他决定在他自己的立场，同中央委员会在混乱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充分了解争论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立场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在他看到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的当天，他就写信给加米涅夫，他在信中写道：

---

① 关于这一点，参阅前引莫谢·勒万著作《列宁的最后战斗》第62—63页是有益的。

②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指出，斯大林对列宁看到的草案所作出的修改之一，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新措施，即政治警察的集中化；从此，政治警察不属于各共和国的权力范围，而只属于中央政府（安·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纽约，主流出版社版，1956年，第16页）。

“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战。”<sup>①</sup>

对列宁来说，这句话说明一项根本性的政治任务，即同一条“右倾”路线进行斗争的任务，这条路线不是通过一个纲领而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出来的。在列宁眼中，所有事实证实了这一斗争的迫切性。确实，人们看到了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民族的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是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危机迅速加剧。

列宁的国际主义路线同总书记的国际主义路线之间的对立这时已经变得尖锐化，虽然还不是公开的。从1922年10月底起，列宁的口授记录、书信、日记中不断提到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站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方面，也就是站到资产阶级立场方面的危险性的分析。他谴责大国沙文主义，并着重指出从此需要一种有利于弱小民族的“不平等”，以抵偿弱小民族遭受到的大民族的不平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5卷第214页。这封信的发表，一反惯例，没有附任何注解；反之，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对列宁于9月26日写给加米涅夫的信（参阅《列宁全集》，第42卷第644页）所加的注解，是要使人相信10月6日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是符合列宁的指示的，但这使人无法理解列宁在同一天写的信。



等。关于这一点，列宁特别写道：

“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于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在实际上抱着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随时都会滚到资产阶级观点的泥坑里去。”<sup>①</sup>

这样，关于民族问题这一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列宁看出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了有利于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倾向。

从这时起，列宁认为有必要坚决谴责俄罗斯共产党书记处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施加的压力，认为这正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关于这一点，在上面已引用的口授记录中，列宁明确说明了他的立场：

“我想，在这里，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非常谨慎，必须采取关心和让步的态度。如果一个格鲁吉亚人蔑视事情的这一方面，轻蔑地滥用‘社会民族主义’这个指责（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者’，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这个格鲁吉亚人就在

---

<sup>①</sup> 见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载《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1页（中文版，第36卷第631页）。

实质上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利益，……”<sup>①</sup>。

列宁认为他之赞成作为一种“联盟”的形式而提出的东西是错了。他肯定在现有的政治条件下，必须放弃斯大林所要的这种“统一”。列宁说：

“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构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sup>②</sup>

列宁在以后的一份口授记录中，很好地说明：对列宁来说，这件事情关系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由于各民族机构同俄罗斯机构的不统一而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而在不久的将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sup>③</sup>

在上面引用的这份口授记录——把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同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比较——结尾的几句话，显示出

---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1—622页（中文版，第36卷第632页）。

② 同上书，第619页（中文版，第629页）。

③ 同上书，第624页（中文版，第634页）。

这时列宁已完全意识到世界革命的重心已从工业化的欧洲移到农业的亚洲这一事实。例如列宁说：

“如果在东方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在他们开始觉醒的时候，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其他民族采取即使是微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一方面，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sup>①</sup>，都会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立场，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的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sup>②</sup>

列宁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所作的论战和斗争的重要性，关键在于：一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同一条倾向于同资产阶级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合而为

---

<sup>①</sup> 着重号是我加的。这句话说明，在列宁看来，除了扎根于私人垄断和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关系外，还有其他帝国主义关系。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4页（中文版，第36卷第634页）。

一的右倾路线之间的斗争。此外，这条右倾路线虽然不是一个公开的反对派的轴心，但终于把越来越多的势力重新集合在党的机构内，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将最后取得胜利。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没有进行一次有系统的思想斗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事实上是在发展，发展的程度是和俄罗斯大部分人民群众尤其是关闭在乡村的狭隘界限内的、容易轻视波兰人、鞑靼人、格鲁吉亚人<sup>①</sup>等其他民族的俄罗斯农民的“自发”精神状态的程度相一致的。而在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并没有进行这一斗争；党的这种被动性同资产阶级行政人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大批渗入到党和国家机构内部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渗入事实上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以及一些“经济主义”措施，这些措施是同对技术人员作用的某种看法、对新经济政策和国家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所起的作用的某种看法相联系的。

---

<sup>①</sup> 民间广泛流行的对其他民族的绰号，被列宁斥为大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参阅《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1页，中文版，第36卷第631页）。

事实上,民族问题上的右翼反对派的发展,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形成的新的政治关系的后果之一。

“战时共产主义”助长了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度集中的领导作风,这种作风损害了党的各级之间、基层和最高级之间、政治领导和行政领导之间关系的性质。党的行政领导在1922年采用的处理格鲁吉亚事件的方式,显示出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方法和关系在那时已达到什么程度。

对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sup>①</sup>拒绝接受由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所作出的“提案”(作为命令而被提出)时,总书记决定采用行政措施。他把拒绝服从书记处决议的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调任其他职务,使他们不能再起政治上的作用,并把有些委员调离格鲁吉亚。格鲁吉亚的若干领导人不肯服从用行政措施“解决”政治问题的决议。<sup>②</sup>这时俄共

---

① 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党中央委员会在压力下最后屈从了,因此这些党的中央委员会同俄共总书记之间的关系,不象在格鲁吉亚那样,有明显的恶化。

② 1922年10月22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俄罗斯共产党书记处的态度提出抗议,并且作出一项非常决定:十一名委员中九名委员提出集体辞职。

(布)中央书记处在格鲁吉亚的代表是奥尔忠尼启泽,他在一次争论时,擅自采用强暴手段,动手打了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卡巴尼泽。

奥尔忠尼启泽的这一行动说明,为了使一名党员“改变意见”或至少改变表达意见的措词时,竟对他采用肉体上的强制手段。在列宁看来,这不是奥尔忠尼启泽的“心理”状态造成的一次“个人错误”,而是为今后极端危险的政治关系开了一个头。既然看到党内出现了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压迫的措施,而总书记斯大林和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捷尔任斯基却参预了这一措施。

1922年12月30日,列宁知道在格鲁吉亚发生的事情后,认为这是党严重蜕化的信号,这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内出现了一种绝不能容许的“领导作风”。列宁明确地谴责使用暴力,并指出奥尔忠尼启泽的行动和发生这种行动的背景,显示出党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sup>①</sup>

列宁表示,如果听凭这样的关系发展下去,布尔什维克党就有走上党内压制发表一切同领导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8页(中文版,第36卷第628页)。

特别是同党的上级执行机构成员不同意见的道路的危险。这种压制严重地威胁着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因为要保持这一性质，党就必须为辩论和批评打开大门，党的统一应是一次公开的明确的思想斗争的结果。

列宁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对格鲁吉亚事件经过的复杂情况以及若干类似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更不允许他采取总的措施，凭借党员之间的巩固的无产阶级关系，同已经冒头的蜕化进行斗争。可是他仍进行了一次调查，为进行这次调查他不得不采用自己的方法，而不通过他已不能再信任的党的行政机构，因为这个机构支持奥尔忠尼启泽，并且附属于党的总书记<sup>①</sup>。这一事件也促使列宁口授了好几个指示，在这些指示中他又一次谴责他所称的使用“肉体压迫手段”或“生物力学”<sup>②</sup>。在1923年2月14日的一项指示中，

① 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始成为“总书记”，在此以前，他仅有“书记”的头衔。

② 参阅《列宁全集》，第42卷第489页起的第288号指示。在这一卷中，收有1922年11月21日至1923年3月6日之间，每天由列宁的秘书们写下的日记（第455—第486页）。从这些日记里可以看到当时列宁患病不能行动时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右倾思潮以及同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的情况。

他再度谴责这些方法，重申“不准动手打人”。<sup>①</sup>

列宁在知道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调查结果之前，已毫不犹豫地宣布要求对那里发生的事件给予一项政治处分。他在1922年12月31日的指示中称：

“应当处分奥尔忠尼启泽同志以儆效尤……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那里无疑已有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平的推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sup>②</sup>

从此，同非俄罗斯民族的关系问题、领导作风问题和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最后两封信是带有征兆性的。一封是警告斯大林要同他断绝关系的信；另一封是写给格鲁吉亚 A. P. G. 姆迪瓦尼、F. E. 马卡拉泽等领导人的信，列宁在信中表示对他们支持。<sup>③</sup>

---

① 参阅《列宁全集》，第42卷第607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3页（中文版，第36卷第633页）。

③ 这两封信是先后在1923年3月5日和6日发出的。收入《列宁全集》，第45卷第628—629页。



在后一封信中，列宁向格鲁吉亚领导人表明：

“我正全神注视你们的事情。为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以及斯大林(……)的姑息纵容感到愤慨。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sup>①</sup>

显然，这一事件从此在列宁心中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他准备公开谴责俄共(布)一部分领导人的(在国际主义的外衣掩盖下)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这样，总的说来，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的变化和一个推行一条专横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路线的不公开的右倾反对派的发展，促使列宁作出了一系列有关实施一条群众路线的新指示。这条路线实际上将遭到力求巩固本身权力的党的行政机构的反对。

### (三)群众路线或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

在一种右倾的专横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强烈倾向存在的最明显标志出现之前，列宁就已作出了旨在打击这种倾向的基础的指示。例如，他在1921年9月着重指出必须进行群众斗争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45卷第629页。

来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党的影响。他在那时写道：

“……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自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群众面前破坏党的威信的人了）。当然，不是群众的所有意见，我们都要服从，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那由于负担和痛苦过重而疲惫不堪的年代，也有根本不是先进的情绪。但是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在否定‘混进党里来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了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以及许多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都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他们最善于区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为终岁勤劳、既无特权又无‘升官之道’的人们所厌恶的共产党员。”<sup>①</sup>

列宁在强调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该怎样做的时候，曾屡次作出和以上同一个方面的指示，列宁在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中的一篇里，严厉谴责工农检查院管理得不好，明确指出由斯大林领导的这个机构同群众隔绝。列宁坚持工农检查院应对国家机关和对党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sup>②</sup>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32页（中文版，第33卷第20—21页）。

<sup>②</sup> 参阅同上书，第504页（中文版，第444页）。

正是考虑到对党内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和党的行政机构内发展的右倾倾向,以及这些机构对中央委员会本身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列宁才作出了被称为他的“遗嘱”<sup>①</sup>的若干指示。这些指示主要是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和领导人员的选拔。

关于第一点,列宁写道,把新鲜血液注入党的领导机关的时候已经来到,应该把中央委员会人数增加到五十甚至一百人,并基本上从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中央委员会的新委员。列宁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指示:

“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我的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总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

“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

---

<sup>①</sup> 被叫做列宁“遗嘱”的,主要包括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6日写的许多文章,他以后又于1923年初作了一些补充。这些文章是准备在1923年4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

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者的农民。”<sup>①</sup>

1923 和 1924 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人数果然增加了,但是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十七名新委员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十五名委员中,没有一个是“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工作人”;相反,新委员中有城市或地区的党委书记,有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名书记(A. I. 多加多夫),有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的一名书记(L. V. 柯秀尔),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人,换言之,都是党和国家行政机构上层的“杰出”代表。

这样,列宁为了改变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以便削弱右倾倾向的代表力量而作出的嘱咐没有丝毫结果。此外,我们已看到,中央委员会虽然依旧是一个重要机构,但对政治局和总书记处而言,越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609 - 610 页(中文版,第 36 卷第 619 - 620 页)。列宁“遗嘱”里的这段话和全部“遗嘱”是于 1956 年第一次在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 9 期上发表的。

来越趋向于只占次要地位了。就在这两个同高级行政人员紧密联系的机构里，实际的权力趋向于集中。

列宁不是不知道这一事实。因此，在他病危和去世前不久，他于1922年12月24日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重新提到书记处和总书记人选问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sup>①</sup>

几天以后，1923年1月4日，列宁在写给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信的补充时，作出一个结论，即上面已提到的，斯大林必须辞去总书记一职。<sup>②</sup>除了有关斯大林“本人”以外，列宁还针对着某一类型的政治关系的支持者，这种政治关系不是把思想斗争同争取党的统一的斗争结合起来，而是把重点放在一种强制的统一上，有时不惜排斥布尔什维克党的老干部（他们的批评，甚至单纯的保留态度，将越来越得不到容忍）。

列宁逝世后，完全掌握党的领导权的那些人事实上没有遵照列宁的最后指示。在这方面，不仅对列宁的一般指示——开始引导贫农中农走社会

---

① 见本卷第456页的引文。

② 见本卷第457页。

主义道路的新策略——，而且对有关组织方面的指示也是如此。

因此，在列宁逝世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决定对党秘而不宣列宁的这些被称为“遗嘱”的最后指示，就不足为奇的了。这些指示，原来是为了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而写的，但并没有传达。克鲁普斯卡娅力求使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这是列宁逝世后于1924年5月23日至31日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知道。她仅仅做到在有最老的党员参加的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加以宣读。在这次会议上，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言后，中央委员会以三十票对十票决定对“遗嘱”保守秘密，并仅对“代表团领导”<sup>①</sup>宣读。

在对五年革命作总结时，不能忘记上述列宁所指出的方向和他在最后两年政治活动期间所反对的倾向。

---

<sup>①</sup> 1956年“遵照列宁的意见”公布他致党代表大会的“遗嘱”时，也同时公布了这次对几个人的口头传达的情况。关于这一点，参阅《列宁全集》，第36卷第736页注677（中文版，第36卷第756页注661）。

## 第五部分

# 列宁逝世前五年革命的 总结和展望

列宁在逝世前几年,即 1921 至 1923 年间,曾致力于对俄国革命进行总结,并为此尽可能好地确定革命所经历的阶段,以及所完成的变革的性质。同时,他力求抓住犯过的错误和存在过的幻想,以便根据当前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来确定应完成的任务。

这个总结,虽然是局部的,却是极其重要的。它包括普遍而现实的教育意义,并关系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问题,特别关系到开始过渡时所出现的问题。

当列宁不得不中止这一工作时,由于这个总结还不是最后的总结,所以,要看清它的决定性意义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当时列宁还没有从他的分析中得出全部结论。要理解他在这个时期的论述的重要性,必须把他从事的工作继续下去,在他指定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今天,在列宁逝世后,注意从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吸取教训,这件事是能够做到的。



要努力阐明列宁的总结中所包含的决定性教训，会遇到两个困难。

一方面，列宁在 1921 和 1923 年间提出了某些新的见解，但他使用的几乎仍是他以前进行分析时使用的术语；因此，对这种术语——当时已经不适用了，但没有被完全放弃——如果人们不加注意，就有看不清新的东西在哪里的危险。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只是部分地理解列宁最后著作中的新内容，对这些著作仍然采用了“传统”的解释，但是，如果要避免对决定性指示的误解，就应当把一部分“传统”解释抛弃。

为此，我们首先介绍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以后所作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总结的主要内容。



## 第一章

### 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后不久所作的总结

列宁在对俄国革命作历史的和政治的总结时，努力把已完成的变革的性质写得尽量明白。这一努力由于俄国革命的双重性导致两种革命特别复杂的交错而更为需要：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一种基本上是属于农民的民主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是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起的领导作用相一致的。这一领导作用于 1917 年 10 月特别显著，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变革。

民主革命是同农民起的决定性作用相一致的，农民的斗争目标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通过消灭大地主，使农民个体生产普遍化。

因此，列宁分清革命的民主的工作和无产阶

级的工作，分清两种革命中每一种的任务和可能性，即由具体条件决定的任务和可能性，而这些具体条件主要来自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形式。

## 第一节 俄国革命的民主的工作

列宁在 1921 年 11 月（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日）所写的题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着重指出：“我国革命充分完成了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工作”<sup>①</sup>。这里，列宁显然是指大地主所有制和这一所有制的政治上的上层建筑已被革命所消灭。

对“资产阶级民主”一词应加注意。列宁在用这一术语时，是指过去革命中的变革，按其内容（由于符合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的“民主”愿望和要求）是民主革命的工作，但就领导革命的力量和这些力量保证其发展和巩固的社会关系来说，则是资产阶级的。

事实上，当革命完成了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07 页（中文版，第 33 卷第 88 页）。

所完成的变革类似的(但并不是等同的)变革,而革命的发展由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起的领导作用成为可能时,这些变革就有了一个新的特征,即充分民主的特征。如果人们仍用“资产阶级的”这一形容词来形容这些变革,那就必须注意这个形容词所起的新的作用。这一形容词是指这些变革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实现的变革有类似的地方。它也说明——这是最重要的——这些变革如果不继之以社会主义的变革,事实上就可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但是,说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工作”已“于1921年全部完成”是否正确呢?如果人们注意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还让“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只是到了后来资本扩大了再生产时才取消,这样说就是对的。如果人们考虑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工作只是在确实摧毁了资本的生产积累的障碍后才全部完成,这样说就是不对的。然而,人们对这个任务是否在1921年全部完成,可能抱有怀疑。事实上,从1917年开始的米尔的巩固和小农个体生产的普遍化,使生产积累遇到了新的障碍。这有利于同市场隔离、闭关自守的

“宗法式的经济”的扩大，同时，在历史上固有的米尔形式掩盖下的剥削和统治关系又逐渐发展。因此，这引进了一种限制生产积累和农业生产增长的资本主义寄生式的发展。几年的新经济政策将证明，在这方面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工作还没有全部结束。

列宁于 1921 和 1923 年所观察到的，是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前者走得太远了，相对地说，后者则很少进展。

这个不平衡的发展是由两个革命过程的性质和所处的条件所决定的。当然，不需要民主革命“彻底”完成后，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进行；相反，在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已不能领导革命），两种革命必须结合。但是，要使无产阶级革命能在广泛的阵线上进行社会主义的任务，阶级斗争必须经历几个阶段，因为无产阶级对全体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要相当巩固以后，才能真正地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结成牢固的联盟，而这个联盟必须建立在深厚的信任关系之上。

在俄国革命条件下，这些关系应在无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中所起的客观作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在巩固它同农民的关系中坚定地完成它的任务。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当农民群众还没有作好准备的时候，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们进行社会变革。正是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党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犯了错误（下文将再作论述）。这些错误削弱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帮助农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能力。列宁于1921年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前面已提过的一篇文章（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

“反革命所以能够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取得暂时的胜利，是因为资产阶级在那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是因为农民反对我们。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sup>①</sup>

人们知道，导致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新经济政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517页（中文版，第32卷第473页）。

策的复杂情况之一，正是因为农民要巩固个体经济和“自由”交换他们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推迟在农村中对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

## 第二节 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工作

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同样也分析了这个时期（1921年底）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工作”<sup>①</sup>。在列宁看来，这项工作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并依次列举如下：

1. “摆脱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揭露并阻止资本主义强盗两大世界集团的屠杀……”

2. “建立苏维埃制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世界的转变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

3. “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3卷第107—108页（中文版，第33卷第88—89页）。



这个论述是极其清楚的。它阐明了已经完成的的任务的重要性，但也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还要完成的任务的艰巨。对此，列宁论述的最后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实际上，最后两个方面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两个任务，于1921年仅仅是接触到而已。列宁后来所写的将使人更能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解决的、以及今后还会遇到的许多问题的性质。

### （一）“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列宁所说的在经济领域内“主要的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就是指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建设”。

以后，这句话被解释为首先针对着俄国低水平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可以推论出根本的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列宁无疑地也注意到这方面的革命任务。这是一个现实的任务，不然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但当列宁讲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时，他不仅注意到发展生产力，而且还特别注意到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这对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两

个互相结合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把这两个任务概括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这两个任务辩证地连结在一起，是一个任务的两个矛盾的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任务的基本方面是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候都是主要的方面。事实上，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只是在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象俄国这样一个国家里，这个变革要求工农实现牢固的联盟。1921年，这个联盟还不够巩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这种联盟。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之一。

此外，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变革的任务的深入，要求群众的生活条件足以使他们能真正地和优先地致力于完成这个变革任务。为此，必须使劳动者无须同饥寒作斗争，不被日常的困难、疲乏和疾病所压倒。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都证实了要使无产阶级革命能进行最根本的历史性变革，首先必须解决日常生活的最起码的任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实践中已证明他们不但能完成英雄的业绩，而且还能组织日常生活，否则将丧失最广泛的群众的信任，而没有这个信任，任何事情都是

办不成的。信任把群众推向前进，而惊惶失措则可以把他们引向绝望。恢复可以接受的生活条件，保证城市供应，使工农业间流转平衡，尽快地消除失业，这些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几个必要的目标。必须实现这些目标，才能使革命继续高涨。

这样，对列宁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是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后一任务是根本的，但它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完成的。

列宁于 1921 年写的《论粮食税》<sup>①</sup> 的小册子，提供了对当时俄国经济关系或经济关系的成分的详细分析。这本书说明了这些关系和成分是同社会主义极不适应的，并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变革这种状况。列宁所分析的成分是来自他称之为“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sup>②</sup> 的。

在这本写于 1921 年的著作中，列宁引用了他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49 页起（中文版，第 32 卷第 319 页起）。

<sup>②</sup> 同上书，第 351 页（中文版，第 321 页）。

于1918年3月写的一本小册子<sup>①</sup>的许多片段，在那本小册子里，他分析了“俄国现时经济”。引用这本过去写的小册子是有重大意义的。它证明列宁在1921年春，即战时共产主义以后不久（当时大工业已完全收归国有）已观察到生产关系或“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不仅和1918年相同，而且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基本上也没有变化。在1921年初，如同在1918年那样，列宁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sup>②</sup>。

尤其重要的是：1921年同1918年一样，列宁明确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是小生产——他把小生产当作“宗法式的”经济（或“自然的农民经济”）同小商品生产<sup>③</sup>的结合——并指出这种小生产的主要“敌人”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看

<sup>①</sup> 见《当前的主要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载《列宁全集》，第27卷第337页起（中文版，第27卷第299起）。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50页（中文版，第32卷第320页）（着重号是贝特兰加的。——译者）。

<sup>③</sup> 同上书，第351页（中文版，第321页）。

来，当时小生产的直接“敌人”，即能阻止它自行发展的敌人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关系还处在萌芽状态，如果不首先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关系就不可能发展。<sup>①</sup>

自从他于1921年总结了当时存在的经济关系后，在1921至1923年，列宁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上。我们将看到他所作的分析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

## （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1921年底，当列宁总结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工作时，着重指出这个工作的重心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提纲发表后的半个世纪，充分证实了俄国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时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遭到重大失败的时代。

十分明显，列宁的这个提纲并不意味着——上面已经看到——无产阶级的工作即使在俄国已经“完成”，也不意味着1917年十月革命所取得

---

<sup>①</sup> 本卷第五部分第二章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的胜利已是“决定性”的胜利。相反，列宁反复强调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形式还是脆弱的和不完善的。他指出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需要和广大群众紧密地结合，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彻底推翻现有的国家机器，他甚至说应把它重新打破。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承认十月革命以前所设想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形式并没有实现，苏维埃不是靠劳动群众给以生命的机关，而只是为劳动者工作的机关。

1922年，列宁在3月27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重复了同一的看法：

“也许我们的机关〔国家机关。——贝特兰〕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气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气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纵然我们的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sup>①</sup>

1923年，在他所写的最后一篇准备发表的文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07页（中文版，第33卷第267页）。

章里，列宁更进一步认为当时的国家机关非但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而且他还说：

“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可以用来建立真正新机关、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机关、苏维埃机关的人材，如此等等。”<sup>①</sup>

经过五年革命，看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形式几乎还不是苏维埃的（就其原意而言），国家机关几乎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根本上取决于作为领导的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这个党能否发展同工人阶级中和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的关系。

这个无产阶级性质也是脆弱的。由于党员的迅速增加以及在党的行列中掺入了缺乏政治素养的人，所以已经不是由党的成分来决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性质了。1922年，列宁——上面已经看到——在他于3月26日写给莫洛托夫为了向中央委员会传达的一封信中，坚持了这个观点。信中主要说：

---

<sup>①</sup> 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502页（中文版，第33卷第442页）。

“……在这样困难的时候，…… 为了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一般说来（如果从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说来），我党在政治教育上还是比较差的。”<sup>①</sup>

在同一信中，列宁还指出——我们也要注意——“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党员成分，而是决定于可以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小部分党员所拥有的巨大无比的威信”<sup>②</sup>。

当时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其特征是它的存在是和俄国人民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所完成的革命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与党的领导——在好多年中——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之间的信任关系、与党的领导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解决问题所获得的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是脆弱的，因为党的领导人少，有分裂，尤其有好几次大多数党员表现了他们容易受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9页（中文版，第33卷第22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60页（中文版，第226页）。



然而也不要夸大这种脆弱性的意义。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不同的时间内，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内部，捍卫无产阶级路线的总是少数人，那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者终于能使自己的观点取得优势，并且能及时取得或夺回党的领导权。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已存在这种可能性，譬如列宁在开始时只是少数派，但终于使他的观点赢得了胜利。

### 第三节 俄国革命的阶段

总结俄国五年革命所完成的工作时，必然要考虑到 1917 至 1923 年间革命所经历过的阶段。列宁提议把这个阶段划分为几个“时期”。

我们知道 1918 下半年，当贫农委员会开始发展时，列宁就认为俄国革命在农村中也走上了一个完全无产阶级的阶段。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不是这样。因此，他于 1921 年认识到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的工作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即使在这方面，也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工作达到了社会主义阶段。

这时，列宁把革命过程划分为三大时期。

第一个时期（1917年10月至1918年春的几个月），这是革命完成了主要政治任务的时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收地主的财产，使俄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大生产资料、运输业和贸易的国有化。<sup>①</sup>

第二个时期，从1918年春至1921年春，这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和军事的任务是中心任务。

第三个时期，从1921年春开始。列宁称之为“在新的道路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sup>②</sup>，即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包括国家工业部门，自1918年3月至4月起，在这个部门中，不是“社会主义标准”，而是“资产阶级标准”（同“专家”报酬问题的解决相联系）<sup>③</sup>得到了巩固。

---

① 参阅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论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81页（中文版，第33卷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中文版，第77页）。

③ 同上书，第82页（中文版，第65页）。列宁于1918年

只有考虑到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后，才能懂得这时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在走向特定的形式，因为归根到底，政治形式取决于经济关系。阶级的革命斗争能粉碎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器，但只要根本的经济关系（包括直接生产者的经济关系）没有变革以前，恢复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倾向一直存在着。然而，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比起摧毁国家机器来，是一项时间更长、更为复杂的任务；所以，即使无产阶级革命已结束了第一阶段，还需要继续斗争，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革命的变革。

我们将看到，列宁通过他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犯的错误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所提出的问题，逐步趋向于这样的结论。我们还将看到，1921至1923年这一段时期的经验如何导致他改正他对新经济政策的最初观点。

---

就指出了这个现实。当时他坚持：由于在国家工业内给予专家以很高的地位，这就在工业内建立了资本主义关系，“因为资本并不是一批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7页（中文版，第27卷第227页）。

## 第二章

### 对“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的分析

列宁对革命最初几年所作的总结，显然不限于列举已完成的改革和已经过的阶段。他的总结也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已往的行动作出批判性的评价。因此，列宁竭力分析所犯的错误，以免重犯。这个总结也是一个自我批评，是针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和赋予这些措施的意义而进行的。

#### 第一节 “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及其后果

列宁写了不少批判地分析“战时共产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所犯错误的性质和意义的说明，不是千篇一律的。

## (一)列宁对错误的分析

特别在 1921 年底以前——那时实施新经济政策（布尔什维克党在春季通过的）遇到了困难，需要加以修改——列宁开始对“战时共产主义”进行了分析。因此，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文章中说：

“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sup>①</sup>

这里，清楚地证实了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但没有确定错误的性质。一方面，这篇文章暗示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生产和分配的障碍首先来自农民小生产的存在；另一方面，文章似乎还暗示，可以用国家的命令来推行“按共产主义原则调整的方式”。这种说法强调要经过几个阶段的必要性，在这以前谈不上按共产主义原则调整的问题。

上面的文章发表了几天之，列宁又回到了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51 页（中文版，第 33 卷第 39 页）。

同一个问题上,他说:

“……我们……犯了错误: 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sup>①</sup>

这里,所犯的错误似乎不在于措施的本身(“共产主义的措施”),而在于采取这些措施为时过早。

然而,事实上,列宁看得比这更远。对他来说,“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不仅在于国家组织实施这些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特征的措施的时  
刻,而且还在于对这些措施可能引起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的判断。譬如,列宁在1921年10月29日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这一点:

“我们曾经以为建立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一个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sup>②</sup>

实际上,这种说法清楚地说明了具有“战时共产主义”特征的国家干预的形式没有改变旧的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55页(中文版,第33卷第4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83页(中文版,第66页)。

经济制度，只改变了它的职能的某些条件。因此，经济制度和“过去的没有什么区别”，已往的生产关系依然原封未动。这就使列宁（在同一报告中）指出：

“我们必须站到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来。”<sup>①</sup>

在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所犯错误的一个方面，在于认为它已“摧毁”了过去存在的关系，其实这些关系依然如故。就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实物税的报告（1921年3月15日提出的）中指出，那些以为俄国特别在农业上可以在三年内过渡到社会主义变革的人是“幻想家”。<sup>②</sup>

但是，这篇报告所直接批评的，不是那种认为通过国家的行动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思想，而是那种以为在很短的时期内（当时人们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从个体农业过渡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93页（中文版，第33卷第75页）。

<sup>②</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7页（中文版，第32卷第205页）。

到集体农业的幻想。

即使列宁在 1921 年还没有能够清楚地确定“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究竟在哪里，是否在于采取某些措施的时间或措施的性质，或者在于对经济关系变革所期望的效果。但是，列宁认为有必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所采取的战略和所执行的路线的错误性质。他笼统地把这个战略称作对资本主义的“直接冲击”的一次尝试、一次失败的尝试，“必须坚决地、明确地承认过去所作的是错误的……”<sup>①</sup>。

这确是一次自我批评。列宁认为为了使布尔什维克党在制定一个“新战略”和一个“新战术”<sup>②</sup>，即经济政策的战略战术时，避免犯类似的错误，这个自我批评是必要的。

列宁在分析“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时所揭露的错误，基本上涉及同这个政策相一致的战略思想。因此，他的批评既不涉及过去采取的每一个主要的具体措施，也不涉及实施这些措施的范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80—81 页（中文版，第 33 卷第 64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81 页（中文版，第 64 页）。



围,尤其不涉及当时采取这些措施的意义(这个不现实的意义曾使实施这些措施的范围超出了战争的需要)。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这个严整的制度是由战时的、而不是由经济的需要、考虑和条件造成的。过去我们处于空前未有的破产的状况,我们不得不在大战之后又承受一系列的內战,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也许在施行一定的政策时有过错误,有过很多过分的地方,——这是应当十分明确地指出的。但是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而只有立即实行最大限度的垄断,直到甚至不给任何报酬地取得全部余粮。”<sup>①</sup>

不久,他在《论粮食税》这一小册子中又作了这样的评价:

“‘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sup>②</sup>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44—245页(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中文版,第32卷第22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64页(中文版,第333页)。

“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制性措施的实施范围，都是由于军事的迫切需要而决定的，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家经济的严重混乱以及与（甚至工人阶级内部也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有关的那种无纪律状态，因此，一夜之间不可能产生自觉的纪律。早在1917年底，尤其是从1918年起，很多农民为他们自己积蓄了大部分农产品（这是前线不可缺少的）；工厂里，旷工在大幅度地增加。到1918年春，不少工厂的管理人为了增加收入，开始变卖机器、零件，或出售存货<sup>①</sup>，而这是由于物价高涨，收入的实际价值越来越下降的缘故。在战争紧迫的形势下，不可能指望在一夜之间出现“自觉的纪律”。必须以一切代价保证军队和城市居民首先是工人的生活。<sup>②</sup>

实际上，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他对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是有其

---

① 参阅马塞尔·利布曼：《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年，第2卷第189页。

② 正如马·利布曼所提到的那样，1918年底至1920年，瘟疫、饥饿、寒冷使七百五十万俄国人死亡，而外国人发动的战争使四百万人牺牲了生命。（见《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第2卷第207页。）

特殊性质的，即是被战争所迫使的这一点一直看得很清楚（虽然有时候被这个时代的一些幻想所迷惑）。相反，其他的人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显然得到许多干部和党员的拥护——则把这些措施当作“直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 （二）“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后果

“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事实上使苏维埃俄国取得了胜利，尽管劳动者精疲力竭和经济遭到破坏。事实证明，由于坚持这个政策，十月革命产生的政权才能动员足够的力量，把群众为革命而斗争的毅力和英雄主义都集中到当时的基本任务上来。

然而，适合“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的实施方式，尤其是被“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幻想所引起的错误，久而久之产生了消极的后果；这些后果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再为战争的需要证明为必要的时候起变得更为严重了。1920年秋天起，情况就是这样，那时，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没有下决心迅速废除农产品的征收、劳动的军事化和工会

的“国家化”等措施，致使广大农民和工人阶层中增长了真正的不满情绪。1920和1921年间的冬季增长的这种不满情绪，在局部地区表现为农民的暴动和工人的罢工。这就使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条件得以成熟。当列宁说当时所犯的错误使布尔什维克党遭受到的失败比它在战场上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时<sup>①</sup>，就是指这些事。因为当时苏维埃政权同许多人民阶层的关系已严重地恶化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只能逐步扭转这种形势。

“战时共产主义”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实际上，由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军事化引起的极端集中而加速了各地苏维埃的活动的减弱（从1918年春已开始出现）。1918年下半年，苏维埃地方机关的权力隶属于中央机关：俄国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和由它产生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和“契卡”。我们知道，党的地方组织的软弱助长了这个变化，因为“地方主义的”或“地区主义的”倾向没有完全被布尔什维克党的统一行动所击败，以致各个不同的地方或地区都试图把最大限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3卷第57页（中文版，第33卷第44页）。

度的产品留为己用，这与战争的迫切需要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苏维埃地方机关陷于瘫痪的倾向，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造成的，不过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对当时的“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解而变得更为严重罢了。所以问题应当这样提出来：这个错误理解的根源是什么？

## 第二节 “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根源

根据上文所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犯的 error 不都是同一性质的。有些错误基本上属于“实践性的”，这与政治路线的执行条件有关，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和由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不可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迅速动员为军队、为防御工作和为城市生存需要的人力和物力，才大规模地或任意地推行了一些强制措施。其他的错误似乎基本上是属于政治和思想性质的，它是同政治路线本身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的尝试有联系的。

两种类型的错误的区别，似乎同两种类型的机关有关。“实践性的”错误可能是由没有无产阶

级性质的和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渗透的国家机关所犯的；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则来源于布尔什维克党本身。事实上，这样的区分是不够的。一方面说“实践性的”错误仅仅是由没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机关所犯，这是不对的，因为被派到农村去的工人分队和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一般也和国家机关采取同样的措施；此外，“战时共产主义”执行的错误措施，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而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政治决议制定的。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承认两种类型的错误有所不同，也必须确认是布尔什维克党在行使权力，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因此，必须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最主要方面的错误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来源于党的路线和党对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作的分析，分析时曾运用了某些理论概念。

### （一）列宁对所犯错误的解释

对列宁来说，他毫不怀疑“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是政治上的错误。因此，他自己提出问题，来

说明犯错误的原因。为了回答问题，他打了个比喻：他把资本主义比作一个要塞，党本来应当采用唯一能获胜的围攻，却试用了冲击。他补充说，在没有用冲击作试探前，人们就不能了解冲击是不可能的，而只有围攻能取得胜利。列宁提出了这个总的原则作为结论：

“执行这个任务时，有很多情况不了解，如果不作适当的实际试探，就很难绝对准确或相当准确地决定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攻占敌人要塞。”<sup>①</sup>

列宁给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原则上是正确的。实际上，面对一个新的形势，只有实践的经验能够使人学会正确地解决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个答案清楚地说明了在缺乏实践经验的条件下，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并说明应该通过这些错误才能前进。这也意味着理论不能走在实践前面（虽则理论从已往的实践中得出有系统的结论来指导实践），但这个答案仍有其不足之处。

列宁在作出这个解释时，似乎承认——同他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79页（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中文版，第33卷第63页）。

在其他情况下写的相反——“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不仅适用于保证捍卫苏维埃政权的迫切需要，而且还能粉碎资本主义的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的关系。实际上，被引用的比喻暗示无产阶级没有具备足够的力量进行“冲击”，所以不得不采用围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无产阶级力量壮大了（依靠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人数的增加，依靠更完善的思想教育，依靠同群众更良好的关系，依靠国家行政机关更有效的服从，等等），就有理由去使用同一类型的“直接”“冲击”了。这个结论有点象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所作出的结论。然而实际上，其错误之处就是认为国家的强制措施可以代替群众的行动，并在根本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中可以代替意识形态的革命变革。

列宁关于不可能预见到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试行变革生产关系的失败所作的解释，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实际上，马克思论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条件——例如当他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似乎已指出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本质上不足以保证生产关系的变革。然而，布尔什维克党尤其是列宁



不会不知道马克思的这些分析，而且他们承认这些分析是正确的。因此，人们不能满足于列宁所作的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解释，而应当另行提出产生这些错误的幻想的来源问题。

## (二)“战时共产主义”幻想的来源

看来有多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幻想之所以能产生和能继续数年之久，甚至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结束时还重新出现。

其中一个因素——其重要性必须在这里加以指出——是把党的行动和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的行动一致起来的倾向。当然，这里是说一致的倾向；其实，列宁曾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党所采取的这个或那个措施没有被工人阶级所理解或接受，因此存在着工人阶级不肯跟布尔什维克党走的危险。所以，在列宁的思想中，党和阶级是有区别的。但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措施的实质和这些措施是怎样设想的，都说明好象党和国家机关的行动与群众本身的行动是一致的，这样就又回到了列宁所引用的“打成一片”的比

喻<sup>①</sup>；然而，这个比喻从字面上说，有掩盖党同工人阶级之间可能发展的矛盾的趋向。

此后，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的倾向将有力地重新出现，而且由于没有及时加以纠正，将产生极严重的后果。

但是，这里只关系到答案的一个因素。实际上，人们要问为什么实践本身没有早一点说明，党和苏维埃国家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不能摧毁旧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建立新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要问，为什么“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存在的经济关系会被当作正在建立的共产主义的关系。

对于上面提出的问题，似乎可以用下面几种因素来回答：

首先（在论述国家经济机关的作用时，人们已看到此事），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形成的一部分观念完全决裂，也没有把国家

---

<sup>①</sup> 1919年8月，列宁在《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中写道：“工人阶级专政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实现的，这个党还在1905年，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已同全体革命无产阶级打成一片了”。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564页（中文版，第29卷第513页）。

所有制和国家集中制同摧毁资本主义关系看成是一回事的观念完全决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屡次说明在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过程中，决不是强化国家而是必然地促使它消亡（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后果）。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清楚地指出社会主义意味着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要消亡。列宁在阅读《哥达纲领批判》或其他讨论国家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时所作的笔记中，非常明确地重申了这些话。列宁特别记住了恩格斯于1875年3月致倍倍尔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吸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写道：

“……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sup>①</sup>

尽管《国家与革命》反对国家主义——并且尽管列宁提醒说，他之所以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

---

<sup>①</sup> 见1950年巴黎版《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附录，巴黎，社会出版社，1950年。（《哥达纲领批判》，中文版，1972年，第35页）。

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正是为了避免把由国家来组织生产和流通与建设社会主义两者混淆起来——如果“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国家措施曾被认为是为了“立即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国家行动的巨大规模把资本主义关系和资产阶级关系存在着的旧形式全部消灭掉了，从而使人们有这样一个幻想，即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这种行动实际上能够粉碎旧的经济关系。

由于国家在流通的范围内大力干预，商品和货币的流通大幅度地被取消了。因而上述的幻想就更加加强了。国家对产品的征收和分配的措施取代了商品和货币的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把商品和货币关系看成同资本主义关系是同样的东西（这是和对马克思的若干文章经常解释错了的情况相同），就可以从商品和货币流通几乎完全取消得出资本主义关系本身已经消失的结论。这样，“战时共产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分配的幻想就占优势了。

在“战时共产主义”末期，当人们拒绝大规模地实施那些曾把商品关系驱逐出经济舞台的国家措施时，商品交换公开地重新出现证实了这是一

种幻想。这种公开的重新出现如此迅速和如此广泛，恰恰说明了过去任何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被“摧毁”，就是说，没有被新的社会关系所替代。所以，只要放松控制，只要能供应更多的产品，那末，一直被抑制的商品和货币关系又重新抬头了。

实际上，必须指出，即使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商品交换的消失还不是真正的而只是形式上的。其实，在所有城市中，都有一些地方几乎公开地发展着非法买卖，因为这些买卖得到了警察的默许。比如，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就是一个例子；甚至这个广场的名称已成为俄语专指“黑市”的普通名词。非法买卖的严重性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1919至1920年间城市中官方分配的粮食产品只占城市居民所需要的热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sup>①</sup>

无论怎样，任凭“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幻想有多么大，但仍旧有下列一些事实：这些幻想没有被及时分析，而且在事后也没有进行分析；而只是看到了作为改变社会关系的政策

<sup>①</sup> 参阅前引 E. H. 卡尔著作，第2卷第242—243页。

的“战时共产主义”所遭到的失败。这里，有一个不足之处反映在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后制订的新路线上。这条路线开始出现时，似乎退回到了1918年春天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上，之后，成为与列宁于1921年秋天以后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概念相一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新政策。在下面第四章中，我们还要探讨新经济政策的各种不同的概念。但在研究之前，必须讲一讲“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所起过的作用。

## 第三章

### “国家资本主义”

在“战时共产主义”被放弃后不久，从 1921 年春天到秋天，处于优势的新经济政策的概念，正如众所周知，是当作一种向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后退，这种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党于十月革命之后打算推行的。这种“后退”证明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心目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在一个长时期内占着主要的地位。

####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 概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中 所占的地位

研究列宁于 1917 至 1918 年初所写的文章时，

可以清楚地看到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用语的目的,是为了在当时能实现的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变革同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划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这是为了指出,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国家化只能是部分地动摇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废除”这些关系,也不是“消灭”资产阶级。

然而这一用语并不局限于提高人们的警惕,起着“教育作用”,而是为了避免把国家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混淆起来。它也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的“阶段”的概念相同。这样,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sup>①</sup>一文中写道:

“……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sup>②</sup>

---

<sup>①</sup> 这篇文章写于1917年9月,并于10月底出版单行本。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7—397页(中文版,第25卷第312—356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9页(中文版,第25卷第348页)。



这些话本身建立在好几个前提上面；这些话暗示着“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必然是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而且能够依靠的形式。这些形式同它们的阶级内容（事实上它们是同某些阶级关系相适应的）的关系问题没有被清楚地说明，因此，需要提出的唯一的重要问题是：如果要采用这样一些组织形式，那末将由谁来监督呢？这就是列宁所说的：

“实质上，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sup>①</sup>

所提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因为权力问题是首要的，但权力问题不足以使其他一系列问题都成为无的放矢：监督的方式和这个监督方式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对两个敌对阶级，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不是同样的呢？如果不是同样的，无产阶级行使权力时对监督的具体方式应采取那些修改？这些方式本身是否应按照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或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2页（中文版，第25卷第332页）。

而改变？

1917年10月，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可能的甚至必要的相同的问题已经解决，至少在当时所处的革命阶段是这样。只有一项决定性的保留：对国家资本主义机关的监督应当由人民群众自己行使（而不是“用人民群众的名义”由其他国家机关行使）。但正是这个保留引起了同样的问题：人民群众能不能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度集中的机关进行真正的监督呢？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其实，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前面分析过的条件——应当承认，那时要避免经济的彻底解体和“崩溃”<sup>①</sup>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除非依赖当时所采取的措施。但这些措施事实上使人民群众的监督极为有限，而人民群众一般对这种监督并不感兴趣。

虽然如此，但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

---

<sup>①</sup> 应该指出，在1917至1918年之间的冬天，人们注意到一种经济解体的倾向：各地方各地区为了首先满足自己的消费，都在设法为自己保留自己生产的产品，甚至拦截路过“本地”的货物。

具有普遍意义的必要性，对于这个阶段在走向社会主义时可能具有的地位，对于这个阶段中所特有的矛盾，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式等问题，都没有真正讨论过。在那时，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在布尔什维克党看来，似乎肯定是必要的，而且德国战时经济的这个“样板”似乎是一个应该效法的样板。

事实上，1918年的阶级斗争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推行——或者试图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同一个基本概念的两种形式。

### (一) 1917年10月至1918年3月实施 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

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一种形式尽可能不要触及企业的法定所有制。这种形式，总的说来，一直到1918年3月为止都处于优势。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工业要由国家来组织和制定规章制度。至于没收企业，一般只是在某个企业的劳动者提出要求，或者作为“惩罚”措施时才这样做。在1918年1月召开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肯定了这个方针，声明国有化和没收是为了使“他们

[资本家。——贝特兰]服从”<sup>①</sup>。

1918年初，为了说明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尤其是当时已实行的并设法限制没收和国有化的政策是正确的，列宁一再提出的一个直接理由是，因为当时俄国经济处境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必须在一个时间内停止向资本进攻，停止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斗争。列宁为了答复那些要继续采取攻势的人，比如说，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

“决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虽然资本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彻底击败，我们还必须无条件地向劳动者的这个敌人继续进攻，可是这样规定的任务是不确切的，不具体的，其中并没有估计到目前时局的特点，即是为了保障今后的进攻能取得胜利，应当马上‘停止一下’进攻。”<sup>②</sup>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77页起（中文版，第26卷第432页起）和E. H.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79页起。可以看出，当时所颁布的国有化命令实际上都附有“理由说明”，这些说明没有提没收政策的原则，只是说明每一项措施的特殊理由。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4页（中文版，第27卷第224页）。

这里，国家资本主义似乎已不是革命的一个阶段，而是一个“停止”革命攻势的政策了。但对列宁来说，这并不是真正停止的问题。对他来说“……是改变我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重心。到目前为止，居首要地位的是采取措施直接剥夺剥夺者。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统计和监督。”<sup>①</sup>

## （二）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趋向于大规模地没收老资产阶级的产业，但仍保存包括在国营工厂企业在内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形式和国家制定的规章制度。这第二种形式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实行的。

布哈林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这种意见，列宁以工人阶级的态度反驳他们说：

“工人们在跨出能被‘左倾’词句或小资产阶级放荡性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利用资本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4页（中文版，第27卷第225页）。

家来领导托拉斯，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每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到社会主义。工人们……不害怕最大的‘国家资本主义’。”<sup>①</sup>

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的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列举了其他论点，说明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一个“阶段”，而是要证明由于俄国革命的孤立和需要等待——在保存政权的同时——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也取得胜利而采取的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1921年初，当列宁对新经济政策提出初步设想时，又一次指出，在现有条件下有必要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 （三）1921年“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

在列宁《论粮食税》<sup>②</sup>的小册子里，新经济政策基本上被看作是“后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它

---

<sup>①</sup> 见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载《列宁全集》，第27卷第365页（中文版，第27卷第324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9页起（中文版，第32卷第320页起）。

具有布尔什维克党于 1918 年春天所给予它的形式。下面<sup>①</sup>将看到新经济政策这一概念只是昙花一现(1921 年秋天被废弃)，但它在理论上依然是很重要的；它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正在占有重大的地位。

具体地说，当时国家资本主义是以极其多样化的形式出现的。列宁在他的小册子里指出那些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形式：把企业租让给资本家；小生产者和小资本家的合作社（列宁显然是把工人合作社同这种合作社区别开来的），将属于国家的工厂、商店、矿山出租给资本家企业主，等等<sup>②</sup>。这是当时国家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但切勿忘掉那些已经实行并保持下来的旧形式：招募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技术人员来管理国营企业和在这些企业中同样保持着的资本主义关系（国营企业中权力和工资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国营企业总的领导方面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以及资本家和资

---

① 见本卷第 678 页起。

② 参阅《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67、369、371 页（中文版，第 32 卷第 359—361 页）。

产阶级技术人员参加这些组织形式（特别是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使工人监督实际上处于从属地位）。

国家资本主义的上述几个形式更值得注意，因为这些形式在以后进入被列宁称为“退却”的新阶段，即列宁认为为了新经济政策的新概念而放弃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时还会存在。事实上，从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概念过渡到第二个概念所造成的中断，比放弃国家资本主义更为严重，正象我们以后在分析这两种概念时将看到的那样。但在这以前，必须先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来源以及这个概念在列宁的思想发展中所处的地位。<sup>①</sup>

## 第二节 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 以及在列宁主义中的地位

“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内产生的。正是

---

<sup>①</sup> 看来这个地位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形式中仍然是很重要的（见本卷第 674 页）。



这些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如考茨基，尤其是希法亭，在党内说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机构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他们还把这个机构看成是无产阶级将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加以使用的经济机构的前身。

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反映了某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断地同这些概念进行斗争。因此，恩格斯多年致力于使群众和党员了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的反对国家主义的论点。对于这篇文章的发表，他很晚才得到德国党的领导人的同意。稍后，他又设法删掉了爱尔福特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中重新提出的国家主义观点。被通过的草案声明社会民主党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国家社会主义”是把国家放在私人企业主地位，“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sup>①</sup>

人们知道列宁是以多大的毅力同考茨基关于

---

<sup>①</sup> 参阅 1891 年 6 月 29 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前引《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第 84 页（参阅恩格斯：《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271 页）。

资产阶级国家政治机构的和无产阶级可能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政治机构的概念决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这样写道：

“……当我们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中，从他提问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国家问题上恰恰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sup>①</sup>

他严肃地指出，在国家问题上，考茨基的观念和马克思的教导是不相容的；为此他重申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必须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机构和一个一定要消亡的国家。

然而，在完成这个决裂之后，列宁在同一著作中还肯定说，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时形成的国家经济机构，应该保留下来。他这样说：

“现在我们要谈国家机构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了。在现代国家机构中，除了常备军、警察、官吏这个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个同银行和辛迪加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5卷第515—516页（中文版，第25卷第464页）。

登记的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个机构决不可以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而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sup>①</sup>

因此,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中,对资产阶级政治机构——这是列宁强调要打碎的——的阶级性的分析,和使之服从于无产阶级权力机关的、似乎需要保留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机构所起的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列宁所采取的立场,给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的摧毁与重建工作确定了一个界限。这个立场引起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必须经过的阶段的问题;列宁承认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而是一个经历若干阶段的过程,他还指出每一阶段是以能有效地完成社会关系的摧毁与重建工作的界限作为特征。可是,关

---

<sup>①</sup> 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1917年11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101页(《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3卷第311页)。

于各阶段的性质、内容和从这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条件方面，却出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这样，国家资本主义有时好象显然由于“技术”上的理由是一个应该经历的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无产阶级“学习”管理经济，因此，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它越来越能控制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才能向前迈进）；而有时，国家资本主义则又好象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的一定阶段中所执行的一种政策。这种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策的概念，从1921年开始，逐步占了统治地位。<sup>①</sup>

另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存在于1918年的文章中，这些文章并未指出，当革命过渡到下一个阶段时，国家资本主义机构是应该消灭呢，或是相反，应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作用（在列宁看来，

---

<sup>①</sup> 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实行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具体内容必然在部分方面和俄国不同；它的特点，就是国家投资于私营企业（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用合同的方式把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联结起来，然后把私营企业转化为国营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原来的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仍担任领导的职务、领取高薪和他们在旧企业所投资本的定息。这个政策主要是在五十年代初实行的，这个政策所发展的某些经济关系一直维持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也没有把它们全部消灭掉）。

这个建设,不是俄国革命在 1918 年所应当解决的任务)。

显然,人们不能希望列宁事前解决一个在阶级斗争中还没有具体提出的问题。可是,当时列宁的某些论述是能够暗示那些还没有革命化的经济机构是应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作用的。

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机构中所实现的社会关系变革的条件的问题。因为,总的说来,列宁把政治置于统帅地位并着重指出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所要求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来自阶级斗争和群众的行动;可是他提出的一些论述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旦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后社会关系的变革是属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来自阶级斗争,这主要表现是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消失。例如,他这样写道:

“……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sup>①</sup>

这一段论述，尽管写得很审慎，却指明了当他在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即他同他过去从未如此坚决反对过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立场决裂的时候——列宁还没有完全放弃社会关系的变革（即他所说的“打破分工”）是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的概念，也没有放弃国家资本主义机构所起的相对持久的作用的概念（因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其实，在这些问题上（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和地位，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人们看到在列宁的著作中两种矛盾的观点相互冲突而又同时并存。一个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突出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与重建的因素，另一个是“占从属地位”的观点（从一般起次要作用的意义上说），它使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这第二个概念——当它占主导地位的时候，

---

<sup>①</sup> 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25卷第506页（《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3卷第25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

则是“经济主义”的概念——的存在丝毫不令人惊奇。马克思的有些著作(尤其是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似乎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概念,这些文章——按“经济主义的”意义来解释——在第二国际的理论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列宁在1918年也只和这个概念实行了部分的决裂。

从理论上来说,同马克思某些著作的“经济主义的”解释决裂,困难在于在一般情况下(即现有的生产关系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确是生产力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反之,当生产力在现有的生产关系范围内不能发展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就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就可能产生思想上的错觉,使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可能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和平地”进行;可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必要性”并不使变革成为“不可避免的”,它只能使社会革命时期的开端成为可能。<sup>①</sup>

---

<sup>①</sup> 人们知道,列宁着重指出这个阶段包括一个“历史时代”,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的复辟仍是可能的(参阅《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3页,中文版,第28卷第235页)。

再看列宁关于“打破分工”的原文，原文的缺点是暗示(可是没有说出来)“剥夺资本家财产”一旦完成后，同旧的经济关系的“决裂”从此将可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后果。一个类似的解释可能使人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机构和被它具体化了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也可能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这个解释是把生产力而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它和马克思、列宁的基本观点相矛盾——因此，为现代修正主义所采用，而这个解释排除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以这个解释会导致巩固经过不同程度改造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分工，在资产阶级政权一旦被摧毁并由国家的经济部门取而代之以后，资本主义关系的因素仍继续存在。这样，这个解释就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使资产阶级得以加强力量(特别是作为国家资产阶级)。最后，采用这个解释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尽管列宁所能总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很短促(尽管这个时期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军事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占主要地位)，但在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中，越来越明显地表明他正在同那些他曾



接受过的、马克思曾分析过的“经济主义的”观点决裂。列宁逐步地撇开了在 1918 年他还给予一定地位的“考茨基”观念的残余，这个观念把国家资本主义不作为一种政策，而作为一种可以直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就是说不需要革命化的）和解决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组织形式。分析列宁对新经济政策陆续发表的文章，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他在 1922 至 1923 年间是怎样同他 1918 年的观念决裂的。列宁的这些观念的演变没有完成，从而造成了在某些文章中有矛盾之处，这正是使以后片面解释列宁的文章时——他们不懂得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活动——用“列宁主义”的名义别有用心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而这恰恰是背叛列宁的新论点的。

## 第四章

### 列宁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概念的演变<sup>①</sup>

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问题的文章极为重要。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把革命初期正反两面的经验逐步提高到理论高度。他从肯定“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出发，表面上好象“回到”1917至1918年的概念上去。事实上他逐步制定了一个新的策略，这个策略从经验中得到丰富，并且越来越仔细地考虑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的欧洲并不显得那么迫切这一事实，这促使他越来越清楚地提出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也促使他制定一个和

---

<sup>①</sup> 这一章是五年革命总结的一部分，只研究了列宁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概念的演变，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后果——新经济政策主要是从1923年起开展的——将在本书第2卷中研究。

过去不同的、新的阶级策略和新的经济策略。的确，这个策略的许多原理已出现在列宁以前的文章中，但是用另一种方式写的。

列宁论述这些问题的文章内容在1921至1923年间不断充实。人们在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新思想的产生，对矛盾看得更深远，并看到对要求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提法越来越正确了。

关键在于掌握列宁思想的发展，因为这种思想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室”。分析他的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应用。这种分析也充满着教育意义，因为它把既陈旧又不适用的、已成为新提法的产生的障碍暴露了出来。

## **第一节 1921年春新经济政策的 列宁主义概念**

1921年春季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概念，看来首先是为了应付紧急形势：不可能再继续执行征集余粮的政策，必须考虑到农民的要求。

列宁根据他在1917年和1918年初所作的分析，证实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且更多地考

虑了农民的要求，最后汇集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概念的材料。

这第一个概念就是应当通过暂时的妥协，“直到国际革命的胜利”<sup>①</sup>；它并不是为了（象列宁在以后的文章中强调的）开辟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只是为了给巩固苏维埃政权必不可少的措施打下基础。

在经济政策方面，符合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概念的（大体上，这个概念从1921年3月至10月是占优势的），主要有两类措施。一方面，象我们知道的，这个概念包括放弃对农民的余粮征集制，代之以粮食税，并给予农民们进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自由，同样也给予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一定的自由。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包括对外国大资本家作出一些“让步”，这样做有双重目的，即利用一部分国际金融资本反对另一部分国际金融资本以便使已经陷于瘫痪的俄国工业得以恢复。“新经

---

<sup>①</sup> 见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1921年4月11日），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324页（中文版，第32卷第294页）。

济政策”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当时列为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条线的，新经济政策在当时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新经济政策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根据列宁的分析，是正确的，因为这时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同广大农民保持关系。在1921年春季，在他看来，只有无产阶级为支持民主革命而斗争，但不是把大规模地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变革作为己任，无产阶级同农民的政治联盟才能够实现。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列宁1921年3月15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说法，为了“挽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同农民达成经济协议的政策是必要的。列宁是这样说明他的思想的：

“……这两个阶级〔农民与无产阶级。——贝特兰〕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sup>①</sup>

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21年5月26日至28日），列宁重复了这个思想，指出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5页（中文版，第32卷第204页）。

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过去在国内战争条件下是可能的，因为白军的进攻同样使农民受到大地主复辟的威胁：

“使我们〔同农民。——贝特兰〕实现协议的主要原因、主要动力和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国内战争。……这就是决定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形式的主要因素。”

列宁接着更清楚地说：

“而当我们真正地彻底地肃清了外来的敌人时……，我们就面临了一个新的任务：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经济上的〔原文有着重号。——贝特兰〕联盟。”<sup>①</sup>

工人和农民联盟的“经济上的”（所以主要不是政治上的）性质，正如我们看到的，列宁亲自加上了着重号。

在同一个报告中，列宁一直把大工业放在主要地位，他说：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32-433页（中文版，第396-397页）。

下  
关  
司  
马  
十  
年  
二  
一

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sup>①</sup>

此外,列宁经常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存在直接同有无大工业联系在一起:“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主要物质基础是大工业。”<sup>②</sup>

当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发展城乡的“社会主义交换”(事实上不是货币交换)来巩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经济联盟”。实际上这导致了一种对恢复农村工业不太有利的态度,而这种工业是农民日常生活的基础。因此1921年春季的新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某些目标,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地巩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经济联盟。

但是,列宁认为,对农民作出的让步,总的说来,可能避免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一旦无产阶级要去完成除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外的任务时,就会出现对抗性矛盾的危险。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还这样说: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35页(中文版,第32卷第399页)。

② 同上书,第438页(中文版,第401页)。

“或者是农民和我们取得一致，我们在经济上向他们让步；或者是斗争。”<sup>①</sup>

这个时期，在列宁看来，在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和不断在威胁着的对抗是和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特性分不开的；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sup>②</sup>——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抗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sup>③</sup>

列宁在1921年7月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重新明确地说明了他当时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关系的看法：对他来说，除了剥削阶级以外，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英国是例外——“都存在着小生产者和小土地占有者阶级。现在，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同这两个阶级作斗争”<sup>④</sup>。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9页（中文版，第32卷第412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页（中文版，第33卷第3页）。

③ 同上书，第19页（中文版，第8--9页）。

④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515页（中文版，第32卷第471页）。



当然，对小生产者和小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不能同对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同样对待，简单的理由就是这些社会阶级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因此：

“……对于他们，不能实行剥夺或驱逐，必须采取另一种办法进行斗争。从国际观点看来（如果我们把国际革命看做统一的过程），现在在俄国开始的这个时代的意义，本质上就是我们必须在实践上解决俄国无产阶级怎样对待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问题。……现在，实践已经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所获得的经验对于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如何是有用的，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一定能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技术上作更好的准备。”<sup>①</sup>

把小资产阶级（当然也包括农民）定为“主要的敌人”<sup>②</sup> 的概念是同促进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相类似的。在这里我们又找到列宁在1918年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那本小册子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515—516页（中文版，第32卷第471—472页）。

<sup>②</sup> 列宁说：“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是它的风俗、习惯和经济地位。”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04页（中文版，第27卷第268页）。

里发挥的论点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着重指出“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sup>①</sup>。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和在其他文章中一样，列宁建议要社会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生产，国家资本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政策，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式”，这种形式的特征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国家组织”，它能“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这些条件，在列宁看来，就是德国所具备的那些条件；而在俄国，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得出结论：应当“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为了使野蛮俄罗斯人迅速采用西欧成果，不惜用独裁方式……”。<sup>②</sup>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50—351页（中文版，第27卷第310—311页）。引自1921年的《论粮食税》的小册子，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51页（中文版，第32卷第32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54—355页（中文版，第324—325页）。

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中所发挥的有意义的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问题，列宁不是没有理由地认为，这是俄国“前资本主义”性质的产物，“穷乡僻壤”即彼此隔绝的乡村的产物，在具有“宗法制度”特征的这些地方都很容易受到官僚主义的压迫<sup>①</sup>，因此无法帮助农民摆脱他们的处境。列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同国家资本主义在新经济政策形式下的结合才有可能做到。

这样，在列宁看来，在这个新经济政策概念中，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时——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有限，特别在农村里——是同官僚主义（小资产阶级发展的另一种形式）以及腐化和“贿赂”制度作斗争的唯一手段。它能够加强城乡之间的正常关系，并有助于摧毁无产阶级革命未能真正摧毁的上层建筑的经济条件。

列宁接着说，即使这样刺激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交换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后果也不如维持现状那样可怕，维持现状是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2页（中文版，第32卷第341—342页）。

而在新经济政策许可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可以加以限制的，因为有工农政权的存在和在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sup>①</sup>

当然，列宁并没有说，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足以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定一条界限。他这样写道：

“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或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sup>②</sup>

这一段话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它清楚地突出了这个新经济政策概念的暂时性；它指出必须找到“正确的方法”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提出了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使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明显地相互对立，并且排除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在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5页（中文版，第32卷第344页）。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7页（中文版，第32卷第336页）（着重点是我加的。——贝特兰）。

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大工业，不需要一个由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的转变过程，就能进入社会主义。关于这条政治路线，列宁着重指出不能抽象地去制定；它的具体内容取决于当时存在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所要求的特殊处理。为了使政治路线的具体内容是正确的，应当取决于实践经验，这就要求作出同新方法的实施相联系的实际上或表面上的前进和临时性的“退却”。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然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能在任何书本上找到。用列宁老的提法，这条道路并不“象涅瓦大街那样笔直”<sup>①</sup>，这些方法好象不一定“接近”社会主义最迫切的需要，但是却最适合当前情况亦即当前阶级斗争的需要。因此，1921年春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形式——以后的形式同样如此——并非问题的解决，而是作为一种尝试，如果事实证明行不通，就准备放弃或加以修改。

---

<sup>①</sup> 如同彼得格勒的“香榭丽舍大街”。（香榭丽舍大街是巴黎一条笔直的大街。——译者）

## 第二节 从1921年秋季开始的新经济政策的列宁主义概念

几个月的经验表明，新经济政策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和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结成联盟来对付小资产阶级，是行不通的。原因很多：“租让”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极难实行，沙皇的旧官僚主义泛滥的机关的压力依旧很沉重，而基层的主动性——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概念准备唤起的<sup>①</sup>——在这样的条件下也没有实现。1921年是饥荒的一年。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在城市和不能提供足够粮食的农村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依旧十分严重。因此列宁得出了新的结论，他提议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

1921年10月，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sup>②</sup>中，列宁对新经济政策和同农民的经

---

① 参阅《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5页（中文版，第32卷第344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75页起（中文版，第33卷第65页起）。

济关系重新作出决定，他主要提出：

“今年春天我们说过，我们不怕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确定下来……

“它预定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地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怎样呢？结果……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了，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了商品买卖。……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sup>①</sup>

从经济观点来说，这个新经济政策的新定义等于是相当广泛地公开恢复商品和货币关系。布尔什维克党从此就让这些关系在比它最初预料的更为宽广的范围里发展下去，因为它希望在生产单位之间、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在城乡之间、在国家部门同农民之间建立“直接关系”（不是货币的关系）。商品和货币关系的恢复对经济的真正恢复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总之，当时令人注意的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3卷第90—91页（中文版，第33卷第73页）。

和被认为有意义的是新经济政策的经济观念的改变。

可是，最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种形式的政治涵义。事实上，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一种新型关系的开端，因为以前当作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盟”不再是要达到的目标了。许多事实说明要农民服从国家经济机关的尝试再次“放弃”，这些机关的职能是对农民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要求他们提供产品和接受他们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同意的交换条件。这样就开辟了为寻求同农民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联盟的道路。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的第二种形式，包含着重新组织一条新的阶级阵线的可能性和在新的基础上（1921年底还没有清楚地确定）重新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这个联盟——在象当时俄国那样的国家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牢固基础。

可是当时的具体条件，对于在新开辟的道路上前进来说，并不是立刻就有利的。一方面——以后我们在讨论作为新经济政策特征的“退却”的比喻时将重新提到——从理论上说，还没有清楚



地表明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关系的重新确定是策略性的(因此是临时性的, 是由环境决定的)还是战略性的(能够据以制定一条基本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 布尔什维克党在乡村的基础还薄弱——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 不能一下子掌握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并同最受掠夺的贫农和中农取得密切的联系, 帮助他们同新经济政策的“第二种形式”可能助长的富农势力进行斗争。

在无产阶级同起决定作用的农民群众(农民当时还停留在农村富裕阶层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的政治联盟的具体条件没有具备之前, 工农联盟主要还是带着经济性质的倾向。假使经济联盟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联盟的组成部分, 那末它本身是很脆弱的, 原因是在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他们寻求以高价出售商品)同工人和苏维埃国家之间的矛盾可能加深。

但是, 这些经济上的矛盾虽然是事实, 如果处理得当, 可能仍旧是次要的。因为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找到一条使他们能彻底改变他们当时不得不服从的经济关系的道路, 一条能够摆脱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的势力在新经

济政策最初几年中增长了) 的剥削并保证彻底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道路;可是,只有无产阶级用自己的组织和以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之上的思想帮助并引导农民群众,农民群众才能走上这条道路。

1921 年底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概念改变以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具备哪些条件,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同农民实现一个新型的政治联盟,一个不仅仅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为目标,而且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联盟?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同欧洲工业化国家首先是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融合的前景(开始时认为马上就会到来的)逐渐消逝,这个问题以越来越具体的方式被提出来了。

在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中——1923 年初写的,是一年多的新经验的成果——人们看到列宁在坚定地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努力。他在《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三篇文章中集中地提出了他的结论。<sup>①</sup>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80—494 页和第 501—507 页(中文版,第 33 卷第 422—435 页和第 441—455 页)。

## (一)《论合作制》

列宁在这些文章的第一篇中，指出他以前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某些提法是属于论战性质的，这就不能认为他以前关于这方面所说的一切同他在1923年的观点仍然一致。<sup>①</sup>

但这篇文章所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列宁对作为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合作化生产给予重要的地位。因此，他批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前所采取的立场，他说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开始忘记合作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合作制注意得“不够”并且“鄙视”它。他着重指出，从过渡的观点看，合作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生产资料所有权操在国家手中），因为它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sup>②</sup>。

这里，在同一句话中，既否认国营企业（主要是国营农场）这方面的重要性，又着重指出合作制特别是有关农民的作用，从此列宁越来越关心农民。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3卷第485页（中文版，第33卷第42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81—482页（中文版，第422和423页）。

列宁在讲到农民时，还补充说：“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sup>①</sup>

因此，合作社的发展就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合作社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合作社的发展应具有自愿的性质：建立在农民自身的信心上面。

列宁提出这些建议是在同党内的一股强大的思潮进行斗争，这股思潮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那时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领导人实际上建议把合作社并入“苏维埃机关”，这在当时的场合下，不是指地方苏维埃（群众自行管理的机关），而是指中央行政机构（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sup>②</sup>。事实上，合作社可能已经国有化。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合作化研究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已经赞成这种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88页（中文版，第33卷第429页）。

② 关于这一点，参阅前引《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卷第495页（中文版，第2分册第17页）。

国有化。只有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才使大会把问题“推迟到以后”再作决定。<sup>①</sup>

1923年，列宁给合作制规定了一个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看来，合作制不仅仅是一个筹备阶段，他说：“……在我国条件下合作制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因为它容许“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不是生产资料的法定所有制的问题（根据这篇文章，生产资料似应为“国家所有制”）而是生产的社会关系问题；因此“合作制”不仅属于列宁所常说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而且“就是社会主义制度”<sup>②</sup>。

这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对此列宁以后也没有时间加以发挥）和当前意义。

文章的普遍性理论意义就是同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国家主义”概念的一种形式进行一次新的决裂。列宁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合作社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1935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25卷第155页起。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84页（中文版，第33卷第426页）。

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一点上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的系统的阐述是相吻合的，这些阐述往往为过分简单化的国家主义观点“掩盖”掉了。而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这些观点的获胜可以有助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在特定的法律外衣下复活，并让非生产者通过国家机关来支配生产资料。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合作制和生产者协会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文章往往为人所“遗忘”，无疑需要重新提一提。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着重指出巴黎公社的重大历史教训之一，也即公社社员的革命大无畏精神的成果，是颁布了一些“具体措施(为了)彻底摧毁官僚制度”；其中不仅包括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提到的政治措施(把为数不多的公职人员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公职人员由群众选举产生，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而且还包括一些经济措施，如公社把生产资料转交给工人协作社。恩格斯在他于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恰恰指出，“公社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要组织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这种组织不

但应该在每一个工厂内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这一切联合体结成一个大的联盟；简言之，这种组织，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sup>①</sup>。

在早几年，恩格斯在谈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时，着重指出这一事实：马克思和他本人对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sup>②</sup>，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sup>③</sup>。

<sup>①</sup>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法译本，巴黎，社会出版社，1968年，第29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2卷第333—334页）。

<sup>②</sup> 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所占有的地位是由国家的存在决定的；这是因为在恩格斯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以合作社为“中间环节”的过渡时期还存在着国家。当然这不是指通往各生产单位归国家所有的“中间环节”，因为国家所有制显然应该跟着国家一起消亡。

<sup>③</sup>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等人的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写于1886年1月20日至23日间，见同上书第43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416页）。恩格斯的最后一句话引起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能仅仅用国家所有制来解决。

这样，列宁的《论合作制》同马克思的分析重新结合起来了，并在这个特殊而重要的问题上继续同第二国际的观点决裂，因为在《国家与革命》中决裂已经发生了。

把这篇文章对照 1922 年底和 1923 年初的政治形势也是重要的。《论合作制》事实上是把 1921 年底开始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列宁主义观点的含蓄的意思具体化了；它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的重要意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着眼于工人的合作社。列宁得出的新的结论是俄国革命最初五年的经验和对成功与失败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分析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哪一种方式才算是正确处理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在部分错误的政治经济措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矛盾。因此这些文章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

## (二) 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和 同国家机关的斗争

列宁寻求一条足以使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到与农业生产水平相一致的道路，与此同时还确



定了同国家机关斗争的任务，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在 1923 年初写的文章中，着重指出了完成有关改革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一整套任务的必要性。他提出的任务有：同沙皇制度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关斗争，摧毁这个机关，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机关，和农民一道进行共同的、相互信任的工作，同高高在上、浪费、自吹自擂、墨守等级制和行政程序的形式与陈规，同“徒有社会主义之名”的国家机关的一切特征进行顽强的斗争。对列宁来说，这些任务只有靠工农之间建立的真正团结才能够完成，他号召先进工人在实践中用批判精神学习，不要怕揭发在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可能有的消极东西。因此列宁总是预先谴责那些为了“前进”而采用同过去一样的官僚主义国家的方法去进行的尝试。

这条同列宁称为涂上红色的沙皇机关这样的机关作斗争的政治路线的轴心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进行思想和政治的领导。这不再是用强制手段来折磨小资产阶级分子（显然对公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所制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准则的人，仍继

续使用强制手段)，而是说服农民群众并同他们一起建设一个真正新型的国家：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很多浪费现象的痕迹全部铲除干净。”<sup>①</sup>

建设一个新型国家，发展工农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意味着在新形式下依靠群众路线。<sup>②</sup> 这对建立新的政治关系是必要的；但只有通过经济关系的改革，新的政治关系才能巩固。事实上，正如马克思说的：

“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

---

①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516页（中文版，第33卷第454页）。

② 见本卷第704页。

的基础。”<sup>①</sup>

因此，列宁在通过合作化道路达到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国家的变革之间所确定的关系绝不是偶然的。同样，——关于这一点下文将再论述——列宁不提出同工业生产关系变革相联系整个问题也不是偶然的。这可能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提法，“人类从来也不会提出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在工业方面改变生产关系的思想条件和政治条件（即矛盾的激化程度）。

即使列宁没有提到工业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也就是生产过程的彻底变革）问题的全部内容，但却提到（从1921年春开始）它的极端重要的几个方面，如他赞成在各地“较大主动性”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发展工业和“附近的小工业”<sup>②</sup>。列宁并不因此放弃了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但他勾划出一个前景，这个前景，中国将在……“两

---

<sup>①</sup>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8卷第1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891—892页）。

<sup>②</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5页和第365页（中文版，第32卷第344页和第334页）。

条腿走路”<sup>①</sup>……和“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sup>②</sup>这两个口号下加以实现。当然，列宁的话离开这两个口号以及把这两个口号同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形式的分工进行斗争联系起来距离还远，但可以看到列宁的话指出了这一个方向。1923年的文章证实了这一点，文章把国家机关的高高在上、不切实际，同地方、工人和农民质朴而严肃的积极性作了对比，又一次着重指出，要实现经济关系的革命变革必须要有一条群众路线。

总之，在列宁最后几篇文章中，已相当清楚地指出这样一个方向，使行政和经济机关中正在形成的国家资产阶级感到是一个威胁，这一点也很明显。然而“新资产阶级”本身所施加的压力相当大，以致列宁在1923年1月初写的《论合作制》和《论我国革命》到5月底才在《真理报》上刊登出来（列宁的文章从来也没有拖延这么久才发表）。

---

① 这就是说，同时发展大小工业，同时采用最新的和较旧的技术，包括传统的技术，后者能逐步加以改革。

② 这里应理解为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相结合。

### (三) 群众路线、文化革命和经济关系的变革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最初几个月中，列宁已经强调指出必须重新严格执行一条群众路线。例如列宁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sup>①</sup>一文中写道：

“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经常会涌现出不少有才干而又忠实的非党人员，我们应当把这些人安插到较重要的经济建设岗位上去，同时由共产党员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指导。另一方面，非党人员也要监督党员。为此必须吸收那些经过考验而证明其忠实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工农检查院，或者不担任任何职务，非正式地参加检查工作和对工作提出意见。”<sup>②</sup>

这个指令显然是为了实现一种对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员本人的群众监督。这样一个方针从此不断出现在列宁的著作和讲话中，出现在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sup>③</sup>（1922年3月底至4月初）上的发言和1923年初写的文章中。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0页起（中文版，第32卷第366页起）。

<sup>②</sup> 同上书，第414页（中文版，第378—379页）。

<sup>③</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3页起（中文版，第33卷第228页起）。

在这些文章中，列宁特别指出工农之间直接联系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列宁的《日记摘录》中的一个片段值得一提：

“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劳动者中间建立相互的联系，确定一种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为此就必须在工厂的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群众的)。”<sup>①</sup>

这篇文章同其他的文章一样，提出的目标是建立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和工人在农民中的作用。为了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不要屈从于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性质的行政机关的领导，要对它们进行监督。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他们可以逐步地、从容不迫地、完全出于自愿地走向社会主义。

在同一时期，列宁也提出“文化革命”问题，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果然，列宁打算，“在开始的时候”(而不是停止不前)，是“资产阶级文化”，列宁认为这样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78页（中文版，第33卷第420页）。

度以前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此外，列宁说的“资产阶级文化”，显然是为了排除“我们许多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员”所想象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为了排除一种确实深入“日常生活习惯”<sup>①</sup>的真正无产阶级文化。

应当指出，对列宁来说，“文化革命”一语指两个互相交错的革命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在风俗习惯和教育方面完成民主革命；列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的。第二个过程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此列宁在写这篇文章时，无疑没有提出其发展条件的可能性，但在他要求工厂的工人帮助农村发展文化时，以及声明以资产阶级文化取代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文化仅仅是一个开端时，显然已感觉到这个革命的必要性。

列宁对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关系的看法——和许多布尔什维克党员尤其是布哈林的“机械论”的立场根本不同——说明列宁是怎样辩证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33卷第501页和第502页（中文版，第33卷第441页）。

地提出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变革作为改变经济基础的条件的问題。

#### (四) 农民的革命作用

因此,从 1921 年年底前后新经济政策的概念形成时起,也就是对俄国革命最初几年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进行批判性总结时起,可以看出在列宁的著作中已显示出一条对待农民群众的新的政治路线,即一条把这些农民群众作为无产阶级的真正同盟者的路线。农民群众不仅是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而且只要能给他们指出正确的道路,他们还是能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同盟者。

在《论合作制》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清楚地显示出列宁思想的这种趋向。比如列宁在(1922 年 4 月 2 日)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说:

“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群众一道前进,用事实、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正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如何来



帮助他们,领导他们前进。”<sup>①</sup>

在列宁以前的文章中早已强调过必须“同农民群众一道前进”。列宁已充分说明了他如何竭力同“工人反对派”斗争,因为他们的提纲有“把工人的行会利益看得高于阶级利益”<sup>②</sup>的危险,因此也就是使无产阶级丧失“对政策的领导”<sup>③</sup>。但只是在1923年的文章中,列宁才提出了可能领导农民,因此也是领导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联盟的一些条件。

这样就跨出了具有巨大意义的一步,因为这样就使人不仅能以新的方式确定无产阶级同俄国农民的关系,而且更普遍地确定农民的革命作用,从而能对国际政治形势作出新的估计,承认世界革命的重心能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转移到拥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国家。

因此,列宁在1923年初重新提到“农民”战争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1页(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中文版,第33卷第289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3页(中文版,第32卷第332页)。

③ 同上(着重号是我加的。——贝特兰)。

问题,并回忆了马克思于1856年就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所写的文章<sup>①</sup>,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列宁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亚洲农民群众在世界革命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列宁写好后准备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sup>②</sup>

### 第三节 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主义”观点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占主要地位

布尔什维克党基本上给予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和前面几页中所指出的意义不同。党没有从中看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列宁1923年1月23日写的一篇《论我国革命》的短文,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89页(中文版,第30卷第43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15页(中文版,第453—454页)。

到一个能达成一种新型政治联盟的方向，这种政治联盟能使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团结在一起，以帮助他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事实上——人们将在下一卷看得更明确——，布尔什维克党是把新经济政策似乎首先理解为一种(极狭义的)经济政策来“实施”的，这个政策是党由于不利的力量对比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因此，一俟情况变化之后，必须把它干脆抛弃，并且把那些被认为更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的措施重新付诸实施。这些措施符合对资本主义关系和商品关系进行“正面进攻”的观点，即类似“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进攻”。因为，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战时共产主义”依然是无产阶级发动攻势的“样板”，主要由于形势而不得不予以放弃，因此，这个放弃应该仅仅是暂时性的。

这样，1928年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和空想在于当时曾相信在军事形势紧迫的压力下所采取的措施能在当时的条件下“立即”实现一种“非商品制的集中经济”。所以，这并不是内战时期所采取的措施不妥当，而是实施这些措施的时间不适合。所以《苏联大百科全

书》关于这个问题的条目认为：“工人阶级在建立一个战时共产主义[原文不加引号。——贝特兰]的牢固制度的同时，为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sup>①</sup>

这里同别处一样，占优势的是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忘记了(或者甚至从未看到过)列宁的最后著作开辟的一条新的政治策略的道路，并必然导致工农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群众同政治机关之间关系的深刻变革，这些机关的资产阶级性质，甚至资产阶级以前的性质必然使它们不可能成为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

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主义”观点所以占优势的原因是很多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属于政治方面的：这些原因归结为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特别是在国家机关内部。开展思想斗争，本来能够使新经济政策的革命观点，即同列宁最后的著作中的一些新指示相符合的观点取得优势，但这一

---

<sup>①</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版)，1928年，第374页；引自E. H. 卡尔：《布尔什维革命》，第2卷第274—275页注1。

斗争也碰到了思想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同列宁思想上某些犹豫不决之处相联系的，并且停留在少数提法、想象、比喻的周围，从而导致最后把这些最后著作中所有根本性的新事物“隐蔽”、“掩盖”起来。列宁采用这些想象和比喻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但如果拘泥于字面，便歪曲了它们的真正意义。

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主义”观点在列宁逝世后越来越使人觉察到它的后果，必须在这个观点所借口的那些形象和比喻中追究其根源：不作这样的研究，这些比喻将继续掩盖列宁最后著作的深刻意义。

列宁在1921年看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方式”的“失败”（这是他原来的用词）。他从这次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尽快地采取另一类型的政治措施，他毫不犹豫地说，这次遭到失败是由于政策的错误（虽然这个政策是由于当时的环境而不得不采取的）。然而根据前面已经指出的，在1921年的著作中，错误的性质没有作为正确分析的对象即没有清楚地指出“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是原则上的错误呢，还是仅仅由于时间的条件注定要

失败的。在这些著作中，列宁却相当例外地表示“沉默”。这个沉默被比喻和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所“充实”了。

在上面提到过的 1921 年 10 月 29 日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列宁把“战时共产主义”比作日本人对旅顺口的冲击（1905 年日俄战争时期），以后，他又把新经济政策比作对这同一城市的围攻。<sup>①</sup> 同这个比喻相连的，是“后退”和“退却”<sup>②</sup> 的比喻。这个比喻容易使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措施在原则上没有犯错误，只是推行这些措施的时间没有选择好，从而使人得出结论：当环境好转的时候，就可以采用“直接冲击”的措施（按照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所用的想象）。

上文已经指出，这样的解释是不符合列宁所要达到的结论的。然而，所用的比喻似乎“允许”那些准备教条式地运用 1921 年著作的人——这种运用在列宁逝世后更为常见——一俟可能，就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78—81 页（中文版，第 33 卷第 62—64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88—91 页（中文版，第 71—73 页）。

重新使用“直接冲击”的方式，包括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采取国家强制的手段。

对于列宁于1923年所写的实质性问题的歪曲，在教条式地运用1921年的其他著作中找到了一种表面的“依据”，在这些著作中，“后退”的比喻又加上了“新的退却”的比喻。

这第二个比喻几乎充实了1921年10月报告中的第二次“沉默”。这个报告是在列宁看到春天的“退却”还“不够”的时候写的。这里，他只承认一个“事实”；他没有说清楚事实的原因。人们似乎面临着一种必须承认的形势，正如他说的，必须“再向后退”<sup>①</sup>。

两次连续“退却”的比喻使人把新经济政策从第一个形式过渡到第二个形式理解为同一次向后退的单纯的延长。

但是，第二次“退却”完全不是第一个形式的“延长”。所以被称为“退却”，实际上是一次战略改变的开端，这次战略改变比几个月以前所宣告的更为彻底，因为它导致阶级力量的一次崭新的发展，从而可能准备一次与第一次进攻完全不同

<sup>①</sup> 见本卷，第690—691页。

的新的进攻。

列宁在1921年秋天用当时包括他本人在内还不很明确的方式所宣布的、重大而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的，就是放弃“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导作用，就是谋求与农民结成真正的、持久的、巩固的联盟，就是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份草图，也就是一条旨在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强制的方法引导劳动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列宁在1922年底和1923年初的著作里进一步加以发展的，正是这样一条路线。

可惜，这一巨大前进步伐是通过那种令人产生错觉的、含有“退却”意义的比喻表现出来的。

在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这种比喻的出现表明了同刚为列宁所看出的过去时期所犯的错误的政治上理论上进行决裂的程度。这正说明在1921年10月的报告中，列宁为什么使用这种乍看起来令人惊奇的提法，当时他说：

“我们必须站到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来。”<sup>①</sup>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93页（中文版，第33卷第75页）。



这种提法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人们显然只能站在现有的基础上，不能站在想象的基础上。

的确，这里涉及的问题——这是报告的深远意义之一——，不是“向后转”而是回到现实。说人们“退却”到现有的基础上，就是说人们并未真正退却，而是离开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想象中的基础，站到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来。

说到这点，也就是说，“战时共产主义”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已失败，那并不是因为它造成了一些“经济困难”，也不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具备足够的力量”，而是因为它不能象人们先前曾相信的那样变革经济关系，所以，这就是说人们受到了政治和法律关系的表面束缚，认为以此能够把社会生产关系“局限”在这种政治和法律关系方面，并错误地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法定所有制和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等同起来。

如果人们从这一观点来看事物，就会看到新经济政策不是一种真正的退却，而只是一种表面上的退却；从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放弃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措施

不能改变经济关系的本质。这种放弃并不是一个“后退”，而是一个“前进”，因为不站在空想的关系基础上，而站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这就是前进；而且，为了能够有效地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这也是一种必要的前进。

为什么列宁把所有这些都要在难懂的、产生错觉的、他自己很少使用的语言中，用必须加以解释的比喻说出来呢？

首先，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战略意义，在1921年，列宁还没有与以前的观念完全决裂，这种观念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后退”，其目的在于与农民建立一种单纯的经济联盟（对农民作了一些暂时的让步）。同样，在列宁的许多著作中，人们还看到——从某些表达方式上——这个观念同另一个新观念并列起来，这个新观念代表着当时列宁的思想活动的真实倾向，并使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盟不再只是直接目的，而是未来的主要基础：即应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治联盟。因为这两个矛盾的观念（其中一个是新生的，另一个正在被抛弃）结合在一起，所以列宁以前所谈到的关于工人阶级和

农民的经济联盟问题，在他的某些著作中曾长期地加以简单地重复。

事实上，这时正处于决裂的开始时期，这种决裂摧毁了一整套旧的理论和政治观念，并肃清了一部分（列宁以前于1917年已与之决裂的）尚未清算的第二国际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遗产”，特别是有关国家集权的重大作用，和“忘记”进行能使合作制的发展成为可能的经济关系的变革的部分。由于决裂开始时期所具有的基本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原因，列宁当时所说的不可能更为详尽。

那时刚开始的决裂的意义，只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新实践的发展，才充分地表现出来，这种决裂为阶级斗争开辟了道路，并保证作为政治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同农民和一般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新关系。只要这种新实践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它需要在理论上重新加以表述——，决裂所宣告的新战略还只能用旧的语言来表达。

但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以后的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阶级斗争新实践的发展受到每天面临着最严重困难（饥饿、寒冷、疾病、失业）

的人民群众政治活动后退的限制，也受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的一些变化的限制；从而使党与“战时共产主义”观念和国家资本主义观念的决裂变得缓慢和具有很大局限性；从而也使列宁在对新战略提出明确定义时碰到了障碍。尽管有着这些障碍，列宁还是逐渐地拟定了具有阶级性的新战略的基本路线。他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具有罕有的政治经验，并精通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他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重新联系起来，而这些教训在第三国际内“已经忘掉”了。

## 第五章

### 列宁逝世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

如果列宁在当时所提出的新战略已经付诸实施，今天就用不着说明在他逝世时布尔什维克党“可能采取过”什么行动了。否则，这就等于从事一种不切实际的工作，因为历史是不能重写的。但是相反地，我们却有理由去探讨当时列宁试图给布尔什维克党规定的那些任务的意义，以及这些任务只能部分地完成的原因。<sup>①</sup>

####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和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列宁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最关心的是：阐述一些旨在准备起草党的新的基本政治路线的方针；

赋予新经济政策以某种内容，以便有可能超越当时无产阶级专政所具有的过渡形式；依靠一整套远远超过“经济政策”范围的干预措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些措施也涉及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

基于形势的需要，列宁最后著作中所拟定的方针还具有一种非常概括的性质。事实上，这些方针的具体化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积累从广大群众活动中得来的经验。党就是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再根据这些经验作出一些纠正的。

人们已经看到，1923年存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形式是对白卫分子叛乱和帝国主义干涉进行武装斗争必然引起的极端紧张的较量的历史结果。在1921年初，俄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的严重性是人所共知的，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1923年。

苏维埃制度，作为人民群众推动下成立的组织，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全国各级行政事务由那些不再受劳动者直接监督的机构管理。为此，无

---

① 至于当时有效地推行过的政策，只能通过对1923年后提出的问题 and 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式进行研究以后才能加以分析。

产阶级专政就由已与工人阶级中最富有战斗性的分子打成一片的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由于经济混乱及其引起的工业半瘫痪状态，工人阶级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此外，工人阶级还部分地“非无产阶级化了”；工人阶级主要不是由一些参加过无产阶级斗争和工业生产实践的真正工人组成，而是由占很大比例的一些失去了原来地位和对无产阶级专政抱有敌对情绪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

当时，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首先是来自党和几十万完全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工人的融合，是来自一个经受过叛乱和内战考验的，以最革命的形式实行一项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策党的领导，这种最革命的形式在过去领导广大群众的组织中是从未有过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还在于布尔什维克党能对自身活动进行批评以及改正错误的能力。

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曾导致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过程的革命的、但还是局部的变革。在工业方面，在一些已经被没收了的和生产不再优先服从利润的需要而是受苏维埃政权所规定的

生产目标所支配的主要工厂里，也进行了局部的变革。这种变革意味着工厂的领导人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来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因为他们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任免，并且在工会和最积极的劳动者的协助下由党监督他们的活动。这种监督的执行情况是很不平衡的，但是只要那里有监督，那里就能有效地改变工人阶级、国营企业领导人和这些企业所掌握的生产资料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鉴于在国营经济部门只能部分有效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鉴于农民小生产大量存在和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新经济政策容许这种生产的某种发展）所起的作用，1923年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并不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的。

为了使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继续抱有任何幻想，列宁毫不犹豫地说：

“……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一个时期……”<sup>①</sup>。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0页（中文版，第33卷第269页）。



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组成部分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在私营企业、农民经营的庄园以及在“让与”或“租借”企业中再生产或可能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关系的存在是通过商品交换、货币交换和工资关系的再生产和一种价格制度的作用表现出来的。这种价格制度不受苏维埃政权支配，而且对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再生产的方式和方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国营企业内部也不例外。

事实上，列宁所讲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由国营经济部门中再生产的那些关系组成的。在国营经济部门中，被现有的国家所有制刚改造过的资本主义关系，仍然居于优势。尽管某些国营工厂的职能实际上要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但这些工厂不过是一些孤岛而已（此外，这些工厂之得以维持生存，是靠了其余经济部门的再生产条件，而这些经济部门本身则又须服从个体生产、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基本的一点是，无论是从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从生产这种产品的方式（确切地说，即生产的方式）来看，国营经济部门仍按过去的

条件进行生产。过去遗留下来的生产因素的种种结合形式,当时并未得到真正改造。

人们知道,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某种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通过长期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的开展应该通过一些阶段,而这些阶段的交替是为矛盾的发展所制约的。矛盾的尖锐化决定了群众的行动,而这种行动的正确方向能够改变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关系越来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正是在1923年,这一变革刚刚开始。在整个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在国营企业内部分工的方法和国营企业彼此分工的方法中,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因素的烙印还很深;因此商品关系和工资关系的再生产在企业范围内出现了货币收益;列宁就是从这里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意见的。

人们想起,布尔什维克党在1918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各国营工厂的工人接受被委派的一些经理所强加于他们的纪律,并付给这些经理以及位于直接生产者之上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以高于工人的工资,当时列宁就已指出这种能再生产的关系是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他对于在新经济

政策开始时所赋与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也作了同样的评价,因为他从中看到已建立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sup>①</sup>。

这样,在1923年,俄国形势的特点是:无产阶级专政——靠和布尔什维克党紧密相连并接受党领导的战斗性强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行动建立起来并坚持下去的——与削弱苏维埃政权和使它在这一时期中具有的过渡形式的整个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之间发生深刻的矛盾。

在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首先是它的领导,就注意到这一矛盾和其他一些矛盾。然而,党的各级领导人对当时存在的矛盾体系所作的分析远不是统一的(这在列宁逝世后更为显著)。列宁对形势的矛盾作了最深入的分析。但是,在1923年,这种分析还是部分地借助于适应旧观念的概括方式表达出来的,历史地看,使用这些方式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使人很难看清形势。在此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应完成的任务还不太清楚。何况在国家机构和党的内部还存在一些社会力量,使现存的“资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395—396页。

本主义经济成分”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更加巩固。正如人们在以后看到的那样，这些力量在以后的年代里非常活跃。

为了促使俄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而落在布尔什维克肩上的、基本上由列宁规定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任务首先涉及到意识形态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变革。

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对党来说，问题在于帮助人民群众除了接受现存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以外，还要让他们看到前景，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改造，而不是进行毫无前途的反抗。党的领导人认识到党的任务与思想斗争有联系。这种斗争似乎特别需要（尤其是在农民内部由工人来领导的）教育工作和一种向“前资本主义的”风俗习惯进行不断的斗争，以及一种有时要借助于“文化革命”一词（这个词的内容无需明确规定）来标志的革命行动。

在直接的政治斗争方面，问题是使苏维埃恢复活力，反对“官僚主义”，尽可能地精简国家机构，而不要采取草率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的经验证明不论是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还是和党的领

导的关系上，最终都会扩大行政机关并加强它们的自治性。

在对待经济关系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在1923年承认这些关系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然而，对于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意见却未真正统一。党的领导远远没有完全符合列宁所作的指示，这些指示是导致在将来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而走合作化的道路以保证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可是，关于这一主题所存在的分歧并未带来直接的后果，因为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在当时没有列入议事日程。

那时，党内对暂时接受各种生产方式——从宗法式的、商品式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式的，一直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共存的必要性的看法仅是相对地一致。而几乎一致同意的是在农村首先要暂时给小商品生产以一个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这种生产方式可能并应该如何与其他生产方式相联系，还存在问题，从而使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受到了重大的影响。

尽管上述任务十分重要，但这些任务的实现仍应从属于直接的和紧急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

的完成。

最紧急的政治任务主要在于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没有这种团结，就不可能在任何领域内真正前进一步。即使在 1923 年，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受到紧急的威胁（如同它在 1920 至 1921 年之间的冬天那样），它也只有劳动者形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之后才能得到巩固；为了较长时期和长期实现清除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关系的任务，这种集体是必要的。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战斗团结，首先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劳动农民群众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在广大的农民群众看来，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能够组织他们为反对地主复辟而进行斗争的党，重新建立这种联盟的部分条件已经具备。在这一认识下，农民群众对布尔什维克党表示了他们的支持。然而，为了完成新的任务，为了向社会主义迈进，这样一种支持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这种支持，并且赋予一种新的政治内容，把这种支持变成一种积极的支持。对于为完成这项主要任务而应该具体做到的事，还远远没有把握，特别是关于在农民内部进行政治上分化工

作所必须有的那些条件。这一工作使布尔什维克党获得最贫穷的农民阶层的积极支持，这些阶层最直接关心的是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布尔什维克党并不因此而失去大部分中农的支持。这些在1923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以后几年里在党内发展起来的最主要的分歧点。

在1922和1923年，布尔什维克党继续为自己规定立即要完成的紧急任务是恢复生产。当时，苏维埃政权是否能够继续生存，这要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保证劳动人民生活下去。如果没有这种能力，那就用不着为将来再制定计划。正如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

“现在全体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自己主要的是如何能够切实地减轻赤贫和饥饿的状况，……”<sup>①</sup>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首先要进行的正是这一任务。这一任务符合人民最深切和最强烈的要求。为了加强群众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党还必须表明它不仅会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由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1页（中文版，第33卷第270页）。

于急于要在生产领域内完成任务，这就使新经济政策具有一种基本上是“经济的”政策的性质。这种政策使某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忽视了为了扩大生产和供应群众粮食而斗争的政治使命。某些领导——人们已经看到——甚至还表示准备同意国家放弃主要的经济力量(如垄断对外贸易)，或者牺牲贫穷农民当前的利益。这样，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在不同的时刻，也就发生了意见的分歧。

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种种障碍，使人难以严格地规定各项任务，也难以使各种任务彼此配合，因而上述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对于这些问题，需要再说几句，以便对苏维埃俄国在列宁去世时的形势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看法。

## **第二节 实现布尔什维克党的 任务的思想障碍**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过去没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变革社会关系的经验，所以要完成这方面的任务就更加困难。当然，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



革命斗争经验是有的，可是在新的条件下，这些经验教训不能生搬硬套。大家知道，行使权力本身就迫使党员，其中包括许多领导人，首先通过依靠国家机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这个国家机关即使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1923年还远不是这样——那末，首先依靠国家机关也不能对社会关系进行革命变革，因为这种变革是需要人民群众自己来进行的。在某些条件下，依靠国家机关也能够保卫已经取得的变革成果，可是不能引起新的革命变革；此外，长期依靠没有人民群众有效参加的国家机关，就会巩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产生劳动者的消极性，并且增长在国家机关中居领导地位的人的权威。但是在1923年，这一切并未被布尔什维克所接受。

所以，掌握政权就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发现新的方法来指导人民群众的行动。<sup>①</sup>然而在这方面，情况也是复杂的：在人民群众倾向于信任党的

---

<sup>①</sup> 这正是列宁在强调必须克服国家机关的缺点以后所指出的，他不承认已经找到克服缺点的方法，他说：“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501页）（中文版，第33卷第441页）。

情况下，他们也并不会轻易投入行动；相反，如果人民群众不信任党，他们的行动就可能转过来反对党。列宁在1923年的著作中强调指出，党应该研究出新的领导斗争方法，并且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他建议群众组织要多样化。

然而，这些方针仍然是很笼统的——当时也只能是这样——特别是还没有深入到布尔什维克党内，因为党的成员越来越陷入管理工作和行政事务堆里。

为产生一条适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新型群众路线所作的努力是软弱无力的，其原因除了上述的根源之外，还有其他的思想根源。在这些根源中，必须提到从第二国际继承下来的某种叫作“工人主义”的方式。这种“工人主义”，不信任农民，甚至不信任新近来自农民的工人（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而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实际上，这种不信任阻碍着群众组织的发展，阻碍着向无党派人士广泛地几乎是经常地征求意见，妨碍着一些适应新的矛盾性质的活动方式的实现和巩固，而这些新的矛盾只能从劳动者自己的经验中得到正确的解决。

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仍然广泛地受到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初期所采取的立场的影响，在当时小生产者与“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还是有可能的。因此，党看不到自己只是“沧海一粟”，只有“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sup>①</sup>，它才能够起领导作用。

其他一些思想障碍或限制也使布尔什维克党所要完成的某些任务难于完成。

这些障碍之一是国家机关的阶级特性尚未充分形成。尽管列宁毫不迟疑地把这种机关叫作“资产阶级的”或“沙皇的”，而大部分苏维埃领导人则特别强调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主义”的特性，或者说“带有官僚主义毛病”。这些人和那些人从这个特性中得出不同的实际结论。对有些人来说（如斯大林），这种官僚主义性质基本上是一种随着教育的发展而消失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特点，在清除行政、经济机关中最“官僚化”的分子过程的同时，有可能部分地被消灭。对另一些

---

<sup>①</sup> 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1页，中文版第33卷第269—270页）。

人（如托洛茨基）来说，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特点（其“错误”必须“克服”），基本上与俄国生产力的低水平有关，这些特点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时才能消失。这里，“官僚主义”作为具有特定的、必要的强制职能的社会阶层出现，这种职能按照生产水平和分配方法来产生作用（只要俄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充分发展，就应该继续按照“资产阶级法权”来分配）。1923年，托洛茨基的这种观念尚未很清楚地肯定，然而在以后几年里就迅速明确起来。

诚然，人们在列宁著作中会看到一些类似上面所提到的分析原理。列宁也使用“官僚主义”和“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等词，但是，关键在于他不满足于这些分析和描写的原理，而是致力于把这些原理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相反，对几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人来说，“官僚主义”和“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等词起着代替阶级分析的作用。通过这种方法，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关系被掩盖起来了，而“官僚主义”的现象只是这些关系的表现。因此，对这种现象的斗争似乎首先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而纯粹依靠生产力的发展、教

育或镇压。

所以，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一条能摧毁国家机关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关系的群众路线，和在这种关系的表现中占支配地位的“官僚主义”概念是有联系的。

对于其他两类重大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正确解决，也限制着党去完成某些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任务的能力。

首先，关于 1923 年苏维埃俄国的土地关系的特点问题，在此不进行分析，因为分析的意义只有对 1923 至 1929 年间发展起来而尚未克服的矛盾进行研究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应该指出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并未在理论上真正地重视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关系的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领导下发生的民主革命的一种结果。由于这次革命，地租以及农民过去被迫承担的捐税都被废除了，不需要用一种资本主义的地租来代替。

第二个特点是米尔及全体成员会议的特权在改变了的形式下得以延续的结果。

这两个特点在农业中决定着生产条件的再生

产的特别形式。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由于这些特点，那些迫使农民把部分产品供应市场、迫使农民年年增产的经济方面的约束大大削弱了，因而农业中的私人资本的生产积累也受到限制。为了制定并执行协调农业政策并在农村中正确地指导阶级斗争，明确考虑这些特点是必要的。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分析中缺少这种考虑。布尔什维克党倾向于在苏维埃农村“实行”用于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再生产的规律，而资本主义农业并不适合俄国的特点的。

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正确地理论上解决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社会化问题。当然，列宁多次强调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国有化，并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他指出，向社会化过渡，要求对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系统的统计和监督，并由社会控制对生产资料的使用。他还指出，这种统计、监督和对社会的使用都只有当劳动人民自己来做时才能真正地存在。但是，在正式承认这些论点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党想把国家机关对生产资料的统计、监督和群众对生产资料的统计和监督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不能达到

生产资料的真正社会化的。

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的行动和群众的行动等同的倾向部分地是与没有完全弄清楚下列条件有关的，即能使人民群众在生产资料的真正社会化中有效地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的条件。不弄清楚这些条件，就不能向真正社会化前进。因为一方面劳动者不是“自发地”去完成生产资料的调查和监督任务，这些任务需要时间和组织上的努力。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努力是部分地自发作出的话，通常并不会引向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体利益来使用生产资料；它们是为狭隘的利益服务的，例如为每个企业内劳动者的利益服务。这样就可能把生产资料变为各个生产单位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制”（事实上，是变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所有制”<sup>①</sup>，这显然不会导致生产资料的真正社会化）。此外，现存的生产资料的调查和

<sup>①</sup> 事实上，当每个企业的劳动者为了占有产值而使用生产资料时，这些生产资料是作为资本来起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生产单位一级“消灭了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却在社会范围内继续存在。这就是马克思在谈到工人合作社时所观察到的，他指出，在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把他们自己的劳动变成价值”的情况下，他们就是这种合作社中“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参阅《资本论》，第7卷第105页）。

监督的问题不能同劳动的社会分工和改造的情况所引起的问题割裂开来。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提出来的，或者因为提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列宁的情况就是这样)或者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幻想，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问题会自行解决。

因此，在1923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前途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系列问题都未得到解决，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如此。对于这种情况也没有惊奇的必要（因为只有通过实践，理论才会发展），但是，不要忘记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并且会导致一些重大的政治后果。

然而，对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朝着社会主义前进的社会关系变革方面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所导致的后果并不都是可以立即感受到的。再者，从理论上讲，布尔什维克党并不缺少使它能够克服这种障碍的手段。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对矛盾作具体的分析以及在实践中取得的成绩和受到的挫折，能够使布尔什维克党发展理论知识并越来越好地使理论知识成为适用于行动的必要的指南。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中



所发展的新理论具体地证实了发展理论知识的可能性。

正是这样,从严格的和透彻的分析观点来看,在列宁的著作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著作中经常存在着差距,不能不使人吃惊。在反对“经济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斗争中,为了对俄国和革命的现实作辩证的分析,列宁几乎是经常地“先行”于党,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这些人不大敢纠正旧的提法,而列宁只要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就毫不犹豫地进行纠正,不怕自己会成为少数派,也不怕为实现他的论点进行斗争。人们早已看到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例如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代替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十月起义的决定、联合政府问题、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保持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完整,列宁是怎样在经过了多么长期的战斗后才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而在其他方面,主要是组织方面的问题,列宁并没有得到同样的支持<sup>①</sup>,或者他不得不作

---

<sup>①</sup> 列宁在 1921 年致布尔什维克 A. 约飞的信中说:“在组织或人事问题上,无法列举我的意见没有得到胜利的所有场合。”参阅《列宁全集》,第 45 卷第 73 页。

一些妥协。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基本问题上，列宁总是第一个看得清楚的，这就可以说，从理论和政治的观点来看，列宁是经常走在布尔什维克党“前面”的。这就使人不得不承认用“列宁主义党”一词来指布尔什维克党是极其骗人的：党只是缓慢地、但不是经常地“跟上”列宁的立场，而且党这样做往往没有掌握列宁思想中的新东西和基本的东西。因此，在列宁作的指示——尤其是关于号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尊重民主集中制——和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的实践之间，还同样经常地存在巨大的差距。

从根本上说，尽管存在着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差距、迟缓和分歧，由于列宁始终是党的领袖这个事实就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性。只有革命的政党才能有一位最大胆和最重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做自己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不是各种对抗着的观念的“仲裁者”。由于他从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经历中积累了经验，由于他的明智的和政治的勇气以及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能力，列宁总是站在他的党的“前面”，又因为这个党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列宁实际上成

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极其严格地以那种完全彻底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思想和行动把党推向前进。

如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都应该在理论方面前进——事实上的确在前进——，那是因为理论永远不会完备的，它应当不断地充实，这也就是说，理论应该摆脱一种同无产阶级观点不可调和的错误观念，并通过社会实践的分析使之提高。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所进行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并且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结果。因此，在列宁的观念和党内占优势的观念之间的分歧以及在列宁的指示和布尔什维克党实际执行中的差距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后果。

如果说，在 1923 年，列宁所致力于达到的某些结论同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观念——它们使一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任务很难完成——之间存在着特别大的差距，那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事实上，一方面，列宁只是刚刚才发表了他的一些新的结论。这些新的结论还只是以未曾系统化的口授记录或注意事项的方式出现的，而且列

宁过去没有时间——以后也没有时间——为使这些新的结论获得成功而进行战斗。

另一方面——那也就是列宁为要使他的意见获胜所遇到的日益增长的困难的社会基础所在——，在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钻进了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往往是等到在行政机构和经济机构中有了“地位”之后转向党内的，他们用种种方法来施加压力以反对群众的积极性，反对加强民主集中制并反对贯彻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性的那些结论。

总之，有三种思想上的限制阻碍着布尔什维克党去完成其实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高级形式的任务。

首先，问题在于以前的理论上的“缺陷”——存在这些缺陷是与没有足够的经验以及第二国际遗留下来的“经济主义”思想影响未曾得到彻底清除有关——甚至当列宁已经开辟了一条能够导致逐步趋向理论上的正确解决的道路时，这些缺陷还未得到弥补。最典型的例子是用从生产力发展和“文化”水平角度的“解释”来代替用阶级的方法

来分析“官僚主义”现象。这一类的论断显然在列宁的许多著作中也出现过，因为列宁在同第二国际遗留下来的思想作斗争，以及在同构成工人运动中某一时期的“假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时，他并未完全“肃清”这种思想，而且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影响下，它还会经常出现；但是，这些论断在列宁著作中只是次要的部分而不是精华，因为精华是新的论断。

其次，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存在着错误观念，尽管这些观念已被列宁否定，至少是部分地被否定了。例如，就以“战时共产主义”方法所起的作用来说，列宁从原则上加以批判了，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则一般地认为作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手段，这些方法本身并非错误，而只是实施的时刻不合时宜罢了。

最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着某些错误观念，例如：在社会关系的革命变革中，以国家机关的活动代替群众活动的可能性，这些观念只是在口头上被否定，而往往在实践中占着统治地位，这是因为，在阶级斗争的影响下，这些错误东西还只是在表面上被否定罢了。因此，由于旧的阶级实践

在“苏维埃”国家内重复出现，列宁曾经把“苏维埃”国家机关的阶级性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沙皇制度的国家机关，但是列宁这些话几乎被人们“忘记了”。布尔什维克党不是领导群众对这种机关进行斗争，而是满足于加强以一部分机关对另一部分的“监督”，试图以此来同“官僚主义积习”作斗争。

在意识形态范畴内，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动的限制，事实上是对政治关系和阶级斗争的限制。

### 第三节 实现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的 政治障碍

1923年，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着手必须进行的任务的可能性，由于遇到了某些阻碍而受到限制，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这些阻碍就是，以前在党内或在党与一部分群众、国家机关之间发展起来的某些政治关系。

这些障碍之一——在开始执行对农民的新政策时特别严重——在于党在农村中扎根不深和党

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不够密切，以致农民群众特别要和人们都知道其特点的国家行政机关发生联系。因此，在读列宁关于《论粮食税》的小册子时，人们看到一系列任务，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这些要很好地完成的任务首先应该是一些战斗任务（“发挥基层的主动性和力量”，“帮助小工业”，“指导合作社”），实际上都是由工作人员完成的。<sup>①</sup>列宁在这一著作中，尤其还在后来的著作中已经提出变革这些关系的问题，例如，通过把在中央行政机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大规模地调到县或乡的领导岗位上去，以便在那里开展模范的共产主义的组织工作。这种模范工作是“可供模仿的榜样”又是“工作人员的培养所”<sup>②</sup>。

从列宁提出的建议中可以看出，当时存在于党和农民群众之间的政治关系阻碍新经济政策实施的那种阻力已大到什么地步。在实施第二次修改过的以与农民结成新型的政治联盟为目的的新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6页（中文版，第32卷第344—34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79页（中文版，第348页）。

经济政策时，遇到的阻力更大。从列宁逝世后所发生的情况来看，排除掉的阻力只是极小一部分，因为这项工作和党与国家之间存在的关系发生了冲突。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党难于领导对在国家机关内部形成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行彻底变革的斗争。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效工具，它有能力采取种种决定以打击资产阶级，包括国家机关和党内的许多资产阶级分子。但是，如果人民群众不参加行动，它还是不能变革国家机关内已经具体化了的政治关系。因此，矛盾也就变得更大了。

1921年开始实现并在1922年继续进行的清党工作的范围和性质，证明当时党是能够大量地清除资产阶级分子的。清洗工作结合自动退党涉及1921年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对被开除出党者所提出的主要罪名是个人野心、贪污和混入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sup>①</sup>；被开除的党员，只有六分之一是工人，农民的比例达五分之二（其中相当多的是富农），而职员、知识分子及其他则占三分之

---

<sup>①</sup> 其他的主要罪名是意志消沉、宗教活动和酗酒。



一。<sup>①</sup> 这些数字说明党组织的成分已经遭到何种程度的破坏，也说明党在清除党内的可疑分子方面具有多少能力。然而，由于缺乏群众的广泛支持——如列宁经常建议的那样——清党工作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党还未能改造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关系，就象它应该做到的那样，在国家机关内能够有效地领导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党的总的领导作用同往往在资产阶级官僚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实际影响下的党员行动之间的矛盾有了发展。列宁在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考虑官僚主义机器时说，他怀疑，不是共产党员在“领导”，而是在“被领导”<sup>②</sup>。

<sup>①</sup> 参阅《苏联共产党的社会成分与民族成分（1927年联共（布）党员登记总结）》（俄文版，莫斯科，1927年），第16页；《中央委员会通报》，第41期，1922年4月。T. H. 利格比著作《1917—1967年苏联共产党党员资格》（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97页曾引用过。

<sup>②</sup>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3页（中文版，第33卷第254页）（本卷第411—412页曾引用过）。在这个报告里，列宁把布尔什维克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比作出征的民族与被征服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由于被征服者的文化的“优越性”，征服者最后会被被征服者征服。我们已看到布哈林重新提出这个比喻并加以发挥（参阅本卷第413页）。

列宁这样讲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因为“被领导”的说法指的是：由数以万计的既敌视无产阶级专政、又在为保护他们自身利益而行动的公职人员可能施加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小规模地表现出来，以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所作出的决定在日常行动中倾向于他们。而且，这种影响也可能施加于党的某些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们接受了在国家行政机构和经济机构里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论证”和“逻辑”<sup>①</sup>。可是，这种影响在那时还是有限的，因为党的领导是由一些经过考验的革命战士所组成，而他们又是根据党的活动来作出他们的决定，这个党拥有许多有经验的并已在内战中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干部。由于党和无产阶级中最富有斗争性的分子的联系以及党领导承认自己所犯错误的程度，所以这种影响也受到限制。

虽然如此，一个基本上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职人员集团的存在，这些公职人员在行政机构中所占的高位以及他们所传播的资产阶级的作风

---

<sup>①</sup> 这就部分地说明了列宁为了保护对外贸易垄断制不得不进行战斗的规模。

和习惯仍然一天一天地阻挠着党的活动。人们通过 1922 年夏天所进行的一次调查(调查是在持有工程师文凭的公职人员中进行的),观察到只有百分之九的旧官员和百分之十三的新公职人员表示赞成苏维埃制度,从而可以看到公职人员敌视苏维埃国家的程度。<sup>①</sup>

大多数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职人员的影响能够如此之深,其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和愿望的认识,一部分是从一个敌对的国家机关方面得来的——这个敌对的国家机关的成员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

因此,国家行政机构和经济机构的组织成分、它们的作用以及它们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就限制了党能有效地完成任务。不过只要人们知道这些限制的存在,只要党和人民群众中的最先进的阶层保持着足够的联系,只要党的领导机关能够经常进行整风和由于实行了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可以让党员提批评意见,这些限制是完全可

---

<sup>①</sup> 参阅前引 L. 克里茨曼著作《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期》,百分比引自前引马塞尔·利布曼著作《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第 2 卷第 167 页。

以克服的。

在这一点上，尽管从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对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规定的贯彻方式以及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党内“统一”问题的趋势，使党员积极分子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甚至把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表示异议的一些人开除出党，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位基本上还是稳固的。人们知道，党的地方或省一级组织利用清党的机会以意识形态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罪名把反对派驱逐出党。<sup>①</sup> 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被清除出党，为了与‘官僚主义’作斗争而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提醒大家注意，任何人都不要离开党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党的路线……”<sup>②</sup>。

党员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的可能性受到的

---

<sup>①</sup> 参阅 V. 奥西波夫等：《恢复时期萨拉托夫的党组织》（俄文），萨拉托夫出版社，1960年，第37页，前引 T. H. 利格比著作《共产党党员资格》第98页曾引用过。

<sup>②</sup> 前引马·利布曼著作《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第2卷第141页曾引用过。利布曼强调指出，这段引文不是讲党代表大会而是讲党中央委员会制定的路线。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来看，不能不说这种提法是一个“创造发明”，它企图降低作为党的最高政治机构的党代表大会的作用。

许多限制，更加阻碍了党去克服自己的判断错误或思想上的毛病，因为党外生活继续受到压制：一些原来被看成是“苏维埃”政党的、并且还在不同时期可以公开活动的政党，事实上都被禁止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即使不进行颠覆活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也还是要经常逮捕他们。在高尔基和克鲁泡特金多次请求下，列宁曾亲自出面反对这种“过分”的镇压。<sup>①</sup> 这种镇压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真正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反革命活动的威胁的那段时期才有必要，而现在，这种镇压反而限制了党对正在发展中的矛盾的了解。

1923年发生的那次一部分是无益的镇压，实际上妨碍了党的领导作用和民主集中制的正常开展。这次镇压是党的行政机关自作主张的结果。它说明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关系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得到了发展。列宁不止一次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他看到了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苏维埃俄国和非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

---

<sup>①</sup> 马·利布曼：《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第2卷第162页。

问题后，更证实了这个问题。<sup>①</sup>

为了便于了解使党更难于完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一些任务的种种障碍，考虑以上事实很有必要。但要注意不要把 1923 年当时的情况“反映”到以后“出现”的一次规模完全不一样的镇压上。1923 年的情况完全不同，特别是在党内。当时，即使反对派不能象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发表意见，他们也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发表：他们的文章和批评还可以流传，他们的名声很大，他们讲的话对制定党的路线产生实际效果。在党外，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虽然逮捕人，但并不能使人们普遍地隐瞒自己的意见或不满情绪的原因。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民意调查证明，在被征询的政府工作人员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表示反对苏维埃制度。<sup>②</sup>

总之，在 1923 年确实存在着种种障碍，使得布尔什维克党不能完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完成的某些任务。不过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思想性的障碍不是最严重的障碍，特别是

---

① 见本卷，第 600 页。

② 见本卷，第 751 页。

对当时来讲不是很严重的。这些障碍并不影响发展到如今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只要通过实践和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来总结错误，这些障碍就可以克服了。政治性的障碍使人受到的威胁就更严重了，但是丝毫不能改变布尔什维克党的性质和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志，也不会影响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其中工人占很大的比例——忠于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其实，摆在人们面前的是阶级关系的某种形式。这些关系将使无产阶级专政在未来的年代里面临一些新问题，这是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准备解决的一些问题，从而使得在列宁逝世后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 参 考 书 目

### 布尔什维克党文件

《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记录》(俄文本):

*Comptes rendus des Congrès du parti bolchevik (en russe):*

第六次代表大会(1917年4月),莫斯科,1958年。

*VI<sup>e</sup> Congrès (avril 1917), Moscou, 1958.*

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莫斯科,1920年,莫斯科,1962年。

*VII<sup>e</sup> Congrès (mars 1918), Moscou, 1920 et Moscou, 1962.*

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莫斯科,1959年。

*VIII<sup>e</sup> Congrès (mars 1919), Moscou, 1959.*

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4月),莫斯科,1921年,莫斯科,1960年。

*IX<sup>e</sup> Congrès (mars-avril 1920), Moscou, 1921 et Moscou, 1960.*

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莫斯科,1921年,莫斯科,1963年。

*X<sup>e</sup> Congrès (mars 1921), Moscou, 1921 et Moscou, 1963.*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4月),莫斯科,1961年。



*XI<sup>e</sup> Congrès* (mars-avril 1922), Moscou, 1961.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莫斯科,1923年。

*XII<sup>e</sup> Congrès* (avril 1923), Moscou, 1923.

《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记录》(俄文本):

*Comptes rendus des Conférences du parti bolchevik* (en russe):

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莫斯科,1958年。

*VII<sup>e</sup> Conférence* (avril 1917), Moscou, 1958.

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1919年12月),莫斯科,1961年。

*VIII<sup>e</sup> Conférence* (décembre 1919), Moscou, 1961.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莫斯科,1953年,第7版,第1卷。

*Résolutions et décisions du PCUS* (KPSS v Rezoloutsiakh i Rechniakh), tome 1, 7<sup>e</sup> édition, Moscou, 1953.

## 统计资料汇编

《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59年。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v 1958 g.*, Moscou, 1959.

《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71年。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v 1970 g.*, Moscou, 1971.

《1922—1972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72年。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1922—1972 g. g.*, Moscou, 1972.

## 作家著作(或未署名著作)

A. M. 安菲莫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农村》(俄文本),

莫斯科, 1961 年。

A. M. Anfimov, *La Campagne russe pendant les années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en russe), Moscou, 1961.

V. 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 (出版者):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苏维埃》, 两卷本, 莫斯科, 1928 年。

V. Antonov-Saratovski (éd.), *Les Soviets à l'époque du communisme de guerre* (*Sovety v epokhou voenogo Kommunistizma*), 2 volumes, Moscou, 1928.

O. 安魏勒: 《俄国的苏维埃》, 巴黎, 加利马尔出版社, 1972 年。

O. Anweiller, *Les Soviets en Russie*, Gallimard, Paris, 1972.

保罗·阿弗里奇: 《1921 年的喀琅施塔得》,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0 年。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Univ. Press, Princeton, 1970.

科莱特·伯戈-弗朗科特: 《苏维埃检察机关》, 载《东方国家研究中心评论》, 布鲁塞尔大学, 1970 年 1、2 期。

Colette Begaux-Francotte, «La prokuratura soviétique», in *Revue du Centre d'études des pays de l'Est*,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n<sup>os</sup> 1 et 2 de 1970.

夏尔·贝特兰: 《经济核算和所有制形式》, 巴黎, 马斯佩罗出版社, 1970 年。

Charles Bettelheim, *Calcul économique et Formes de propriété*, Maspero, Paris, 1970.

夏尔·贝特兰: 《制定计划和加速增产》, 巴黎, 马斯佩罗出版社,

1964年。

Charles Bettelheim, *Planification et Croissance accélérée*, Maspero, Paris, 1964.

夏尔·贝特兰:《中国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巴黎,《马斯佩罗小丛书》,1973年。

Charles Bettelheim,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t Organisation industrielle en Chine*, 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 Paris, 1973.

夏尔·贝特兰:《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68年。

Charles Bettelheim, *La Transition vers l'économie socialiste*, Maspero, Paris, 1968.

G. 博法:《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巴黎,弗·马斯佩罗出版社,1964年。

G. Boffa, *Les bolcheviks et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F. Maspero, Paris, 1964.

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1970年。

N. Boukharine, *Ö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Rowohlt, Hambourg, 1970.

尼·布哈林:《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汉堡,C.霍因-纳克福尔格·L.肯布莱出版社,《俄国通讯小丛书》,第82—83种,1923年,共82页。

N. Boukharin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Kultur* (Verlag C. Hoym, Nachf. L. Cahnbley), Kleine Bibliothek der Russischen Korrespondenz n<sup>os</sup> 82-83, Hambourg,

1923, 82 p.

尼·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入门》,两卷本,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68年。

N. Boukharine et Preobrajenski, *L' A. B. C. du communisme*, 2 vol., Maspero, Paris, 1968.

莫里斯·布林顿:《布尔什维克与工人监督》,载《自治和社会主义》杂志,1973年9、12月号。

Maurice Brinton, *Les bolcheviks et le contrôle ouvrier*, revue *Autogestion et socialisme*, sept. déc. 1973.

皮埃尔·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

Pierre Broué, *Le Parti bolchévique*,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63.

J. 布尼安和 H. 菲什:《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18年)》,斯坦福-牛津,1965年。

J. Bunyan et H. Fish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 Stanford-Oxford, 1965.

E. H.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企鹅丛书》,1966年,第2卷;1966年,第3卷。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Penguin Books, tome 2, 1966; tome 3, 1966.

E. H. 卡尔:《苏联的形成》,巴黎,子夜出版社,1950年。

E. H. Carr, *La Formation de l'URSS*,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50.

E. H. 卡尔:《一国的社会主义(1924—1926年)》,第1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4年。

- E. H.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vol. 1, Macmillan, Londres, 1964.
- E. H. 卡尔和 R. W. 戴维斯:《计划经济的基础》,第1卷,第2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9年。
- E. H. Carr et R. W.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vol. 1 et vol. 2, Macmillan, Londres, 1969.
- G. 沙拉波夫:《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土地问题》(俄文本),莫斯科,1966年。
- G. Charapov, *La Question agraire en Russie au lendemain de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en russe), Moscou, 1966.
- A. V. 沙亚诺夫:《农民经济原理》(D. 索纳、B. 克布莱和 R. E. F. 史密斯出版),美国经济协会,伊利诺斯,霍姆伍德出版社,1966年。
- A. V. Chayanov,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edited by D. Thorner, B.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Homewood, Illinois, 1966.
- D. M. 柯林斯:《关于1917年10月俄国赤卫队力量的札记》,载《苏联研究》,1972年10月号,第270页起。
- D. M. Collins, «A note on the Numerical Strength of The Russian Red Guards in October 1917», in *Soviet Studies*, oct. 1972, p. 270 s.
- 《苏联共产党的社会成份和民族成份(1927年联共(布)党员登记总结)》,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
- Composition sociale et nationale du PCUS (Sotsialnyi i natsionalny Sostsav V. K. P. (b): Itogi vsesoiouznoi*

- partiinoi perepisi 1927 g.), Moscou-Leningrad, 1928.
- «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汇编», 莫斯科, 1939 年。
- Congrès des Soviets de la RSFSR d'après leurs résolutions (Siezdy Sovetov RSFSR v Postanovleniyakh)*, Moscou, 1939.
- «百科词典», 两卷本, 莫斯科, 1963 年。
-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Entsiklopedicheskiï Slovar)*, 2 tomes, Moscou, 1963.
- «1917 和 1919 年农民经济的分化», 莫斯科, 中央统计局, 1922 年。
- La Différenciation économique de la paysannerie en 1917 et 1919 (Ekonomitcheskoe Rassloenie Krestiantsva v 1917 i 1919 gg.)*, Direction centrale de la Statistique, Moscou, 1922.
- 莫里斯·多布: «1917 年以来苏联经济的发展», 伦敦, 劳特莱克-基根出版社, 1948 年。
- Maurice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Routledge & Kegan, Londres, 1948.
- S. 杜布罗夫斯基: «1917 年俄国革命中的农民运动», 柏林, 1929 年。
- S. Dubrowski, *Die Bauernbewegung in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1917*, Berlin, 1929.
- 弗·恩格斯: «反杜林论», 巴黎, 社会出版社, 1956 年。
- F. Engels, *Anti-Dühring*,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6.
- 马克·费罗: «1917 年革命», 巴黎, 奥比埃出版社, 1967 年 (自

543 页起有大量关于俄国革命初期的书目)。

Marc Ferro, *La Révolution de 1917*, Aubier, Paris, 1967  
(aux pages 543 s. se trouve une abondante bibliographie  
concernant les débuts de la révolution russe).

L. A. 弗齐也娃:《回忆列宁》,莫斯科,1964 年。

L. A. Fotieva, *Souvenirs sur Lénine (Iz Vospominani o  
Lenine)*, Moscou, 1964.

《盖莱克是怎样对付什切青罢工者的》,巴黎,塞利奥出版社,1971  
年。

*Gierek face aux grévistes de Szczecin*, SELIO, Paris, 1971.

J. K. 金斯:《西伯利亚、协约国和高尔察克》,北京,1921 年。

J. K. Gins, *La Sibérie, les Alliés, Koltchak (Sibir, Soïouz-  
niki, Kolchak)*, Pékin, 1921.

《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本),莫斯科,1928 年和 1930 年。

*Grande Encyclopédie soviétique (en russe)*, Moscou, édi-  
tions de 1928 et de 1930.

西格里德·格罗斯科普夫:《俄国谷物问题和新经济政策》,高等  
技术学校第六系论文,1970 年 9 月。

Sigrid Grosskopf, *Le Problème des céréales en Russie et  
la Nep*, Mémoire EPHE-VI<sup>e</sup> Section, septembre 1970.

西格里德·格罗斯科普夫:《新经济政策时期土地的占有、使用和  
分配》,载《俄国和苏联手册》,1973 年 10—12 月。

Sigrid Grosskopf, «Appropriation, utilisation et partage  
des terres à l'époque de la Nep» in *Les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oct. -déc. 1973.

- M. 格伦巴赫:《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研究》, 高等技术学校第六系  
博士论文, 1973 年。  
M. Grumbach,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en Russie*, Thèse de 3<sup>e</sup> cycle, EPHE-VI<sup>e</sup>  
Section, 1973.
- G. 豪普特:《有关苏联历史的书目》, 载《俄国和苏联手册》, 1960  
年, 第 502—513 页。  
G. Haupt, "Ouvrages bibliographiques concernant l'his-  
toire de l'URSS", i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  
tique*, 1960, p. 502-513.
- G. 豪普特和 J. J. 玛丽:《布尔什维克自述》, 巴黎, 弗·马斯佩罗  
出版社, 1969 年。  
G. Haupt et J. J. Marie, *Les bolcheviks par eux-mêmes*,  
F. Maspero, Paris, 1969.
- 亚历山得拉·柯伦泰:《工人反对派》(《社会主义或暴行》, 1964 年  
1—3 月, 第 35 期, 根据“团结”小组再版本转载。)  
Alexandra Kollontai, *L'Opposition ouvrière* (réédité dans  
le n<sup>o</sup> 35 de janvier-mars 1964 de *Socialisme ou Barbarie*  
d'après la réédition due au Groupe Solidarity).
-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十年(1917—1927 年)》  
(俄文本), 莫斯科, 1928 年。  
Krijjanovski, *Dix ans de construction socialiste en URSS,*  
*1917—1927* (en russe), Moscou, 1928.
- L. 克里茨曼:《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期》, 莫斯科, 1926 年。  
L. Kritzmman, *La Période héroïque de la grande révolu-*



*tion russe (Geroïtcheskii Period Veliki Rousskoï Revolutsiï)*, Moscou, 1926.

R. 拉布里:《共产主义的立法。布尔什维克政府主要法律、法令和决议汇编》,巴黎,帕约出版社,1920年。

R. Labry, *Une Législation communiste. Recueil des lois, décrets, arrêtés principaux du gouvernement bolcheviste*, Payot, Paris, 1920.

克洛德·勒福尔:《官僚主义批判原理》,日内瓦,德罗兹书店,1971年。

Claude Lefort, *Éléments d'une critique de la bureaucratie*, Librairie Droz, Genève, 1971.

《列宁全集》,莫斯科,1964年,第5版,第45卷。

V. I. Lenin, *Œuvres complètes (Polnoe Sobranie Sotchinieni)*, 5<sup>e</sup> édition, tome 45, Moscou, 1964.

《列宁全集》,莫斯科,第3版,第26、27和28卷。

V. I. Lénine, *Œuvres (Sotchinienia)*, 3<sup>e</sup> édition, tomes 26, 27 et 28, Moscou.

《列宁全集》,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第20(1928年)、21(1930年)、25(1935年)卷。

V. I. Lénine, *Œuvres complètes*, 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tome XX (1928), XXI (1930) et XXV (1935).

《列宁全集》,46卷本,巴黎,社会出版社,1958—1972年(据俄文第4版翻译),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参考本版。

V. I. Lénine, *Œuvres*, tomes 1 à 46,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8 à 1972 (traduction de la 4<sup>e</sup> édition des *Œuvres* en russe). Sauf indications contraires, les références aux O. C. renvoient à cette édition.

莫谢·勒万:《列宁的最后战斗》,巴黎,子夜出版社,1967年。

Moshe Lewin, *Le Dernier Combat de Lénine*,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67.

马塞尔·利布曼:《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两卷本,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年。

Marcel Liebman, *Le Léninisme sous Lénine*, 2 tomes,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73.

D. L. 利蒙:《列宁与工人监督》,载《自治》1967年12月号。

D. L. Limon, «Lénine et le contrôle ouvrier», in *Autogestion*, numéro de décembre 1967.

达尼埃尔·林登贝格:《共产国际和阶级教育》,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2年。

Daniel Lindenberg,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et l'École de classe*, Maspero, Paris, 1972.

达尼埃尔·林登贝格:《关于苏联学校建立前的历史》,载《今日政治》1971年9月号,第57页起。

Daniel Lindenberg, «Sur la préhistoire de l'école soviétique», in *Politique Aujourd'hui*, numéro de septembre 1971, p. 57 s.

阿·洛佐夫斯基:《工人监督》(俄文本),莫斯科,1918年。

A. Lozovski, *Le Contrôle ouvrier* (en russe), Moscou, 1918.

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两卷本,巴黎,《马斯佩罗小丛书》,1968年。

Rosa Luxemburg, *La Révolution russe*, 2 tomes, 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 Paris, 1968.

《政治经济学教程》,苏联科学院,巴黎,社会出版社,1956年。

*Manuel d'économie politique*,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6.

《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年,第1卷;1967年,第2卷;1968年,第3卷。

Mao Tsé-toung, *Œuvres choisies*, E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Pékin, tome 1, 1966; tome 2, 1967; tome 3, 196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8卷本,巴黎,社会出版社,1967—1969年。

Karl Marx, *Le Capital*, 8 tomes,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67—196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未发表的一章》,丛书第10/18种,巴黎,1971年。

Karl Marx, *Le Capital, Chapitre inédit*, Collection 10/18, Paris, 197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巴黎,社会出版社,1957年。

Karl Marx, *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7.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1928年。

Karl Marx, *Le 18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 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1928.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两卷本,巴黎,人类出版社,1967和1968年。

Karl Marx, *Fondements de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2 tomes, Editions Anthropos, Paris, 1967 et 1968.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年,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无出版日期)。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ietz Verlag, Berlin, 1953 et Europäische Verlag, Frankfurt (sans indication de date).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巴黎,社会出版社,1968年。

Karl Marx, *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68.

《马克思著作》,巴黎,七星出版社,1968年,第2卷。

Karl Marx, *Œuvres*, tome 2, Editions de la Pléiade, Paris, 1968.

卡尔·马克思:《哲学著作》,巴黎,科斯特出版社,1937年,第6卷。

Karl Marx, *Œuvres philosophiques*, tome 6, Editions Costes, Paris, 1937.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卡·考茨基等的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

Marx-Engels, *Briefe an A. Bebel, W. Liebknecht, K. Kautsky und Andere*, Moscou-Leningrad, 1933.

马克思和恩格斯:《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巴黎,社会出版社,1950年和1966年。

Marx-Engels, *Critique des Programmes de Gotha et d'Erfurt*,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0 et 1966.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讯集》,巴黎,社会出版社,1971年和1972年,1—3卷。

Marx-Engels, *Correspondance*, tome 1 à 3,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71 et 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柏林,迪茨出版社,1962年,第18卷;1962年,第19卷;1963年,第22卷。

Marx-Engels, *Werke*, Dietz Verlag, Berlin, tome 18, 1962; tome 19, 1962; tome 22, 1963.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巴黎,社会出版社,1969年。

Marx-Engels, *La Sainte Famill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69.

鲁瓦·阿·梅德维捷夫:《斯大林主义》,巴黎,瑟伊出版社,1971年。

Roy A. Medvedev, *Le Stalinisme*, Le Seuil, Paris, 1971.

奥尔加·A. 纳尔基耶维茨:《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形成》,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0年。

Olga A. Narkiewicz,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tate Apparatu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0.

N. 奥加诺夫斯基和 N. D. 康德拉捷夫:《苏联农业发展的前景》(俄文本),莫斯科,1924年。

N. Oganovskii et N. D. Kondratiev, *Perspectives du*

*développement agricole de l'URSS* (en russe), Moscou, 1924.

V. 奥西波夫等:《恢复时期萨拉托夫的党组织》(俄文本), 萨拉托夫出版社, 1960年。

V. Osipov et autres, *L'Organisation du parti de Saratov au cours des années de reconstruction* (en russe), Editions de Saratov, 1960.

M. 乌斯季诺夫:《开发土地的形式问题》(俄文本), 载《布尔什维克》1927年19—20期。

M. Oustinov, «La question des formes d'exploitation du sol», (en russe) in *Bolchevik*, n<sup>os</sup> 19-20 de 1927.

《从数字来看党》,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年。

*Le Parti à la lumière des chiffres (Partia v tsifrovom osvechenii)*, Moscou-Leningrad, 1925.

《苏联小百科全书》(俄文本), 莫斯科, 1929年。

*Petite Encyclopédie soviétique* (en russe), Moscou, 1929.

A. 波利亚科夫:《十月革命的土地社会经济改革(1917—1920年)》, 载《苏维埃农民和苏联集体农庄的历史》(俄文本), 莫斯科, 1963年。

A. Poliakov, «Les transformations socio-économiques agraires de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1917-1920)», in *Histoire de la paysannerie soviétique et de la construction kolkhoziennne en URSS* (en russe), Moscou, 1963.

P. 波波夫:《俄罗斯联邦的谷物生产》(俄文本), 莫斯科, 1921年。

P. Popov, *La Production de céréales en RSFSR* (en russe), Moscou, 1921.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年。

*Le Pseudo-Communisme de Khrouchtchev et les leçons qu'il donne au monde*, E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Pékin, 1964.

克利斯提安·拉柯夫斯基：《政权的职业性危险》，载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克·拉柯夫斯基和列·托洛茨基：《论官僚主义》，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红色》丛书，1972年。

Christian Rakovsky, «Les dangers professionnels du pouvoir», in *De la bureaucratie* de E. Preobrajensky, C. Rakovsky, L. Trotsky, Ed. Maspero, coll. Livres «Rouge», Paris, 1972.

《1922年全俄共产党党员登记》，莫斯科，1922年。

*Recensement panrusse des membres du PCR en 1922* (*Vserossiskaïa perepis chlenov RKP 1922 g.*) Moscou, 1922.

《俄罗斯联邦工农政府决议和命令汇编》(俄文本)，司法人民委员部编，莫斯科，1919和1920年。

*Recueil des décisions et ordres du gouvernement ouvrier-paysan de la RSFSR* (en russe), Commissariat du Peuple à la Justice, Moscou, 1919 et 1920.

T. H. 利格比：《1917—1967年苏联共产党党员资格》，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

T. H.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

1917--1967, P. U. P, Princeton, 1968.

雅克·萨杜尔:《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札记》,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1年。

Jacques Sadoul, *Notes sur la révolution bolchevique*, Maspero, Paris, 1971.

L·夏皮罗:《苏联共产党》,梅休因有限公司,1970年。

L.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Methuen and Co. Ltd. Edition de 1970.

T·沙宁:《难对付的阶级,发展中社会农民政治社会学》,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easantry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res, 1972.

列·索斯诺夫斯基:《行为及人》,《真理报》社论汇编,译自俄文,维也纳,文学和政治出版社,1924年。

L. Sosnovski, *Taten und Menschen*, Recueil d'articles de la *Pravda*, traduits du russe,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Vienne, 1924.

《苏维埃、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出版,莫斯科,1924年。

*Les Soviets, les Congrès des Soviets et les Comités exécutifs (Soviety, Sezdy Sovietov i Ispolkomy)*, publication du N. K. V. D., Moscou, 1924.

《斯大林全集》,巴黎,社会出版社,1954年,第3卷;巴黎,社会出版社,1955年,第4卷。



J. Staline, *Œuvres*, tome 3,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4;  
tome 4,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5.

约·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巴黎,法共出版社,1952年。

J. Staline, *Les Problèmes économiques du socialisme en URSS*, Editions du PCF, Paris 1952.

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两卷本,巴黎,诺尔曼·白求恩出版社,1969和1970年。

J. Staline, *Les Questions du léninisme*, 2 tomes, Editions Norman Béthune, Paris, 1969 et 1970.

《斯大林全集》,莫斯科,1953年,第6卷。

J. Stalina, *Works*, tome 6, Moscou, 1953.

安·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纽约,主流出版社,1956年。

A. L. Strong, *The Staline Era*, Mainstream Publishers, New York, 1956.

保罗·M. 斯维济和夏尔·贝特兰:《有关当前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书信》,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2年。

Paul M. Sweezy et Ch. Bettelheim, *Lettres sur quelques problèmes actuels du socialisme*, Maspero, Paris, 1972.

列·托洛茨基:《论革命》,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

L. Trotsky, *De la Révolution*,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63.

列·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军事著作》,巴黎,埃尔纳出版社,1967年,第1卷。

L. Trotsky, *Comment la révolution s'est armée. Ecrits*

*militaires*, Edition de L'Herne, Paris, 1967, tome 1.

列·托洛茨基:《红军的道路》,1970年第3—4期《怎么办?》,根据1922年5月21日原文转载。

L. Trotsky, «Le chemin de l'Armée rouge», texte du 21 mai 1922, in *Que faire?*, n<sup>os</sup> 3-4 de 1970.

N. M. 瓦纳格:《世界大战前夕的俄国金融资本》(俄文本),莫斯科,1926年。

N. M. Vanag, *Le Capital financier en Russie à la veille de la guerre mondiale* (en russe), Moscou, 1926.

《喀琅施塔得真相》,布拉格,1921年。

*La Vérité sur Cronstadt (Pravda o Kronstadte)*, Prague, 1921.

L. 沃林:《俄国农业一百年》,剑桥,马斯出版社,1970年。

L. Volin,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Cambridge, Mass., 1970.

詹姆斯·D. 怀特:《莫斯科、彼得堡和俄国的实业家》,载《苏联研究》,1973年1月号,第414页起。

James D. White, "Moscow,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Industrialists", in *Soviet Studies*, janvier 1973, p. 414 s.

兹纳缅斯基:《唐波夫省苏维埃机关发展史》(俄文本),《苏联建设》汇编,莫斯科,1925年第1卷。

Znamensky, «Histoire du développement de l'appareil soviétique dans la province de Tambov», tome 1 du recueil *La Construction soviétique*, Moscou, 1925 (en russe).

## 主 要 报 刊

俄文:

《农村公社》

*Derevienskaia Kommuna.*

《经济生活》

*Ekonomiticheskaia Jizn.*

《历史论丛》

*Istoritcheskie Zapiski*

《消息报》

*Izvestia.*

《俄共(布)中共委员会通报》

*Izvestia Tsentralnago Komiteta R. K. P. (Bulletin d'information du C. C. du P. C. R.).*

《国民经济》

*Narodnoe Khoziaistvo.*

《党的生活》

*Partinaia Jizn.*

《真理报》(俄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Pravda (organe du C. C. du P. C. R. et du P. C. U. S.).*

《苏联建设》

*Sovietskoë Stroitelstvo.*

《历史问题》

*Voprossi Istorii.*

法文:

《社会经济史年鉴》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共产主义者公报》

*Bulletin communiste.*

《俄国和苏联手册》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政治和社会问题》,《法国资料》,1971年,第74期。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n° 74, 1971.*

《苏联研究》

*Etudes soviétiques.*

英文:

《苏联研究》

*Soviet Studies.*

《斯拉夫评论》

*Slavic Review.*